国际政界名人传记

ZPAMÄTI

前捷共中央第一书记
“布拉格之春”
的发起人

杜布切克回忆录

ALEXANDER DUBČEK

〔捷〕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著

Nádej zomiera posledná

新华出版社

杜布切克回忆录

〔捷〕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著
黄英尚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布切克回忆录/（捷）杜布切克著；黄英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5
ISBN 7-5011-5200-4
Ⅰ.杜…… Ⅱ.①杜…②黄… Ⅲ.杜布切克，A.（1921—1992）-回忆录 Ⅳ.K835.1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987号
京权图字：01-2001-0342

Nádej Zomiera posledná
Z pamäti Alexandra Dubčeka
Vydavatel'stvá Národná obroda，a. s.，Práca，spol. s r. o.，
Bratislava，1993
根据布拉迪斯拉发民族复兴和劳动出版社
1993年斯洛伐克文版译出

杜布切克回忆录
〔捷〕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著
黄英尚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 邮编：100803）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235千字
2001年5月第一版 2001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200-4/D·825 定价：20.00元（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1921. 11. 27—1992. 11. 7)



1968 年杜布切克在民众中间



上图：1968年8月1日杜布切克（左四）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左三）、柯西金（左六）等人在一起。

下图：1968年8月21日在布拉迪斯拉发街头。





1968年8月苏军入侵后，人们凭吊最初的受害者。街道的墙上挂着杜布切克等捷领导人的画像。

作者简介

1921.11.27　生于斯洛伐克的一个世代工人家庭。父亲是个木匠，二次大战时曾任斯共第三届地下中央领导成员。

1925—1938　随父母和哥哥在苏联生活、学习。

1939　加人斯共，到机械厂当车工。

1944.8　同哥哥一起参加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不止一次负伤，哥哥在起义中牺牲。

1945—1949　在酵母厂当维修工。

1949—1951　先后任斯共特伦钦县委书记和第一书记，其间曾参加斯共中央举办的为期半年的政训班和三周军训。

1952 初　代理民族阵线斯洛伐克委员会主席，业余通过函授攻读法律。

1953—1960　先后任斯共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和布拉迪斯拉发州委第一书记，其间 1955 至 1958 年，上苏共中央高级党校。

1958　当选为斯共和捷共中委、斯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1960—1962　任捷共中央书记，主管工业。

1962—1963	任斯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
1963—1968	任斯共中央第一书记、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1968.1—1969.4	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9.4—1969.10	任捷联邦议会主席。
1969.12—1970.6	任捷驻土耳其大使。
1970.6	被开除出捷共,后与持不同政见者接触,有时对当局提出批评。
1970—1985	在国营西斯洛伐克林场当机械师,实被软禁,直至退休。
1989.12—1992.6	再次出任捷联邦议会主席。
1992	任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
1992.9.1	遭遇车祸,身受重伤,两个多月后(11月7日)身亡。车祸原因迄无定论,仍在调查之中。

译者的话

1968年初亚·杜布切克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掀起“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这是一次有益的改革尝试。苏联为阻止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并防止它蔓延到整个苏联东欧地区，悍然于同年8月20日深夜，伙同波、（东）德、匈、保四国，出动数十万（最多时为60万）大军侵捷，其霸权主义面目暴露无遗。

作者身为当时捷的第一把手，在回忆录中向广大读者和国际问题专家，提供了关于这一震撼世界的重大国际事件的最权威、最可靠、最翔实的情况，其中包括“布拉格之春”的由来，捷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苏联的入侵与占领，捷苏莫斯科会谈及以后的斗争等。

作者童年和少年时期在苏联度过，后又到苏共高级党校学习，参加过1944年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解放后历任斯共县委和州委第一书记、捷共中央书记、斯共和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捷议长，因此，关于捷、苏和苏欧地区其它国家，也提供了许多其它鲜为人知、不可多得的情况。

本回忆录1990年至1992年由作者口述，他人整理，1993年出版。作者晚年曾任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因而其所持立场和观点，不免带有该党的色彩。

中文版据斯语版译出。为便于阅读和理解，译者在书中加了一些注释，在书前和书后附上作者简介和捷大事略表。书中注释除标明原注外，均为译者所加。不妥之处，望读者指正。

译者

2000 年 10 月

目　　录

1

一个人的命运是如何形成的

对自己的命运，多少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多少是事先就确定了的，总是争论不休。就我而言，我们家不断迁来迁去，肯定从一开始就对我有巨大影响。那是从几个移居芝加哥的斯洛伐克社会党幻想家开始的。在我出生之前不久，他们回到祖国斯洛伐克。当然，我已不记得，我是怎样经受船只的颠簸的。

我诞生于捷克斯洛伐克，时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三年。对斯洛伐克，我只有很少一些早期记忆，因为父母带着我进行另一次长途跋涉时，我才三岁。这一回，我们乘火车向东走了6400公里，走到苏联的吉尔吉斯，这儿靠近中国。我父母的愿望是帮助刚诞生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

到我12岁，我们一直留在吉尔吉斯。我的多数早期记忆同一个地方连在一起，当时叫比什佩克，后来更名为伏龙芝，现又易名，不过已按吉尔吉斯语叫作比什凯克。然后，我们迁到位于俄罗斯中部、伏尔加河上的高尔基市，我们在那里又住了五年。我17岁时，父亲终于把我带回幼时认得的斯洛伐克。我对它的想象几乎完全建立在父母的回忆之上。我们是在1938年，即希特勒准备以暴力分裂捷克斯洛伐克时回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风雨正好在我成年时来临了。我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打上我先前经历的印记。事情还能不如此吗？

* *　　* *　　* *

对我早期岁月的回忆是偶然的，断断续续的。就如同每个人一样，我对自己以往的生活到后来才看得更清楚，即使有时觉得像放电影，有些部分进行得快些，另一些部分进行得慢些。

自然有过这样的情况，在其发生时，我并不理解。对某些事情，经过数年，我才理解其意义。也发生过我现在才努力去理解的事情。我经常重新考虑自己过去作出的反应和行为，假如我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满意，那就是骗人。但是我相信，我从不背叛自己的良知。我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体味过去的某些事件，并努力再次重新给予评价。有时以前的看法颠倒过来了。但是，认识和理解是逐步得来的。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未真正了解应该了解的一切，就必须作出许多决定。

父母两人都生于中斯洛伐克的西部。我父亲什捷凡的出生地是乌赫罗维茨，位于当时的县城班诺夫采、我母亲巴芙琳娜·柯比多娃出生地东北约三公里处。这是白喀尔巴阡山东南、斯特拉若夫山西部的一个风景如画、森林茂密的地区，但农业资源有限，只有小生产，只能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少量食品。乌赫罗维茨村名称来自一个表示属于匈牙利的词，虽然它是个地地道道的斯洛伐克村子。当地居民使用这一名称，是因为一批匈牙利人11世纪从亚洲来到多瑙河谷地之后不久，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山寨。

20世纪初，乌赫罗维茨是个纯粹斯洛伐克的村子，大约有1000人。除了天主教徒占多数以外，由奥格斯堡派福音教徒组成的、占少数的新教徒在那里也异常活跃。稍后的统计甚至表明福音教徒在乌赫罗维茨占多数，这在天主教徒占优势的斯洛伐克是罕见的，虽然在中斯洛伐克并不那么稀罕，在捷克地区17世纪反对改革之前，新教徒在那里找到了庇护所。早在19世纪初，我的

远祖安德烈·杜布切克的名字就被列入乌赫罗维茨福音教管理处的登记册以及县里的纳税人登记册。

当时在乌赫罗维茨只有地方性的小生产：锯木厂、纺纱厂、制糖厂，还有一个小玻璃厂，但农业仍然是食物的主要来源。劳动岗位很少，许多年青人不得不到其它地方找工作。祖父是个玻璃工人，在当地的玻璃厂做工。越来越穷的家里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我们家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地，全靠祖父挣的钱过活。孩子还小的时候，祖父就死于肺结核，养育子女的重担就落到祖母肩上。幸好她可顶已故丈夫在玻璃厂的班。

在乌赫罗维茨至今仍有座小屋子，我父亲一家当时就住在那里。这是一间小房子，内部未安装任何设备。在拥挤的空间里，祖母抚育了三个子女。她教养得好，想方设法使所有子女都学会一种手艺。父亲学会木工，他弟弟米哈尔学会裁缝，他们的妹妹也学会了缝纫。对祖母来说，这是巨大的自我牺牲，但她从不动摇，尽管许多人不像她这么有力、顽强。

在我父亲的那个时候，乌赫罗维茨有一所两个班的天主教基础学校和一所用匈牙利语授课的五个班的公立学校。在基础学校，斯洛伐克语每周只上两个钟头。但是，能上学的一般只限于比较富裕的家庭子弟，我说不准，我父亲上到了几年级。不过，我能肯定，贫困的童年终生都对他起促进作用，事先确定了他的活动以及对世界的看法。他是个坚决果断、积极肯干、肯动脑筋、不依赖别人的人，心情几乎总是良好。他身体相当健壮，也能干，因此我总是注意瞧他做什么、怎么做。由于父亲有这些品质，老乡们也都敬重他。换句话说，他是个有天然威望的父亲。

尽管贫困，父亲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这并非偶然。我从他那里，也从母亲那里了解到，在这一有悠久爱国传统和较高文化水平的地区，人们很关心外部世界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在乌赫罗维茨，人们特别感到自豪的是，斯洛伐克现

代民族生活的奠基人物留多维特·什图尔[1] 1815年诞生在那里。留多维特·什图尔是福音教教师的小儿子，他争取民族复兴的重大努力——在生死攸关的1848年和1849年达到高潮——在全国尽人皆知。

斯洛伐克人作为一个民族，在没有国家、明确划定的边界和自治的情况下，当然是不会屈服的。他们反抗布达佩斯执行的强迫匈牙利化的政策。他们为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文化和保存自己的语言而斗争。从这一角度看，受过教育的政治精英和居民的观点接近起来了。斯洛伐克工人阶级特别关心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和工业民主的思想对他们来说是亲切的。父亲学木工时，在乌赫罗维茨已有各种工人兴趣小组，也有1905年成立的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支部。

1910年，父亲不足19岁，沿着瓦赫河和多瑙河河岸向南走到布达佩斯找工作。他会匈牙利语，很快就在家具厂找到工作。他在那里参加了匈牙利工人党支部的组建工作。那是个年青的党，其纲领把拉萨尔和马克思两者的观点结合起来，类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对匈牙利当局来说，这个党是太激进了，父亲几个月之后就失去了工作。

他当时像在他之前成千上万、随后几年还多得多的斯洛伐克年青人那样，决定去美国。美国对他们来说，就像对许多欧洲人来说那样，是个令人向往的国家。那是个共和国，这本身就使人感到新鲜，因为欧洲还有一半处于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美国也是个民主国家，这更令人羡慕。美国是个大国，因此他们觉得，在那里，机遇在等待着所有奋发努力的人……

父亲的弟弟米哈尔叔叔，裁缝出身，同他一起去。1912年，他

---

① 留多维特·什图尔（1815—1856），19世纪中叶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代表人物，与他人一起规范了斯洛伐克书面语言。

们抵达芝加哥，在该市的北部已有一个巨大的斯洛伐克社区。最初几年父亲在各地当木工，每周大约挣 25 美元，积极参加斯洛伐克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参加美国社会党斯洛伐克部的活动。当时这个党十分兴旺，有十多万名党员，在芝加哥还有几个民族的支部。

除此以外，在城里进行竞选和举行国家选举时，党的斯洛伐克支部还组织了许多活动，父亲参加了这些活动。他听报告，上英语课并参加公开演讲训练班。他在“斯佩沃柯尔”斯洛伐克工人俱乐部练体操，业余还演戏。

1915 年，父亲 24 岁时，在诺思林荫道北面的韦布斯特街和阿什兰街的乐器厂找到报酬较高的工作，每周挣 40 美元。该厂大部分工人都是匈牙利人，正好父亲掌握他们的语言。

1916 年，父亲似乎已决定留在美国，并接受美国国籍。他当时显然过得比较好。几年前他的一位老朋友写信告诉我，父亲和他合用一张电车票，帮了他的忙。他们两人每天在阿什兰站从电车窗子里往外递车票。另一位朋友回忆说，父亲租用的房间没有洗澡间，因此常去他那里洗澡。虽然没有洗澡间，父亲也不愿意离开房东，那是位有四个孩子的寡妇，房租是她的惟一收入。

这种平静的生活在 1917 年美国参战时被打破了。美国的社会党人对此感到震惊。他们曾根据 1916 年竞选时的许诺判断，托·伍·威尔逊[①] 和民主党真的反对战争。当然，社会党人强烈反对任何战争。在当时的社会党国际，实际上只有美国人仍然忠于在反战政策方面的长期使命。美国参战时，他们也未改变立场。

父亲真诚地赞同反战思想。我们家的一位老朋友回忆时说道，父亲经常说，假如他被征召入伍，会把他派到欧洲某个战场，可

---

① 托·伍·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 28 任总统（1913—1921），民主党人，力促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不得不向在奥匈军队中服役的另一些斯洛伐克人开枪。这把他吓坏了。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和他的斯洛伐克朋友约瑟夫·格里盖尔决定逃避兵役，他们想去墨西哥，在那里等到战争结束。他们到了得克萨斯州的拉雷达，碰上其他许多想法越境的年青男子、言辞激烈的人和反战者。不过，父亲和约瑟夫·格里盖尔没找对路线，被抓住，送交法庭，让他们选择：监禁一年半或罚款 1000 美元。他们付不起，只好进监狱。

在把他们送上法庭之前，向他们提供了一种选择，即答应入伍。他们出于原则性的理由拒绝了。战争结束时，他们还在坐牢。获释后，父亲回到芝加哥乐器厂原来的岗位上。这个时候，我的父母在芝加哥斯洛伐克工人俱乐部相见，他们很快就结婚。

我母亲巴芙琳娜，原姓柯比多娃，比父亲早到芝加哥。她的父母萨穆埃尔和安娜·柯比多维住在离乌赫罗维茨不远的班诺夫采。母亲于 1897 年出生在那里，她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她出身于贫困、没地的天主教家庭，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她的哥哥米哈尔、姐姐卡塔琳娜和安东尼娅等三人，分别于 1902 年至 1904 年间离开斯洛伐克去美国。

母亲于 1909 年走上漫长的路途，跨越大西洋去找哥哥和姐姐。她去那里时才 13 岁，是和生人一块去的。不过她在芝加哥找到姐姐和哥哥，他们帮助她开始过新的生活。

父母相见的时候，母亲在一个犹太富商家当厨娘和佣人。父母两人来自斯洛伐克的同一地区，这显然有利于他们互相接近。母亲是个自学者，非常富于善良感和正义感，自然而然倾向于在许多方面同她所受的基督教教育相接近的社会主义理想。她参加社会党斯洛伐克支部的活动。在某些方面，她甚至比父亲更鲜明、更坚决。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个非常和蔼可亲、富于牺牲精神、乐于助人的人。她永远是个家的真正创造者，把温暖、清洁和亲切

带进我们简朴的住处。不论我们住在哪里，那里从不缺鲜花。在某些方面，我对她比对父亲更依恋。她叫我在房前屋后干一些并非总是愉快的活。她经常对我说："你是我唯一可依靠的人。"

哥哥尤利乌斯生于1919年12月，那时正处于暴风雨一样笼罩着芝加哥几个民族生活的战后混乱之中。社会党人分裂成几派，而且夺取领导的是比较激进的、列宁派的民族小组。特别是民族小组要对分裂负责，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简而言之，它们扎根于美国环境还不够。分裂使整个运动脱离美国生活的主流，它是美国整个左派即将瘫痪的先兆。父母两人都很快加入两个新成立的共产党之一。不过，他们加入哪一个，我可说不准。人们告诉我，是母亲带父亲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父亲后来也把它作为自己的政治信条。

我能想象，对他们来说，那该是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看来，俄国革命开辟新纪元。在此之前，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梦想。但是，正如在芝加哥争论激烈的会议上对他们所说的，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梦想变为现实。

同时，他们的祖国斯洛伐克终于不再是匈牙利的殖民地，成了新的、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个部分。这也影响了他们的观点和计划。与许多人的看法不同，同捷克人结盟的思想不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才产生的。它早就产生，19世纪中叶又有新意。两个民族及其语言相近，以及捷克过去不倦地支持斯洛伐克民族的夙愿，使这种联盟变得十分自然。

而且，如何把斯洛伐克民族从匈牙利上千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没有别的现实途径。同盟国的失败和奥匈帝国的崩溃更促成了这种情况。因此，斯洛伐克代表的秘密会议1918年5月底就在图尔昌尼的圣马尔丁举行，并通过建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共

同国家的思想，也并非偶然。这发生在托·加·马萨里克[①]和旅美斯洛伐克人代表签署匹兹堡协议之前几天。该协议也支持成立捷克斯洛伐克的思想，尽管其基础与后来实现时不同。

对在芝加哥的成千上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来说，这是值得欢迎的。1921 年初，父母决定回斯洛伐克。他们取出储蓄，乘船经过大西洋回国，随身带着当时只有一岁零三个月的尤利乌斯，而我回国时还在母亲腹中。他们持美国护照。因此，我只差几个月，错过生在美国的机会。

父母两人的家大部分留在美国。至今我在那里还有许多生来从未见过面的亲戚，叔叔、舅舅和姨母的后代，堂表兄弟姐妹和侄儿侄女。毫无疑问，其中有些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在斯大林主义政权年代，在我们这里人们是不能说有亲戚在西方的，即使是同他们通信也是危险的。到现在我才开始收到在美国“失踪的”亲戚的来信。有些至今仍住在芝加哥，另一些迁到密执安和佛罗里达。

回到乌赫罗维茨之后，父亲发现老房子已不能住。幸好父母可迁到一座属于当地福音教管理处的房子里的一套住房去住。在他们到来之前，那里住着管风琴手亚历山大·特兰奇克。他也领导教会学校。特兰奇克是个好人，他腾出住房，让我父母迁进去。我 1921 年 11 月 27 日出生时，他也当了我的教父。父母本来想给我取名米兰，但后来改变想法，为对特兰奇克表示尊敬，给我取名亚历山大。

但是，我出生于其中的这座乡村小房子，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一百多年前它也是留多维特·什图尔的诞生地。我和上一世纪

---

① 托·加·马萨里克（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1918—1935），1918 年 5 月 30 日同斯洛伐克在美国的团体代表签署匹兹堡协议，规定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中的地位。

最伟大的斯洛伐克人留多维特·什图尔生在同一座房子里，这是命中注定的吗？我觉得，两个事件的这种巧合后来也引起胡萨克[1]政权大怒，1970年以后他们把我宣布为人民和民族的敌人，奥韦尔[2]式的“不存在的”人。

当然，这一切我当时都没有意识到。

---

① 古·胡萨克（1913—1991），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总书记（1969--1987），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75—1989）。捷解放后曾任斯洛伐克部长会议主席，1951年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罪名被捕，195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60年获释，1963年恢复名誉。1968年任捷政府副总理。1969年4月起出任党的最高职务，根据苏联的要求，在捷推行“正常化”。

② 乔·奥韦尔（1903--1950），英国作家，现代“反乌托邦”代表，从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转到自由改良主义。

2

寻　　梦

我父母去美国时，是弗兰西斯·约瑟夫[1]皇帝的臣民，在欧洲地图上还没有斯洛伐克。而当他们1921年回国时，一切正好相反。奥匈帝国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是美国的公民，他们的祖国成了战后成立的欧洲四个新国家之一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从凡尔赛和约建立的政治秩序中诞生了，其安全，它的生存本身，取决于这一体系的存在。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生命攸关的。

我只能联系回国时的这些变化，来看父母的思想感情。但是我理解，他们要了解这些变化，需要时间。根据不断出现的历史事件，我们只能推论，时间不利于作这样的考虑。

从斯洛伐克的观点看，一切变化的主要结果，不仅是斯洛伐克从匈牙利的千年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还有其边界明确划定，并在匈牙利1920年不得不签字的特里亚农条约[2]中获得国际承认。在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是自己的行政单位，而不再是带有"上匈牙利"贬义称呼的不准确的地理概念。

根据通过的宪法，新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个民主共和国，拥有法律上由两院议会保障的立法权。带有社会党倾向的民主主义者

---

① 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1830—1916），奥地利皇帝、捷克和匈牙利国王（1848—1916）。

② 特里亚农条约，1920年6月4日协约国和匈牙利在法国特里亚农签订的条约，规定匈的边界、赔偿义务、匈军的数量和装备。

托·加·马萨里克任新的共和国总统，他是全国的道德大权威。在捷克斯洛伐克1920年第一次议会选举中，当时还把一切社会党人团结在一起的社会民主党赢得了胜利。它在全民投票中，获得25%以上的选票，成为国家中最强大的政党。当然，我们还可以补充，甚至早在战前社会党人就是捷克和摩拉维亚最强大的党，他们在1907年和1911年的选举中获得了40%的选票。对战前斯洛伐克社会党人的力量则不能作出可靠的估计。

新的国家的政治做法至少有些无疑是积极和“开明”的。例如1919年的土改肯定是通往较公平的土地所有制的一步：颁布的法令规定，私人耕种的土地最大面积为150公顷农地或250公顷各种土地。有趣的是，70多年之后，1991年新的捷克与斯洛伐克土地法回到类似的标准。新国家的社会政策的另一例子，是1921年8月企业委员会法，那是走向工业民主思想的一步。1919年11月11日的法律规定在布拉迪斯拉发创办第一所民族大学，对斯洛伐克具有巨大意义。

但是，并非一切都是好的。新宪法建立在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的思想之上，它只谈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语言法也只谈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语言。捷克的迫切需要是尽量缩小捷克和斯洛伐克大的非斯拉夫少数民族，但同时也表现为对斯洛伐克人争取承认其民族和文化特点的努力麻木不仁的、不恰当的、错误的做法。从长远的观点看，正如后来1938年、1939年、甚至1992年事件[①]所表明的，这没有好处。部分斯洛伐克政治代表很快就表示反对这个思想，包括宪法上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集权制规定。他们坚持要求自治，但捷克的国家政治领导和部分斯洛伐克政治代

① 1938年捷苏台德区的德族法西斯党闹事，英法要求捷把苏台德区割让给纳粹德国。1939年纳粹德国占领捷克和摩拉维亚，在斯洛伐克扶植傀儡政府。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领导人就国家体制问题发生争执，最后导致国家解体。

表不接受。

还有其它严重问题。父母回国时，成百上千个斯洛伐克家庭乘船经大西洋去西方。早在1920年，战后经济衰退就波及斯洛伐克，即比捷克斯洛伐克其它地区早一年。生产下降，失业猛增。可以理解，经济危机加强了我父母的社会主义观点。

社会民主党在1920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比战前减少，而工人运动的一些重要部分，由于长期战争引起的困难、战后经济衰退以及俄国革命令人产生幻想的榜样作用，则越来越激进。1920年至1921年，全世界左翼党发生分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不例外。温和的少数派留在老党内，激进派按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建立共产党，接受列宁提出的加入第三国际的21条件。

共产党人是强大的，特别是在捷克和摩拉维亚。在斯洛伐克，激进的、革命的力量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显然仍是多数。在很快即将成为我的出生地的乌赫罗维茨，也是如此。父母回国安顿之后很快就发现，当地的政治气氛像他们离开的芝加哥的斯侨社区。

正如父亲后来对我说的，他一适应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时区变化，就在乌赫罗维茨陷入关于工人运动的过去和未来的激烈的政治辩论之中。1921年9月25日，他主持当地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支部的会议，其主要议程是党的今后方针。不久，他们就接受了第三国际的政纲。

主要发言入叫巴拉什加克，是刚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干部。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要说明，他想干什么，大概不需要许多说服才能。会上决定建立当地的捷共支部，选举父亲为书记。同父母一起从美国回来的米哈尔叔叔，是当选的支部委员之一。

人们在回顾时感到奇怪，乌赫罗维茨的那些好人是怎么估计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那是些朴实的人，他们只根据个人和历史的经验作出判断。但是，同一事物在政治发达的国家法国、德国、

意大利，当然还有捷克是否适用？当时左翼到处掀起一股毫无批判地谈论革命俄国的一切的热情。摘掉领导的一个个党，掌握布尔什维克学说，放弃政治独立。如果我们重读列宁和考茨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和专政问题的争论，别的选择无疑是有的。但我怀疑，对别的选择会认真进行考虑，在充满激动的气氛中，别的选择几乎无任何希望被采纳。在旧的和新的义愤中，激进的、迅速的解决办法比呼吁理智与温和更符合这种气氛。一切看来非常简单：俄国爆发了劳动人民的革命——关于社会公平的梦想，“实现了的”梦想。现在一切好人的任务，就是给予这一梦想以完全、直接、无私的支持。

我父母参加国际援助合作社企业，就是采取这种态度的好例子。国际援助社是捷克斯洛伐克上千名工人组成的合作社的名称，他们于 1925 年至 1932 年分五批去苏维埃俄国。他们的想法是参加建设新社会。从政治上说，这一运动努力抵抗同盟国对俄国事务的干涉和打破新的苏维埃国家的孤立。在经济方面，该运动组织以金钱、物资、各种医疗和技术服务援助苏俄的活动。整个活动由国际工人援助组织协调，其中心设在德国，最有名的德语叫做 Internationale Arbeiter hilfe (IAH)。

国际工人援助组织成立于 1921 年，是对列宁援助饥荒受害者号召的响应。尽管它毫无疑问是由莫斯科领导的，1933 年之前其大本营设在柏林。它发展成为庞大的国际组织，1926 年在欧洲各国和海外有 1500 多万会员。

成立熟练工人合作社、把他们派到苏俄去的思想在其它国家也实现了，而国际援助社则首先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组织。其目的虽然也同国际工人援助组织协调，但行政上总的来说是独立的。

父亲 1923 年底或 1924 年初第一次从党的报刊上获悉关于国际援助社的情况。当时国际援助社已开始同苏联政府商谈其活动。合作社社长是鲁道夫·马雷切克，前俄国战俘。马雷切克在苏联

中亚经历过布尔什维克革命和随后的国内战争，因此产生派合作社到苏联土耳其斯坦、后来更名为吉尔吉斯坦的最东地区的想法。

马雷切克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工人之家，作关于中亚具有田园诗般条件的报告。他用幻灯机放映地广人稀、“鲜花遍地”、土地肥沃、原料丰富的镜头。他的观众喜欢森林茂密、果园里果树挂满苹果和桃子、葡萄园里葡萄熟了和异国驼队的画面。

父亲在汉德洛瓦和特伦钦参加这些报告会，像其他许多工人一样，较快地对未知的国度感到欢欣鼓舞。他不仅是位革命者，而且也有颗浪漫的心。他向母亲谈了计划，两人决定参加国际援助社。路途遥远、不了解情况也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他们已经是有经验的旅行家。

除要求合作社社员手艺要好以外，还要求他们每人投资达3000克朗之多。社员必须符合木工、机械工、电工、车工、皮革工、面包师、屠宰工等职业的专业水平。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工人，随身带着自己的劳动工具。父亲随身带着生产橱柜和装备木工房所需的一切。只有为数不多的社员未受过专业培训。

1925年3000克朗是很可观的，而且第二批报名的社员必须交得更多：5000克朗。父母假如想办更实际的事，用所交的费用可买一座房子和办个生产家具的作坊。但是，他们作出了另外的决定。许多社员把自己一生的积蓄投入合作社。另一些社员变卖了房子和一切其它财产。合作社只靠本社社员的社员费。

合作社用这些资金购买成套的机器设备和工具，包括蒸汽机和发动机、福特载重汽车、拖拉机、机器、木材和金属加工车间用的车床和切割机以及砖厂设备。国际援助社也购买了纺织机械、制革设备和许多其它用品……。要把这些设备运到苏联，需要一打以上的火车车皮，运费必须由合作社自付。我的父母像大多数社员一样，牺牲了所有的一切。

多数社员不仅仅把苏俄之行同建设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我

相信，只有一些组织者才是因思想热情而去的。多数普通社员是去寻找工作和好的生计的。他们希望，在他们设想的工人掌权的国家能找到这些。他们逃避国内日益扩大的失业和暗淡的前景。合作社的男子和女子都老老实实，富于牺牲精神，忠于所向往的没有统治者、有许多劳动岗位、不必天天为吃饭而发愁的国家的思想。1923 年 8 月，国际援助社领导向苏联政府提出，将派合作社到土耳其斯坦苏维埃共和国。它还要求为所有社员发证件。

1924 年 2 月，莫斯科的肯定答复来了，同年 8 月国际援助社的两名代表去莫斯科商谈签协议。代表团团长是捷克斯洛伐克议会上议院的共产党议员、参议员瓦茨拉夫·赫卢麦茨基，由鲁道夫·马雷切克陪同。赫卢麦茨基参加这一活动证明，活动获得了捷共的批准。但是，加入共产党不是参加国际援助社的条件，看来党委不对社员进行审查。

莫斯科会谈之后，赫卢麦茨基生病了，马雷切克自己到塔什干进行调查。塔什干是拥有里海和中国边界之间全部领土的苏联土耳其斯坦的首府。那是前俄国土耳其斯坦，沙俄军队 1881 年才攻占，后来红军于 1920 年攻占。

马雷切克起初设想要搞的显然不是大的工业合作社，而是一支较小的、流动性较大的队伍。他原先建议合作社安家的地方，是个叫普热瓦利斯克的城市。它座落在伊塞克-库尔湖东岸，帕米尔山麓。斯洛伐克共产党报纸当时的一篇文章《贫困的真相》把这个地方描写成“气候有利于健康的地区”，这可能是马雷切克提供的情况。但是，他提供的情况，正如后来所表明的，至少可认为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误入的。

马雷切克到塔什干才发现，铁路只通到比什佩克，距离以东的普热瓦利斯克还有约 800 公里。运送国际援助社的财产包括重型设备走数百公里草原到普热瓦利斯克是完全不可能的。

人们一定会感到奇怪，马雷切克究竟是怎么想的，数百人包

括妇女和儿童，即使不带重型机械，怎么能用几个月时间，步行经过沙漠和荒原，到达他向他们有声有色地描述的地方。到比什佩克的铁路也是不久前才竣工的。

因此，马雷切克从塔什干到比什佩克，同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一起签署协议。在那里决定，合作社将去比什佩克，这一协议得到莫斯科的确认。

马雷切克在塔什干和比什佩克的会谈还因整个地区正在进行的行政改组而复杂化。苏联从法律上说到 1922 年 12 月底即列宁逝世前一年才成立。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不复存在，比什佩克地区成为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的自治区。两年后的 1926 年，才获得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到 1936 年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难说马雷切克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所有这些问题。从俄国回来之后，他通知改变原计划设合作社的地点。但这只引起不大的兴趣，因只有马雷切克一人对那个地方有所了解。

社员 1924 年 11 月在日林纳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同苏方签订的协议。会上通过关于合作社基金分配的决定，并决定第一批 1925 年初春出发。这样，国际援助社就在 1925 年 3 月 29 日星期天早晨冒雨上路。火车头在烟气腾腾之中，拉着有 24 节车厢的列车，从日林纳向东驶去。十节客车车厢里安置社员及其家属。另 14 节货车车厢拉他们的设备。

队里有 303 人，代表捷克斯洛伐克较大民族（163 个捷克人，101 个斯洛伐克人，18 个匈牙利族人，13 个德族人，8 个俄族人）。我哥哥尤利乌斯和我对那天早晨都记不得了。我带到以后年代的，只是对我度过最早童年的地方的模糊回忆。几个熟人和亲戚的面孔，我们住的房子的样子和屋后的小院子，那是我的第一个游戏场……

儿童所记得的一切，是特别的。我记得早期童年在乌赫罗维茨的一件小事。有一回，星期日下午我们要出门拜访一些亲戚。母

亲给我们兄弟俩穿节日服装，带白领子的蓝色海军小大衣。衣服穿好后，母亲叫我们到院子里等她。但是糟糕，院子里有个脏水坑，我和尤利乌斯爬进去扮演水手。原计划星期天出门当然是不成了，而是第一次挨打，对此我还记得。我也记得我们的大花狗，我喜欢它，但我们不得不把它留在乌赫罗维茨。我也记得我曾经怀着敬畏的心情观察过的教堂后围栏里的那只高贵的驯鹿。这只叫阿琶塔的鹿，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国际援助社的这支队伍里有近 140 名儿童，毫无疑问，一个也不清楚我们要去哪里、为什么。但至少他们的父母知道或以为知道：去找面包，去寻梦。

3

在吉尔吉斯的新家

梦想很少同现实一致，总是偏于不好或过于乐观。国际援助社社员的梦想是乐观的。而等待着他们的，正好同所说的天堂相反。整个活动未以彻底失败告终，证明了社员们的顽强精神。我说不清，多少对比什佩克之行的回忆是我自己的，多少是我从父母的讲述中得知的。但此行肯定清晰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就像是我自己记得的似的。

由于俄国铁路是宽轨的，我们这支队伍必须在波苏边界转车。合作社随身拉的一切必须搬到俄国宽些的货车车厢里，而社员则转到俄国客车车厢，后者今后三周将成为他们的家。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苏边界在比今天往东去得多的地方，因为哈利奇曾经是波兰的一部分。普鲁特河把波兰和乌克兰分开。把一切从一些车厢搬到另一些车厢，费了一天半时间，但搬完后我们就又动身了。火车呼啸着经过乌克兰被雪覆盖着的白桦林到基辅，然后就到俄国本土，到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父亲后来指给我看地图上的那条路线，并对我说，他和妈妈感到奇怪，为什么铁路沿线的所有房子都是木头房子，砖房或石头房子难得一见。父母告诉我，在沃罗涅日和萨马拉中间的奔萨站，当地的居民还记得捷克斯洛伐克军团[1] 官兵，后者在漫长且富于戏剧性的经西伯

---

[1]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捷国外抵抗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志愿军，参与对苏俄的干涉，后部分人退出并成立捷红军队伍。

利亚回国的途中，于1918年乘火车穿过该市。

母亲和其他厨师要给所有的人做饭，任务不轻，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当地的人非常和善。不论火车停在哪里，他们都主动帮助社员补充食品和水。

火车在萨马拉跨过伏尔加河，我后来的游泳场所。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古比雪夫1935年逝世后，萨马拉按他的名字重新命名。那个时期老历史同新历史有争议。如今则又相反。

过了伏尔加河，已是一片大好春光。越往前走，我们越感到，我们的新祖国是多么辽阔广大、多姿多采啊。

火车驶近乌拉尔山南麓时，森林越来越稀少，出现了辽阔的草原，间以条状沙漠。特别是铁路转向东南，我们走过奥伦堡，更是如此。我们已到了中亚，或像当时所说的，哈萨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我们看见骆驼成群结队在无边无际的地方走来走去，除此以外觉得铁路沿线只有电线杆，某些地方有水池，再别无它物。每个车站像集市，有货摊和小店铺，从附近老远地方来的人在那里谈买卖。这是社员第一次见到东方集市。

阿拉尔湖[①]北岸较大的城市阿拉尔斯克是个重要车站。大多数圆形大帐篷蒙古包证明，许多哈萨克居民过的还是传统的游牧生活。被队里选为妇女委员会主任的母亲告诉我，社员在当地的集市上第一次尝到马奶。但是，他们买不到牛奶给孩子喝，使她非常难受。

过了阿拉尔斯克，称为饥饿的沙漠的大片沙子和岩石似乎没有边际，有些人开始对整个行动表示最初的失望。但是以后到了沙漠南边的阿里斯和锡尔-达里亚大河，它发源于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山，注入阿拉尔湖。很快就又能看到绿色，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可看见大山的白色山峰。那是天山。山脉大部位于新疆。有些地

① 阿拉尔湖，即咸海。

方突然出现清澈见底的溪流，接着是草地和俄罗斯住户被院子和田野包围着的破旧房子。父母经常回忆说，沙漠变成森林和草地，社员的兴致就提高了。

1925 年 4 月 24 日黎明，火车走到铁路线的尽头，天下着雪夹雨。我们在途中度过了 27 天，才走到这里。但比什佩克在哪里？火车似乎停在荒原之中。那里没有车站站房，只有几座低矮破旧的房子，周围就是光秃秃的草原。后来我经常听到有人重复某人难受的评论："我们来到天涯！"

当然，并非如此。比什佩克在往东约四公里处，有条道路通往该市，再通向伊塞克-库尔湖西岸。可以猜测，几个世纪以前马可·波罗在赴中国途中经过这里。我不知道，铁路的建设者为什么在离首府这么远的地方停工。

很快将成为我们的家乡的比什佩克，当时仍然是住在这一地区的诺马德人的一个"站"。其中心是个热闹的集市，几乎一切东西，谷物、大米、水果、蔬菜、玉米和母鸡，甚至还有绵羊、牲口和其它许多东西，都是在大声的讨价还价中进行买卖。

我不知道，比什佩克 1925 年有多少长住居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国百科全书说，该市有约 1.5 万人。在我们抵达比什佩克时，由于新修了铁路，人口比战前可能有所增长。

国际援助社第一批的负责人，具体说就是其主席菲利浦·什沃利克，不得不从铁路终点走到比什佩克去报告我们的到来，并了解如何开始。应当说，当地的苏维埃对我们是理解的，只要其有限的资源允许，也很愿意帮忙。有些社员包括我父亲很快成为市苏维埃委员。

国际援助社第一批领导成员菲·什沃利克和扬·卡万 1925 年 5 月 15 日寄给正要上路的第二批成员鲁道夫·特萨日的信概括我们抵达后一个月的情况，信中说：

“我们1925年4月24日来到比什佩克，对马雷切克提供的情况感到失望，因为这一地区和气候都与他所提供的情况不相符。我们所在地区经济制度极其原始。我们住在旧兵营的营房里，兵营有约十座快坍塌的小房子。我们修了修，现在快活些。住房合同订到明年3月底。因留在兵营里过冬是不可能的，我们最近将开始建造家庭住房。马雷切克为我们签订的合同是不够的，因此除他签的合同外，我们不得不签新的，以便保障我们企业的繁荣。我们在铁路边获得建造家庭住房和工业企业的地皮。马雷切克获得的地只适于搞农业……当局努力满足我们的需要，尽管开头难，我们希望在短期内把急需的先办起来。比什佩克市是喀拉吉尔吉斯区的首府。这里什么工业也没有。这里只有一家啤酒厂，我们将进行安装，因为它的机器设备状况非常糟糕。

把鸭绒被、暖和的衣服和厨房器皿随身带来，这里什么都缺。夜间气候相当凉。

菲利浦·什沃利克　扬·卡万”

获得某种收入，是最初要费心的事之一。合作社抵达时，只有332卢布现款。社员个人没有任何现金。需要立即投入生产，即使产量不大也好。制鞋师傅立即出售制成品。市警察买了他们的靴子。裁缝和木匠很快跟着干。父亲办起了木工房。上述这些活动的收入用于买木材、建筑用石料和煤。所有东西都必须从诸如萨马拉这样遥远的地方运来。吉尔吉斯商业银行很快提供了2万卢布贷款，作为建设制革厂的经费，合作社为该厂运来了一切机器。

国际援助社社员的到来在比什佩克居民中引起巨大的轰动。从未见过汽车或拖拉机的吉尔吉斯人和塔吉克人非常激动。汽车或拖拉机从旁边驶过，扬起一团团尘土，当地的人惊慌得逃跑并叫嚷“沙伊坦——阿尔巴”，即鬼车之意。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对

机器习惯了，社员同当地居民的关系非常友好。

初到比什佩克的艰苦条件迫使合作社有一段时间像公社一样工作和生活。最初几个月未发工资。厨房是公共的，全体人员不得不住在1904年—1905年俄日战争的日本战俘20年前盖的已经坍塌的房子里。屋顶不仅漏水，而且有大洞。门窗不是全缺，就是被打破，地板许多地方都朽了。据我所知，有一家人一看到当地的军事管理单位租给合作社一年的"设施"，立即决定回国。在这些临时宿舍里，社员只进行了最必要的维修。建造家庭住房、建设工房、播种和收割第一年庄稼，成为首要任务。

无损健康的饮用水，是又一严重问题。当地人所用的水都从小而浅的水流汲取，他们显然不会打井。谁也不知道，多深的地方有水。幸好我们的人在约20米深处找到水，但比什佩克一直缺水。

必须在冬天以前盖好家庭住房。因为砖厂仍未竣工，砖必须靠太阳晒干，用湿粘土和秫秸加固。没有石灰和水泥，每个人包括儿童都干活。对怎么搅拌泥浆，我记忆犹新。家庭住房设计成四方形建筑，每座住四家。每家有一间屋子，厨房是公用的，此外还有一条小过道。房顶用木头做成，以铁皮覆盖。整个工程的布局是棋盘式的，街道编号，这是根据我父亲在美国取得的经验设计的。

那个时候饭从来不多。无所不在的麻雀的大翅膀是我最早记得的东西之一。我们来到旧兵营时，赶跑成千上万麻雀，它们在塌下的房顶和屋内筑巢。另外，许多麻雀栖息在离此不远的墓地后面离高的白杨树上。它们以什么为生，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谜。到处都有麻雀蛋，我们儿童的肚子从未填满过，我们就生吃，有时把蛋壳也吃了。我们用火烤麻雀，吃那么一点点肉。

为帮助喂猪，我们经常拨弄有残余食物的垃圾堆。里面蛆虫成堆，即使我已走开，它们还在我的脚上爬。我干脆把它们抹掉。

我们一年有半年以上赤脚走路，脚丫子皮硬得可走在刺刀上而毫无感觉。

因为一切都是稀罕的，我们不得不好好爱惜自己的财产、工具和器具。比如像爱惜珍宝一样爱惜水桶。水桶掉到 20 米深的井里，我们必须不断打捞，直到把它打捞出来为止。

大约一年以后情况改善了，食物也比较多了。我们的男人在周围打猎时打死的野味，有时可补充从合作社耕作中获得的食物。他们从遥远的故乡带来步枪，获得打猎许可证不成问题。有个吉尔吉斯人带着一支既旧又坏的步枪找我们，我们的人帮他修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但是，也发生过严重的、令人痛心的事件。比什佩克的气候条件比马雷切克预计的恶劣得多。尤其在夏天，常常极为炎热和潮湿。第一批人里没有医生，初夏流行疟疾，无法同其作斗争。头一年年底以前，30 名儿童死于这种疾病。

尤利乌斯和我幸好都未得疟疾，至于我的父母，我不记得，他们两人之中的哪一个什么时候病过——在比什佩克，随后在高尔基市，或者后来在斯洛伐克，都未病过。

火灾是另一种灾害，1926 年焚毁了我们的许多工房。一切必须重新盖，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以防止新的火灾发生。这些不幸的后果是有几家吓得搬到俄国的其它地区，有几家甚至回国。很快放弃并离开该地的人包括马雷切克先生本人，他迁到原打算把整支队伍带去的地方——普热瓦利斯克，那里情况好得多。他在那里安家落户，娶当地妇女为妻。以后 40 年我再未听到关于他的情况。到 1968 年苏联占领后，他突然出现在布拉格，让人当作国际援助社的大英雄歌颂。胡萨克政权后来甚至因为他的“功勋”，而给他以崇高的奖赏。记得他真正表现的人非常气愤，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毫无办法。

讲到这里，我应当说，父母还有我后来经常考虑，把合作社

派到吉尔吉斯，派到这样艰苦、原始的环境中去究竟是为什么。国际援助社有现代化的机器和高度熟练的人员，如果在别的、挑选得好些的地方，特别是在乌克兰或俄国中部，可能有用得多。去吉尔吉斯首先是马雷切克的主意。但是，莫斯科那些作最后决定的掌握大权的人很容易就能改变的。也可能是这样，他们有排外之心，他们有喜欢把外国人派到最远的、紧挨中国边界的地方的想法。

* *　　* *　　* *

1925年11月另一批60人到了。父亲以合作社的名义到阿里斯接，把他们带到比什佩克。另外，更大的一批于1926年抵达，有600多人，还有两名捷克斯洛伐克医生，伯恩鲍姆和洛瓦斯大夫，以及两名合作社学校教师。其中之一是著名的斯洛伐克作家彼得·伊列姆尼茨基[1]，他同我们一起度过几个月。

共有五批到比什佩克。1925年两批，1926年和1928年各一批，1932年最后一批，总共1078人。其中有我未来妻子的一家，他们1928年8月同最大的一批一起来。我在比什佩克就很了解安娜·翁德丽索娃。后来二次大战末期在斯洛伐克，我们两人所走之路终生合起来了。

比什佩克的学校白手起家，50名儿童第一年都上同一班级。教学在兵营一座较小的房子里进行，开始时没有课本、纸张和铅笔。但情况很快就改变了。学校迁到新建的房子里，第二批带来所需的一切，甚至把乐谱纸和世界地图也带来了。我1929年八岁时开始上学。

---

① 彼得·伊列姆尼茨基（1901—1949），斯洛伐克作家，原籍捷克，在斯任教，多以斯语写作。

起初斯洛伐克语或捷克语是惟一的教学用语。所有基本课程包括代数、物理、历史和地理都上。1928 年学校开设俄语课，这不仅是由于受到苏联地方当局压力的影响，而且也是出于实际原因，因为一切高些的教育都是用俄语进行的。当时即 1930 年前或在此前后，多数社员考虑长期住在苏联，承认侨居在外要逐步适应新的环境。

当我看到，我的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同学不能用本民族的语言学习，我的感觉是多种多样的，我同情他们。有个叫阿谢尔贝伊的吉尔吉斯男孩成为我的好伙伴。他是从我们到达比什佩克时起，最早同我们交朋友的人之一。他毕业后在国际援助社的纺织厂工作。

我记得，我们的一个男孩对当地的一位同学进行挑衅，把咸肉皮放在他的椅子上，使我非常生气。吉尔吉斯人和塔吉克人当然都是伊斯兰教徒，从不吃猪肉。下课后，开玩笑变为打架。我毫不犹豫地站到当地男孩的一边，反对我们当中开玩笑的同学。

尤利乌斯和我很快把比什佩克当作自己的故乡，不太记得我们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周围没有什么使我们觉得是“异国风情”。但是骆驼特别让我们人迷。

有一回，我还不满五周岁，我和哥哥碰到一只被套上吉尔吉斯两轮车的骆驼。哪儿也看不见车主。骆驼站着不动，好像在睡觉。它还能做什么？尤利乌斯一向敢想敢干，突然想爬到车上，从这一指挥员的位置看看世界究竟怎样。他先帮我上去，然后再自己爬上车。我们刚坐好，尤利乌斯找到鞭子，并用鞭子打骆驼屁股。骆驼惊醒了，开始像赛马一样地奔跑。它跑过几条街道，冲到草原上。它大概知道，究竟往哪里跑，但我们不知道。比什佩克很快就从视线里消失，隐没到高低不平的草原后面去了。骆驼跑呀跑，车子在它的后头上下左右颠簸，它几乎要了尤利乌斯和我的命。

我不记得，受惊的牲口跑了多长时间。但它不是自己停下来的。突然一个骑马的哈萨克人出现了，他把长鞭甩向空中，把它缠在骆驼的脖子上，才让牲口停住。

尤利乌斯和我尽快从车上爬下来。爬下来比在这以前爬上去快得多，我们开始沿着车辙跑回比什佩克。我已记不得，我们究竟花了多长时间，才跑到家，但是天已经黑了。我们到家时，所有的人已找过我们，我们冒险的后果是可以预料到的。

尤利乌斯向来比我性急，很少先考虑好再做。有一次在比什佩克，他差点儿淹死在制革厂后半结冻的池塘里，当时他在试冰有多厚。这里冬天向来不太寒冷，尤利乌斯跑到池塘中央时，冰裂开了。我们只看见他两只手扒在冰窟窿边上，拼命挣扎把头探出水面。一个吉尔吉斯人跑来救他。那个人扛来一架长长的梯子，把它放在冰上，慢慢向他爬去，终于把他拉上来。

几年中我们的生活逐步改善。合作社慢慢发展，努力并有效地建设吉尔吉斯的基本工业部门：第一家发电厂和铸造厂，第一家纺织厂、机械化的制革厂、砖厂和家具厂。建筑队设计并盖了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大厦、银行、医院、学校和大的文化宫，其大厅可容纳六百人。国际援助社第一个开始在吉尔吉斯种植甜菜。

1926 年把比什佩克改名为伏龙芝，这是按照苏联军事活动家、托洛茨基的对手、军事人民委员伏龙芝[①]的名字改的；他诞生在那里，虽则原本是个德国人。他在这之前一年逝世。根据苏联的资料，该市人口 20 年代末增长到近 5 万人。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进一步巩固，也日益强调现代化和城市化。不过莫斯科温和派 1928 年遭到失败后，斯大林开始推行激进的政策。1929 年开始的集体化，1930 年发展到吉尔吉斯。

---

① 米·瓦·伏龙芝（1885—1925），苏联将领，在 1918—1920 年国内战争期间同高尔察克等作战，1924 年起任军事人民委员。

国际援助社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均未直接受集体化的影响。其管理方法仍然是社员在国内时所熟悉的。这就是说，它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和主任管理的。但是，正是这很快碰上苏联由上面任命的做法。1928年国际援助社不得不参加集中统一的合作社组织，1930年通过符合苏联模式的新章程。1932年国际援助社分为七个合作社。

集体化首先以农民的到来开始，他们被押送出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家乡。他们被货车车厢送到西伯利亚和中亚。我记得伏龙芝火车站的可怕场面。有些被送走的死在途中，还活着的包括儿童看似活尸。他们饿得吃长满蛆的猪和家禽饲料。我无论何时也不会忘记肚子鼓起的死人。我问母亲，那个男人死于什么病，她说："死于饥饿。"我问为什么这么"肥胖"，她解释说，死后才变成这样。

我不记得有谁能理解，究竟是什么造成这一切贫困。这对我们来说是令人不安的经历。不论对儿童还是对成人来说，都是如此。同时我们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大人从早到晚艰苦劳动。我们上学，做家庭作业，在房前屋后帮助干活，玩耍。但是，生活已不像以前那么稳定。未知的阴影浮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之上。

集体化的做法也开始在吉尔吉斯推行时，到处引起反对。吉尔吉斯农民成立了以巴斯马奇闻名的武装小组。有些隐藏在城里和乡下，另一些躲到山中。他们夜间对俄罗斯人员、部队和民兵发动进攻。我们看见他们的受害者被吊在树上和电线杆上。所有这一切暴行对我十岁的智力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集体化和暴力镇压破坏了地区的整个生活，特别是在这以前明显改善的经济。在对水果种植者征收新税后，跟着来的就是大规模毁坏果园。我记得一个水果种植者，我们从他那里买苹果和其它水果。有一天我们来到他的果园，发觉他把几乎所有的果树都砍了。"为什么？"母亲问道。"对我们征收的税高，我交不起，"

他说。“所以，我把大部分果树都砍了。我留下的那几棵，是为我们家留的。”

这样，水果就从市场上消失了。一切农业生产深受其害，因为强迫集体化、义务交售和征用没收使农民不愿意生产比自己所需更多的东西。各地区的情况每况愈下。

1932 年国际援助社派父亲到莫斯科参加某种专业培训。他那时可能已考虑过，我们要迁走。决定是突然作出的。1933 年我们就往西迁。这回是迁到高尔基市。

离开伏龙芝市我们居住过的小房子、我惟一真正记得清的家，不是没有惋惜之情的。我记得，当我得知要搬家，感到心神不定和失望。当我们包装东西时，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是全家都走，这使我稍感安慰。况且我只有 12 岁，好奇心和认识新的地方、新的人的愿望占了上风。但对吉尔吉斯的回忆从未消失。

国际援助社在组织结构方面经过变动和分成几个社，一直运营到 1943 年 12 月解散；其工厂和车间由吉尔吉斯农业部接收。那时还在打仗，多数前合作社年纪最大的社员留在伏龙芝市。其中许多人战后仍留在那里。据我所知，有些国际援助社社员至今仍同自己的子孙生活在那里。

4

在高尔基市的岁月

高尔基市是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汇合处的俄罗斯历史城市。它位于莫斯科以东乘火车约三小时处。原来叫下诺夫哥罗德，到我们抵达前一年才按照俄国伟大作家马・高尔基[1]（当时还活着，1936年逝世）的名字改名。1991年又恢复原名。

该市有近一百万人口，是我当时所见过的最大城市。它是个工业中心，特别是造船和纺织工业中心。其大学是俄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正在建设的汽车厂叫加兹（高尔基汽车厂缩写）。父亲在那里制作汽车车身的内里、嵌板和预制板，这些当时还是用木材生产的，因此很需要出师的木工。塑料代替木材要晚得多，西方也是如此。

父亲英语说得流利，这对他很有用，可同美国底特律福特汽车公司的一批工程师和技术员交谈，他们是来培训俄罗斯工程师从事汽车生产的。他们对按照福特的方法安装组装线进行监督，经常叫父亲当翻译。父母两人同其中的几个交朋友，他们有时到我们家用晚餐或边喝一小杯伏特加酒边交谈。那是些非常友好、快活的人，可惜我把他们的名字忘了。可能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还活着。尤利乌斯和我非常好奇地观察了美国人，因为俄罗斯人很尊

---

① 马・高尔基（1868—1936），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母亲》、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1934年任苏联作协主席。

敬美国。

在高尔基市，我们住在鲁腾堡区租用的房子里。那是个专为汽车厂职工建设的市区。母亲在高尔基市不上班，留在家里。她像以前那样管理家务，不过在比什佩克还全天在单位食堂干活。

尤利乌斯和我在高尔基市上好得多的中学，班级人数较少，纪律较严，教师水平高得多。学校至少暂时得益于根据教育改革编写的全国新的教学大纲，教改强调传统的教学方法和价值。我对学习的兴趣提高了，我想我是个挺好的学生。我肯定打算上高等学校，即使我对将来要当什么还没有明确的想法。尤利乌斯比我高一年级，我们通常一起上学。我特别记得爱好运动的同学。我同其中两人，米沙·扎哈罗夫和瓦连京·贝洛夫，战后还在通信。因为多数学生家长都在汽车厂工作，加兹汽车厂支持我们的各种运动队。我在加兹青年队打水球和踢足球，参加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上的帆船比赛。冬天我们在结冻的河上溜冰，但我们会玩的惟一冰球，用的是网球和曲棍。

1935 年初，有件事突然扰乱了我们的家庭生活。这件事要是现在可能觉得很平常，不过在当时显得非常严重。我哥哥，当时 15 岁，卷入同另一个区男孩的街头打架斗殴之中，把其中一人打伤了。父母担心，他根据当时苏联法律可能受到非常严厉的惩处。家里开会决定，母亲立即把尤利乌斯带回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夜里迅速走了。幸好最后一切都有个好结果。被打伤的男孩恢复了健康，但对我们继续居住在苏联一事已留下阴影。我和父亲自己留在那里。

在斯洛伐克，母亲和尤利乌斯住在米哈尔叔叔在瓦赫河畔的新城的房子里。米哈尔叔叔战后也从美国回国，但未参加国际援助社。他用自己的积蓄建立一个成功的缝纫合作社。他称这个他自任经理又是主要股东的企业为“美国缝纫合作社”。在他的支持下，尤利乌斯回国后结束了学业，学会做安装工和车工。1948 年

以后合作社被收归国有，米哈尔叔叔失去一切，最后自杀了。

母亲和哥哥离开我们后，一切都变了样。我缺了他们两个实在不行。尤利乌斯一走，我马上就失去老是同我玩儿童游戏的朋友。我也非常想念母亲。她创造了我们的家，她一走，房子变得空荡荡、凉嗖嗖的。但是，我不得不适应新的情况，承担一些家务劳动。当然，我继续上学。当我回顾在苏联学校度过的岁月，我看到，虽然教学从专业教育的观点看是好的，但在其它方面则深受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妨碍，该学说很难引向独立思考。如此推行学说特别妨碍发扬对社会科学和历史采取客观的态度。自然科学的情况好些，但政治形势也对其投上长长的阴影。不过我认为，即便如此，我也学会许多，并对高尔基市的许多教师怀有敬意。

我对政治的兴趣并不比其他和我同年龄的男孩大。尽管如此，我的家庭背景使我对公共事务和国外事件的发展有较多的认识。在学校里教师努力向我们灌输官方批准的对当前苏联和世界事件的看法，在家里广播电台不断给我们报道新闻、评论和公开讲话，因此气氛充满政治。甚至我们当中对警示性消息最不注意的人，也像老一辈一样开始担心会产生纳粹主义。

我清楚地记得，苏联 1934 年加入国际联盟，翌年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联盟。我们当时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站在营垒的正确一方。但是后来爆发了西班牙内战，敌友之间的外交关系复杂化了。苏联内部紧张明显增长，整个前景暗淡，前途未卜。

尽管如此，在高尔基市的岁月对我来说多半是男孩游玩、运动和快乐的时光。除有组织的运动外，我从早春到秋末还同朋友、男孩以及女孩到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游泳。冬天我们经常上剧院或电影院。但是，这些美好时光也被自 1936 年年中起在我们周围发生的奇怪、扰人的事情投上阴影。发生了一些事件，其后果犹如

越来越扩大、变黑的浓重乌云悬在空中。无忧无虑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原来我们钦佩的革命英雄，突然被宣布为坏蛋，被送上法庭并杀害。在学校里命令我们从课本上剪掉一整页又一整页，因为“真理”往往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对我们使用的一些课本，我记忆犹新。我特别记得有本教科书有张图哈切夫斯基[①]元帅带着各种勋章的照片，在他1937年春被杀害后，我们不得不立即剪掉那一页。老师小心翼翼收集剪下的一页页照片，并数了数，不让我们拉下一页。

在图哈切夫斯基之前，1936年8月审讯季诺维也夫[②]和加米涅夫[③]，然后1937年1月审讯拉狄克[④]和皮达可夫，在审讯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著名指挥员之后，1938年3月进行了对布哈林[⑤]、雅哥达和李可夫[⑥]的审讯。对最后一次审讯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电台广播了。对这场这么多苏联著名领袖突然变为“叛徒”的戏，我们感到悲哀并被搞糊涂了。

---

① 米·尼·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苏联元帅，1931年起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37年以从事“反苏活动”罪名被判处死刑，1957年恢复名誉。

② 格·耶·季诺维也夫（1883—1936），1919年—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1925年和加米涅夫等组成“新反对派”，1926年和托洛茨基等结成“反党联盟”，1936年被判处死刑，近年恢复名誉。

③ 列·鲍·加米涅夫（1883—1936），1925年和季诺维也夫等组成“新反对派”，1926年参与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1936年被判处死刑，近年恢复名誉。

④ 卡·伯·拉狄克（1885—1939），苏联政论家，1923—1927年追随托洛茨基，1937年被判处监禁。

⑤ 尼·伊·布哈林（1888—1938），1928—1929年和李可夫等结成“反党联盟”，1938年被判处死刑，80年代后期恢复名誉。

⑥ 阿·伊·李可夫（1881—1938），1924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8—1929年和布哈林等结成“反党联盟”，1938年被判处死刑，80年代后期恢复名誉。

但是，在我们周围也发生了其它令人不安的事件。一些同学的父母突然失踪了，我问其子女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从来不知道怎么解释。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家庭受害，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笼罩整个社会。不久之后我们了解到，造成“失踪”的是秘密警察，即克格勃的前身格伯乌和恩克夫德[1]。

好多年，要弄清当时的全貌是不可能的。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最后终于说服这一切可怖情况的，是赫鲁晓夫[2] 1956 年所作的揭露。但这晚了 20 年。在 1936 年至 1938 年，在苏联可获得的一切政治消息，只来自官方传媒、我们的老师、电影周报和必听的报告。苏联把强迫和说服结合在一起的公布消息的方法是非常彻底的、密不透风的。甚至骂人话也听不到了，因为人们害怕特务报告。

父亲是一个朴实、耿直的人。他不是个善于分析经验、得出独立结论的知识分子。他宁可说是个克制、严肃的人，对这些事情他宁愿不同我谈得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感到多么混乱，也不可能产生严重的怀疑。认为杀人可能是国家上演的司法滥杀的想法，是太富于幻想、太可怕了，我们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今天年青一代可能觉得这是无法相信和幼稚的，但在 1938 年，甚至流亡法国、出席对拉狄克和布哈林审判的著名悲观人道主义者、作

---

① 1917 年决定成立契卡，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1922 年改组为格伯乌，即国家政治保卫局。1934 年并入恩克夫德，即内务人民委员部。1954 年成立克格勃，即国家安全委员会。

② 尼·谢·赫鲁晓夫（1894—1971），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3—1964），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1964）。1956 年在苏共“二十大”上作报告，提出所谓“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批评“个人崇拜”，强调要恢复党的集体领导，这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又在东欧各国和国际共运中造成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导致波匈事件的发生。

家利翁·福伊希特瓦格[1] 也相信，被告是有罪的。

在清洗年代，苏联宣传的“擂鼓”是有系统、不断进行的。宣传制度的成就：建设新工厂和水库，电气化，新住宅。不断重复关于国际资本主义勾结起来要消灭苏联的所谓外国威胁的“祷词”。在一切之上屹立着斯大林父亲般的身影，对他的迷信具有正统催眠仪式的一切特点。我对中世纪历史了解不够，看不出这些做法的为人所知的拜占庭特点。

他们把威胁和指责灌输给消息欠灵通的人。1938 年以前，纳粹德国被看作最危险的敌人，这是对的；1941 年 6 月后事态的发展最终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其间于 1939 年 8 月签订了德苏条约。接着将近两年两大国之间举行秘密谈判并达成协议。当这一切进行的时候，我已回到斯洛伐克。在我们的情况下，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对国际形势的发展给予充分关注。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对该条约应当怎么看。我从我们的朋友那里听到的主要解释是，斯大林在同希特勒玩游戏，只是等待消灭他的适当时机。当然，这是哄人的说法。

直到许多年之后，我才努力把一切，即我在苏联经历过的镇压、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的条约以及我本人对在战后捷克斯洛伐克运用苏联的做法日益增长的怀疑，联系起来进行比较清楚、合理的考虑。这是后话。

* *　　* *　　* *

在德国吞并奥地利(时间上同 1938 年 3 月对布哈林的审讯相

---

① 利翁·福伊希特瓦格（1884—1958），德国作家、戏剧家。

一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危机[1]很快成为日常谈资。事态的这一发展使父亲和我非常不安。也许无需我强调，我们居住在苏联期间，我们的民族觉悟从未削弱。父母一直保留捷克斯洛伐克国籍，这当然也适用于尤利乌斯和我。尤利乌斯因为出生在美国，也曾经是美国的公民，父母经常提醒注意这一点，有时是开玩笑，有时认真。

我们在家总是说斯洛伐克语，家庭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仍然是斯洛伐克的。当然，这在我们被许多同胞包围的比什佩克容易些。但迁到高尔基市后，这方面变化也不大。我们只不过是生活在国外的斯洛伐克人。父母两人对民族和国籍问题看法一致。

但正好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期，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一切生活在苏联的外国人必须接受苏联国籍或离开苏联。正式法令于1938年夏天颁布。

在比什佩克，我的父母像其他许多合作社社员一样起初相信，他们的决定是一辈子的事。这一观点30年代初由于受到苏联内部事态发展的影响而开始发生变化。我从那时记得，我当时已听到父母两人提及可能回国。但我认为，他们不是在1938年以前就作出这样的决定的。甚至在母亲1935年突然回国之后仍未作出决定。实际上，他们对就业和吃饭问题的根本担心继续存在。他们1925年由于经济危机离开斯洛伐克，国内这方面情况1936或1937年之前未开始改善。他们从亲戚朋友来信中了解了这一点。

但在1938年，面对不可避免地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国籍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父亲看来一刻也不犹豫。更不必说，这会堵死他回国的道路。他虽是个朴实的人，但还是看见他周围在发生

---

① 在纳粹德国1938年3月12日吞并奥地利之后，英法同年9月15日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出卖捷克斯洛伐克，要求捷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翌年3月15日德国占领捷克全境，并在斯洛伐克扶植傀儡政权。

什么。他不免有批评的想法和怀疑，而且，即使他接受苏联国籍，他也知道，他在苏联当局的眼中仍然是个外国人，而1938年对在俄罗斯的外国人来说不是个好的年头。他是个共产党人，这意义不大；成千上万外国共产党人成为荒谬迫害的牺牲品，他们的遭遇即使在当时也不是太大的秘密。父亲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很可能被捕。在挑选恐怖活动的受害者时，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叶若夫1938年12月下台后，暴力行动也未停止。因此，爆发慕尼黑危机时，我们要回国的事基本已定，捷克斯洛伐克前途未卜也不能加以改变。

1938年11月，我们走上归途。

不错，我父母一直称之为"家乡"的地方，我大多只能根据他们的讲述和回忆想像，没有自己的亲身感受，不具体。尽管如此，那个景象也是可信、温馨、诱人的。我知道，我属于它。在我们要回去的国家，每个人都说我母亲从小就教我的话。我出生在那里，我父母及其祖辈的根在那里。

况且，母亲和哥哥现在国内等着我们。

但我同时又离开我在此之前认识的惟一国家，我几乎所有好的和不好的感受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我许多朋友的祖国。苏联对我来说意味着同人们的具体相处，亲眼所见的房屋、树木、日落，人生体验。相反地，"家乡"从这一观点看则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其轮廓我只不过是根据父母的讲述勾勒出来的。

在17岁的脑子里带着所有这些混杂想法，我同父亲一起坐在火车里。他也陷人沉思。到边境过道前的最后一站，父亲突然问我是否随身带着些卢布。我带了。父亲对我说，禁止带卢布出境。我急忙跑到车站上，把钱装进信封，寄给高尔基市的一个同学。

但我们到边境时，我又发现，我的另一只口袋里还有些卢布，是父亲给我买裤子剩下的零钱。我记得，我非常害怕会被查出来，一切进出苏联的旅客都必须接受彻底检查。我就向海关走去，将

那些钱扔进垃圾筒。

后来我克制对这些时刻的回忆，但总的来说从未忘却。多年之后回忆又浮现出来。



5

战时在斯洛伐克

1938年11月，即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几周，我们回到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在缺席的情况下，被迫把约占捷克领土五分之二的苏台德区，割让给纳粹德国。在这片领土上，部署有共和国的主要防御工事。慕尼黑协定不仅推毁了国家的防御，而且也破坏了它的战斗意志。对一切真正的爱国者、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来说，那是绝望之时。

不久之后，其它方面的进攻也来了。波兰抓住机会攫取北摩拉维亚的一部分，匈牙利急忙索要对斯洛伐克的“权利”。50多年后的现在，我看到，在历史的泥潭中，我们落入了圈套。我们在摆脱一种困境，却陷入了另一种不是好些、而是更糟的局面。

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后，我们到特伦钦找我仍寄居在米哈尔叔叔家的母亲和尤利乌斯。对所有的人来说，那是非常幸福的重逢。我很高兴，分别三年后又见到妈妈和哥哥。我挺容易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没料到，这么简单、自然。可惜，一家重逢好景不长。新的灾难很快又影响我们的生活。

慕尼黑会议之后，希特勒准备“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其它部分。他需要控制整个中欧地区，作为新的进攻的跳板。首先他想以不太明显违背慕尼黑协定的办法，攫取捷克斯洛伐克的其它部分。他想逐步同各国算帐。他把斯洛伐克变为形式上拥有主权的附属国。这样，国家的被肢解、无防御能力的捷克部分作为保护国就易于吞并。

为执行这一战争计划，对纳粹分子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确保获得一些1918年以来不放弃自治要求的斯洛伐克政治代表的支持。纳粹分子知道，某些斯洛伐克政治家20年来有斯洛伐克完全独立的想法，但是对匈牙利的恐惧妨碍他们这样做。德国可能提供保证，给他们带来新的选择。这是纳粹说客不仅仅在实际上只占民族零头的法西斯纲领的信徒中，能找到听话的耳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赫林卡[1]的斯洛伐克人民党，它是斯洛伐克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该教会从不原谅马萨里克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早年执行的反教权主义政策。

在这一范围内，斯洛伐克右翼的分裂纲领在慕尼黑协定签署后迅速形成了。正如可预料到的，分裂主义者利用许多其根源为共和国的中央集权制形式的正当的民族要求和义愤，同时公开显示，他们如何仇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制度。这一纲领非常适于说明民族自决的要求（正如萨尔、奥地利和苏台德区事件时所利用的），把斯洛伐克右翼卷入在欧洲传播专制和法西斯的浪潮。

斯洛伐克的法西斯信徒特别从墨索里尼及其“劳资协会国家”那里寻求思想启示，虽然在1938年和1939年对中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德国。但两者差别不大，因为这两个极权政权，尽管作风和组织结构不同，在做法上有许多共同特点。

慕尼黑协定签字后，斯洛伐克的政治自治通过把中央集权制国家易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来表达。约瑟夫·蒂索[2]博士领导的自治政府在斯洛伐克掌了权。政治反对派逐步遭到镇压或取缔。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解散和取缔。其它的斯洛伐克政党都

---

① 安·赫林卡（1864—1938），1918年建立斯洛伐克人民党。该党1922年提出斯自治纲领，1939年起为斯执政党，1945年解放后被取缔。

② 约·蒂索（1887—1947），斯洛伐克天主教神甫，1938年起任斯人民党主席，1939—1945年任斯洛伐克国总统，1947年因“叛国投敌罪”被处死。

并入一个“统一的”党——赫林卡的斯洛伐克入民党。除斯人民党外，能开展活动的只有德意志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党。亲纳粹的斯洛伐克德族人的德意志党的代表当了蒂索政府成员。

1938年，当时51岁的约·蒂索当了赫林卡的斯洛伐克人民党的主席。他的分裂主义起初不像某些较激进的领袖的分裂主义那么突出。1939年3月14日他被召到柏林去见希特勒时，他拒绝在斯洛伐克议会通过之前，宣布斯洛伐克自治。捷克总统埃·哈赫[①]博士未曾表示这样的反抗。但对蒂索的行为必须从更广的角度看。他作为1939年至1945年斯洛伐克国的总统，对政府工作负有直接责任，盟国理所当然把他宣布为战犯。

1938年11月，经过德国和意大利的所谓维也纳仲裁[②]的“调解”之后，斯洛伐克被迫把南部领土割让给匈牙利。但这也未消除匈牙利民族统一主义对斯洛伐克其它地区的威胁。希特勒利用这一威胁加速消灭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中，在德国的保证和统治下，把斯洛伐克分裂出去具备了法律形式。德国占领了捷克和摩拉维亚，匈牙利得到吞并喀尔巴阡山麓罗斯的许可。

有些历史学家把斯洛伐克分裂出去和宣布成立斯洛伐克国看作可能使匈牙利重新搞殖民化。事实是希特勒更愿意要的是被阉割的斯洛伐克傀儡国家，而不是更大的匈牙利。扩大这两个国家的分歧，从而操纵它们，这也符合他的需要。在从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出去之后，斯洛伐克政府立即公开宣布同纳粹德国结盟。捷克人、犹太入、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被宣布为国家的敌人。公

---

① 埃·哈赫（1872—1945），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39—1945年任德国占领下的捷克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统。

② 维也纳仲裁，指1938年11月2日德国和意大利作出“裁决”：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将南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山麓罗斯（也称外喀尔巴阡山乌克兰）两处领土割让给匈牙利。二次战后，前者归还捷克斯洛伐克、后者划归苏联。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受到限制，接着就颁布反犹太法律。1939 年 9 月蒂索政府向波兰宣战，参加德、意、日“三国集团”。

内部强行统一在德国的统治下施行。执行任务比不完整的、被占领的捷克和摩拉维亚的纳粹分子还快的斯洛伐克新统治者，也发挥相当大的主动性。按照意大利黑衫队组建的赫林卡卫队执行政治警察的任务。其最初行动之一是掠夺犹太人的财产并迫害政治对手。

今天重要的是要懂得，蒂索的斯洛伐克是怎样一种国家和政权。这个国家及其政府把斯洛伐克变为纳粹德国进行战争侵略的盟友和同案犯。它们向反纳粹联盟各大国宣战，派斯洛伐克军队的三个师支援东方战线的德国人。它们对本国公民搞极权恐怖，压制民主捷克斯洛伐克居民拥有政治权利和人权，把 6 万左右斯洛伐克犹太族公民送到纳粹灭绝人性的、几乎必死无疑的集中营。我感到自豪的是，父亲、母亲、哥哥和我本人，像其他许多爱国的斯洛伐克人一样，为反对这一政权而斗争，我们准备在这一斗争中牺牲自己的生命。

谈到这里，应当说，假如斯洛伐克国 1945 年不被打败，假如没有抵抗和 1944 年 8 月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假如战胜国不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恢复而慷慨大方地不计较斯洛伐克的战争行动，斯洛伐克人民就要忍受其它战败的纳粹国家的命运，长期被打上战犯的印记，受战争赔偿要求之害。

* *　　* *　　* *

从我们回国后的最初几天起，父亲就不是消极地注视事态的不利发展。他在迅速变化的局势中马上辨得清方向。他同共产党内的老朋友恢复接触，重新加入其队伍。任何其它组织对他来说都不适宜。斯洛伐克共产党当时是惟一有组织的明确鲜明反对法

西斯、慕尼黑协定及其后果的力量。不错，在斯洛伐克也有其他的政权反对者。例如农民党的一部分同投敌者及其政策划清界线。但在 1939 年共产党是惟一真正有组织的抵抗力量。

也必须提到，直到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之前，在全共和国只有一个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斯洛伐克组织拥有地区组织的地位，其工作受到在布拉格的捷克党的机构的严密控制。这一事实既表达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也表达共产国际只允许每个国家有一个共产党的指示。当然，这不是令人满意的情况。

共产国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政策上绕弯子绕了 20 年。它一方面鼓励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自治政治路线，另一方面通过控制斯洛伐克党的机构的捷克党的干部施加自己的影响。30 年代，共产国际的路线改变了，由捷克干部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高度集中的，这特别是在斯洛伐克年青左翼知识分子中引起日益增长的反抗。实际上 1939 年 3 月后共产国际承认斯洛伐克共产党地下组织是个独立的部分，它就已从布拉格赢得一定程度的独立。但 1941 年 6 月德苏条约被撕毁后，它又失去自治。我说明这一点，是因为这些关系历史上长期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关系的基本因素。

1939 年春通过的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纲领，包含到 1940 年 3 月的三个基本点：不承认斯洛伐克国，推翻法西斯和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这对 18 岁的我来说十分明确、重要，我根据父亲的建议并按照他的风范加入了共产党（1939 年年中）。父亲的两位后来当了斯共第一届地下中央领导成员的朋友，留多维特·贝纳达和扬·奥索哈，正如党章所要求的，当了我的“介绍人”。

在这么多年之后，也许我应当对读者提到，当时加入共产党不像加入养鸽协会。那是非常危险的一步，只能带来负面酬报。那不像执政前一天或执政后一天才加入胜利的党，意味不同。1939

年在隧道尽头看不见光明的迹象。我们面临着长期困难时期，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预料情况很快会好转。

因为党被宣布为非法，它的一切活动不得不秘密进行。当时我们党的工作主要是散发党的地下印刷品和传单，把它们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人处送到另一个人处。我想起，母亲把传单深深地藏在购物兜里，在特伦钦的市场上散发。有时我们必须把刚送来的报纸和传单藏在家里一段时间，每次总是寻找新的地方藏起来。我已记不得，谁出主意把狗窝作为交换情报的地方。幸好狗在我们家里从来也不缺，一只死了，我们很快就弄来另一只。狗窝看来是顶好的藏物处。警察多次搜查我们的住房，把一切翻得底朝天，甚至扒开炉子周围的陶砖，但是从未搜狗窝……

我从苏联回国时，尤利乌斯已在30年代在法国人帮助下建造的杜布尼察的什科达工厂学当车工。当然，1939年工厂已被纳粹分子控制。有些工厂相距数公里，有些有地下生产车间和仓库。1939年我在杜布尼察找到工作，像尤利乌斯一样，我也开始学当车工。

不用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杜布尼察的工厂不能挑选用户。比尔森的什科达工厂在纳粹分子的同意下，好几个月仍继续为苏联订货开工，而留给斯洛伐克工厂的只有德国订单。但斯洛伐克工业仍很不发达、很不平衡，在整个地区挺难找到工作。而杜布尼察离特伦钦不远，只有大约15公里。

同年，政治迫害进一步加剧，父亲为了不被逮捕，不得不藏起来。直到战争结束，我只能见他两次，一次在1940年他未被捕时，另一次在1943年，我获准到尼特拉监狱探望他，借口是我要结婚了。实际上我是那几年家中惟一见过他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试图保持家庭接触太危险了。

我们很快就恢复同在国际援助社时期很了解的翁德里斯家的

友谊。他们住在维尔奇采，特伦钦西部挺远的一个村子，铁路交通不便。1940 年翁德里斯一家人有段时间把我父亲隐藏起来，我到那里看他。我又见到安娜，我未来的妻子。她也在杜布尼察的什科达工厂工作。对我来说，安娜一直是非常有魅力的。我想，那是一见钟情，我挺幸运，她对我也报之以爱。安娜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待人也非常和蔼、亲切。当时我们开始交朋友，1941 年夏天我们不得不从特伦钦迁到维尔奇采后，我们的关系更巩固了。搬迁不是自愿的。因父亲的政治活动，警察把我们赶出特伦钦。他们命令我们迁到 200 人以下的村子，以便使我们尽量孤立。翁德里斯一家人帮了我们大忙，在当地福音教神甫家给我们找到一个地方。神甫向我们提供一个工房，我们把它变成住房。我们，母亲、尤利乌斯和我，在那里一直住到 1944 年 8 月斯洛伐克民族起义[①] 爆发，我和哥哥立即参加起义。

从维尔奇采到杜布尼察比从特伦钦到那里远得多。从星期一至星期六我们必须凌晨两点来钟就起床，以便及时步行赶到最近的、有几公里远的火车站。火车不直走，而是拐向瓦赫河，然后经过特伦钦到杜布尼察。从杜布尼察火车站我们必须再步行几公里，才能到我们工作的工厂。一天来回走两趟这么远的路，对我们特别是对安娜来说是够累的。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安娜在弹药车间工作，尤利乌斯在军工厂，我在工具车间。早晨到工厂后，我们就分手，每人去自己的工作单位。下班后我们又见面，走上漫长的归途。

---

① 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欧洲最大的反法西斯起义之一，1944 年 8 月 29 日爆发，由以斯共产党人为主要负责人的斯民族议会领导，参加起义的有约 6 万名军人和 1.5 万至 2 万名游击队员，曾建立约占斯国土三分之二的解放区。

人们现在常常问我莫洛托夫[1]1939 年 8 月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条约对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的实际后果如何。当然，我们是从报纸上和广播里了解条约的，但是我们对它不太认真看待。至少普通党员普遍相信，条约只不过是苏联人赢得时间的策略手法，因为德国人在同法国和英国作战中正在流血。

在德国 1940 年 6 月占领法国和向欧洲其它地区进攻之后，德苏条约继续有效的消息使我们感到不安。但我们当时也认为，苏联不会认真看待这一同德国签订的条约。我现在知道，其中许多是我自己的善良愿望。但在 1940 年，我们对斯大林同希特勒合作的真正范围，几乎什么也不了解，或只了解得很少。而且纳粹势力的大膨胀掩盖了一切，面对直接威胁，甚至我对在苏联最后几年的混杂感情和回忆也失去意义。在伦敦，对一切更了解的贝奈什[2] 总统，在回忆录中表明，他当时也有类似考虑。

对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来说，1939 年 8 月和 1941 年 6 月之间这段时间，肯定不像他们向普通党员所介绍的那么简单。条约签订之后，共产国际通过表达柏林和莫斯科关系新现实的政治路线。它把西方的战争定性为"帝国主义战争"，在给欧洲地下共产党的一些指示中，共产国际甚至号召同德国军队的士兵结拜兄弟，把他们说成是"穿德国军装的无产阶级弟兄"。在莫斯科的捷共领导 1940 年 12 月寄到布拉格的决议也含有这样的提法。但是，在被德国控制的国家，很少人包括普通共产党员对这一令人反感的政策有所了解。

---

① 维·米·莫洛托夫（1890—1986），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1941）、外交部长（1939—1949、1953—1955），1939 年 8 月 23 日同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② 爱·贝奈什（1884—1948），捷克斯洛伐克第二任总统（1935—1938，1946—1948），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弃职、1940 年在伦敦成立捷流亡政府。

我怀疑，斯共地下领导不大努力传播上述莫斯科指示。它表面上宁愿表示服从，并通过决议。它采取别的做法的可能性非常有限，那是另一回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像其他人一样，也感到必须按莫斯科指示改变自己的路线。但是，如果不是不愿意采取接受共产国际急剧变化的政策的办法，至少可以发现有犹豫不决的表现。

这一时期党的文件证明，转入地下的斯洛伐克共产党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间得到莫斯科的新指示。1939年10月前，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届地下中央领导（由尤利乌斯·朱里什、留多维特·贝纳达和扬·奥索哈组成）发表决议，要求"在新欧洲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自由斯洛伐克"。对此应给予特别注意，因为这发生在德苏条约签订后三个月和苏联承认斯洛伐克国后两个月，苏联承认斯洛伐克国实际上等于赞同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切只促使我产生总的印象，甚至地下斯共的领导干部也只把苏联的做法理解为策略手法。

但是，同一个共产党中央领导1940年3月起草的党的下一个声明终于接受苏联新的路线。它放弃了以前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要求，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和"反苏的"公式。为什么？它未说明。文件也要"独立的斯洛伐克"，这意味着以前政治路线的180度大转弯。

不过，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毫无热情地接受了的这一新方针，寿命较短，从未深入党的下级组织。由于领导的拖延，1940年散发党的报刊非常困难。但我本人在报刊上从未见过党的真正亲德路线。

父亲当时在中层地下党组织工作。他虽然知道"新的路线"，自己对它却从不认真看待。正如他后来告诉我的，他只是遵循老信仰和经验。我想，他连假装机会主义也不会。

包含改变了的党的路线的文件于1940年3月发表。我从父亲

那里得知，文件是扬·奥索哈起草的，他简单照抄莫斯科的指示。奥索哈习惯于列宁原则所要求的盲目纪律，未深入思考就执行命令，也不寄托某种信仰。

在德苏"蜜周"时，斯共地下领导只发表过一个著名文件——新党纲（1941 年 5 月通过）。新党纲也是扬·奥索哈起草的，其中呼吁建立"苏维埃斯洛伐克"。看来这一纲领反映了不切实际的希望，纳粹德国会允许苏联继续在欧洲进行领土扩张而损害自己。今天我们知道，希特勒 1940 年 11 月在柏林向莫洛托夫提出建议，要苏联人面向南方，即反对伊朗和印度。但斯大林宁愿首先要罗马尼亚。希特勒对斯大林的这一野心的反应是开始著名的巴巴罗斯战役，该战役意味着对苏联的入侵。

自然，1941 年 6 月纳粹分子对苏联进行突然入侵后，局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我记得，我是在杜布尼察上班时获悉这一消息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令人震惊的新闻。当然，斯大林迅速回到共产国际 1935 年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地位又改变了，因为共产国际也对承认斯共为独立党进行部分修改。

但是，修改不是完全的。苏联人认识到，斯洛伐克的情况同捷克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继续被承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不同部分，而不仅仅是个地区组织。同时到 1943 年 1 月，他们政治上就又从属于流亡在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1943 年 12 月共产国际结束活动在这方面未带来任何变化。

在莫斯科的党的领导的斯洛伐克成员威廉·西罗基 1941 年 7 月就给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带来新的指示。但西罗基来后很快就于 1941 年 8 月被捕。斯洛伐克秘密警察很快也破获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届地下中央领导，逮捕了其三名成员中的两名，尤利乌斯·朱里什和留多维特·贝纳达。

斯共第二届地下领导产生于1941年9月，由扬·奥索哈、奥托·克拉伊尼亚克和温岑特·什克拉巴拉组成。它存在了七个月，1942年4月被警察破坏，克拉伊尼亚克和什克拉巴拉被捕。在这之后我父亲走到前头，同扬·奥索哈和约瑟夫·列塔维茨一起，当了斯共第三届地下中央领导成员。当时觉得，德国进攻苏联证实了许多人的看法，1939年的德苏条约只不过是在玩策略手法。

斯共第三届地下中央领导比前两届寿命更短。所有三名成员包括父亲不到三个月之后被捕。这次把此前成功地逃脱追捕的奥索哈也抓到了。把所有三个人都关押在布拉迪斯拉发，晚些时候关在尼特拉，一直关到1945年，甚至包括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期间。

父亲被捕前几年，躲藏在许多地方。他藏在维尔奇采的粮仓里，后来躲在托波尔昌尼自己妹妹祖兹卡的家里。但他不能长期留在那里，党在一个寡妇家里给他找到秘密藏身处，也是在托波尔昌尼。在那段时间，父亲和那位已有个成年女儿的寡妇之间产生了长期的关系。战后父亲也从未回到我们家。

父亲藏在托波尔昌尼时，得到要他于1942年春转移到布拉迪斯拉发的指示，上面提到的斯共第三届地下中央领导将在那里组成。从那时到三个月后被囚禁，他同扬·奥索哈住在一套秘密住宅里。他1942年7月在布拉迪斯拉发市公园秘密碰头时被捕。

正如我已提到过的，我1943年在尼特拉监狱中看见过父亲。我要求探监，列举的理由是我要结婚，想征求父亲同意。准许我进行短时间的探望，我们隔着铁栅栏坐着。两个警察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至少可以见他。我感到高兴，因为此前我不知道，是否还能见他一面。我们谈话时，我惊悸地看到，警察在我们旁边拉着一名手臂上有政治犯带的红袖标的犯人。那个男子的衣服沾满鲜血。我看了看他苍白的面孔，认出是留多维特·贝纳达。

1942年春夏大概是斯洛伐克国内恐怖的最糟时期。那也是大规模把斯洛伐克犹太人押解到在波兰的集中营的时候。1942年3

月到 10 月间，他们有 5.8 万人被强拉到奥斯维辛和其它集中营，大多数人一去不复返。斯洛伐克监狱也关满政治反对派，其中包括数百名共产党人。

1943 年 4 月，斯洛伐克共产党又受到沉重打击，整个第四届地下中央领导同 80 名其他领导干部一起被捕。当时，在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派两名指导员到斯洛伐克。其中之一卡罗尔·什米德凯于 1943 年夏组成斯共第五届、也是最后一届地下中央领导。

德国进攻苏联和日本进攻珍珠港之后，军事形势对法西斯轴心国日益不利。1942 年 8 至 9 月，英国和法国流亡政府宣布慕尼黑协定无效，此后苏美英三个主要盟国很快就承认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1943 年 2 月，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吃了败仗，盟国在意大利登陆。在斯洛伐克，像在被德国控制的欧洲的其它地区一样，自由的希望重又增长了。

从我回到斯洛伐克到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期间，我过得较平静。我在杜布尼察上班，参与工厂小党支部的各种活动。那的确是危险的工作，因为警察对这么重要的工厂嗅觉很灵。我们得以同其它工厂、特别是我母亲出生地班诺夫采的斯洛伐克地下党的小组建立和保持联系，他们在附近的拔佳鞋厂建立较强的党支部。

日林纳和鲁荣贝尔克市的工人组织了意义重大的罢工，几个孤立的游击小组开始在附近山区开展活动，逃出集中营的苏联战俘也在山区帮助组织游击小组。另一些游击队组织者是空投到斯洛伐克的。但是，较重要的游击活动是从 1944 年春才开展的。

从 1942 年出现战场形势发生变化的最初迹象起，我们就关切地注视着法西斯缓慢而不可阻挡的灭亡。我记得，我们急不可待地研究苏联地图，德国人在那里遭到最初的失败。我们努力找到希特勒分子宣布“战线缩短”的地方，那意味着他们的又一次退却。我们用禁止使用的短波收音机，收听伦敦和莫斯科的消息。在

意大利，战线似乎不动，特别是在蒙特卡西诺长期休战期间。但我们知道，盟军在西欧某地的大规模登陆正在准备中。1944年初春，我们就嗅到其味道，距战争结束不远了。

1943年11月我22岁，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前夕我已成年，缺乏耐性。战争曾经像见不到黎明的漫长黑夜，但如今曙光就要来临。

6

1944年的政治

1944年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和1918年摆脱匈牙利的桎梏，属于斯洛伐克现代史的最重大事件。通过举行反蒂索政权和纳粹分子的起义，我们参加了各爱好自由的民族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起义结束了我们历史上的可耻插曲——斯洛伐克国极权政权。

起义作为一次历史性事件，被蒙上传奇以及简单化解释的面纱。

不错，我在起义中只不过像个兵卒，难看到其更广大的轮廓。但从那时我就一直渴望了解，那一切实际上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其进程是这样的，而不是另外一个样子的。多年来，看清许多事实对我而言是不易的。直到1970年后我长期被软禁期间，我才真的能对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进行较彻底、深入的思考。当然，1968年8月的痛苦经历打开我的眼睛，我可以得出新的解释。

那一段时间我读得很多，我看到，在许多官方准许、过去出版发表的关于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书籍和论文中，只有几本、几篇越出适应官方要求的宣传。我想，在捷克斯洛伐克写作和发表的关于这一斗争的严肃、公正的作品，到6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1968年军事占领后，在多数情况下又开始伪造和沉默。古·胡萨克1969年当政，照抄历史又成为通常的做法，许多历史学家包括我的朋友遭到迫害。政治上被流放使我能重新慢慢地阅读一切，这帮我弄清许多过去忽略的有趣事实。朋友们有时也给我带来了此前只能偶尔看到的“非官方”出版物、书籍和文章。这样，我就

扩大了对这一时期的认识，我努力分清重要和次要的事实。我从思想上放弃许多以前的看法，一块块拼成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较完整、准确的图像。

起义的早期准备工作开始于1943年初，当时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已获得反纳粹战争联盟主要成员国包括苏联的正式支持。很难估计在那时的斯洛伐克，这一事实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熟知，但我估计，在政界对它是了解的。同时，蒂索的极权政权由于和纳粹德国同流合污，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国内也失去许多同情者。

斯洛伐克的非共产党反对派小组，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和农民党的持不同政见者，1943年初同在伦敦的贝奈什总统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建立经常的无线电联系，商定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和推翻蒂索政权。斯洛伐克军队的反法西斯军官采取了最初一些步骤，他们在民主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学院受过培训。

贝奈什总统从1939年起开展不倦的外交活动，争取废除慕尼黑协定和重新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占领的捷克和摩拉维亚的抵抗具有巨大的意义。需要在捷克和摩拉维亚保护国采取惊人的反纳粹的反抗行动，促使1942年5月发动对赖·海德里希①的暗杀。

爱·贝奈什和在伦敦的军队侦察机构首脑莫拉维茨将军挑选在国外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年青军官，让他们跳伞降落到捷克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消灭海德里希。其中一个是斯洛伐克人约瑟夫·加布奇克，另一个是捷克人扬·库比什，这并非偶然，这一

---

① 赖因哈德·海德里希（1904—1942），纳粹德国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头目，1941年9月27日被任命为捷克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代理总督，1942年5月27日被流亡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派遣的伞兵小组刺杀，随后德国占领当局对捷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

组合象征着继续存在着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利益的共同性。

当然，斯洛伐克现存政权及其支持纳粹仍然是贝奈什所作努力的更直接的障碍。爱·贝奈什显然想鼓励斯洛伐克赞成捷克和斯洛伐克联合的地下力量进行反蒂索政府的公开活动。

继续执行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联合"方针，始于194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该决议让流亡国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管理保护国及斯洛伐克的党务。这一决议呼吁同非共产党民主力量合作，这是苏联人同西方联盟的反映。就实际结果而言，它悄悄地撤销了"苏维埃斯洛伐克"的政策。

1943年7月，在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派代表到保护国及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卡罗尔·什米德凯和卡罗尔·巴齐列克受命贯彻新的政策。什米德凯的任务更多的是政治性的。巴齐列克主要负责协调游击运动。什米德凯从莫斯科来后不久，建立了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新的中央领导。由于多数其他有经验的党的积极分子都在狱中，什米德凯挑选了拉吉斯拉夫·诺沃麦斯基和古斯塔夫·胡萨克两位新人，到党的中央机关工作。

当时40岁的拉·诺沃麦斯基是斯洛伐克著名诗人、记者和战前集中在文化刊物《群众》周围的同名左翼文艺小组的奠基人之一。小10岁、当律师的古·胡萨克，也是这一小组的成员之一。

1939年成立斯洛伐克国以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转人地下、隐蔽起来。胡萨克起初甚至在布拉迪斯拉发律师协会工作。对这一异乎寻常的情况，可以用30年代末知识分子右翼和左翼某些个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解释，当时思想和政治利益不止一次交织在一起，这是对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如何对待斯洛伐克民族利益不满的结果。

1943年秋，这个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新领导，在来自伦敦和莫斯科的消息的鼓舞下，同非共产党的抵抗运动建立了接触。1943

年 12 月达成基本谅解，称为圣诞节协议的文件体现了这种谅解。文件包含了要求斯洛伐克和捷克民族在将要恢复的共和国平等相处的句子。这一协议是成立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基础，后者成为地下反对派的中央领导机关。

斯民族议会起初有六名成员，其中三名是共产党人（卡·什米德凯、拉·诺沃麦斯基和古·胡萨克），另外三名代表非共产党反对派（扬·乌尔辛尼、约·列特里赫和马·约斯科）。这种组成反映了反法西斯反对派各集团的相应力量，但我想，也预示了苏军解放我国之后共产党的影响。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期间，斯民族议会扩大到 50 名成员，其中共产党人拥有约一半席位。斯民族议会的执行机关行政委员会也是如此。

圣诞节协议的产生与贝奈什对莫斯科的访问同时。他在那里同斯大林达成协议（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也同在莫斯科的捷共领导达成协议，捷共带来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简单化的政治制度结构。这些协议（比 14 个月后在雅尔塔签订的协定大得多的程度上）把捷克斯洛伐克带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使国家的对外政策从属于莫斯科，以决定性的方法事先影响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生活近半个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决定之一是建立新的地方政权机构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类似苏联早期的苏维埃，那时苏维埃还有政治多元化的“门面”。现已清楚，在莫斯科的捷共领袖当时就把人民委员会理解为控制的工具。贝奈什总统完全接受人民委员会，在伦敦的广播讲话中对人民委员会表示支持。

在制订政治计划的同时，也进行起义的军事准备。伦敦流亡政府国防部和贝奈什总统从 1943 年夏就同斯洛伐克军队的一些高级军官，特别是同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军队司令部的弗兰季舍克·乌尔班和扬·戈利安中校，保持无线电联系。贝奈什总统责成扬·戈利安进行军事行动的整个准备。1943 年底，斯洛伐克军队

军官的起事网基本已准备就绪。

同时，斯洛伐克游击运动形成、发展并壮大了。但游击队员既不受伦敦、也不受斯洛伐克民族议会控制，而归设在基辅的、政治上由尼·谢·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游击司令部控制。这种各管一段的指挥，后来带来严重问题。

1944 年 5 月，贝奈什总统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任命戈利安中校为斯洛伐克起义军事力量的首脑。1944 年 6 月，斯洛伐克民族议会提出两个起义方案。第一个、非常优先的方案建议同苏军的活动协调行动。第二个方案把起义作为对德国一旦军事占领斯洛伐克的反应。同苏联人协调对两个方案来说都是重要的（但对第一方案尤为重要），8 月 4 日斯洛伐克民族议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以便就此达成协议。代表团由卡罗尔·什米德凯和斯洛伐克反法西斯军官费伦奇克上校组成。

回过头来看，什米德凯和费伦奇克代表团未达到所提出的目的，并不出人意料。起义的组织者原来期待，苏军第四乌克兰战线部队很快开始在斯洛伐克东北和东部进行反攻。这次反攻本来真的计划在 8 月 28 日进行。但 1944 年 8 月 23 日罗马尼亚转到盟国方面，改变了战略计划。斯大林推迟第四乌克兰战线部队随后的进攻七个星期。

其后，德国在巴尔干的另一个盟国保加利亚也垮台了，苏联最高统帅部把下一次主攻从斯洛伐克转向匈牙利，那里的地形对坦克大规模作战有利得多。

但是，这些事件不是影响苏联对起义的态度的惟一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因素。我首次不再否认当时苏联领导有怀疑他们未完全控制的任何行动的偏执倾向。1944 年 8 月 1 日爆发的华沙起义是明显的例子，苏联人拒绝援助波兰起义者。我承认，我许多年来拒不相信，苏联领导会作出这种行为。但随着我了解更多的事实，我的眼睛睁开了。阅读 1974 年在布拉格发表的苏军总参

谋长S·M·什捷缅科元帅的回忆录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他把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组织者定性为“资产阶级叛乱者”，这的确是同斯大林一致的观点。

只有这种态度才能说明，为什么苏联统帅部不向起义部队提供军用物资。那肯定不像他们对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带有倾向性的叙述所说的，仅仅是由于“天气条件恶劣”。苏联飞机在解放区到处自由飞行，运送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的代表，如扬·什维尔马和鲁·斯兰斯基，把物资空投给受苏联人控制的游击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苏联统帅部拒不允许英国皇家空军为起义者空投物资。

有些人宣称，苏联领导持保留态度，可能是由于所谓恰特洛什丑闻[①] 而产生的。但就是这我也觉得不合乎实际。斯洛伐克民族议会明确地同恰特洛什建议划清界线，贝奈什总统在伦敦也这样做。把斯洛伐克反对派民主力量同恰特洛什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像的。我也认为，斯大林本人不论怎么背信弃义，不会对这种人抱有某种幻想。

但是，还有别的可能增添苏联对起义怀疑的因素。那是古·胡萨克起草、卡·什米德凯带到莫斯科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胡萨克写了恢复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几种可能的选择，其中之一是斯洛伐克可能加入苏联。

斯大林不久前刚批准同贝奈什达成的、承诺恢复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盟条约，必然觉得这种建议令人怀疑、冒险。不错，尽管有这一条约，苏联人几个月后在恶劣的情况下吞并了曾经是战前

---

① 斐迪南·恰特洛什（1895—1972），1939—1944年任斯洛伐克国国防部长，1944年夏制订军事政变计划并力图同苏联统帅部建立联系，8月29日在广播电台表示反对斯民族起义，数日后又转到起义区，被扣押并送到苏联，1947年被判处五年徒刑，翌年获释。

捷克斯洛伐克一部分的喀尔巴阡山麓罗斯，不过斯洛伐克是另外一回事。

胡萨克由于过热，显然忽略了1941年年中苏联人和共产国际政策发生的变化，除此以外，他的建议同在莫斯科的党的领导的政治纲领相矛盾。可能这也把政治之水搅混了，未增进苏联对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同情。

把这一切概括起来说，事实是，未形成起义同苏军统帅部协调的必要框架，尽管原计划访问一周的斯民族议会代表团，为此失望地在莫斯科度过整整一个月。现在我相信，苏联领导对这种协调工作根本不感兴趣。

东斯洛伐克的两个斯洛伐克师的遭遇可说明整个情况，它们从1944年7月中准备在德国后方投入战斗、协助苏联突破喀尔巴阡山。当时在这一地区俄罗斯战线和斯洛伐克边界之间的距离大约只有42公里。贝奈什在莫斯科的全权代表皮卡将军1944年7月17日就向苏联最高统帅部通报这一计划。但是，皮卡未收到任何答复。直到9月8日，德国人包围此前准备打他们的斯洛伐克两个师并将其缴械之后一个星期，苏联朝着这一方向的有限进攻才开始。

这两个斯洛伐克师的预计的指挥员塔尔斯基上校后来被指责对起义的失败负有严重责任。事实是，两个师的指挥员是马拉尔，而不是塔尔斯基。戈利安任命塔尔斯基，到起义行动开始时，才担任两个师的指挥。但早在塔尔斯基到达两个师之前，协调工作就失灵了。我现在想问，在对苏联在这一地区的计划没有清楚了解的情况下，他还能做什么？

同对业已组成的起义军事部队完全相反，苏联统帅部在向共产党占优势的游击队供应物资方面主动得多。起义前几周，苏联飞机向日益壮大的游击队空投越来越多的伞兵小组和物资。

1944年8月25日，一个游击小组对弗鲁特基的一小队德国

驻军发动未经深思熟虑的进攻，引起德国的入侵。这正是斯民族议会所担心的。其领导人 1944 年 8 月 20 日就要求苏联人指挥的斯洛伐克游击参谋部推迟类似的行动，避免挑起德国的提前干涉，不给希特勒部队以占领斯洛伐克的借口，但徒劳无益。苏联人了解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的游击小组得到提醒，在对武装行动进行彻底准备并同苏联军事行动的进展加以协调之前，不要同敌人进行公开对抗。为什么他们无视这一请求？这么多年之后，这一问题还在折磨我。

斯民族议会非常努力把拟议中的起义同苏联人的做法相协调。在弗鲁特基发起进攻后，已无暇它顾。德国军队开始占领斯洛伐克，新任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斯洛伐克参谋部参谋长扬·戈利安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下令进行武装抵抗。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开始了。

* *　　* *　　* *

在两个月内，斯洛伐克游击队和军队拖住了德国部队，但是，尽管赫鲁晓夫在基辅的基地支援了游击队，人们所盼望的苏联部队的到来未实现。几个月之后的 1945 年春，雅尔塔会议之后美国部队不应当“提前”解放捷克和摩拉维亚，苏联部队在马林诺夫斯基和科涅夫元帅的指挥下打败最后残余的纳粹部队及其国内帮凶，斯洛伐克才解放。

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被描绘成光荣的、然而不成功的起义，由于上述原因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分享解放国家时取得的成就。客观地说，起义的军事失败不仅削弱了斯洛伐克的非共产党力量，而且也削弱了共产党在国内的抵抗和全斯洛伐克民族利益。我不努力夸大起义在打败德国中所能起的作用，但起义在当地范围内，时机选得好，可显著削弱德国战线中央部分的坚固性，拯救众多生

命。

但这看来不是大较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想起1944年9月哥特瓦尔德[1]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谈产生的文件，哥特瓦尔德在该文件中对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政治态度评价不佳，把它比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策。独立态度当时在斯大林周围就未引起同情。

我还可补充说，起义只取得部分、不完全的结果，也削弱了斯洛伐克在新的共和国同捷克民族建立较平等的伙伴关系的要求。可惜，这违背了当时所有主要活动家的利益，不仅是苏联人，而且还有贝奈什政府和哥特瓦尔德的党的领导的利益。所有的人出于各种理由，都更主张在捷克斯洛伐克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斯洛伐克在联邦国家中平等的愿望的实现又被推迟24年，到1968年在苏联占领整个共和国的困难条件下才至少在形式上达到。

45年之后，我想，有个事实必须强调：像我一样的普通人，当时不可能了解如此广大的事件画面。我们只不过把起义的失败，看作不可预料的战争环境给我们带来的不幸。由于对幕后政治没有较详细的了解，我们只看到战争的大轮廓，得知主要是苏联人打败了德国人。盟国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德国只在比意大利或北非战线大得多的俄罗斯战线吃败仗。

在1945年，这种对苏联强大力量的看法，是我这一代人从战争中获得的头一个印象。苏联人从初期的军事灾难中清醒过来并转入强大反攻的能力是显而易见、不可否认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就容易对苏联整个政治和经济制度抱有幻想。我还记得，我们乘火车去上班，一位老年人同我们进行小声的讨论，他谈到了苏联人。他说："人们假如不喜欢政权，就不会以这么大的决心为其面

---

[1] 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1896—1953)，木工出身，1929年起先后任捷共总书记、主席，1946—1948年任捷政府总理，1948年起任捷总统。

战斗。”这不像我们后来所了解的那么简单。

当然，我没有忘记自己早年在苏联的经历。但是面对着战争，对其阴暗面的回忆逐渐让位了。而且我对在高尔基市中学、清洗时期受到的宣传不是免疫的，其受害者（从季诺维也夫和图哈切夫斯基到布哈林）被说成是纳粹或甚至日本的代理人。在宣传上，对这些审讯，以同法西斯作斗争加以说明。回顾1945年和我稍后的认识，这显得异乎寻常。

至于对德苏条约的回忆，1941年6月后很快就淡化了。解放后谁也不提醒注意这一时期，捷克或斯洛伐克报刊更不提。1948年2月以前很久，避免公开批评苏联就是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各种政治力量普遍采取的政策。例外甚少。

战争加强了父母灌输给我的关于自由和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信念。像他们一样，我也从不追求权力或物质报酬。我只有朴实的生活目的：安全可靠的工作和我同妻子可养育子女的小房子。但这曾经是许多人的梦想，现在仍然是大多数人的梦想。

我想每个人，只要他不是一出生就非常富有，都理解安全可靠的工作的意义，有工作保障有饭吃。如果人没有运用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就失去意义。对这一信念，我从不动摇。战争事件坚定了我的社会主义理想，加强了我的下述信念：旧制度不能保障生活中基本的东西——所有人的工作和好的生活。

因为我是在1938年秋快要成年时回到斯洛伐克的，我不了解，正常时期这里情况怎样。我听到许多对失业及其所带来的贫困的不满。1936年和1937年，新建的军火工业开始投产，斯洛伐克情况有一定改善。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和战争初期，军火工业继续提供工作岗位，也促使斯洛伐克其它经济部门逐步恢复。新政权同样需要庞大的国家机构，包括为数众多、军饷高的警察。

斯洛伐克部分人觉得，这种相对、脆弱、短期的繁荣是斯洛

伐克国的积极成果。但这是极其简单化和错误的看法，因为它未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许多长期消极后果，包括破坏人的价值和道德价值。

我自己的感觉和经验是，甚至在失业率由于战争的反常而下降的时候，我也未看到福利普遍提高，未听到人们说对生活条件感到高兴。实际上，稍微动脑筋的人都提出战争结束后就业的可能性将会怎样的问题。他们忘不了过去长期的经济贫困。

至于我，进行比较、或作别的政治选择的可能性很小。我以前的惟一经历是居住在苏俄，正如我所记得的，在那里失业不是个问题。而这我认为是重要的。

7

起　　义

在 1944 年春末夏初宁静的夜晚，当苏联人逼近斯洛伐克边界和盟国飞机高高地在头顶自由飞过，在东斯洛伐克，人们已能听到战争的直接声音。每个人都清楚，苏联将来的反攻可把战线经喀尔巴阡山推进到斯洛伐克。6 月初，西方盟国在法国登陆。看来好像战争可在几周之后结束似的。

自然，我们生活在紧张等待每天传播着的乐观消息之中。实际上，我们对大千世界的政治事务了解得很少，更不必说对起义的军事准备了。从每天早晨和下午把我们拉去上班和回家的火车车窗往外看，斗争似乎是简单的。

在起义前的几周内，苏联人向斯洛伐克各个地区空投了许多游击队组织者和物资。因此，产生了游击队员几乎到处都有的印象。各地下小组之间的接触扩大了。我获得消息，战争既已打响，我的杜布尼察小组，还有班诺夫采的一个党支部，应当同游击队联合起来。我的印象是满意的：一切都准备、协调得好。我们必须战斗，我们之中的一些人肯定会牺牲或受伤。那可是战争啊！

8 月 29 日信号发出了，起义部队的军事指挥员戈利安上校发布命令，奋起抗击侵入国家、要占领斯洛伐克的德国人。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参加——实际上我早已作出决定。8 月 29 日是星期二，我提前下班回家。母亲已经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站在厨房的炉子旁边，我对她说，我要去参加战斗。她把脸转向我，看着我的眼睛，沉默了几秒钟后说："的确，你应该去。"我理解她

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她的一切。但她向来是个坚强的人。

我往背包里装几件必需品，她又给我添点东西，我们互相拥抱，我就走了。她的那一双眼睛，我在其中先感觉到然后再看到眼泪，永远铭刻在我的脑子里。

当然，情况不像我所期待的那么清楚。当我们集合起来，向北朝起义区中心班斯卡-比斯特里察进发时，德国人已在迅速行动。几个小时就夺取了统治政权在那里集中了最忠实的部队的整个南部地区。几天之后，占领了各战略方向的重要城市：日林纳、弗鲁特基、利普托夫斯基-圣米库拉什、普雷肖夫、凯日马罗克、托波尔昌尼。托波尔昌尼靠近我的小组帮助在解放区南部边沿建立防线的地区。

德国人以如此迅速的行动，保障了以后行动的供给线。他们很快从西面的保护国、南面的奥地利和匈牙利以及北面的波兰调来又一批部队。但其主攻行动继续在南部进行。

我不断想念父亲。关押他的尼特拉，距离托波尔昌尼大约只有 40 公里。他能逃出来吗？事实是德国人开到那里时，起义刚刚开始。但正如我战后所了解到的，起义爆发之后不久，父亲和其他被关押在尼特拉的政治犯有可能逃出来。警卫士气非常低落，所有犯人都可出来——牢门大开。当地的反法西斯小组甚至准备了卡车，以便把犯人拉走。父亲的老朋友留多维特·贝纳达也已离开牢房，坐在卡车里等其他犯人。但是，据说就在这时来了一位信使，带着斯洛伐克党的第五届、也就是最后一届地下中央领导成员古·胡萨克的指示，要求等待斯洛伐克几个监狱同时释放一切政治犯。

他们等着，留·贝纳达甚至又回到牢房。我是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到的。党的纪律是首要的。因为卡·什米德凯在莫斯科，古·胡萨克当时就代表党的最高权威。但不久之后德国人来了，斯

洛伐克的监狱警卫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越狱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几周之后，政治犯被从尼特拉转移到布拉迪斯拉发，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其中也包括父亲，从那里又被押解到杀害了12万名犯人的茅特豪森死亡集中营。父亲奇迹般地活着出狱。

较多的老战士自那时以来认为，胡萨克发出不幸指示的主要动机是其野心，当他正在走向权力中心时，他不希望年长些的党的领袖出狱归来。老实讲，这一说法无法证实。即使在1950年之后进行最恶劣的虚假审讯的时候，指责古·胡萨克有这种意图也不是容易的。许多年之后，我亲自问胡萨克，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指示。他答道，他当时不相信德国人会入侵斯洛伐克，不想以未准备好的释放政治犯激怒他们。据说他想协调从较多的监狱同时释放政治犯。对他的回答，我耸耸肩膀，因为他对此应当更了解。我还应补充，卡·什米德凯当时仍在莫斯科，不能把对胡萨克的命运攸关的决定的责任推给他。我后来对他更了解，相信他不会支持这样的指示。

就在起义的最初几天，我完全出于偶然，碰见哥哥尤利乌斯，可惜这是最后一次。那是在诺瓦基和普列维扎之间的某个地方，尼特拉河的山谷中。我被分配到炮兵部队，我们的任务是支援步兵阻止德军前进。我们部署在公路上方的一小块平地上，面朝南。原来估计德国人将从西南面来。实际上，他们也从东南面来，我们看到，我们的步兵在他们面前全线后退。这时，尤利乌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装作完全像个军人、严肃的样子。但他的脸上迅速露出舒展的微笑——我们互相见面，两人都感到高兴。

在我离家后一两天，尤利乌斯也参加起义。现在他感到奇怪，我们这支部队还躲在野战炮后干什么。“你们没有看见，步兵已经在跑吗?”他说。我回答说，我们还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但他的小组已经走了，因此没有时间再谈话。我们互相拥抱，我未曾料到，这是我们的诀别。

尤利乌斯有两支手枪。临走之前，他从腰带里拔出一支，放到我的手里。“在这种时候，你可能需要它。”他开玩笑地说。在整个起义期间，我都随身带着它。

我们向汉德洛瓦撤退时，德国坦克在塞贝德拉热附近切断我们必须越过的道路。我同来自离乌赫罗维茨不远的塞列茨的扬诺·布尔科在一起。我们一起爬过壕沟到另一边。我们小组的其他人也跟着我们很快爬过壕沟。路边有一排结着圆形果实的小灌木丛。灌木丛后面展现一片至少有半公里宽的开阔地，它的后面是树木丛生的山岗的边缘地带。在我们的左面，我们看得见之处，两条道路交叉的地方，停着一辆德国坦克，其炮塔在慢慢转动。

我们看到，我们必须在德国步兵到来之前，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开阔地，跑向森林。我们吸口气后，就跳起来，开始跑。随后我们就听到德国机枪扫射的声音，看见子弹落在左右两侧的尘土里。我感到背部被轻轻螫了一下，但我没有放慢跑的速度。我很快就发现，我以为只是出的汗，其实它已同血混在一起。我们终于跑到森林边缘，森林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我们走到森林较深处时，战友们帮我看伤口。幸好子弹穿过皮带，速度稍微减慢，因此只打进肌肉，而未伤着脊椎。他们尽可能给我包扎伤口，我们继续前进。

仗不多，我们慢慢向汉德洛瓦撤退，然后面向东南，沿着汉德洛夫卡河，撤向圣克里日，后来改叫赫龙河畔日阿尔。1944年10月18日，德国人从那里转入对我们起义区的反攻。他们把我们往回压，经赫龙河谷，向东朝着兹沃伦方向，于10月26日占领该城。然后向北，直到班斯卡-比斯特里察，一天后我们不得不放弃该城。剩下的部分起义武装部队后来继续向北撤入山中，在东诺瓦利设立又一个临时指挥部。

德国人在装备特别是坦克方面拥有压倒优势。我们主要缺少重型武器和反坦克武器。苏联人送一些物资，但就其数量而言，不

够多。在苏联、约有1700人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二伞兵旅的伞兵来得很晚（9月25日才来），1944年10月8日之前未投入战斗。当时，起义区急剧缩小，四面受包围。起义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我们不知道，苏军终于开始在喀尔巴阡山主段的几个山口进行有限的反攻。但反攻在11月底以前停滞不前，未取得重大进展。

从班斯卡-比斯特里察陷落时起，起义的有组织的阶段就结束了。所有剩下的起义部队都改打游击战。有些人向北撤。另一些部队向东、西开入中斯洛伐克林木繁茂的群山中。我们的部队回到我们从那里来的西部。

这次，一切铺过的道路都由德国人控制。我们不得不回避较大的居民点。为了到达我们要去的斯特拉若夫山，我们绕过了克雷姆尼察、汉德洛瓦和普列维扎。我们从一群山走到另一群山。

那是缓慢的行进，躲避在山麓镇压反抗和搜寻我们的德国岗哨。有时我们同他们交火，但我们避免进行较大的战斗，因为1944年12月初的某一天我们到达斯特拉若夫山时，我们的人数已不多于一个连。我们既饿又累。夜晚已非常漫长、寒冷，我们如睡在野外面不生火，就有冻死的危险。

在山谷中越过德国人控制的道路特别危险。但我们在未到达班诺夫采和杜布尼察间半路上的莫捷希采附近的狭窄低地之前，成功地避开了敌人。我们要去姆尼霍瓦-列霍达，离莫捷希采大约还有15公里。扬诺·布尔科在莫捷希采有个亲戚，是一座小房子的孤单主人。他认为，我们在经过荒山野林的长期退却之后，可在那里隐蔽几个晚上，至少稍微休整一下。

莫捷希采是两条山路的交叉之处。我们从森林边上瞭望一下，发现德国人在这两条道路的交叉点上修筑了机关枪位，从我们必经的村子北面控制低地。一条清浅的小河同两条道路之一平行、自北向南流去。

我们选择了一个到最近的森林距离最短的地方，得以涉水过河，而又未让德国人发觉。在我们和道路之间，是一片有深深的犁沟的田野。我们决定，顺着犁沟爬到路上，然后经过开阔地跑到森林。我们以往一向是这样越过的，只有细节不同。这回森林和道路之间的距离总的来说是短的，不多于 400 米。我们沿着犁沟爬时，德国人可能看见我们当中某人的军用背包，我们刚爬到一半，他们就开枪了。我们在犁沟的掩护下，奇迹般毫无损伤地爬到路上，枪声停了一会儿。不过，我们在道路和德国人之间落入了圈套，德国人肯定去叫了指挥官。我们不能等到天黑再跑。

森林看来很近，因此我们决定跳起来跑。扬诺·布尔科在我前面，另外两人跟着我。机枪又开始扫射时，连里的其他人还留在后头。我们尽快向森林边上跑。扬诺·布尔科一直在前头，我离他只几步。我们快跑到那里时，子弹又打中我，这次打着右脚。我的靴子立即流满血。

我们跑到林中时，等了一会儿。然后我们往山岗上走，以便离那条道路和搜捕我们的德国人更远些。我们尚未走得太远，就听到某种响声。"是野猪"，我想，但我们很快就听到狗吠。德国岗哨走近了。他们必定来得很快，我们一越过道路就来了。我们跳进附近的一个坑里，用树叶遮盖起来，等待着。后来声音减弱，听不见了。他们没有发现我们。

我多次想起这样的时刻：我去打猎，看到护林人为测风向，往食指上吐唾沫。那天，我们在奥斯特拉山躲德国岗哨，救我们的风从警犬那边向我们吹来。

过一会儿，我们又小心地走，大约走了 800 米，在天大致已黑时走到扬诺·布尔科堂表兄弟住的小房子。扬诺先去看他，我们在森林中等着。几分钟之后，他回来说，我们可留在那里过一夜，但不能待得更长。附近到处都有德国人，搜查房子，掩护逃亡者的人受到残酷的惩罚。德国人枪杀一家又一家，烧毁他们的

房子。我们在干草房里过了一夜，我不敢从受伤的脚上脱下靴子。扬诺的堂表兄弟天亮前来叫醒我们，我们差点把他误杀。

从那里我们还必须再走大约八公里，经过一座座森林茂密的山峦，才能到达扬诺家住的塞列茨。我走的时候伤口疼，不得不找根棍子作拐杖。在这次长途跋涉的末了，又是一片开阔地和一条铺设的道路，我们在路上看到德国的机动车、卡车和上下山巡逻的摩托车。我们利用间歇，跑过田野、道路、路那边的另一片田野。这次，我已记不得，我是怎样脚上带着子弹，一瘸一拐地跑过大约 500 米的田野和小河。我一跑到，就倒在地上。后来人们对我说，我手里拿着拐棍跑，显然不感到疼痛。

从那里到布尔科的家已经不远，在他家人们终于帮我割开靴子，从肿胀的脚上脱下它，用一些草药包扎伤口。

在塞列茨，把我抬到住着一户有小孩的人家的房子。这使我非常不安，因为我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危险。我请求用某种办法把我送回维尔奇采，因为我不知道该去别的什么地方。

人们急忙组织复杂的运输。我记得十分清楚，我被藏在白马拉的打谷机的侧板上。最后把我送到维尔奇采，藏在没有小孩的彼得家的房子里。当然，我在维尔奇采也有其他朋友，不过最好的是安娜在那里，我不能走路时，她照顾我。

只是我的脚看起来可怕，又青、又红、又肿。我需要请个医生。其间迁回特伦钦的母亲，想方设法寻找医生。她找到一个，但不愿给我治伤。还算幸运，他未到警察局告母亲。

最后，找到一位名叫博伊科的医生。他来自不远的麦尔奇采。1917 年革命后，他的双亲同他一起从苏联流亡到捷克斯洛伐克。博伊科大夫是个勇敢、有礼貌的人，他来给我看病，直到我的脚伤愈合。

战后，我想寻找博伊科大夫，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在托波尔昌尼了解到，苏联人把他逮捕了，押回苏联。“他们为什

么这么做?”我问道。“他们把俄国所有流亡者集中起来,”人们对我说。“他们有流亡者名单。”

这使我吓了一跳,不过我对此暂时不能有所作为。但博伊科大夫未从我的脑子里消失。一有可能,我就开始打听他的消息,并利用我所有的一切关系帮助他。我写信给布拉格的苏联大使馆、莫斯科和基辅的朋友及熟人,发起争取释放他的运动。但这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才把他从古拉格[①] 放出来。

1957 年,博伊科大夫终于带着受到损害的健康回来。那时我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工作,我安排他在别什江尼疗养。可惜,他回来后活得不长。这位勇敢、善良的人的遭遇,一直使我感到痛心。

1945 年 2 月,我在房子周围瘸着走动,听到敌人把尤利乌斯枪杀了。我们在战斗中分别之后,他也像我一样,转向采取游击斗争的方法。他留在本游击小组,该小组 1944 年秋末退人尼特拉河和赫龙河之间的山中,因此我们两人相距不远。1945 年 1 月 28 日,德国哨兵在那里把他打死了。尤利乌斯不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只是个有礼貌、正直的男子汉。他接受了父母以及我的信念,但从未加入共产党。他是个自由人,不愿失去哪怕只是一点点的独立性。从童年起,他就非常自由自在,有时甚至不谨慎、无忧无虑。在跳进水之前,从不试两次水。我相信,他也是这样死的。从 1945 年 2 月传来这一悲痛的消息时起,我不断想起我们在尼特拉河上的山岗上分别时他的最后一次微笑。他是临解放前近半年牺牲的。

对我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而对父亲来说最艰难的时期才刚刚开始。1945 年 2 月,政府警察把他同其他政治犯一起交给纳粹分子,后者又把他送到茅特豪森。后来我得悉,载着近 200 名犯

---

① 古拉格,苏联 1930—1955 年的劳改营。

人的火车，在贯穿奥地利的铁路线上受到轰炸。有些犯人被炸死。其中包括扬·奥索哈，父亲的多年朋友。其他犯人包括父亲得以逃走，但时间不长。当他们走到斯洛伐克边界时，又把他们抓住，拉到茅特豪森。父亲 1945 年 5 月回来，体重不足 50 公斤。

时值温暖的春天，和平来临了。每个人都憧憬着未来。我们刚刚上了一课，可惜我们忽略它。我从那时以来不断对它进行思索。人们在大胆展望未来之前，总应努力了解过去。

但是，我还年青，通过受教育准备实现伟大的期望：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将有计划地发展，劳动成果将公平地分配，每个人将得到一份。这不仅看来是美好和能够实现的，而且我们对它也相信。

当然，我对这样的世界怎样建设、怎样运作，只有模糊的想法。但是，我 17 岁在地下时期加入的党宣布，它对这一切都知道，将寻求完成本党历史使命的科学方法。它只要求要有耐心、纪律和努力工作。我相信社会主义思想。我的信仰是纯洁、彻底的。为了人类更幸福的生活，我准备献出自己的智慧、心和整个灵魂。

8

战后年代

维尔奇采和相邻的霍霍尔纳之间有条小河，战线来来回回移动了几次，后来苏联人把德国人永远地挤出这一地区。那是在1945年最初几周，当时我还东躲西藏，晚上从一个藏身处经过村子后院瘸着走到另一个藏身处。

我大多藏在两家，努力不让任何人看见我。但战斗结束、我可外出之后，我很快就发觉，整个新教徒占多数的村子，实际上都知道我在那里。维尔奇采一个叛徒也没有。

安娜继续到杜布尼察上班，直到战线移得相当近，工厂因此不得不停工时为止。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见面，她给我送饭，告诉我关于外部世界的新闻。附近没有任何收音机，我想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远处的炮声宣告，战线正在移近。

解放后我和安娜很快决定要结婚，但我们又等了几个月，等到大战的硝烟沉降下来才结婚。1945年9月15日我们在维尔奇采举行婚礼。我们的主婚人是当地的新教牧师科列萨尔先生，我的证婚人不是别人，正是亚历山大·特兰奇克，我的来自乌赫罗维茨的教父，他在24年前给我命名。他仍然在当教师和管风琴手。

我充满爱意、感动地回忆起婚礼，尤其是在1990年夏秋之交，当时我坐在安娜的病榻旁，悲痛地看着，她的生命慢慢结束。她是我的忠实的好妻子，我们三个儿子的耐心、慈爱、关怀备至的母亲。我非常想念她。但我感到欣慰的是，她至少活到苏联对我们祖国的占领结束和我们的尊严得到恢复。

父母两人虽然分开过，但都参加我们的婚礼。父亲身体仍然虚弱，脸色苍白，体重只有正常的一半。他 1945 年 5 月从茅特豪森集中营回来，随后在别什江尼疗养。当局一通知我们他回来了，我就到那里去看望他。我无法描述，我看见他活着，是多么幸福。

他对我说，他还在茅特豪森时，就得知哥哥和我在起义期间的遭遇。有一天，一个斯洛伐克囚犯走近他并问："你叫杜布切克吗?""是的。"他回答。"你可知道，我叫扬诺·布尔科，起义时碰到你的两个儿子。"正如我已提到的，他是我的战友。他帮我隐蔽在维尔奇采之后，德国人很快把他俘虏，并拉到茅特豪森。他从未供出我，为此，我感谢他。他本人未从集中营回来。结婚后几周，我和安娜迁到特伦钦。我在那里的酵母厂找到工作，当维修工和蒸馏系统的操作员。工厂当时约有 500 名职工。企业刚按贝奈什总统 1945 年 10 月 25 日颁布的国有化法令收归国有。

我们的孩子未出生时，安娜也在那里工作。起初，我们不大走运。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只有几周，就死于肺炎。那发生在 1947 年冬天。帕沃尔、彼得和米兰分别生于 1948、1950 和 1953 年。有一回，我对安娜开玩笑，说我想要能组织一个足球队那么多的儿子。她不是个球迷，问："那是几个?"我回答她说："只六个"。真正的数目我不敢对她说。

我在酵母厂一直工作到 1949 年夏，因此我在战后的最初几年或多或少只是个政治戏剧性发展的旁观者。

如同我的多数同事一样，我也支持政府解放以来执行的政策。因为政府作出许诺，要让大家过更美好的生活，而当时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我们看到，旧的不公平正在纠正，特别是采取了诸如土改、重工业国有化和实行普遍健康保险等行动。我同多数其他人一起，相信失业的灾难在从 1946 年后的两年计划开始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已一去不复返。

也许我有把问题简单化和坚持某些天真期望的倾向，我基本

上仍相信正直和礼貌——不多不少，仅此而已。这一构想肯定不乏自由，不过我们曾认为，为了能享受自由，我们需要填饱肚子、有家可归。实际上我现在仍认为，平民百姓如今也这样想。

在战后这几年之中，我只在地方一级从事政治活动。我在工厂的共产党支部工作。我从未想到将成为职业政治工作者。但1949年6月我被叫到特伦钦党的县委办公室，要我担任脱产的党的工作者。像其它政党一样，斯洛伐克共产党也有专管本党内部事务的行政机构。我应在那里做类似的事。

建议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正要当酵母厂的副厂长。事实表明，我学习好的管理规章学得比较快，两三年后我有机会取代要退休的厂长。除此以外，政治建议还有另一个不利之处：党的干部的工资不足我在工厂能挣的一半。那并不是不重要的，因为安娜要生小孩，以后我们也还要孩子。

我和安娜一起，首先从实际角度伤脑筋地分析考虑几种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在酵母厂的工资高、安全可靠的岗位是否明智。但党对我来说比其它可能的用人单位更重要，它体现我的信仰。因此，拒绝建议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安娜了解这一点。这样，我终于在她的同意下接受了建议。这当中没有任何升迁的打算。我们认为牺牲自己的利益是必要的。除此以外，我们预期，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如同迄今为止在党支部的每项工作义务一样。就是说，这时我对职业政治工作的想法还不太明确。

我的工作内容是管县党组织的行政方面，即管会议的安排，地方和工厂党小组党员的登记，吸收新党员，收党费的制度等。一句话，我是斯共县委的组织书记。那不是首要的岗位，须知还有另外三名书记，集中搞工业、农业和意识形态问题，在县委第一书记的领导下工作。行政工作对我而言是一种新的工作，经过几个星期，我对工作才熟悉起来。

大约三个月后，我已开始相信，我可做好工作，我被派到离

布拉迪斯拉发约25公里的“和谐”休假中心，参加为期半年的政治训练班。训练班是由斯共中央举办的，其日程包括关于党纲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工人运动历史、党的机构和组织系统的报告。

训练班于1950年3月结束，我在家只住了几天，就被征召去参加军队后备役人员的训练。我在捷克度过了三个星期，在军事区的山坡上奔跑。正在这时，我们家发生了可悲的事件——米哈尔叔叔自杀了。他刚60岁，一直是缝纫合作社的领导干部。正如我已提到的，合作社是美国归国斯侨20年代初创办的，并像西欧和中欧合作社运动的多数组织一样，自己管理自己。1949年，企业干部之间发生了地位之争，我叔叔被错误地指责在帐目上进行欺骗。他一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忍受不了这种指责，卧轨自杀。在他死后不久查帐时才发现，合作社的财务没有问题。但是，这一悲剧深深地触动了我。

军训回来之后，我很快获悉，任命我为特伦钦县党的组织的第一书记。我任该职一年多，到1951年10月。那是困难时期。它使我想起我年青时在高尔基市度过的清洗和审讯的痛苦年代。镇压的思想借口是所谓“阶级斗争尖锐化”，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成了斯大林晚年众所周知的偏见。在1950年至1952年，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和共产党人逐渐被解除职务，被指责从事虚构的活动，送上法庭，判处重刑包括死刑和无期徒刑。斯洛伐克未能免于清洗。

父亲相信，在斯洛伐克迫害的发起者是威廉·西罗基[1]，他1938年至1941年是在莫斯科的捷共领导成员，1945年后任斯洛

---

① 威廉·西罗基（1902—1971），1945—1953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后期兼外长，1953—1963年任捷政府总理，1945—1954年是斯共主席，1948—1963年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3年被解除一切职务。

伐克共产党主席和捷共领导成员。在1950年弗拉基米尔·克利门蒂斯[①]因受捏造指控搞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被监禁之后，他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也接管了外交部。西罗基从1953年起任政府总理。父亲60年代末还在搜集他相信可揭露西罗基由来已久的阴谋的文件，不过没有找到。

应当提到，父亲除做地下工作外，战后未担任什么党的职务，也未在党的机构工作。他留在托波尔昌尼，直到1952年退休之前，在当地大家具厂工作，运用自己作为能工巧匠的手艺和经验。他在斯民族议会大厦工作了几年，担任不重要的职务。

我必须说，在1950年4月至1951年10月担任特伦钦县委书记期间，我未碰到非亲自就政治或经济迫害作出决定不可的情况。这种情况无疑出现过，但未引起我的注意。

当然，我作为县党委书记，无权决定公安部门和秘密警察的事，它们归上级管。它们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问我它们该干什么，也不向我汇报工作。这些做法是晚些时候才采取的。正如我12年后在50年代初镇压调查委员会工作时所了解的，国家安全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国中国。甚至在中央一级也是如此。它们通常直接从苏联顾问那里接受指示，捷克斯洛伐克50年代初的大审讯也是莫斯科贝利亚的国家安全局发起和指挥的。因此，许多县和州党委书记才会受到指控和被撤掉。甚至捷共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②]也在策划的审讯之后被杀了。

---

① 弗拉基米尔·克利门蒂斯（1902—1952），1939年因批评苏德条约被开除出捷共，后重新入党。1948—1950年任捷外长。1951年被捕，翌年被判处死刑，1963年恢复名誉。

② 鲁道夫·斯兰斯基（1901—1952），1945—1951年任捷共总书记，参与“制造冤假错案”，后本人也成为其牺牲品。1951年被捕，被指控为“反国家阴谋中心”头头，翌年被判处死刑，1963年恢复名誉。

1951年10月，把我调到布拉迪斯拉发。我成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干部。我们从特伦钦迁到斯洛伐克首府。这是我的一家以后几年不得不进行的多次搬迁之一。

除在斯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以外，1952年初我还受命代表患病的民族阵线斯洛伐克委员会主席弗兰季舍克·库巴奇。挑选我担任这一职务，可能是因为我当过两三个月特伦钦县的国民议会议员。1948年选举时，我的酵母厂同事争取到把我摆在民族阵线候选人名单的第二位，这样我才当上了议员。1948年当选的议员逝世了，我的义务是接替他的职位。弗兰季舍克·库巴奇本人担任民族阵线斯洛伐克委员会主席职务大约只有一年。在他之前担任这一职务的是卡罗尔·什米德凯。

1953年1月，我就任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州委书记之职。我不能说，这不出乎我的意外，但这同时也使我感到高兴。不是我不喜欢布拉迪斯拉发，而是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离安娜和我的老家更近。在1951年搞掉和关押古·胡萨克、拉·诺沃麦斯基及其他重要干部和撤销总书记职务之后，斯洛伐克党的机关发生重大变动。父亲的老朋友留多维特·贝纳达从1952年年中起又在斯共书记处工作，我的任命可能就是他促成的。

斯大林逝世前大约只两个星期，我当上了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州委书记。几天之后，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也逝世了。他可能在参加斯大林葬礼时着凉了，回到布拉格时，医生已救不了他。在逝世后，把他的遗体保存起来，就如同对斯大林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在学习苏联榜样方面漫无边际。

许多资料包括赫鲁晓夫回忆录表明，苏联的情况在斯大林逝世后几乎立即开始好转。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停止镇压要晚得多。

尽管捷共领导表现顽固，已可看出普遍好转的某些迹象。朝鲜战争和越南抗法斗争已经结束。东西方恢复解决德国问题的努

力，可感觉到苏联领导考虑“修正”南斯拉夫案。我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开始较系统地思考“解冻”问题。

最凶的镇压持续了几年，但未被直接卷入暴力之磨的人觉得，一切在迅速、急剧地进行。回首往事，那就像以快速度倒着放的电影。我的大部分朋友同我一样，感到恐惧并被搞糊涂了。我们伟大的梦想怎么啦？为什么？

我从事件的发展懂得，社会主义像过去一切伟大理想一样，在防止坏人和不正派的人利用方面，并非更安全可靠。不过，思想本身在我的眼里仍未失去其伟大和吸引力。但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必须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符合其哲学价值。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一点。

生活在清洗期间也继续向前，似乎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发生。人们上班，上电影院、剧院和舞厅，尤其是店铺像平常一样满满的。作为州委书记，我每天有16小时工作要做。必须组织收割，保障新工厂的建设和投产。新的职工需要住宅和服务。在修建新的公路和铁路。我经常去农业社，访问了几乎所有在建的地方或州的建筑工程。在会议上，我们解决如何实现国家规定的农业和工业生产目标的问题。

不过，如果我应当说真话，我对班斯卡-比斯特里察时期最生动的回忆，是对家庭生活的回忆。孩子是我的巨大快乐。天气好、我有点空闲时间时，我喜欢和安娜带他们到风景秀丽的郊外去旅游。我们经常到高、低塔特拉山滑雪，我们徒步旅行、采蘑菇和野果。

1954年底，我在布拉迪斯拉发被告知，将派我到莫斯科苏共中央高等政治学校学习。我想，他们作出这一决定出于多种原因。我是个战前共产党员，家庭背景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有功。我俄语说得流利，这在当时是相当少见的，我在工作上也没有特别问题。我没有敌人，至少在我所了解的人中没有。

1955 年去莫斯科是诱人的，但我的感觉也是复杂的。一方面，我感到高兴，时隔近 20 年之后，我将要访问度过青年时期的国家，在它发生非常激动人心的变化时进行访问。另一方面，我知道，我将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儿子，这是个严重的障碍。学习将持续三年，我不期待我一年能回家两次以上。此外，我已在上布拉迪斯拉发考门斯基大学函授部法律专业第六学期。我学习没有问题，但我觉得，我处在那样的年龄，从一个科学领域转到另一个不太实际。

但安娜鼓励我，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1955 年夏，我们从班斯卡-比斯特里察迁到特伦钦，我不在国内期间，安娜和孩子们住在那里。最大的儿子帕沃尔七岁，上二年级。彼得五岁，一年后开始上学。最小的儿子米兰三岁。

我母亲这一时期和我们住在一起，给我们看孩子，帮了大忙。安娜在特伦钦有个姐妹和两三个堂表姐妹，因此在那里可得到可靠的家庭支持。至少 1955 年 8 月我启程到尼基塔·赫鲁晓夫已有决定性发言权的苏联时，我有把握不必为妻子和孩子的安稳生活而担心。

9

在莫斯科学习

我们约十人被从捷克斯洛伐克派到莫斯科苏共中央高等政治学校学习。其中有两三个斯洛伐克人。对一些人我记忆犹新。其中之一是布拉格党多年的高级干部米洛什·雅盖什[1]，他在1968年8月占领后起了非常消极的作用。他在1988年当上最后一任捷共第一书记，正如人们所说的，把党带向其葬礼。较多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学生已在那里学习过，例如约瑟夫·列纳尔特[2]，他在1963年后当上诺沃提尼时代的政府总理，在1968年8月以同米·雅盖什类似的方法败坏自己的声誉。我们在莫斯科肯定读同样的书，但未带着同样的思想从那里回国。

对我而言，那在1955年8月总的来说是一次充满感情之行。我在火车里回想起，我1938年11月同父亲一起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当我观看窗外的风景，我想得更多的是正在变化着的时代，而不是树木和房屋。17年前我和父亲离开时，我们所不理解的内部冲突困扰着苏联，在我们面前浮现了日益临近的战争的浓重乌云。

从那时以来，过去的岁月似乎数不清：充满死亡和破坏的长

① 米洛什·雅盖什(1922—)，1968—1977年任捷共中央监督与检察委员会主席，1977年起先后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委员，1987—1989年任捷共中央总书记，在剧变中辞职。

② 约瑟夫·列纳尔特，生于1923年，1963—196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总理，1970—1988年任斯共中央第一书记。

期战争，整个事态发展互相矛盾的战后时期。现在是斯大林逝世后两年，看来一切都在好转。犹如清新的空气进入大开的窗户。因此，上次之行伴随着绝望，而这次之行则满怀希望。

我感到，我是在回到熟悉的、可信赖的老地方，但同时又是回到一个有着需要研究的新的、不了解的特点的地方。由于我以前居住过，我能比其他捷克斯洛伐克学生更快地理解苏联发生着什么，对事件的看法更尖锐。我也很快找到对一些多年强烈困扰我的老问题的答案。

在此之前我从未直接到过莫斯科，当列车走了近两天之后开进白俄罗斯火车站，我像其他人一样，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站房破旧，有些人在掩饰自己的失望。我则不必掩饰。一切和我所想像的差不多。

一辆表面不平的旧轿车拉着我们及行李，穿过城市，到列宁格勒火车站附近的列宁格勒大街。学校由大约 20 座 30 年代初建造的简朴的苏式砖楼组成。教室、图书馆、办公楼和宿舍，一切都在一起。

苏共中央高等政治学校组织上像通常的高等学校，不过不分系，而是直接分教研室。以校长为首，副校长和教研室主任协助校长。高级党校由苏共中央教科文部监督。当时约有一千名学生在该校学习。其中约百分之十为来自东欧的外国学生。我不记得有任何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

当时外国学生也在莫斯科和苏联其它城市的其它高等学校学习。相当多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国立莫斯科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农业科学院和其它学校学习。我们有时在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大使馆会面。

高级党校对外国学生的态度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他们一起住在分开的宿舍区，分成特别学习小组，在学习上对他们提供特殊帮助。开始时，多数必须学习俄语，以便能正常上课，这费了

将近整整一个学期。教师要求外国学生掌握的必修课、书本知识少些，给他们评分比对本国学生宽容些。

这导致外国学生的某种孤立。苏联学生也有自己的党小组，经常开会，而我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但我俄语说得流利，且无口音，因此他们通常不把我当作外国学生对待。我未得到任何特殊帮助，从一开始就像我的苏联同窗一样刻苦学习。我记得到达后几周的第一次较难的考试，在与本国学生同样严格的条件下，我取得了好成绩。

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让我与一位名叫鲍里斯的俄罗斯人同住一屋。他原来是位莫斯科以南地区的县党委书记。高级党校学生的平均年龄为 30 至 40 岁，而鲍里斯大约是 50 岁，不得不为被录取而顽强斗争。他几次提出申请，均未成功，最后写信给尼·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指示党校录取他。他是位用功的学生和好朋友。

党校分成八个或九个教研室，其中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历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国际关系、农业、新闻和苏共党史教研室。学生不能自由选择，而是必须学习教学大纲规定的所有课程。除日常的讲课和讨论以外，还有课堂讨论和个别质疑。

除本校的教师外，莫斯科其它大学的教师也来讲课。苏联各种高级的活动家也来作报告或同学生进行讨论。比如我记得鲍·尼·波诺马廖夫和 L·P·伊利切夫就曾来过。波诺马廖夫当时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伊利切夫在莫洛托夫时期曾任外交部副部长。

从讲课和读书中可搜集许多资料，但对任何题目都不客观地进行教学或讲解。一切都严实地包裹在苏联式的马列主义诠释之中。他们虽然对我们提到不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总是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或“敌对的”。我们无论何时也不能通过独自阅读诸如列·达·托洛茨基、卡·考茨基或罗·卢森堡的书籍，来整

个了解这些观点。他们只对我们讲解其中经过挑选的引语，随即加以批驳。对其他精心挑选的作者的著作和引语，则进行歌颂。

历史事件和人物也随着党的现行“福音书”发生变化。我已从在高尔基市的经历记得这一做法。现在，在1956年或1957年，某些指责已撤销，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案就是如此。我经常想到对人物的不正确评价造成的人的悲剧，但对许多案件我只能推测。我们知道，图哈切夫斯基被处死，但直到如今也未告诉我们，其他许多他们所说的“个人迷信牺牲品”究竟怎样。

在学校对非正统观点采取偏执态度的有倾向性的做法中，只有几个罕见的例外。我记得，我怀着巨大的好奇心阅读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件哥达纲领和埃尔富特纲领的全文。实际上是我不自觉地寻找，才找到这样的原文。在高级党校图书馆，正式说，没有未经批准的作者的任何著作，更没有批评列宁及其观点的作者的著作。我们必读的书很多，难得有时间再读其它书，这也是个障碍。

许多讲稿和课文以其经过选择和简单化的内容使我感到意外。例如在农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中不提西欧和中欧合作社运动的丰富、重要的历史。看来集体农庄似乎是纯粹苏联的发明，据我所知，这是不对的，而且当时（50年代中期）也不把集体农庄理解为真正自己管理自己的合作社。我不知道，苏联人是否故意决定无视欧洲的合作社运动，但它从19世纪就有的民主性，在他们显然根据列宁的理论和斯大林的实践看来，令人怀疑是资产阶级的。众所周知，苏联人当时正好充满他们发明从独轮车到电力的一切的想法，他们的历史性孤立使他们得以进行这种自我欺骗。

高级党校的考试在学期的中间和末尾举行。每个学生从硬纸盒里抽出一个打在小卡片上的问题，可留在教室里考虑一会儿。然后把我们叫到教授办公室去考试。只有口试，不作文章，不写研讨会发言稿，最后也不写毕业论文。评分制是从A到E，即从优

秀至不及格。党校不授予学衔，而只发给证明毕业和通过考试的文凭。文凭颜色因取得的成绩不同而不同。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获得了红色文凭，这意味着 A 等。如将高级党校的学识要求和考试制度同布拉迪斯拉发考门斯基大学的要求作比较，前者肯定松些，对外国学生更是如此。尽管这样，我在那里学到很多，因为我可多读，而在这之前我没有时间读书。最吸引我的是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在这两方面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对我都有助益。在所有必读作者中，卡·马克思是最具逻辑性和说服力的。不出我所料，他时至今日仍然是公认的 19 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当然，我读过《资本论》，但他篇幅较小的著作如《路易·波拿巴雾月 18 日》和《法兰西阶级斗争》也吸引我。我经常考虑他的某些思想可在 20 世纪下半叶运用的问题，但我不能肯定，我能否找到答案。

起初，我未有意识地将马克思和列宁加以比较。在某个时期，我未想到他们之间会存在某种分歧。大约到最后一年级，我才开始注意到较多差别。例如，马克思关于实现社会主义转变的经济前提的论述，是对列宁有关俄国的论证的质疑，尽管列宁的结论在对我们讲解时是作为最后的发现的。马克思比列宁民主得多。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未离开对多数人的统治的理解。当然，我意识到，这样的理解在苏联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但是，列宁著作中其它引用马克思的话有多么重要?这些问题使我感到不安，但我从来不敢提出。校外时代变了，但在校内我未发现教授的态度有什么解冻。他们的学说是教条主义的，弗·伊·列宁是他们的上帝。对其马克思主义可信性的任何怀疑，可能等于大逆不道的异端。

我的问题在于，我相信社会主义，这本是我继承的遗产。在研读过的书中，我寻求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据，而是如何更好地理解它的方法，怎么办，以便使它更好地运行。我愿意根据其价

值考虑每种思想，不评判任何似乎是圣经或可兰经的著作。但我们的教授们所要求的正是这种原教旨主义。这一做法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为一套步兵条例。

还在当高级党校的学生时，我就注意到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某些矛盾。我在那里碰到一种我觉得在50年代中期重要而又迫切的思想。列宁认为，一旦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国家，而不是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赢得胜利，这个较发达的国家将担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俄国将跟随它。我在这段下面划杠，并在旁边写道：捷克斯洛伐克？东德？

大约12年之后，勃列日涅夫及其政治局力图教训我们，应如何管理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时，我想起这一段话。在1968年蒂萨河畔切尔纳会谈期间，我对我的同事提起这段话，我说在正式会晤时我想谈这一思想。但我的同事大多吓了一跳。他们肯定，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会把这看作侮辱。因此，我保留自己的观点，宁可不提。

今天我自问，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多年社会主义失灵是否真的是其思想的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反正他未提出任何社会主义的固定模式，晚年甚至接受资本主义非暴力过渡的可能性。后来其信徒根据他无法预料的欧洲社会经济新发展，继续修改和补充其思想。我不知道，社会主义在20世纪失灵是否可以用下述一点来更好地加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实现完全为俄罗斯的激进分子所垄断，他们受教条主义和出于落后状况的正统之累。我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表明，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对进行社会主义试验没有准备。我同样认为，恐怕不能怀疑马克思和其他经典社会思想家对消除当代西方世界形成的社会不公平的重要改革的贡献。

我的观点和未来政治实践的形成不仅仅建立在莫斯科三年期间阅读和研究科学书籍之上。苏联和世界其它地方发生的事件具

有重要的、可能更大的意义。我抵达莫斯科时就已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1955 年 5 月底尼·谢·赫鲁晓夫到贝尔格莱德，称呼约·布·铁托为“亲爱的同志”，这不仅仅意味着改变对铁托的评价及其在苏联集团先贤祠中的地位，其意义还大得多。这破坏了斯大林在战后年代强加的苏联及其东欧附属国之间不平等关系的片面、压迫制度的基础。从此开始了这些国家解放的长期进程，它经过 1956 年和 1968 年两个里程碑，直到 1989 年导致苏联统治最终崩溃①。

我很快就感到并真正认识到赫鲁晓夫姿态的历史意义。我在内心深处从未同铁托是个叛徒——正如在他同斯大林分裂之后的年代里苏联宣传所描绘的——的想法调和。现在，在赫鲁晓夫公开表示道歉时，我内心感到非常满意，即使南斯拉夫形式上未回到苏联人领导的国家集团，而是继续追求独立目标。简而言之，赫鲁晓夫的行动第一次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独立于苏联之外合法化了。

苏联人民对铁托 1956 年 6 月访问莫斯科的反应也感染了我。那是令人感到吃惊的，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像成千上万苏联公民欢迎乘车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的南斯拉夫领袖这样自然爆发出来的欢乐。不久之前报刊漫画还把他画成身穿纳粹制服、鹰脸、手拿沾满鲜血的斧头的人物，称他为“刽子手”和“帝国主义走狗”。我是热情大爆发的见证人，它向我表明，这种宣传对苏联普通居民的影响多么肤浅。这使我感到喜欢，它证实人们的看法正确。

也发生了其它预示美好时光的重要事件。当然，最有意义的是 1956 年 2 月的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该报告

---

① 指 1956 年匈牙利事件、1968 年“布拉格之春”改革尝试和 1989 年苏欧地区剧变。

是赫鲁晓夫在讨论的最后一天做的，他在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统治的犯罪性质。

抵达莫斯科之后不久我意识到，高级党校学生之间的整个气氛与我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感到的有相当大的不同。由于我同苏联学生生活在一起，他们把我当作朋友，同我说话坦率，我也了解到他们在党的会议上讨论的情况。

老实说，在抵莫之后的最初几个月，我不大准备听他们对我所讲的情况。当我清清楚楚地听说，斯大林是个杀人犯，我感到震惊。在以后的年代里，还有其它许多震动的事等待着我们，但这次震动太突然、太大了。要知道斯大林这么多年把自己当作我所相信的一切的体现！但我现在已不能把斯大林同一切坏事分开，已不能设想，“他不知情”。现已表明，他本人就是恶之因。

开始大批从古拉格回来的囚徒，是这些揭露的最重要来源。他们的故事迅速传遍全国。越来越明显，他们是无辜的，这意味着，其他已回不来、其坟墓遍布整个国土的数百万人，也是无辜的牺牲品。其中也有我记得的30年代大清洗的受害者。得知这一情况是可怕的。

我想，即使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相当长时间，多数其他外国学生（包括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学生）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隔绝在这一深刻的内部变动之外。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不止一次对是否把从苏联同窗那里听到的一切都告诉他们犹豫不决。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有在采取行动或作出决定之前进行透彻思考的癖好，这回也不例外。我需要时间自己消化大量令人不快的消息、找到其解释、分清人与思想及好坏。

我的苏联朋友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两周，得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苏共中央的一位活动家到党校，在党的会议上向他们宣读摘要。未流传过任何文本。那是绝密的党内通报，对我们高级党校的外国学生谁也不说什么，当时不说，后来

也不说。我很快获悉报告的许多细节，它们证实了会前几个月就已流传的传说。但官方说实话影响大得多。

在我的苏联朋友的眼中，尼·谢·赫鲁晓夫是当时的英雄。流传的消息说，他敢于违背多数本人要对大规模迫害负责的领导成员的意志，对代表作报告。1957年这些领导成员勾结起来反对赫鲁晓夫，力图推翻他，但他比他们有能耐，赢得了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斗争。

整个发展导致苏联政治气氛如此彻底的变化，以致几乎无法加以描述。我记得这一时期叫《解冻》的影片。春风真的吹起来了，莫斯科到处解冻，每个人都感觉到了。我对这些事件感到震惊，随着我在莫斯科居留行将结束，我越来越多地想到我们国内的情况。我记得，在一次假期结束时，我就限制探亲问题，向捷共中央人事部某干部提意见。她答道："我们也不能从德国集中营回家探亲！"我忍不住说："但我们不是在蹲集中营，同志。我们是在上学！"她对此未作出反应。这一插曲表明，尼·谢·赫鲁晓夫在苏联开创的解冻，到捷克斯洛伐克来得多么缓慢。

毕业后，我可以参加外国学生小组，该小组到乌拉尔考察苏联工业管理方法。我们首先详细地参观了苏联主要冶金和采矿中心之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重工业综合体。我们所看到的，比我在国内见过的任何企业大得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我无从比较。

乌拉尔之行后，我终于回国。捷克斯洛伐克的解冻还只不过是地平线上的一闪之光。形象地说，我从春天回到了冬天。

10

暴风雨时期的来临

1958年9月，我同在特伦钦的家人团聚。从我最后一次探亲以来，男孩长高了，我同安娜、母亲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平静而幸福的几天。但很快把我叫到布拉迪斯拉发，并通知我，我被任命为西斯洛伐克州党委第一书记。

在我出国的这几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无大变化。尽管如此，在公众了解了赫鲁晓夫指控斯大林的删节本之后，发生了某种变动，在许多党组织中进行了愤怒的讨论。在其中的许多组织中，通过要求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可惜这一运动首先局限于知识分子党员，党的领导比较容易就压制了这一倡议。他们又不让党内一直存在的反斯大林的反对派讲话。但是，即使如此，这一批判性地思考党在1948年以后的活动的时期，成为我们争取改革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的开端。为了使我们理解伴随这一过程的一系列问题，必须稍微回顾过去。

* *　　* *　　* *

1945年以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执政的是八党联盟，捷克和斯洛伐克各四个政党，都参加民族阵线。几乎所有的党都是左翼的或中左的。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后和战后，明显的右翼党在政治体制中不允许存在。

因此还在1948年2月共产党完全掌权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就

无疑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1945 年 10 月的国有化涉及一切银行、保险公司、钢铁厂和所有 500 人以上的企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也涉及只有 150 人以上的工厂。公共部门已因 1945 年 5 月和 6 月颁布的惩罚性法令而显著扩大，这些法令将德国和匈牙利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财产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土地无偿分给农民，尤其在捷克地区更是如此，而在斯洛伐克则较少。1945 年的另一个总统令，赋予多数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理事会，以在管理公共、私人工业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 1946 年 5 月的议会普选中，捷共借助在工业国有化和土地重新分配中所起的作用，在捷克地区获得 40%以上的选票，成为捷克最强大的政党，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社会党得票 18.29%，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得票 15.64%，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得票 12.05%。在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得票 30%多一点，位居第二，落在得票 62%的民主党之后。但得票总数本身并未反映出共产党人的全部组织力量。1947 年底，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拥有的党员数量等于所有其它各党的总和。在国民议会共产党人只需获得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支持，就能控制整个立法工作。

1948 年 2 月的政治危机① 及其结果，造成民族阵线的伙伴模式，被代之以完全由共产党控制的体制。民族阵线形式上虽保存下来，但保存的仅仅是其“外壳”。

1948 年 2 月的直接结果是：以法律的形式把医疗保险制度固定下来，对 1920 年的土改（在个体经营的基础上仍然有效）进行调整，把批发商业、对外贸易和 50 人以上的企业收归国有。

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1948 年 2 月政治体制质的变化具有

---

① 史称“二月事件”。1948 年 2 月下旬，捷联合政府中的右翼党部长联名提出辞职，试图搞垮以捷共为首的联合政府。捷共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迫使总统接受右翼党部长辞职，任命捷共提名的新政府。

决定性的意义，尽管我们当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共产党作为实际垄断政权的统治力量，摆脱了危机。不管其领导的直接意图如何，同苏联的历史、意识形态联系为推行斯大林体制打开方便之门。在冷战正在发展的情况下，这大概不可避免。

诸如扬·马萨里克[①]或爱德华·贝奈什这样的政治家，对此必定比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更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在2月危机之后不久自杀。（许多人相信，马萨里克被杀。1968年春调查此案，但调查未找到能支持政治谋杀论的令人信服的事实。）患病的贝奈什总统1948年6月辞职，三个月后逝世。我们当时不理解这些悲剧的不祥意义。

对1948年2月变动后捷共领导的直接意图，仍有一定疑问。这一时期较多的历史学家说，哥特瓦尔德和其他共产党领袖起初不大努力以苏联为榜样提出政治方针。1948年2月以后，哥特瓦尔德真的又数次重新提出自己从前的纲领，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所特有的、民主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在今天听起来可能像个空洞的口号，但反复强调特殊性，不能意味着任何别的东西，只能意味着有意回避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

以后，偏离这一要求是逐步的，几乎是不引人注目的。在表面之下，在我工作的这一级，是难以发现的。对所发生的事情，党的领导不急于作出较明确的说明。但到1948年6月，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时，哥特瓦尔德就站到苏联人一边，同他们一起批评南斯拉夫及其应考虑“特殊性”的要求。自然，这也是他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所特有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结束。接着，党的宣传越来越强调“苏联的经验”。即使这种变动暗

---

① 扬·马萨里克（1886—1948），捷第一任总统托·加·马萨里克之子，1940—1948年先后在捷流亡伦敦的政府和解放后成立的政府中任外长，据一般看法，他于1948年3日10日自杀身亡。

示，苏联体制将是惟一公认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正在继续进行着的实践毋宁说是个偏离而非明显转变的过程，政治经验不多的人难于理解。就像我的多数朋友一样，我也被南斯拉夫事件搞糊涂了，当时不理解其历史意义。

其间，1948 和 1949 年冷战的开始，使斯大林的偏执狂及其拥护者和其他一些高级共产党人的随声附和复活起来。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马嘉什·拉科西在妒火中下令杀拉斯洛·拉伊克时，对斯大林说，拉伊克的阴谋也扩大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当然，斯大林竖起了耳朵听。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长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贝利亚[1]的副手 1949 年来布拉格，开始寻找这一并不存在的阴谋的罪犯。波兰共产党人顶住了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而哥特瓦尔德和党的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则物色适合这一脚本的牺牲品。最后，这种捕风捉影的做法像飞去来器一样也打着了斯兰斯基本人。斯兰斯基和其他党的高级干部被指控搞所谓铁托阴谋，其目的据说是使捷克斯洛伐克摆脱同苏联结盟。斯兰斯基被送上法庭，1952 年同其他十名被告一起被处以绞刑。这一案件的 13 名主要被告中，有 11 个是犹太人（就像匈牙利的拉伊克一样）。

正如我在这之前已提到的，我在任职期间，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不知有进行迫害的事。晚些时候，揭露出几起非法抓人的事件，这些人被无辜判处几年监禁。

这种疯狂的行动对在特伦钦的我们来说，是个遥远的、虽则又是警示性的威胁，在逮捕达到高潮期间我在那里担任县党委书记。不过，斯洛伐克作为一个整体深受其害。用以反对我的年长些的斯洛伐克朋友、党员的借口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一提法是在布拉格捏造出来并厚颜无耻地用以算私人旧帐和警告不要

① 拉·巴·贝利亚（1899—1953），1938—1945 年任苏联内务部长，1939—1953 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破坏法制”，被判处死刑。

支持斯洛伐克的要求的。

主要的牺牲品是弗拉多·克利门蒂斯博士，战前时期非常受尊敬的斯洛伐克知识分子，1948年起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他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死刑，1952年12月被处决。实际上，正如我们晚得多所获悉的，他受到惩处，主要是因流亡巴黎时批评1939年8月的德苏条约。当然，也是因搞所谓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之故。

参加1944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古斯塔夫·胡萨克和诗人拉吉斯拉夫·诺沃麦斯基，被监禁多年，丹涅尔·奥卡利、拉吉斯拉夫·霍尔多什、伊凡·霍尔瓦特和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卡罗尔·什米德凯[1]也是个我父亲一辈的人物，在起义中起了首要的作用，虽未被监禁，但政治上遭到侮辱、毁灭。

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苏联学说的说法，是从民族主义的一切表现都有资产阶级根源的假设得出的。把它应用到斯洛伐克和克利门蒂斯、什米德凯、胡萨克、诺沃麦斯基身上尤为错误，因为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也不能称之为资产阶级分子。什米德凯就出身而言是个捷克工人。尽管如此，还是解除了他的一切公开职务，把他赶出政治生活。他在这之后不久的1952年12月去世。我本人虽不认得他（父亲认得他），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他在斯兰斯基和克利门蒂斯在布拉格被处决之后不到两周逝世，使他的许多朋友深感悲痛。

当时，国家安全局的恐怖活动登峰造极，对新的指控和逮捕的恐惧是巨大的。但什米德凯不久前是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最高领导人，必须为其举行正式葬礼，于是就产生是否参加葬礼的难

---

① 卡罗尔·什米德凯（1897—1952），1944年任斯洛伐克游击运动总参谋部司令，同年至1945年任斯共主席，同年及1948—1950年任斯民族议会主席，1945—1946年任斯行政委员会主席（总理）。1950年被指控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题。最感为难的人之一是留多维特·贝纳达，什米德凯的老战友和我们家的朋友。贝纳达当时担任斯共中央书记，并且是什米德凯的儿女亲家（他的女儿嫁给什米德凯的大儿子）。贝纳达负责动员人在什米德凯葬礼上致悼词，但找不到愿意念悼词的人。一天早上，他把我叫去。我记得，我对同意其要求并非犹豫不决。不过，贝纳达的做法谨慎。“你把悼词写出来，然后把它送给戈西奥罗夫斯基审批”，他给我出主意。米洛什·戈西奥罗夫斯基当时担任主管意识形态的斯共中央书记。

这样，我就写了个初稿，提到什米德凯真的是个怎样的人：他是个好人、忠诚的革命家和伟大领袖，他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中的组织工作功不可没。

戈西奥罗夫斯基不喜欢我所写的，对初稿大删大改，要我在葬礼上宣读。对戈西奥罗夫斯基所作的改动我不喜欢，因此我决定将宣读原稿。在某些问题上，我会坚持己见，不惜一切代价。那是个寒冷、刮风的日子。但最后来了一群人，向什米德凯作最后告别。我不怀疑，在场的也有来自国家安全局的人。我的朋友、政治工作者、记者尤莱·什皮采尔，在我提交戈西奥罗夫斯基之前，读过我的初稿，也读过“修改”稿，在葬礼上致悼词之后对我说：“这将引起地震。”不过，什么事也未发生。可能没有人受命把我的悼词同戈西奥罗夫斯基的修改稿作比较或他们未想到，我竟敢再作变动。正如一个古老的俚语所说的：“非万不得已，不要尿裤子！”

* *　　* *　　* *

但再回到 1958 年 9 月。我还在莫斯科时，党的最高层政治领导就发生变动。从 1953 年起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安东宁·诺

沃提尼[①]，在安东宁·萨波托茨基逝世之后，又于1957年11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这一不祥的步骤意味着进行垄断统治的党的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这两个拥有实权的职务结合在一起。这样，党和国家的结合进一步加强了。

安·诺沃提尼是个战前的党员，在茅特豪森度过几年，战争快结束时，我父亲也被送到那里。哥特瓦尔德逝世后，其追随者1953年9月决定恢复斯兰斯基最后担任的第一书记职务，并寻找不会怀疑他们的权威的人。于是他选中了并不突出的党的活动家、布拉格州委书记诺沃提尼。我还可补充，斯大林当年也是从类似的人中选出来的。

我1958年9月就任布拉迪斯拉发州委书记时，需要时间对国内形势进行分析。我必须了解，谁在各种不同事情上采取什么态度。在1958年5月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上，我在缺席的情况下，又被选入斯共中央，也当选为其主席团候补委员。我不了解我被提升的准确背景，但我估计在莫斯科高级党校进修起了作用。一个月之后，我又在缺席的情况下，首次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这意味着我将经常到布拉格去。尽管我的党内级别提高了，最高的掌权者是诺沃提尼，他是政治体制任何变革的顽固反对者。直接反对其意见等于政治自杀。

我要向读者介绍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一般每四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后一个时期的基本政治路线和选举中央委员会，后者是下届代表大会之前的最高机关。中央委员会一般隔一个月开一次会，讨论重要问题并规定解决问题的步骤。中央委员会选举主席团、第一书记和书记处，以执行日常任务。50年代末，主席团有10至12名有表决权的正式委员

---

① 安东宁·诺沃提尼（1904—1975），1953—1968年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1957年起兼捷总统，1968年初先后被解除、辞去党政职务。

和几名参加讨论但不参与表决的候补委员。主席团每周开一次会。书记处成员可多到10名，由中央书记和书记处成员组成。那是中央主席团的执行机关，处理其事务。书记处的首脑是第一书记。书记处有时每周开两三次会。协助它的是人数众多的党的“机构”，包括数百名在近20个部工作的干部，这些部监督政府和党的一切活动。

出于实际的政治原因，第一书记手中握有决定权。这是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关键性职位。决定权在于任命、提拔和贬黜。第一书记甚至也可逐步影响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从而也影响主席团和书记处的组成。

在这一体制中中央各部部长掌握比政府部长更大的权力，习惯于随时干预政府的工作，非常小的事也干预。至于捷共和斯共之间的关系，我已提到过，斯洛伐克的党基本上从属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因而全体斯洛伐克党员作为一个集体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 *　　* *　　* *

回到布拉迪斯拉发之后，很快在米希克街31号分给我一座两层家庭住房，我把安娜和孩子们从特伦钦带到那里。我母亲又同我们一起搬迁。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房子周围有个小院子。男孩可在那里的新鲜空气中玩，不久后我开始搞园艺，这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从那时以来一直住在这座房子里。

从内容看，我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工作同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工作无大差别，但大的、迅速发展的城市有自己的问题，我对一般所理解的政治未给予最大的注意。这在那里可做的甚少，因斯洛伐克共产党受到诺沃提尼在斯洛伐克的主要仆从、第一书记

卡罗尔·巴齐列克[1] 的控制。

巴齐列克将作为 1944 年斯洛伐克游击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在苏联受过秘密活动训练，据一般估计，同恩克夫德有密切联系。在 1952 年被任命为安全部长之后，巴齐列克很快到布拉格可怕的鲁津涅监狱进行视察，那里关押着数百名政治犯。他从一间牢房走进另一间牢房时，也走进不久前才认识的斯洛伐克诗人拉上·诺沃麦斯基呆的牢房。诺沃麦斯基自被监禁以来对外面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当他看到巴齐列克，惊叫道："我的天，卡罗尔，你也在这里?"这并未使巴齐列克不知所措，他把手伸人口袋，给诺沃麦斯基一支烟，就走出去了。

除巴齐列克和其他人以外，在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中还有诺沃提尼的盟友米哈尔·胡吉克和未来的政府总理约瑟夫·列纳尔特，后者同我一起在莫斯科学习，以后担任中央书记。我们有时一起工作，相处得很好。他那时是个有现代观点和善意的人。他缺乏勇气和反抗性是后来才出现的。在年长些的主席团委员中没有一个想要改革，可能贝纳达是个例外，但他已从党的职位上退下来。

在布拉迪斯拉发要对付的第一项较严重的政治事务，是诺沃提尼的修改宪法(1959 年宣布，一年后进行)。新宪法应取代 1948 年通过的宪法。对其较多部分的正确性我有严重怀疑，某些部分我认为完全不对。例如，它给国名加了"社会主义的"形容词，我觉得，这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没有根据。宪法中规定了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这在任何民主制度中都不是个恰当的立法措施。在 1959 或 1960 年，我不能直接表达这些观点，但在以后几

---

① 卡罗尔·巴齐列克(1896—1974)，1950—1951 年任斯行政委员会主席(总理)，1951—1963 年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2—1953 年任捷国家安全部长，1953—1963 年任斯共中央第一书记。

年的过程中，我在公开讲话中几次指出，共产党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不能一劳永逸地获得。党必须使自己的活动配得上其领导地位，必须通过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来不断地保持它。

新宪法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条款，涉及斯洛伐克1944和1945年建立的政治机构的地位。以行政委员会闻名于世的斯洛伐克民族机关，本应管理斯洛伐克的国家政治事务，却被完全撤销。其它执行机关和机构包括社会保障局，也被撤销。斯洛伐克民族议会被精简为无实际权力和威信的地区议会。上述大大加强布拉格的中央集权的措施，表明了其傲慢地忽视斯洛伐克的民族利益和感情，并无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以30年代末为最的惨痛教训。我在内心深处毫不怀疑，这些令人不安的决定只能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关系播下未来危机的种子。

我意识到，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一政策将破坏诺沃提尼及其盟友的威信，只可惜对他们的独裁政权仍不能进行直接的攻击。同鲁道夫·巴拉克① 有关的丑闻表明，这种步骤意味着自杀。捷共较年轻的领导成员、内务部长巴拉克1962年试图搞掉诺沃提尼，这次根据虚构的指控把他投人监狱告终。1968年我接替诺沃提尼时，提议把他放了。

我懂得，为了有效地反对诺沃提尼，首先必须创造所需的条件，然后选择恰当的时机采取坚决行动。我逐步把思想相似的人集中在自己周围，在下层和中层党与国家机构找到许多这样的人。我也同记者、作家和科学家交朋友，他们几乎不用说就理解需要变革。

1960年，在我担任西斯洛伐克州委书记职务两年之后，把我

---

① 鲁道夫·巴拉克，生于1915年，1953—1961年任捷内务部长，1953和1959—1962年为捷政府副总理，曾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2年因同诺沃提尼之争被判处15年徒刑，1968年获释。

调到布拉格担任主管工业的捷共中央书记。我们又不得不离开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家，迁到布拉格。

冶金、机械、化工和建筑工业属于我的工作范围。我应保障党对这些集中的部门的领导和监督，这些部门不久前通过所谓结构重新调整而得到加强。我承认，我起初不理解，为什么这一新构想不应起作用，因为我当时还太相信中央计划，我认为，体制的错误首先在于管理得不够、不好。我觉得，做得机敏些、灵活些就够了。经过一段时间我才懂得，问题是体制本身，它已达到自身可能性的极限，必须破坏它。

另一方面，在布拉格的两年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们扩大了我对许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眼界。我认识了许多有才智的人，他们的基本利益同我并行不悖。其中有些人，如经济学家奥塔·希克和卡雷尔·寇巴，成了我的朋友，晚些年尤其是在1968年春天，我们在好得多的情况下一起工作。

在布拉格，我同诺沃提尼有最初的一些公开分歧，那发生在我以中央书记身份参加的书记处和主席团会议期间。当我敢于对斯洛伐克的优先投资项目和稍后对为50年代的受害者恢复名誉持不同观点时，分歧开始出现了。我注意以压低的声音表达自己的保留意见，以便严格地坚持所说的事，而又避免争论的语调和进攻性的批评。

这是我通常的作风，我当时必须特别小心，避免我无希望赢得胜利的任何较大的冲突。

在这之前，我对安·诺沃提尼不太了解。我当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党委书记时，正式同他见过几面。起初我对他未形成什么特别的看法。我觉得，他是个一般的工人出身的党的干部，同我到布拉迪斯拉发和莫斯科学习之前没有太大差别。从远处看，安·诺沃提尼相当实际、坦率。到布拉格我才发觉，他的智慧并不出众，却常常目空一切，他不尊重、容不得不同观点，不能理解国

家关键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他对斯洛伐克和改善捷斯关系的可能性几乎一无所知，特别使我感到震惊。更糟的是，党和国家的其他成员中，谁也不敢纠正其根深蒂固的观点。对我的意见，诺沃提尼大多激动、生气地作出反应，我越来越意识到，他将是一切变革的主要障碍。

幸而苏联的内部斗争继续以改革的方法进行，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不得不追随它。对改革的普遍压力增长了，恢复名誉成为当务之急，因为未受到公开谴责的50年代的镇压，像块巨石堵塞通向任何新的进步之路。在这方面，诺沃提尼及其盟友因慑于愤怒的批评之浪会把他们冲垮，而尽可能慢地踏步不前。

我要强调，我们当时在斯洛伐克没有像诺沃提尼60年代初叫在布拉格南部奥尔利克水库为自己和自己的人建设的这样一套封闭式的休养设施。我在布拉格工作时，去过两三次。这套设施所在的地方优美，座落在伏尔塔瓦河迷人的一段。但党的领导在警察的保护下享受的这种隔绝式的阔绰的想法本身，使我反感。

多数度周末的党的领袖以打牌消磨时间，诺沃提尼在这方面是出众的。受到邀请、同第一书记围着一张桌子、在置于他的房子之前的大啤酒桶旁边打牌，不止一次是他的一帮人所追求的目标。我不打牌，因而没有被邀请上桌的危险。空闲时间我是以同孩子们玩和到森林中散步度过的。

1961年10月举行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会上继续批评和谴责斯大林主义，这次是公开地批评和谴责。代表大会以后，他们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出红场上的陵墓。这是掌握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最高机关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也不能置之不理的事。

在这之前，捷克斯洛伐克为纠正50年代初的冤案所做的一切，在于从监狱里悄悄释放数万个无辜的、多数非知名的人，仅此而已。捷共中央成立了由鲁道夫·巴拉克主持的、调查较早的镇压情况的委员会。但这一委员会1958年的报告与其说是认真调

查，不如说是掩盖手法来得更恰当些，并且对多数党员保密，更不必说对广大公众了。1961 年，哥特瓦尔德的保存下来的遗体仍然安放在布拉格纪念馆供人瞻仰，斯大林的巨型雕像仍然屹立在伏尔塔瓦河畔。

参加莫斯科苏共“二十二大”的诺沃提尼，现被迫作出几个或多或少形式上的、虽则又是惹人注目的让步：哥特瓦尔德的遗体被火化，通过拆除布拉格斯大林雕像的决定。又过了一年，才采取后续步骤。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中央主席团或书记处讨论恢复名誉的各个方面时，我同诺沃提尼又有别的分歧。比如我坚持要为斯洛伐克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和民族起义的游击队司令员恢复名誉，毕竟很少有著名司令员不受镇压，有些在 50 年代初被杀。

在预算和发展斯洛伐克某些地区——在那里落后仍然是人们的严重问题——资金不足问题上，我也不同意诺沃提尼的意见。最后，我也提出斯洛伐克民族机关因新宪法而撤销或下降的迫切问题。正如可预料到的，诺沃提尼如此恼怒，以至决定把我搞掉。但他不能立即一下子就这么做，因为我不像巴拉克给他以公开的借口。他决定逐步搞掉我。

他们首先把我调回斯洛伐克，这是 1962 年 11 月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走形式采取的步骤。他们在那里把我选为斯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任命我为中央书记，这看起来几乎像是提升。但所有了解内情的人都懂得，这是降职，从中央一级的书记降为省级书记。

我的处境看来不妙。在布拉迪斯拉发我受到诺沃提尼的忠实朋友和帮凶卡·巴齐列克、帕·戴维、米·胡吉克和米·萨博尔奇克的包围。我的莫斯科同学和朋友约瑟夫·列纳尔特也在那里，但正如后来所表明的，不能指望他。我没有许多时间设防，这样我就恢复同老朋友的接触，寻求新的盟友。我知道，那里有我的盟友，即使他们不担任最高职务。我到斯洛伐克各地旅行，同当

地的干部尤其是同平民百姓谈话。我有系统地这么做，努力抵制诺沃提尼反对我的行动。

我的策略看来是正确的，因为在捷共“十二大”上，尽管诺沃提尼可利用其地位从中作梗，我还是当选为调查50年代镇压和政治罪行的重要的委员会委员。

在该委员会工作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委员会工作由前俄斯特拉发北摩拉维亚州委第一书记、新当选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德拉霍米尔·科尔德尔主持。我是这个以科尔德尔委员会闻名于世的小组的成员。

科尔德尔是个受教育有限、方法粗鲁的人，不过当时他持改革立场并支持我。后来他在同诺沃提尼的最后斗争中是个重要盟友。但是，以后他开始害怕“布拉格之春”的民主方针，以苏联人1968年8月搞的阴谋的同谋者而告终。我对他在政治上变来变去的方法感到震惊。

科尔德尔委员会紧张地工作了两个多月，调查研究了其牺牲品为共产党员的镇压情况。(为其他人恢复名誉由政府成立的机构办理。)对镇压方法的许多揭露的确是令人震惊的。

比如我了解到，受害者既受到肉体上的折磨，也受到心理上的折磨。通过不断的审问不让他们睡觉，以不让喝够、吃饱或不好好给看病折磨他们。让他们呆在寒冷的牢房里、睡在水泥地上(冬天也是如此)，如果他们拒绝在虚假的供词上签字，威胁要对其妻子儿女采取残酷的措施。我得知，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最高领袖的亲自介入达到可耻、犯罪的程度。例如党的主要干部包括诺沃提尼瓜分自己从前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将其送上绞刑架——较贵重的私人物品，直到成套瓷器和床上用品。人们一想到此，就非常恶心。

我看过的文件，肯定无疑地证实哥特瓦尔德女婿阿列克赛·

切皮奇卡[①] 和 20 年代末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党的老领导成员瓦茨拉夫·柯别茨基[②] 所起的令人遗憾的作用。哥特瓦尔德及其总统一职的接班人安·萨波托茨基[③] 也表现得可耻，因为他们对如此明显、大规模的司法罪行未表示反对。其他的人，如诺沃提尼及其妻子，不仅因得到被杀害者的财产而可耻地发财致富，而且很长时间掩盖不公正迫害的案件。

最糟糕的是，当苏联斯大林的后继者已在改变方针，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主要活动家还在继续贯彻这一精神（虽则是比较有选择地）。比方所谓医生的阴谋，早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不久的 1954 年，就在莫斯科被宣布为是个骗局。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到 1954 年 4 月还在僵化地继续迫害所谓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我已说过，我对揭露出来的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圈子里 50 年代早期发生的情况，的确感到震惊。我觉得，在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队伍中相互比较尊重和宽容。但也有重大的例外。威·西罗基、卡·巴齐列克和帕·戴维也许是最糟糕的。不过西罗基早就在布拉格同党的最高层联合在一起，正如我已提到过的，我父亲一向认为，指责斯洛伐克党的政治家搞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理由之一，是巩固党的中央领导对民族机构的权力。

---

① 阿列克赛·切皮奇卡（1910—1990），哥特瓦尔德女婿，1948—1950 年和 1950—1956 年先后任捷司法部长和国防部长，1951 年起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 年起任捷政府副总理，1956 年被解职，1963 年被开除出党。

② 瓦茨拉夫·柯别茨基（1897—1961），1945 年起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同年至 1953 年和 1953—1954 年先后任捷新闻部长和文化部长，1954 年起任捷政府副总理，著有《捷共三十年》等。

③ 安东宁·萨波托茨基（1884—1957），石匠出身，1945 年起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同年至 1950 年任捷工会主席，1948—1953 年任捷政府总理，1953—1957 年任捷总统。作家，著有反映工人运动的长篇小说多部。

在镇压最厉害之时，像在莫斯科那样，国家安全局从内务部分出来，划归单独的安全部。只有两人连着担任该部部长职务。第一个是捷克人拉吉斯拉夫·科普日瓦，1952年由卡罗尔·巴齐列克接替。

在科尔德尔委员会工作显著地加强了我的改革观点和变革事物的决心。我在该委员会领导负责纠正前斯兰斯基总书记的副手玛·什维尔莫娃[①]案的工作小组。什维尔莫娃是1944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中牺牲的战前党的高级干部的遗孀，1951年被错误地指控参与反对当时党的领袖哥特瓦尔德的阴谋，在狱中度过六年多。在我们的委员会开展活动之前，未为纠正此冤案做过任何事情。

我也集中研究斯洛伐克的镇压问题。我想，到委员会的工作结束时，我已换了个人。

1963年2月底，我们把委员会的报告提交给捷共中央主席团，在那里以及在书记处（我已非其成员）接着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在简短的表态中，我集中谈玛·什维尔莫娃案和斯洛伐克问题。我特别坚持要为克利门蒂斯、胡萨克和其他斯洛伐克受害者完全恢复名誉，毫不让步地驳斥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指责。诺沃提尼及其盟友表示反对我的意见，与包括也恢复其党籍的平反不同，只同意在法律面前恢复其公民名誉。诺沃提尼及其盟友仍然利用有“思想倾向”的指责，以便把清洗的幸存者关在党外。我感到这种半途而废的恢复名誉是不够、不真诚和恶意的。但他们的票数暂时仍占多数，因而推迟了健康化进程。

1963年4月，科尔德尔委员会的报告终于提交给捷共中央。诺沃提尼宣读了文件的摘要，并以主席团名义建议，把前主席团

---

① 玛丽亚·什维尔莫娃，生于1902年，捷民族英雄扬·什维尔马之妻，1945年起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同年至1949年兼中组部长，1949年起为捷共副总书记。1951年被捕，195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56年获释，1963年恢复名誉。

委员阿列克赛·切皮奇卡和前安全部长拉吉斯拉夫·科普日瓦两人开除出党。另一名前安全部长卡罗尔·巴齐列克应被撤销在斯洛伐克的职务和解除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之职。负责安全事务的布鲁诺·科勒尔①（1945年以后惟一仍担任领导职务的德族人），只应被撤销捷共中央书记职务。

中央会议的第二天，4月4日，我想在讨论时发言。诺沃提尼阻止我这么做，因此我只能以书面形式提交发言，它成为会议记录的一部分。

在这一未宣读的讨论发言稿中，我指出，直接参与镇压的布鲁诺·科勒尔，理应受到严厉得多的惩处。我直接批评已故的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大兴冤狱时期的党的领袖。难道他作为国家元首，不应当至少防止杀害他本人认识20年或更久的无辜的人吗？

我也说明，我对指责搞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怎么看的。控告胡萨克和诺沃麦斯基力图根据贝奈什总统的命令复辟资本主义，与对玛·什维尔莫娃的任何指责同样可笑。为了较年轻的一代党的干部，我宣布，每个1949至1954年之间较年长的党的干部，应对在我国发生的恐怖活动，承担自己的一份大小不等的责任。

这是给诺沃提尼的明确信息。我对科勒尔的批评触及特别敏感的神经：科勒尔同诺沃提尼一道工作，两人互相亲近。

委员会报告后来遭到阉割，党组织只能逐步看到，在总共近800页中，只能看到大约80页。尽管如此，这对党和居民消息较灵通的群体也有强大的影响。在斯洛伐克，报告为由于巴齐列克离职而进行重大的干部变动铺平道路，也造成当时的政府总理和诺沃提尼的另一个亲密盟友威廉·西罗基下台。

---

① 布鲁诺·科勒尔，生于1900年，1953—1963年任捷共中央书记。

找到巴齐列克的继任者对诺沃提尼来说是个问题，特别是他不情愿接受巴齐列克被搞掉。他意识到，任何阿谀奉承的接替者在斯洛伐克党的中央委员会都通不过。诺沃提尼正处在下降时期。1963年4月，斯共中央主席团有九名委员，其中卡·巴齐列克、留·贝纳达和帕·戴维三人正要离职。对其余六人，我对过去的镇压和斯洛伐克的民族利益问题作出了最有力的反应，这在当时斯洛伐克的情绪下，有利于我作为斯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候选人。我起草了讲话稿，在讲话中我激烈地批评巴齐列克在镇压中的作用，强调科尔德尔委员会报告有关斯洛伐克的内容。在布拉迪斯拉发，不像在布拉格那样，要剥夺我的发言权！

诺沃提尼对我的提升非常不悦，在幕后徒劳无益地努力为他所属意的米哈尔·胡吉克作宣传。胡吉克无希望当选，列纳尔特的希望也并非大得多。除此以外，准备让他担任其它政府职务。因此，诺沃提尼最后不得不放弃。他所能办到的只不过是，让米哈尔·萨博尔奇克作为我的副手。我想，这是诺沃提尼的第一个明显的政治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任斯洛伐克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由此我随后担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在那里，我接替了巴齐列克。我熬过诺沃提尼使我屈膝下跪的最初尝试，取得可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改革计划的职位。但这只是个开始，我的地位还是易受损伤的。我必须不断地巩固它，以便能更果断地前进。

11

“可爱的夏天”

苏共“二十二大”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就像遥远而强烈的地震的余震。一次余震震掉布拉格的斯大林雕像，另一次余震造成巴齐列克、西罗基、戴维和其他人下台。更多的余震还要发生。我就职时，斯洛伐克舞台已处在运动之中。当然，最激动的斯格伐克人是对一场变动迅速作出反应、敏感的知识分子，许多变动是他们自己发起的。但实际上整个社会都处在运动之中。

公开揭露的剂量不当犹如火上加油。诺沃提尼担心，太多的“坏消息”可能会突然把他的船摇晃得使他驾驭不了。因此，他努力尽量推迟每一次揭露。不过，这又给他造成别的问题。关于科尔德尔委员会报告的主要结论的消息，基本上被扣押到1963年8月底，即使由此而发生的干部变动4月份就开始起作用。这在保密保不了的时候，是可笑和令人吃惊的。

斯洛伐克报刊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日益公开。它们逐步冲破无透明度的壁垒。1963年专门的检查机构尚未成立。1948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满足于借助干部措施来控制大众媒体。然后顺从的主编及其副手就根据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和引导办，充当检查官。这一制度现在不灵了。许多编辑承受公开的压力。更不必说自己发起重大变动的人了。一年之后，惊慌失措的中央政府感到有必要通过内务部的新闻监督局进行严格检查，这是我们1968年撤销的机构。

1963年春，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周刊《文化生活》开始发表

谈以往忌讳的题目的重要文章。这样做不论在捷克地区还是在斯洛伐克，都引起公众的巨大反响。多数斯洛伐克和捷克作家早就真诚支持共产党部分领导的改革努力，我们则努力保护他们。斯作协周刊不像以前那样，受到那么严格的发表前检查，这提高了它60年代初开始具有的意义和作用。《文化生活》当时发行量大，是斯洛伐克惟一在捷克地区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拥有许多读者的杂志。

关于捷共政策的批评文章也很快开始出现在其它许多报纸杂志包括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真理报》上。因为《真理报》的总编辑是翁德烈·克洛科奇，并且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我的朋友，不难推断我在这当中所起的作用是直接鼓励这种批评，或者为其大开方便之门。正因为如此，我很快就陷入以造反的斯洛伐克作家和记者为一方、以斯大林主义分子为另一方的交叉火力之中。

作家，其中许多是共产党员，决心加速非斯大林主义化。记者不愿落在他们之后。他们很了解，站在他们后头的是一大部分学术界和知识界人物，更不必说其它部分的居民了。

虽然他们和我的目标是并行不悖的，他们不时把我置于不易的境地。捷共领导中对变革的反对仍然是非常强烈的，我知道，我们用光溜溜的前额不能把任何墙壁撞倒。勇敢是好的，但我们也需要耐心和政治上的灵活。

作家协会以及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了争论激烈的代表大会。作家和记者分别于1963年4月和5月举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同他们发表的批评文章一起，在较多问题上把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推到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改革运动的前列。在捷克地区，诺沃提尼对公开批评自己的政策仍严严实实地捂盖子。

在1963年4月的作家代表大会上，经历过清洗和监禁的诗人拉吉斯拉夫·诺沃麦斯基，发表了感人的讲话，为受难的弗拉多

·克利门蒂斯辩护。那是对要为50年代初的恐怖负责、仍然拒绝撤销刑事判决的人的强烈控诉。

诺沃麦斯基讲话的长篇摘要发表在《文化生活》上，这也给《真理报》上对恢复名誉停滞不前的尖锐批评增添了份量。另外更响的一炮是在5月记者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斯洛伐克著名政论家米罗斯拉夫·希斯科的讲话中放的。他分析了对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捏造出来的指控，指责当时仍然担任政府总理和捷共领导成员的威廉·西罗基是其主要策划者。这是对西罗基的首次公开控告。他长年是党的位居前列的领导成员，从一开始就参与镇压。甚至连作为布拉格州委书记参与清洗的诺沃提尼，在1951年年底之前也尚未成为主席团委员。而西罗基在整个黑暗时期都在那里，他直到1963年还继续留在党和国家的高级职位上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耻辱。

尽管如此，他的去留是件高度政治性的事，我意识到，希斯科的强烈公开批评不会得到布拉格党的老一辈领导的其他成员的理解。那些人，尤其是诺沃提尼和亨德里赫，同西罗基共事多年。我必须考虑问题的实际情况，回答两个问题。进行这种正面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吗？就从西罗基开始吗？我把一切彻底斟酌之后，得出结论，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记者代表大会之后大约一个星期，希斯科的讲话稿出现在《真理报》上。它在这家报纸上发表比讲话本身更重要，因为这暗示它得到斯共中央的批准，或者至少得到我的同意。事实是总编辑克洛科奇认为不需要事先告诉我。这对我来说没问题。

有几天总的来说是平静的。甚至在布拉格主席团最近一次会议上也对此保持沉默。西罗基不说什么，在会间休息时也未试图同我谈话。诺沃提尼也不说什么。不过我清楚，此事在书记处讨论时必然成为热门话题。

再次休息时，诺沃提尼终于向我走来并问道："那里发生了什

么?”当然，他指的是斯洛伐克。

我佯装不知他说什么。“你指的是什么?”我问道。

我们两人单独站在一起，离其他的人几米，我注意到，诺沃提尼试图以和缓的声调说话，我问他能否说得具体些。过一会儿，他终于说到点子上：“希斯科对西罗基的批评。”

我对此有准备。我对他说：“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我们两人都知道，西罗基50年代在那锅最糟的粥里沾了手。这从科尔德尔委员会的报告中可清楚地看出来。希斯科不可能了解我们所了解的，但他及其他人显然了解得够多的，他的批评有根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我对此应采取某种措施。”

他什么也没说，于是我又补充道：“我想，部分问题在于公众还不了解党纠正违法案件的努力。人们看到苏联事态的发展，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恢复名誉工作进行得太慢。”

我知道，这是个诺沃提尼不能公开反对的论据。这次谈话之后，我已不必抑制和劝阻斯洛伐克报刊的批评。我只要求作者保持清醒、实事求是的调子。

但诺沃提尼不愿未经斗争就放弃西罗基。6月中，他出现在科希采。因为他是我的上级和共和国总统，典礼局要求我同他一起走并坐在他的身边。我坐在台上，努力避免在脸上露出任何表情。我必须显得完全无动于衷，不过绝不能表露自己的看法。

诺沃提尼在这里再次表明对斯洛伐克情况完全无知。他说，呼吁修订新宪法没有根据，因为被撤销的行政委员会工作做得不好。然后他试图以重提关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荒谬论据，来为镇压辩护。他甚至重新攻击胡萨克和诺沃麦斯基是罪犯。如果我们考虑到科尔德尔委员会查明的情况很快就要公布，这是个政治上的奇耻大辱。我感到奇怪的是，什么竟使他如此发疯。

诺沃提尼在讲话中也强烈谴责斯洛伐克报刊、《真理报》、希斯科和克洛科奇。这是对我的影射攻击。他提的问题也证明这一

点："西罗基的事不是党内事务吗？党不应当保持对报刊的控制吗？"

诺沃提尼讲话后，我决定从两方面作出反应。首先，我有斯共中央主席团起草通过的决议，该决议要求成立特别委员会，以调查研究由于指控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产生的过错。这是精心准备后提出的要求，布拉格的捷共中央主席团也不能加以拒绝。我的目的是要求对整个运动进行相应的纠正，这在一夜之间办不到。当然，我相信，委员会不能证实别的什么，只能证实旧的指责没有任何根据。诺沃提尼也不能期待会有别的结果，但我的建议至少给了他时间，这对他来说是比较能接受的。于是就成立了党的专门调查研究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审判案的委员会。

其次，我必须对诺沃提尼有关报刊控制的指责作出反应，又要避免过早同他发生正面对抗。我注意诺沃提尼批评的为害最小的方面，特别是他的恢复名誉是"党内"事务的指责。我决定笼统地接受指责。我在几天后发表的公开讲话中暗示，希斯科在公开发表批评文章之前，应先把它提交给斯洛伐克党的中央委员会过目。这是没牙的责难，不伤害任何人，对希斯科或克洛科奇的伤害最小。此外，我避免使用任何听起来像保西罗基的说法，指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身是个不明确的概念。

几周之后（1963 年 8 月底），根据科尔德尔委员会查明的情况而起草的报告终于发表了。正如我所料，报告削弱了诺沃提尼的地位。

我要求成立的委员会 7 月开始工作，它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解决同西罗基这个人有关的问题的迫切性。诺沃提尼当时终于认识到，在新的委员会发表报告之前，他不得不牺牲西罗基。撤换西罗基是 1963 年 9 月 20 日在捷共中央会议上宣布的，从而结束了他为期十年的政府总理时代。西罗基也失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因此这意味着他完全靠边站。诺沃提尼不太令人信服地试

图使这一措施变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他把西罗基下台包裹在多起不那么重要的干部变动之中。

动摇不定的约瑟夫·列纳尔特当上了政府总理，米哈尔·胡吉克，诺沃提尼原来准备让他担任我的职务，被任命为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以代替列纳尔特。主管文化的捷共中央书记切斯特米尔·齐萨日，被任命五个月之后，就被解除职务。我想起他，是因他被指责为要对1963年春夏政治气候缓和负责。有些人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可爱的夏天”，同以前的一些时期相比，它的确是可爱的。

以后，我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问题的委员会的工作上，我们在斯洛伐克非常强烈呼吁做这一工作。起初委员会只由斯洛伐克委员组成，由列纳尔特主持。在9月干部变动之后，列纳尔特在委员会的职务由弗拉基米尔·寇茨基担任，他长期当主管意识形态的捷共中央书记。委员会的其他许多委员是斯洛伐克人。委员会在布拉洛古老的巴纳比特教修道院工作，国家和党的档案馆设在那里。虽然我不是这个所谓巴纳比特委员会的委员，但经常向我通报其工作情况，我参加它的一两次讨论。

委员会查明的情况是完全明确的。整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案件是臆造的，所有根据这一指责遭到迫害的人都是无辜的。1963年12初，巴纳比特委员会向斯洛伐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提交报告。它建议为1950年被判刑的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成员彻底昭雪，为所有受到虚假指控和不公正迫害的人，特别是弗拉基米尔·克利门蒂斯、古斯塔夫·胡萨克、拉吉斯拉夫·诺沃麦斯基和卡罗尔·什米德凯，彻底恢复名誉。1963年12月18日斯共中央通过该报告，一天后捷共中央也这么做。共产党历史上丑恶的一章因此而正式结束。但这一罪行的污点永远无法去除，尤其是杀害弗·克利门蒂斯。尽管如此，这对我们来说是伟大的胜利。我不能隐瞒，我也有个人胜利的感觉。

当然，恢复名誉工作提出纠正的问题。弗·克利门蒂斯和卡·什米德凯已经死了，拉佐·诺沃麦斯基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但古·胡萨克是另一种情况。1960年，巴齐列克还当斯共中央第一书记时，他们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对搞胡萨克负责的巴齐列克，未做什么来帮助他。他们分配胡萨克当建筑材料仓库管理员，他在那里工作到1963年。

我接替巴齐列克的职务后，很快就在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给胡萨克安排了较适当的工作。我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是他自己选择的。他开始研究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史，该书第一版（在威廉·普雷昌和其他历史学家的帮助下写的）出版于1964年。

1963年7月，我把胡萨克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同他讨论他的地位和彻底恢复名誉问题。我给他讲科尔德尔委员会查明的情况和正在巴纳比特修道院进行的调查。他注意地听着，以提问题和进行评论作答。在这次见面之前，我本人不认得他。但他认识我父亲，肯定知道我是谁和我的身份，因此我们并不感到陌生。我觉得，他理解我想帮助他，但正如我也从其他人处所了解到的，他非常冷淡、不敏锐。我感到，我未能同他建立人际接触，这在其他情况下一般是能办到的。

古·胡萨克对巴纳比特委员会来说是个关键证人。不为其彻底昭雪，整个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案就不能切实了结。当此前已根据科尔德尔委员会报告做到为其恢复公民名誉，诺沃提尼及其主要意识形态专家伊日·亨德里赫仍然反对政治上为胡萨克恢复名誉，包括把他重新吸收入党。他们声称，他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包括民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为胡萨克洗刷这些指责是个原则问题。

我想起，较多并非最坏的人也对重新接收胡萨克入党表示保留。他们提出的论据是，他曾经并仍然是个斤斤计较、渴望权力

的人。这种话我听得很多，特别是从战时认识胡萨克和他战后当权时记得他的人那里听到。最后，我也了解我父亲的看法。尽管如此，我反对把胡萨克看成是有罪的，只看到其品格的不好方面。回过头来看，这可能被认为是个错误。但在1963年，为胡萨克恢复名誉是通向进一步改革和更公平调整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国家法关系[①]的道路上的重要一步。我的目的是要让真理和法律获胜。

约瑟夫·列纳尔特受命执行同胡萨克进行谈话的任务。我想，那是在1963年9月，还在西罗基被迫下台和列纳尔特被任命为政府总理接替他以前。列纳尔特出于某些个人原因显然担心，除速记员外，他要自己同胡萨克谈话。他忐忑不安地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到他那里。我无理由拒绝，遂要求胡萨克再次到我在斯共中央的办公室来。

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起初我们向胡萨克说明会晤的目的，要求他对被指责犯下的错误提出自己的说法。在这之前，我已在巴纳比特修道院看过关于他的大量材料，知道他的案子首先建立在国家安全局队伍中性格不坚定分子搜集的虚假指责和诽谤上。这特别牵涉到胡萨克是铁托的秘密追随者的指责，但也涉及其它许多指责。让胡萨克向我们说明他对这些指责的看法，仍然是重要的。这一次，尤其在开始时，他非常神经质，似乎怀疑会晤会有什么结果。但在谈话的过程中，他又平静下来，我们讨论了需要弄清的一切问题。

这次会晤之后，我们（列纳尔特和我）立即向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为胡萨克彻底恢复名誉。最后，我们的报告被包括到巴纳比特委员会1963年12月19日向捷共中央提交的最后报告中。

1964年初，胡萨克被重新接收入共产党。我2月5日又接见

① 国家法关系，指涉及国家体制问题的关系。

他，同其讨论其情况和计划。这回他装得非常自信、相当傲慢和冷淡如故。他未提自己的任何具体意图，但我断定，他在等待让他担任党或国家的高级职务的建议。约一个月之后，捷共中央主席团同意建议胡萨克担任司法部副部长职务。我觉得，这是个恰当的建议。胡萨克是位法学家，我希望他在不久前的遭遇之后，能帮助做还得我们去做的低一级特别是斯洛伐克的恢复名誉工作。

1964 年 3 月 13 日，我又接见胡萨克，党的州委第一书记弗兰季舍克·德沃尔斯基在座。我要求胡萨克接受司法部副部长职务，并对他说明，他在这样的岗位上可能很有用。对所建议的职位，他坚决拒不接受。我明白，这对他来说是不够的。他未上任，而是继续留在斯洛伐克科学院工作，并开始为自己制造自由派的名声。

* *　　* *　　* *

1963 年底，我有理由对所取得的感到满意。我但任了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职务九个月。我度过了诺沃提尼试图把我搞下台这一关，迫使他接受为斯洛伐克共产党洗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指责以及为因此而受害的人彻底恢复名誉。诺沃提尼也未能像他在捷克地区所作的那样，迫使我束缚斯洛伐克报刊和文化生活。斯洛伐克继续为社会、政治批评提供相对有利的气氛，较多捷克文化活动家羡慕地看着这一点。

我决心继续坚持这一方向。对其正确性我深信不疑。我注意到，这种放松的态度帮助我进行工作，我走动时没有警察保护。我自由地同人们交谈。我感觉到日益增长的信任的纽带，乐观地向前看。诺沃提尼已不能像对我的前任那样，把我推来推去。不过我意识到，由于他力图把我搞掉，我总的说来仍不安全。但他要搞掉我越来越困难。

12

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我 1964 年 3 月同胡萨克见面之后不久，诺沃提尼又试图使我屈服。但这一次他大概懂得，他不能以从布拉格发出的行政命令来搞掉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他决定首先从斯洛伐克共产党组织内部破坏我在斯洛伐克的地位。

诺沃提尼的工具是其代理人米哈尔·胡吉克、米哈尔·萨博尔奇克和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州委书记鲁道夫·茨维克。诺沃提尼以参加州党组织代表会议，对茨维克表示支持，这是他在茨维克开始攻击我之后不久作出的刺眼姿态。

在 1963 年最后一次访问布拉迪斯拉发期间，诺沃提尼同巴齐列克在多瑙河之滨散步了两个小时。当时就已清楚，巴齐列克将不得不下台。但诺沃提尼还想表明，他对此不批准。从那时直到 1968 年下台，他回避对布拉迪斯拉发进行访问。

在 1964 年斯共中央会议上，茨维克突然在讨论时发言，强烈谴责我对当局的批评者特别是作家和记者"软弱"。他也就斯洛伐克出版社的活动对我进行指责，它们出版了在捷克地区遭禁的书籍。

于是，诺沃提尼通过斯洛伐克帮凶对我进行的长期的"游击战"便开始了。虽然斯共中央的多数在我这一边，我必须遵守限定我的回旋余地的规则。1964 年 4 月，当我从故友、特伦钦县委书记尤利乌斯·图尔切克处得知，妻子和我两人都处在国家安全局的监视下之后，我特别谨慎小心。他们搜集反对我的"材料"。

这在那个时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我了解到，因 1962 年反对诺沃提尼而被监禁的鲁道夫·巴拉克，在布拉格被判处 15 年徒刑。

诺沃提尼的代理人以各种不同力度继续攻击我们在斯洛伐克实行的政策，一直到 1967 年。我们得以打退其进攻。1965 年中，斯共中央委员会里对我的支持显著巩固了。1966 年 5 月斯共代表大会以后，我感到比较安全，会后诺沃提尼已无力以公众可接受的政治手段使我屈服 。不过他手中仍掌握权力工具，仍是通向较彻底改革道路上的障碍。还必须再过一年，才有可能和时机转入更坚决、有希望成功的反攻。

1964 年 8 月尼·谢·赫鲁晓夫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问是个伟大的政治事件。我们当时觉得，赫鲁晓夫手里牢牢地掌握着苏联的权力。在我国他也因揭露个人迷信和谴责斯大林的恐怖活动而很受欢迎。他平易的作风和直率的个人讲话，特别是在平民百姓中为他赢得好感。对我来说，赫鲁晓夫是希望的同义词。与苏联 30 年代末和捷克斯洛伐克 50 年代初的情况不同，我看到赫鲁晓夫 1956 年以后所做的，并相信他的努力最终将把社会主义引到正确的道路上。我也认为他是个诚恳、真挚和值得信赖的人，政治家难得如此。

我对外交政策只一般地关注，因此对赫鲁晓夫的外交活动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我总的相信，他执行的是一条通向国际和平的路线。他支持非殖民化，在我看来也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合乎逻辑的运用。难道世界各地包括西方的多数社会主义者不都是反对殖民主义的吗？

当然，如果我们未考虑到 1956 年秋的匈牙利事件，对尼·谢·赫鲁晓夫的任何回顾都是不完整的。我当时在莫斯科，这可能不是客观观察的最理想的地点。匈牙利事件的整个规模我不完全清楚。作为斯洛伐克人，我仍倾向于透过本民族历史 经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眼镜看匈牙利事件，二次大战中当时的匈牙利同

希特勒并肩作战的时间比其他纳粹盟国都长。从这一观点和从积极理解赫鲁晓夫的观点出发，我不愿怀疑莫斯科对匈牙利事件的解释：右倾倾向或甚至法西斯倾向的复活。

1961 年 10 月我本人第一次见到尼·谢·赫鲁晓夫，当时我是出席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捷克斯洛代克党的代表团团员。以后诺沃提尼几乎从不带我，尽管在我就任斯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之后，我在代表团里是不应缺少的。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党的领导之间的一切会谈，就是在我未参加的情况下举行的，只有一次例外：到莫斯科参加赫鲁晓夫 70 寿辰庆祝活动。

一般之行，如 1961 年那次布加勒斯特之行，多数是形式的。人们必须参加代表大会的会议，听枯燥无味的讲话，坐在正式的午宴和晚宴上，无数次举杯致祝酒词。不过，1961 年 10 月在布加勒斯特的情况不同。中苏意识形态分裂加剧了，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还与会。肯定可料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向代表大会所致的贺词中将同苏共发生明显矛盾。赫鲁晓夫率领苏共中央代表团表明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正如所预料的，中国代表团尖锐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主义化政策，虽然这还在斯大林遗体被从红场搬走之前。

在这种情况下，尼·谢·赫鲁晓夫要求罗马尼亚人举行代表大会外国代表团的内部会议。这是个未料到的转折，也没有足够时间起草和翻译讲话。诺沃提尼的做法是一切都要事先准备好并获得通过，这是他的一大缺点，这回更因整个讨论直接用俄语进行而复杂化。我们必须参加这一非常直接的讨论，而我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惟一会俄语的团员。于是我不同诺沃提尼进行较彻底的磋商，就必须表达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立场。我知道自己所说的，对非斯大林主义化表示完全支持。

在此次会议上，主要是赫鲁晓夫和中国人之间交换观点，后者反对批评斯大林。尼·谢·赫鲁晓夫热烈地为自己的改革辩护。

在谈到仍安放在莫斯科陵墓列宁旁边的斯大林遗体时，他以自己所特有的气质说："喏，如果你们要斯大林，你们可以把他带走！"我不记得，中国人接受了这一建议。

以后我再次见到尼·谢·赫鲁晓夫是在1964年4月，当时我同党的代表团一起去参加上面已提到的他的诞辰的庆祝活动。我感到高兴的是，他还记得我，并对我表现出相当大的个人好感。我期待着他的捷克斯洛伐克之行，特别是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20周年之际可在斯洛伐克欢迎他。因为赫鲁晓夫在我们起义期间领导基辅游击司令部，我估计，他对这一重大事件记得很清楚。

四个月之后，尼·谢·赫鲁晓夫访问时先在布拉格度过两三天，后在诺沃提尼的陪同下来到布拉迪斯拉发，我们从那里飞往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参加起义庆祝活动。

赫鲁晓夫在布拉迪斯拉发对我就很亲切，老要我待在他身边。这很难使诺沃提尼感到高兴，他对我已公开表示出敌意，总是力图把我挤到后面。但他这回也因俄语不好面处于不利地位。我发觉，诺沃提尼的刻板举止同赫鲁晓夫的自然快活不一样。我努力尽量不引人注意，以避免同诺沃提尼发生不必要的问题，但赫鲁晓夫一直回头看，要求我在他身边。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不仅全面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务，而且也很了解斯洛伐克的情况，包括我接替巴齐列克职务的背景。尼·谢·赫鲁晓夫不止一次赞扬我纠正捷共战后领导造成的冤案的努力，强调为受害者彻底恢复名誉的意义。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本人在这方面总的说来是不彻底的，但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他的过错。在反对斯大林主义运动中，他遇到其他党的活动家的顽固抵抗，他们最终阻止他开展改革。必须提到的是，在他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期间，反对他的阴谋已接近顶点。当然，我对此并不了解。

我们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机场坐上汽车，出发到露天剧场参

加庆祝活动。尼·谢·赫鲁晓夫同安·诺沃提尼坐在头几辆汽车的一辆里，而让我坐在车队末尾的车里，这是诺沃提尼的礼宾官精心安排的。车队在欢呼的人群之间缓慢行进。所有的人都像过节一样。

但是，整个车队在离城还有大约半公里的地方突然停下不动。我摇下车窗玻璃，担心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我看见苏联大使吉缅宁顺着车队从前向后跑，从外往里看每一辆车。当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跑到我所坐的那辆汽车，对我叫道："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快跟我走，我们进城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要你坐在他身边！"

我有点犹豫不决地下了车，跟着吉缅宁走，我知道，诺沃提尼对这一礼宾变动不会感到高兴。但我不能拒绝，我跟着大使顺着车队走，发现站在人行道上的人脸上露出好奇的表情。我们走过约12辆汽车，才走到后排座上坐着赫鲁晓夫和诺沃提尼的那辆车处。吉缅宁把我推入车内，诺沃提尼愁眉不展，赫鲁晓夫咧着大嘴微笑。

庆祝活动结束后，全班人马到附近的疗养院斯利亚奇。午餐后我看见尼·谢·赫鲁晓夫溜出侧门，走向森林边上。他停下来，陷入沉思。我理解他在忙了一天之后要独处片刻的愿望，但我对他也有担心，因而想问他一切是否正常。当我走近他，看见他脸上表情严肃甚至忧郁。他一发现我，就微微一笑，并说他感觉良好，但在考虑国内的许多问题。他未补充任何更具体的内容，这次简短谈话的余下部分，在我们回来往里走时以轻松的语调进行。

几周之后传来尼·谢·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消息时，我在思想上生动地回忆起这次简短的谈话。他知道反对他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吗？或者只有预感？

在随后举行的第一次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我看到每个人都感到不安和不幸，包括诺沃提尼在内也是如此。他长期抵制赫

晓夫发起的变革，但过一段时间看来他也受到苏联领袖的信念和热情的影响。对赫鲁晓夫下台将带来什么，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明确的看法。难以想像非斯大林主义化会完全逆转，把尼·谢·赫鲁晓夫搞掉的人也否认有此意图。他们特别对赫鲁晓夫的领导方法表示不满。他们以苏联典型的行话指责他犯有“主观主义”，这要表达的意思是，他办事未经政治局同意。

我们主席团的多数委员都喜欢赫鲁晓夫，不论他是作为一位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人，都是如此，说明把他搞掉的理由的解释未能使我们信服。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在他访问我国之后这么短就把他搞掉，我们也对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感到非常不安。在同中央委员会的矛盾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安·诺沃提尼显然必定有特别理由对此表示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致决定通过对此事的立场，不仅把它发到莫斯科，而且也予以发表。当然，这不是抗议，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是苏联的内政，抗议是不合适的。但我们提出，我们对莫斯科的“突然变动感到意外”。从整个上下文可以看出，我们对此感到不悦。

当时也流传这样的消息，说诺沃提尼曾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表示他本人对政变的不满。不过，我不了解实际情况如何。我们通过的立场，是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一致行动。同时，勃列日涅夫可能就此对诺沃提尼进行指责，但我认为，这对勃列日涅夫后来不支持诺沃提尼未起较重要的作用。

根据某些消息，尼·谢·赫鲁晓夫是第一个强迫诺沃提尼同意苏军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领袖。根据这些消息，诺沃提尼据说对此表示拒绝。据报道，在列·伊·勃列日涅夫当了总书记之后，他也仍然反对这种计划。是否有过这样的讨论，我不了解，据我所知，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也不知道。

对1964年10月莫斯科变动的更深的、长期的意义，我相当

长时间不清楚。在列·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之前，我同他只见过一次。那是在 1963 年 12 月中。勃列日涅夫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布拉格逗留之后，来布拉迪斯拉发访问两天。我对他未进行过任何特别研究。实际上，当时谁也未能料到，他十个月后会取代赫鲁晓夫。我记得勃列日涅夫是个看起来非常善意的人。但如把他同尼·谢·赫鲁晓夫作比较，不免产生这样的印象：他缺少赫鲁晓夫的自然。

后来，勃列日涅夫以俄罗斯典型的而不总是受欢迎的男子接吻习惯而闻名。尽管当地这一习惯是相当普遍的，特别在亲戚或亲近朋友阔别重逢时更是如此，勃列日涅夫一直把它作为本人公开活动的一个突出部分来加以运用。比如，他 1963 年 12 月来布拉迪斯拉发、我到机场欢迎他时，他拥抱和吻我就没有来由。我们在这以前从未见过面。五年之后，又是在公开场合，在糟得多的情况下，他又试图这么做。有人称这样的戏为“有组织的亲热”，这合乎实际。

撤掉尼·谢·赫鲁晓夫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不过对其完全理解并不简单。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独到的关于苏联的研究文章，正如我后来所弄清的，甚至我们来自莫斯科的外交消息也是肤浅的。列·伊·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虽然撤销了赫鲁晓夫的较多措施，但我们对他们完全扭转改革方针，总的说来还不清楚。这到几年之后才是显而易见的。

我相信，这一方针的精神之父首先是苏联的主要意识形态专家米·安·苏斯洛夫，他从斯大林时代到戈尔巴乔夫上台都在克里姆林宫工作。我想，在推翻赫鲁晓夫和后来扼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努力当中，苏斯洛夫都是幕后的决定性人物。作为政治局委员，他活得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四位总书记还长。假如他不死，也许还阻挡戈尔巴乔夫走向公开性和改革的步伐。

不过，1964年底我尚未如此关注外部威胁。赫鲁晓夫下台的确使我难过，但我未充分考虑到其对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后果。争取改革我国体制的斗争几乎耗费我的全部注意力和精力。



13

在山熊的帮助下

从赫鲁晓夫下台到 1967 年秋同诺沃提尼的最后决定性斗争之间的几年，留有发生在三个主要战场的冲突的印记。第一个是一直恶化的经济。第二个是新闻自由，因为教条主义者不断要求对报纸、书籍和其他创作活动进行更严格的检查。第三个是捷斯关系，诺沃提尼对斯洛伐克麻木不仁的政策不断损害它。所有三个战场往往互相重叠。

1961 和 1962 年我担任主管工业的捷共中央书记职务，因此同主张进行经济改革的人保持经常联系。因为我起先相当相信经济计划和中央管理，奥·希克、卡·寇巴等经济学家的论据说服了我，放宽和非集中化是不可避免的。对专家的看法我总是给予巨大注意，特别是在斯洛伐克的工作中我越来越依靠他们出的主意。

希克教授公开说明自己 1964 至 1966 年的经济改革计划时，我也已相信企业自主作为发扬其主动性和经理、技术员及工人创造思想的必不可少的激励手段的重要性。我也认识到必须以利润指标代替总产值指标,后者是苏联集团经济结果的传统衡量标准。

尽管对不如捷克经济发达的斯洛伐克经济来说有风险，我支持以所谓新经济机制闻名的改革，因为我认识到，旧的过份集中管理的做法造成停滞，不能为经济的健康增长创造条件。

尽管上述建议影响相当深远,所有制问题在其中尚未出现,因为即使是私有化的最小迹象，在意识形态上也是不可想像的，在

政治上也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会引起“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因此，尽管改革坚持了社会所有制，它仍标志着走向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更合理的管理方法的重要一步。我们也考虑加强其他形式特别是合作社和公共行业的社会所有制，因为这两种形式提供了进行较灵活的经济活动的可能性。

贯彻改革纲领是个艰巨的斗争。管理构想的变化既威胁党的机构，也威胁各部官僚。这些强大、隐蔽的力量一年年阻碍改革，最后他们得以把所谓新经济机制的范围缩小到 1967 年 1 月开始进行的最低限度的试验。他们称其为“完善管理体制”，但很快就表明，它以这种被肢解的形式，根本无望获得成功。

在经济改革之前，需要先进行政治改革，这越来越显而易见。我相信，党的中央机构每天插手经济管理的做法必须结束，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必须明确分开。两年之后的 1967 年秋，当政治局势终于成熟，我公开地表达了这些思想。在争取经济改革当中，我们努力同较多的党的领导成员建立政治联盟，他们稍后在同诺沃提尼和其他变革反对者斗争中起了关键作用。支持我的比如有雅罗米尔·杜兰斯基博士，战前的共产党员，从 1954 年起一直担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可惜，他在同庚人中完全是个例外。捷共中央主席团两个较年轻的委员德拉霍米尔·科尔德尔和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也与我同心协力。这两人都是前北摩拉维亚冶金中心俄斯特拉发州的干部。切尔尼克的立场起初不完全明确，但到 1966 年底他已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最后，他是个比科尔德尔彻底、可靠得多的改革盟友。

弗兰季舍克·弗拉萨克是改革的重要拥护者之一。他就职业而言是个工程师，不是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但担任国家技术发展委员会主席的重要职务。当然，政府和其它机构首先是科学机构中的其他许多人也支持改革。但他们在诺沃提尼当政时期无希望运用自己的思想。

我经常同保守分子就投资政策发生争论。中央的计划制订者及其在各个经济部门的同盟者仍然主张优先加强工业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地区的集中。我则争取对斯洛伐克进行更多的投资，它能使国家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平衡，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斯洛伐克落后于捷克的状况仍继续存在，有正当和实际的理由把新的生产部署在斯洛伐克，并让斯洛伐克企业生产更多的制成品，而不是在捷克或摩拉维亚补充配套的半成品。

什图罗沃的造纸联合企业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一直使我感到高兴。原来计划把它建在已有造纸工业的地区，捷克的什捷吉。不过在这里既不能指望原料数量会增加，也不能指望有劳动力储备。此外，这里环保问题增多，水资源不足。我提出的建在斯洛伐克的选择是合理的并更好，但在布拉格进行官僚主义反对的情况下，要使它获得通过，是极为困难的。在愤怒的争论中，我甚至被迫使了个花招。1964 年 9 月，我在什图罗沃举办庆典，那里已为建厂准备了地皮，在中央计划机构批准之前，我宣布要建厂。这一招真成了，因为诺沃提尼及其盟友不想使公众扫兴，假如工程撤销，大家就会扫兴。最后，党批准了。不过，许多脸阴沉沉的。

在东斯洛伐克兴建大的冶金综合体是件类似的事，原来计划建在俄斯特拉发，那里在这之前就有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冶金中心。铁砂从乌克兰的克里维-罗格进口意味着，运载铁砂的火车沿着斯洛伐克的整个长度开到北摩拉维亚，有近 400 公里的距离。在俄斯特拉发地区建设另一个炼铁综合体也因劳动力不足而无经济意义，其劳力必须从国家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斯洛伐克获得。同时，在东斯洛伐克兴建新的冶金联合企业不是新的想法。在 50 年代中期就曾讨论过。后来放弃了。但当 60 年代初提出需要提高捷克斯洛伐克铁和钢的生产时，我们同许多合理地考虑问题的人一起，为这一对东斯洛伐克的投资而顽强斗争。

应当说，60 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供应整个苏联集团的机

器以及相当一部分军火的领先生产国。这一生产成为我国经济的基础，我无法改变之。我只能在现有范围内活动，努力限制对居民的不利影响。当时新的铁厂和钢厂就是“必须”建在某个地方，问题实质上简单化为：建在哪里和花多少钱。

但是，不论我对部署工厂及其它经济设施的建议的说明多么令人信服和客观，诺沃提尼越来越把我看作暗藏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他对斯洛伐克事务和文化的无知与忽视使他总是怀疑，在斯洛伐克一直有人搞阴谋反对他。我几乎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他1965年4月在苏军解放布拉迪斯拉发20周年之际对该市的访问。在卡尔顿宾馆的午宴上，诺沃提尼演出了一场戏，强迫招待员先当着他的面打开一瓶甜葡萄酒，然后再给他斟上。在参观古老的杰温城堡之后，上了葡萄酒，诺沃提尼又看着自己面前的酒杯，迅速把它同坐在桌子对面的米·胡吉克妻子的一杯对换。我不会描写，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我是多么难堪。他之所以如此多疑，可能是由于他相信国家安全局的警告，正如我后来所听说的，在斯洛伐克有人想要谋杀他。谁散布这种消息，我不得而知。

诺沃提尼对我的敌意因斯洛伐克文化气候的缓和而更加加强了，尽管他对此经常反对，我则是容忍的。斯洛伐克的缓和气氛同捷克地区的情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并以对民族问题进行更自由的公开讨论为其特点。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开始越来越公开地批评布拉格对斯洛伐克政策麻木不仁。不过讨论是有分寸和实事求是的，因此我决定不干预。

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不直接到捷共中央主席团去，不对1960年宪法否定斯洛伐克民族机关提出抗议。可惜，要采取这样的步骤，我背后需要有个统一的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这我没有，甚至在1966年5月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以后也没有。安·诺沃提尼一直有足够的权力和可能利用他在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来反对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主要工具是批评性的

公开讨论和指出不公正。

我 1965 年 10 月 30 日在乌赫罗维茨参加留多维特·什图尔诞生 150 周年庆祝活动和在那里发表的讲话，就是这样的步骤之一。我已提到过，我同留·什图尔出生在同一座房子里，在父母的影响下，我从不接受官方对他的歪曲看法。一方面，他在形成现代书面语言中的作用被肯定地接受。对他的文学作品和他作为匈牙利议会议员的活动，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因为留·什图尔不支持匈牙利 1848 年革命，要求给斯洛伐克民族以平等权利，又把他看作"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这一看法出自马列主义把任何民族主义简单化评价为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害的消极现象。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在 1849 或 1850 年谴责了斯拉夫人在镇压匈牙利革命中起的作用，他对此所写的就等于教条。但斯洛伐克 1848—1849 年革命不能同帮助哈布斯堡家族的人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其它斯拉夫民族特别是俄罗斯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活动相比。首先，匈牙利人否认斯洛伐克的存在本身，而斯洛伐克人又没有军队。他们 1848 年起义假若不反对自己的匈牙利压迫者，应当反对别的什么人呢？

因此，官方对留·什图尔的看法是扭曲和恶意的。150 年之后，布拉格当政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仍经常利用他污蔑斯洛伐克争取解放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要求在历史上给留·什图尔以他真正应得的地位是正确的。

在讲话中我把什图尔的行动放到其历史背景中去看，强调当时的起义同时也是斯洛伐克农奴反对其匈牙利封建主的起义。我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自豪感也是正当的，不过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我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使每个人明白，我反对布拉格当政的中央集权主义者的反斯洛伐克观点。在 1963 年

8 月庆祝斯洛伐克马吉查[1] 一百周年时，1965 年 2 月农民协会成立 120 周年之际在索博季什捷，1967 年 3 月在赫尔博盖的约·米·胡尔班[2] 150 诞辰的庆祝会上，以及在其它场合，我也努力这么做并在讲话中强调民族意识。

至少从 1964 年 3 月起就对我进行系统攻击的安·诺沃提尼，特别是通过其仆从，比如米·胡吉克、米·萨博尔奇克和鲁·茨维克，继续这么做。1966 年 5 月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之前几个星期我获悉，在参观什图罗沃造纸厂工地时，国家安全局对我进行盯梢。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调查我在杜布尼察的活动，我战争期间在那里工作。我不知道他们寻找什么，但我相信这是严重的，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安全局在制造反对我的“案件”。

其命令必然来自诸如捷共中央军队与公安部队部这样高级的职位。该部的任务是监督全国的军队和警察，在安·诺沃提尼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该部部长米·马穆拉是诺沃提尼的左右手。

我一得知对我进行调查，立即在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起反击。我问道，未得到主席团的批准，怎么能进行类似的活动，我要求中央监督与检察委员会马上调查，谁下的命令。我警告说，这样的做法意味着回到 50 年代初。我知道，在科尔德尔委员会揭发之后这么短时间，这一论据必定会起作用。幸好主席团的其他委员尤其是雅·杜兰斯基也支持我的要求。每个人都清楚，这是诺沃提尼搞的，因此当他看到遭到强烈反对，不得不让步。

直到 1968 年，捷共领导尤其是第一书记及其所领导的中央机关，对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活动进行系统的监督。这种做法的一个

---

① 斯洛伐克马吉查，斯文化机构、中央图书馆和斯侨研究基地。总部设在马尔丁。1863 年成立，1875 年被匈牙利当局强行关闭，1919 年恢复。

② 约·米·胡尔班（1817—1888），斯洛伐克民族复兴运动代表之一，1848—1849 年曾任斯民族议会主席，参与组织斯武装起义，诗人、作家。

组成部分是，捷共领导，我在那里处于少数，在斯共每次代表大会之前，事先通过要提出的文件，包括我的主要报告和拟议中的干部变动。不过诺沃提尼的权力终归已不是完全无限的，因为他本人需要斯洛伐克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

在1966年5月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之前，我相信我在中央全会上可获得足够的支持。但在主席团中约·列纳尔特站到米·胡吉克和米·萨博尔奇克一边，在书记处中两名书记约·克里日和扬·扬尼克也同他们联合在一起。这就是说，在斯共中央七人主席团以及五人书记处我的反对者都处于少数。但布拉格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权力还是强大的，他仍可把我搞掉。早在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诺沃提尼就发起倒我的秘密运动。同时他也知道，在某些县和州的组织中通过许多批评其政策的决议。毫无疑问，他估计我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将包含这种批评。这可能导致斯洛伐克党的领导机关中发生不必要的干部变动，并使一个月以后要举行的捷共“十三大”的筹备工作复杂化。

我在行动上基本上仍小心谨慎，因为我不相信同诺沃提尼发生直接冲突的时刻已到。同低些的党组织的决议相比，我们起草的报告相当有分寸、克制。

但诺沃提尼按他以往的做法行事，采取了好斗的反措施。

1966年4月初，即在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之前一个月，他作出决定，要在捷共中央主席团事先讨论的不仅有对代表大会的报告，而且还有整个“斯洛伐克政治局势”。他在捷共中央主席团有足够的支持，可能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斯洛伐克领导进行干部变动。他想要撤我的职，任命米·胡吉克担任。

尽管有这种威胁，我现实地估计到，诺沃提尼不会走得这么远。在这点上我没错。整个事情在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时，诺沃提尼未获得足够的支持，不得不放弃他的计划。讨论第一次表明，诺沃提尼在党的最高机关的影响严重削弱。在主席团八名有表决

权的委员中，只有约·列纳尔特在一切问题上完全支持诺沃提尼。我特别注意到伊·亨德里赫的不明确的表现，他在这之前一直是诺沃提尼最亲密的盟友。我看得清楚，他们正处在分手的边缘，已不会一起走。

诺沃提尼从无表决权的主席团候补委员即马·瓦楚利克、米·萨博尔奇克和安·卡佩克那里，获得较大的支持。瓦楚利克当时是党的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据信诺沃提尼把他选为自己的接班人。诺沃提尼在书记处也得到支持，他在这之前把A·克尔切克、卢·什特劳加尔和L·克伦霍娃-贝塞罗娃安插到那里。捷共中央书记弗·寇茨基也支持他。

尽管诺沃提尼在主席团推行其深思熟虑的计划未得逞，我留任的前景仍不能肯定。我的心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宿命论的，我需要休息。这样，我4月底（代表大会前三个星期）就到远在高塔特拉山中的消夏别墅去。几位朋友包括斯洛伐克党中央工业部长弗兰季舍克·巴尔比雷克，同我一起去。巴尔比雷克是个亲密忠诚的朋友，我稍后支持他不仅进入斯共中央主席团，而且进入捷共中央。

我们来到高塔特拉山雅沃林纳地区的一座小别墅。别墅座落在波兰边界附近。整个地区被宣布为自然保护区。这里有丰富的阿尔卑斯山植物和由冰川形成的美丽的湖泊。高大的野兽、猞猁和狗熊生活在遥远的山区。

我们到达时雪还很多，夜晚寒冷。我们了解到，人们正在搜捕一只野棕熊。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熊受到严格的保护。它们吃植物，怕见人。但这里出现了一只坏熊，它变野了，袭击边界两侧的羊群。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山区居民决定，必须除掉这一害。不过，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只熊显然是狡猾的，已成功地躲避猎人好几年。它在夜间从山的一边走到另一边，从波兰走到斯洛伐克，又回到波兰。我们到后不久得知，有人看见熊，它正

从波兰走到塔特拉山的我们这一边。我顶不住诱惑，决定参加打猎，其他人包括巴尔比雷克也同我一起参加。

捕猎这么大而危险的猛兽不是件小事。山民夜里带着经过训练的猎犬，出门到各个地方去守候。我们跟着他们，陷入雪中，白雪没膝。稍顷寒冷开始侵入我们的骨头，但熊可能出现的希望使我们感到温暖。

我们白等了两个晚上。第三天，山民决定取消打猎。他们熟悉自己的活儿，相信熊已离开他们那个地区。

我的朋友决定回布拉迪斯拉发，我也差点同他们一起离开。但是有什么东西告诉我，熊还一直在近处，因此我决定留下，再试一次。巴尔比雷克离开时，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要知道，如果我弄到那只熊，这就意味着，诺沃提尼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不到我！"

我走进一个山民的房子，告诉他我准备做什么，并要求他准许和帮助。最初，他什么也不答应。他对我说，猎犬已经走了，有权参加打猎的人也已经走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说服，但他在这之后肯定也不相信我的预感。

我们在太阳下山以前出发，占据了一片急剧倾斜的高地边上几棵矮树底下的一个地方。那是大礼拜五[1]的前一天晚上，天气酷冷。我们等了几个小时，我相信山民一定觉得，这真荒唐，躺在热床上该多舒服。

后来我突然在距我们约二百米处发现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我轻声唤醒正在打盹的山民，用手指指着那个方向。望远镜使我们确信，那无疑就是受到搜捕的熊。我们像规则所规定的那样，排除了一切怀疑。我立即瞄准它，等它走到开阔的地方就开枪。我们听到猛兽的嚎叫声，它跳到一边，消失在树林中。

① 大礼拜五，复活节之前的星期五。

山民对我说，我实际上造成非常危险的局面。由于没有可把我们带到被打伤的野兽那里的猎犬，我们将不得不迅速找到一块有利的高地，以便从上往下看。山民同时不大愿意往前走，因为我们可能碰上受伤狂怒的野兽。但我坚持要走，并走在前头。经过彻底搜查，我们终于在树林中找到被打死的熊。那是只大兽，体重近三百公斤。从那时起，我在卧室里就有张带着头部的熊皮。

我们回到别墅，按照传统以碰杯庆祝我们的凯旋。天亮，我立即给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巴尔比雷克打电话。我通知他，我打死了熊。想到我在临别时对他开的玩笑，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几天之后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开始举行，诺沃提尼未能像我弄到熊皮那样，剥我的皮。我对代表大会的报告赢得了支持，我甚至得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当然，我未能摆脱胡吉克、萨博尔奇克和诺沃提尼的其他一些帮凶，但我已感到比较安全。晚一个月举行的捷共"十三大"，未带来任何出人意料的东西。我的发言像在斯洛伐克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样被接受。我知道，时间对改革有利。

后来我听说，诺沃提尼曾发出指示，调查我是怎么打死熊的。警察不得不证实，打猎是合法的，官方准许的。我肯定是因打熊而受根据如此高级权威的直接命令进行的审查的第一人。消息使我感到非常开心。它表明诺沃提尼因权力下降而绝望。

14

通向“布拉格之春”道路的开始

1967年，改革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开始走向高潮。这次所说的已不是次要的事，冲突集中在我国社会的基本的、长期的问题上，从50年代初起就开始存在的政治压迫制度上。

在前一年，诺沃提尼及其盟友试图不让反对派讲话，尤其是在斯洛伐克，又未能得逞。不满增长了。年初我们从县党委的报告中了解到，斯洛伐克以及捷克地区公众中的急躁情绪和变革倾向在增长。危机的所有三个最主要领域，经济、文化和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国家法关系，都在捷共中央秋季会议上公开讨论。

所谓新经济机制一月份开始贯彻，但很快就清楚，以其被阉割的形式走不到哪儿去。此外，正如我已提到过的，它的更广泛的运行有对斯洛伐克产生消极后果的危险，这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继续存在的过错。斯洛伐克工业生产率仍然低于捷克地区，甚至我的一些盟友（如弗·巴尔比雷克）也认为，以往的体制向斯洛伐克经济提供了更好的保护。提出这一问题的讨论，在1967年头几个月爆发出来，也表现在这年5月斯共中央会议上。我对这些趋势有担心，因为它们可能推迟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我相信政治体制是问题的根源。

1967年6月底，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它发展成为四年前我们在斯洛伐克经历过的造反。这一回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大约四分之三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会员，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和编辑，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组成一支早在

战前就支持党的有威望的力量。对社会主义理想蜕化变质敏感地作出反应的作家，公开起来造反，反对诺沃提尼和负责监督文化事务的亨德里赫的政策。有些著名的共产党作家，例如帕维尔·科后特、米兰·昆德拉和卢德维克·瓦楚利克，公开谴责斯大林主义统治和要求根据国家的民主传统进行根本变革。

安·诺沃提尼、伊·亨德里赫及其盟友被激怒了，要求对最坦率的批评者，首先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本身，采取严厉的措施。只是捷作协的多数领导基本上同意批评者的意见，而不听亨德里赫和其他负责文化问题的干部的命令。此案后来提到捷共中央主席团进行讨论，主席团接受诺沃提尼和亨德里赫查封捷作家周刊《文学报》的建议。

在9月底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我出面反对这一步骤，但谁也未站到我一边，只有杜兰斯基表示谨慎的保留。诺沃提尼的多数派的意见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一群名声不好的记者在警察的保护下强占了布拉格《文学报》编辑部的房子。

自然，这样的干预也是要为在斯洛伐克对斯作家周刊《文化生活》采取类似行动创造条件。这也可能违背我的意愿发生，因为警察是由布拉格中央指挥的。幸好诺沃提尼已无足够的时间这么做，因为他开始遇到其它太多严重问题。这样，在紧接着的几个星期之后，反对布拉格捷克作家的行动也产生这样的间接后果：更突出了斯洛伐克和捷克地区能否更自由地表达意见的差别。捷克造反作家如今在斯洛伐克报刊特别是《文化生活》上找到发表的地方。这也带来同布拉格发生新的冲突的可能性。

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也给这团面增添了酵母。按照苏联领导的做法，除罗马尼亚以外，整个东方集团偏向阿拉伯人，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不受欢迎的，斯洛伐克著名共产党作家、记者拉吉斯拉夫·姆尼亚奇科流亡以色列，以示抗议。他立即被开除出党、剥夺国籍。

我对整个案子有自己的看法，原则上反对在“解决”观点分歧时采取纪律措施，但在这件事情上反对诺沃提尼没意义。这涉及国家的对外政策，它在当前情况下是个不可触动的领域。

尽管那是个异常繁忙的时期，我在7月份抽出两个星期休假，同妻子和儿子们一起度过。我们到低塔特拉山去。我们沿着旅游路线走，欣赏秀丽的风光，呼吸极为清新的空气。

在反对捷克作家的运动中间，诺沃提尼于8月份对斯洛伐克进行事先未计划的访问，最后造成捷斯关系中的又一次不快。这一次他表现出对斯洛伐克民族现代生存基础的明显不尊重。其机会是图尔昌斯基-圣马尔丁斯洛伐克中学堂建校100周年。1867年这一学堂的建成是个重大事件，因为当时在整个地区只有另一所用斯洛伐克语进行教学的中学。

该市本身对所有斯洛伐克人来说具有伟大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特别是从斯洛伐克马吉查成立时起，图尔昌斯基-圣马尔丁在维护斯洛伐克民族特点、反抗布达佩斯19世纪下半叶实行的残暴的匈牙利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斯洛伐克马吉查及中学堂根据匈牙利当局的命令于1875年被关闭，直到匈牙利被迫放弃斯洛伐克的1918年之后才重新开放。

因此，中学堂建校100周年是斯洛伐克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可是斯共领导和斯民族议会主席团都未主动邀请诺沃提尼参加庆祝活动。我怀疑他能理解斯洛伐克的历史里程碑。斯洛伐克马吉查的领导人按惯例邀请他这位国家元首。他们这样做不需要得到布拉迪斯拉发的允许，因而按本系统的做法行事。他们显然未估计到，他会接受邀请。他们也未事先通知我们要邀请，诺沃提尼非常突然地接受邀请以后才这么做。

因为我未得到总统办公厅和捷共中央关于他要来的正式通知，我利用 这一“疏忽”，未到马尔丁去。不过安·诺沃提尼终归

是共和国总统，因此我还是责成负责文化事务的斯共中央书记瓦西尔·比拉克（当时他还不是改革的反对者，而宁可说是某些改革的支持者）参加庆祝活动。

我如此回避履行这一义务，省却许多麻烦，但未能避免诺沃提尼可能是无意造成的丑闻。我后来听说，他原来想通过接受邀请来挽回和改善自己在斯洛伐克的声誉，现在听起来像开玩笑。与此相反，他的访问变成对东道主的一系列侮辱。他显然不听斯洛伐克马吉查究竟是什么的讲解，当有人要求他给予一定支持时，他叫他们找布拉格的博物馆。他拒绝接受出于真诚给他夫人的礼物：斯洛伐克皮大衣和一套刺绣，继续丢人。最后，他把马吉查的象征和友好接近的努力当作斯洛伐克民族主义的挑衅性表现，表明他对斯洛伐克马吉查及其周年的意义全然无知。这样一来，诺沃提尼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几乎是不可挽救的。

为期两天的捷共中央秋季全体会议于10月30日开始举行。预计表达捷共中央主席团集体意见的报告，是讨论和中央委员会要通过的决议的基础。主席团在10月19日和24日的两次会议上讨论了报告初稿。我觉得初稿的基调是不恰当的。

我集中谈三个方面。首先，我要报告包含党的领导的明确自我批评，因为初稿未超出下级党的机关县委和州委的批评。其次，我建议在报告中明确规定政府和党的职权范围。我的目的是结束党的官僚每天对政府工作的干预。第三，我要求早日起草建立在中央委员会决定之上的行动纲领。

今天可能觉得这太少、太晚。但必须记住，1967年我们还生活在斯大林奠定基础、为其独裁需要服务的体制下，我们只能逐步地破坏它。不足一年之后，即使这个“太少”也终于给我们带来了有60万名士兵和7000辆坦克的占领军。

安·诺沃提尼等人拒绝我的批评和建议，首先是起草行动纲领的想法，基本上未让修改报告。诺沃提尼相信会得到多数支持，

因此在讨论之后一般总是只嘟哝一声："通过。"对我和其他人的建议未进行表决，我想不起有谁支持我。

捷共中央会议于1967年10月30日星期一开始举行。诺沃提尼宣读应代表整个主席团意见的报告。在他讲话之后像往常一样就宣布会议是不公开的，这意味着记者或来宾不能出席。讨论开始了，我是头几个发言者之一。

与特别是出现在西方的对我的讲话的许多报道不同，我未对诺沃提尼进行任何轰动性的攻击。我只重申在主席团10月19日和24日会议上所讲的几点。我要求大大改变党领导社会事务的方法，指出党的领导需要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

我触及了对待斯洛伐克不好的问题，但这不是我讲话的主要意思。尽管如此，诺沃提尼及其盟友选择这一题目进行反击，以臭名昭著的方法指责我搞民族主义。我一讲完，诺沃提尼立即就进行干预。捷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马尔丁·瓦楚利克站到他一边，诺沃提尼曾把他培养作自己的接班人。瓦楚利克力图把我的讲话缩小为只介绍斯洛伐克情况，指责我有"民族主义倾向"。

幸而许多中央委员已理解，真正问题是在别的地方，我把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他们就直接斗起来。随后的讨论立即表明，分析真正问题的时机已多么成熟。在两天之中，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表示重视我的批评和论据，第一次使用"兼职"的提法。起初这意味着对诺沃提尼权力太大的影射批评，但很快就发展成为要诺沃提尼辞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明确要求。

这次讨论是此后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斗争的第一次公开冲突。我以非常感谢的心情，回忆起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①]的发言。

---

① 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1911—1974)，1944—1945年为捷共第四届地下中央委员，1945年起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1—1955年被监禁，1963年平反。1968—1969年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国民议会主席。

那是个因战时参加抵抗运动而在捷克地区受尊敬的人。他50年代初成为镇压的受害者，1967年担任政治上不太重要的水利部长的职务。他坚定地站在改革派一边，这在斗争刚开始时具有巨大意义。摩拉维亚的两位州委书记奥尔德日赫·沃列尼克和约瑟夫·什帕切克也坚决支持我的立场，其他许多中央委员也是如此。

在会议第二天，晚上七八点钟，传来布拉格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和警察对他们采取行动的消息。事件本身没有多大政治意义，因为大学生抗议的主要是宿舍断电。但我必须说，它帮助"搞浓"了中央委员会的气氛。

以后对诺沃提尼较严重的打击来临了。在会议闭幕时，多数人拒绝他及其助手起草的决议。中央委员们批评决议草案是表面的、不恰当的。中央委员会表决把它退回修改，12月份再提出来。类似事件在这以前从未发生过。诺沃提尼的威望正在下降，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信号了。我宁愿说，中央委员会本身对自己突然拥有的力量感到意外，领导的危机每个人都清楚。

于是，会议就以未得出结论而告终。第二天早上，诺沃提尼和其他主席团委员赴莫斯科参加布尔什维克革命50周年庆祝活动。这本身使正在展开的戏中断了。另一次中央会议要到圣诞节前夕才举行。但导致"布拉格之春"的事件已在发展之中，既不可制止，也不可扭转。

15

诺沃提尼不愿下台

诺沃提尼到11月10日才从莫斯科归来。正如我已提到过的，他不顾礼宾规定和我的地位，不带我去，而是带自己的“讨人喜欢的斯洛伐克人”胡吉克去。

诺沃提尼长时间在莫斯科逗留，引起国内猜测。他11月1日抵达那里，11月6日和7日参加庆祝活动，11月8日出席各国共产党会议。我们估计，他用很多时间等待同勃列日涅夫谈自己的国内问题的机会。但我们未了解到任何特别的情况。在他回国之后，我们被告知，他在莫斯科得了感冒，这也是对他未出席捷共中央主席团两次会议的说明。从1953年3月哥特瓦尔德在斯大林葬礼上得最后一次感冒时起，莫斯科感冒在捷克斯洛伐克享有特殊的声誉。

诺沃提尼不在时，党内私下主要谈论戏剧性的10月中央全会。捷克的一些中央委员，如约·斯姆尔科夫斯基、瓦·斯拉维克和弗·克里格尔等，同我们一起到布拉迪斯拉发谈谈。我们就基本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我看到捷共中央的改革潮流在加强。不过仍不能肯定，它是否会强大到足以战胜诺沃提尼的反抗。

诺沃提尼对捷共中央10月全会的反应是可预料到的。他成立了主席团五人小组，该小组的任务是调查我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是其简单化的斯大林主义思维的绝好例子。首先我应当被指责有思想倾向，然后要指出我的过错并给予处分（至少是警告），这就会成为撤销斯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充分理由。再后，诺沃提

尼终于可把胡吉克安插到我的职位上。

委员会由诺沃提尼、亨德里赫、胡吉克、萨博尔奇克和列纳尔特组成。当然，诺沃提尼挑选那些他认为最值得信赖的人。他显然相信，他能得逞。至于我，我想的适得其反，我是镇定的。诺沃提尼的思想至少落后十年。

10 月会议后，主席团内开始讨论"兼职"问题。当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有十名有表决权的委员。我们当中有四人，切尔尼克、杜兰斯基、科尔德尔和我，赞成把总统和第一书记的职务分开。在"杜布切克委员会"中，除诺沃提尼外，有亨德里赫、胡吉克和列纳尔特，他们是忠于他的。萨博尔奇克是主席团候补委员，无表决权。我还需要另外两名委员拉什托维奇卡和西穆涅克之一的一票或赢得诺沃提尼的一个追随者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这就会带来新的局面。起初，这看来是相当无望的。

奥塔卡尔·西穆涅克是多年主管经济计划的政府副总理，从1959 年起坚定不移地忠于诺沃提尼，因此我把他排除在外。可惜，我也不得不将拉什托维奇卡排除在外。博胡斯拉夫·拉什托维奇卡，捷克战前的老党员、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纵队成员，50 年代初躲过了落到诸如阿瑟·朗登（《自白》的著名作者）和其他国际纵队成员这样一些人物头上的斯大林主义迫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诺沃提尼的亲自保护，为此一直对他心怀感激。

因此，我把注意力放在伊日·亨德里赫身上，他近几年是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中的第二号人物。他被认为是诺沃提尼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据说已无更大的野心。10 月全会后，他表明支持诺沃提尼。

但我观察亨德里赫已有一段时间。他是个矮胖的人，带着粗糙的深色宽边眼镜，看起来像个上了年纪的乡村牧师。他长期是诺沃提尼的左右手、主要顾问及其讲话的起草者。不过，他又是

个奇怪的同盟者。与诺沃提尼不同，亨德里赫是个知识分子，他在纳粹分子1939年关闭查理大学之前，曾在该大学法学院读了几个学期。我感到，他外面披挂的教条主义盔甲不是没有裂缝的，他必定会算计，诺沃提尼的日子屈指可数。我看到亨德里赫在各种情况下犹豫不决，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

经过长时间考虑我得出结论，他是另一方惟一可击垮的人。我未低估困难，因为我知道，诺沃提尼和亨德里赫个人长期是亲密无间的。除了别的以外，他们一起在茅特豪森集中营度过漫长岁月。不过我也知道，奥·希克教授也曾接近过诺沃提尼（在茅特豪森甚至比亨德里赫更接近他），可现在坚决地反对他。这给予我以希望，亨德里赫可能转到我们方面。

一些历史学家后来猜测，我大概同亨德里赫达成协议，要他改变观点。事实是，什么协议也未达成，我只是往他的思想里撒下种子。

11月底的一天，我向科尔德尔谈对亨德里赫的估计。科尔德尔是个看法简单的人，完全不知所措。他看着我，好像我发了疯似的，并说道："即使只试图同亨德里赫谈此事也没有意义。诺沃提尼和他就像孪生子。无论什么时候你也改变不了亨德里赫的观点。你只能贻笑大方。"不过我相信自己的预感，从科尔德尔处直接到亨德里赫办公室去。他的办公室的门上亮着红灯，女秘书对我说："他非常忙，正在办一件又急又重要的事。"

"喏，我也有非常重要的事，"我说道，并直接朝着门走去。我打开门，走进去，随手关门。亨德里赫坐在桌子后面看某种文件。当他听到我走进去，他把圆脸转向我问道："你要什么？"

虽然他指给我一个地方要我坐下，我还是站着，我向他保证，我待的时间不会长。然后，我就开门见山。我说："正如我们两人所知道的，第一书记职务和总统职务分开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我突然想到要问你，你是否对这两个职务之一感兴趣。"他看样子

就像刚刚挨了一记耳光的人，被打蒙了，又保持这种僵硬的姿势一会儿。我意识到，他大概真的从未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当他喘过气来，我继续说道："不论如何，情况必须解决。的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撤换总统是困难的，因而这里指的是第一书记职务。你对此不能阻挡，如果你反对，你也可能下台。"

他一直什么也没说。当我离开时，我只看见，铅笔从他手指间慢慢滑落下来。"我至少往他脑袋里塞进一只屎壳郎，"我想。

我真的给他塞进屎壳郎。

我闯入亨德里赫办公室之后不久，12 月 5 日，诺沃提尼给我送来正式通知，说我应该到调查我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委员会去，并给我一份我应回答的问题清单。这些问题听起来像党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训练班结束时的考试。如果我们考虑到正在迅速变化的政治气候，整个案子是可笑的。它缺乏现实基础，也违背党章。

当我出现在委员会面前，我立即就发现，多数委员对整个行动并不很热情。只有胡吉克完全支持诺沃提尼。出乎我的意外的是，萨博尔奇克未出席会议，列纳尔特未参与交锋，只提了几点形式上的看法。当然，我想了解，亨德里赫有何作为。他至少三次擦眼镜，提出许多看法。但看起来完全是无所谓的，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总的是中立的。我知道，诺沃提尼必然感到愤怒，这使我相当开心。

尽管就审问我作出的结论不明确，他们责成我回到布拉迪斯拉发后，向斯洛伐克的其他领导成员通报。第二天举行的斯洛伐克党的主席团会议，决定拒绝诺沃提尼的指责，只有胡吉克一人例外。这样事情实际上就告结束。

在这期间，诺沃提尼急忙要求勃列日涅夫到布拉格来，进行有利于他的干预。12 月 8 日，即斯洛伐克党的主席团拒绝对我的有倾向的指责那天，苏联领袖悄悄地来了。

我知道，勃列日涅夫来时是想支持诺沃提尼的。勃列日涅夫的一个顾问几个星期之后告诉我这一点。他也告诉我，他的上司如何改变看法。

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勃列日涅夫打听在布拉格究竟谁是第二号人物。有人告诉他，亨德里赫。他们也告诉他，根据来自大使馆的消息，"二号"坚定地支持诺沃提尼。

勃列日涅夫来时带着五人名单，他要同他们谈话。名单上有诺沃提尼、亨德里赫、列纳尔特、杜兰斯基和我。有人告诉我，拟就这份名单不是为了物色诺沃提尼的可能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毋宁说是故意挑选三名捷克和两名斯洛伐克的主席团委员，总的说来遵守礼宾规定。不多不少，仅此而已。

亨德里赫是勃列日涅夫在会见诺沃提尼之后，与之谈话的第一人，据我的情报员说，那使勃列日涅夫感到震惊。他要求亨德里赫告诉他，对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怎么看。出乎勃列日涅夫的意外，亨德里赫几乎没有开场白就答道："我愿意接任第一书记职务。"我不知道，他们接着讨论什么，但勃列日涅夫显然意识到，当诺沃提尼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也准备离开他，让他继续掌权已不可能。

我第二天在布拉格捷共中央大楼同勃列日涅夫谈话。(在西方传出错误消息，说勃列日涅夫到布拉迪斯拉发访问我)。会见持续了约一个小时。这可能比他同其他人度过的时间短，但我们不需要译员。勃列日涅夫要求我告诉他，我对局势怎么看，我讲了。我强调我们的问题的严重性和诺沃提尼不愿解决问题。我也提到诺沃提尼在我们两个民族关系问题上不能容忍。勃列日涅夫向我提了几个补充问题，但未透露自己的观点。我们未谈诺沃提尼的接班人问题。

我想，勃列日涅夫到达布拉格时，对我们问题的深度没有明确的看法。在同我谈话时，他也未表现出更多地了解这些问题的

特别兴趣。他听我说，但不提能帮助他理解争论的实质及其基本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的问题。我想，他把这看成党的高级干部之间的一团个人纠葛。而更糟的是，他及其政治局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对此有一定忽视。他们把我们的问题简单化，按照自己的做法把它们变为执政党的官僚的利益之争。

西方的消息中经常引用勃列日涅夫的话，称他在访问结束时说，取决于我们如何决定。那就是有名的："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是对谁说的。事实是他回避期待中的同整个主席团的会见。他于12月9日离开，诺沃提尼陪同他到机场。

勃列日涅夫所说的，终究没有他回避同主席团会谈那么重要，会谈时他可施加压力，以利于诺沃提尼。因此他访问的真正结果是，他未给予诺沃提尼以所期望的支持。我不怀疑，亨德里赫的立场对勃列日涅夫的影响比任何其它东西都大。

在这次失败之后，诺沃提尼也未投降。他又抵抗了近四个星期。12月11日，在勃列日涅夫访问后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像以往一样以一定力度继续进行。我注意观察亨德里赫，但他宁可说是消极被动的，没有转到另一方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拟议中的中央会议从12月12日推迟到12月19日，令人不快地靠近圣诞节。一些女中央委员抱怨没有时间烤制圣诞节糕点。

在12月17日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即12月全会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出现了突破。我发言说，只有四位主席团委员，即杜兰斯基、切尔尼克、科尔德尔和我，态度是明确的。这有点夸张，不过我要提出建议：所有领导成员包括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都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一建议未付诸表决就被通过。甚至诺沃提尼也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因为他显然希望多数人会支持他。

对领导成员发言，未规定什么先后次序。但当中央书记弗拉

基米尔·寇茨基开始发言时，重要的时刻来到了。寇茨基（与其他许多人不同）是个有学问的党的干部，他在纳粹占领期间参加了抵抗运动。他同亨德里赫非常接近，不同其进行讨论就做某件事是不可想像的。

寇茨基小心谨慎地开始发言，先说明他如何注意听取讨论。然后他说，当他对此进行了彻底分析，他相信，不能回避把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职务分开的问题。

我看到，在寇茨基发言结束时滚过一股惊讶之浪，我不怀疑，这只不过是亨德里赫发言的开场白。紧接着那事就发生了。亨德里赫未使人失望。他强调，把职务分开是不可避免的。猫终于从口袋里放出来。主席团分成五对五。决定必须在捷共中央会议上作出。

中央委员会会议于 12 月 19 日开始举行，列纳尔特作关于经济状况的报告。但每个人都在等待称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改组”的第二项议程。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应由诺沃提尼作。

他为在 10 月会议上对我的攻击进行辩解，把自己说成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友谊的主要捍卫者。然后他开始宣读充满一般辞令的报告，如关于“对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那显然是诸如此类的暗示：在斗争中间不应当换马。

但是，中央委员会对此不喜欢，四面八方的叫声打断诺沃提尼的报告。接着进行激烈的讨论，有些发言者直接呼吁诺沃提尼下台。第二天讨论也继续进行，已完全清楚：诺沃提尼正在失去多数的支持。

会议又延长一天。当时，12 月 21 日，所有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都被要求表明自己的看法。在这个 15 人的小组中，只有四人继续支持诺沃提尼，即拉什托维奇卡、西穆涅克、诺沃提尼的两位不那么著名的拥护者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罗斯拉夫·帕斯蒂日克和中央监督与检察委员会主席帕维尔·赫隆。反

对的人中最重要的是马尔丁·瓦楚利克。

在这样的事态发展之后，诺沃提尼终于让步，接受把两个最高职务分开的原则。具体地说，他把第一书记职务交给“中央委员会安排”。

关于由谁接替他担任这一职务，暂时未谈。中央委员会选举12人顾问小组，帮助主席团挑选候选人。小组由各州委的领导人组成，由代表中捷克州党的组织的扬·皮列尔主持。然后，中央委员会把会议推迟到1968年1月3日举行。这是较多中委非常不愿接受的决定，因为他们担心诺沃提尼可能采取非法方法保自己的地位。

这种担心真的是有根据的。可能在诺沃提尼知晓的情况下，还在中央会议举行的过程中，就制定有国家安全局和军队一些部队参加的政变计划。

中央机关第八部是这一活动的中心，它主管安全和武装部队部门。其领导人是诺沃提尼的密友米罗斯拉夫·马穆拉。据说该部拟定了诺沃提尼的几百名反对者的名单，政变开始后国家安全局应立即将他们逮捕。

国防部党委书记扬·谢伊纳将军准备搞同样的活动。谢伊纳是受诺沃提尼保护的人及其儿子的私人朋友。在谢伊纳1968年2月逃到西方之后揭发出来，他也是个盗贼，偷偷在黑市上出售军队储备的草籽和苜蓿籽。谢伊纳力图争取国防部主要的党委支持诺沃提尼。他终于在1968年1月5日得逞，这是个讽刺，不过其时斗争已告结束。

不清楚谢伊纳是否也卷入总参谋部某些军官试图派坦克部队到布拉格，支持马穆拉策划的政变一事。关于所有这些计划的秘密协议未得到证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名有影响的大将、中央候补委员里季日和赫奇科支持诺沃提尼直到最后，内务部长约瑟夫·库德尔纳也是如此。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某些将军，如楚尔、

佩皮赫和普尔赫利克，因作出制止阴谋的勇敢努力而值得感谢。后来我提议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军事和安全职务。

幸而政变活动未能挽救诺沃提尼，可能他自己最后将其撤销。这一切太可笑，军事政变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先例，首先改变不了共和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不过，中央12月和1月会议之间的时期的确充满紧张，流传各种传说。我同家人一起在布拉迪斯拉发度过圣诞节，不排除典型的凌晨两点多撞门的可能性。

捷共中央主席团1月2日在上面提到的顾问小组出席的情况下举行会议，以准备将向计划于翌日召开的中央会议提出的建议。诺沃提尼仍在玩弄手法。他原则上已接受职务分开的原则，现又要求将其接班人的选举至少推迟到2月底。诺沃提尼的拥护者显然把推迟理解为使他保留原职的又一方法。同时，主席团像以往一样仍是分裂的。会议持续了十多个小时（几乎开到夜里一点多），表明不能解决问题。

但正如随后两天当中中央会议上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压力增长了。诺沃提尼直到1968年1月4日晚上主席团会议期间，才终于开始让步。这次会议是在顾问委员会缺席、但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诺沃提尼要求所有与会者写出在选举第一书记时他们可能支持的人的名字。

在这一时刻之前，我未估计到我要接替诺沃提尼。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适当分配最高职务的原则尚未固定下来，迄今为止的做法对我宁可说是不利的。总统、总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议会主席四个最高职务中，只有一个由斯洛伐克人列纳尔特担任，他当时是政府总理。因面我估计，捷共中央新的第一书记又将是捷克人，只要他是赞成改革的，如切尔尼克，我不反对。我也提议由他担任，但他连仅仅考虑一下也加以拒绝，而倾向于继续在政府工作。

我是否觉得适于担任这一职务，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意识到第一书记的巨大责任。我已从党的工作和公共管理工作中获得足够的经验，能理解这一点。我的首要目标之一，是大大减少党对政府日常工作的直接干预。我想以此为改革开辟道路。

统计诺沃提尼要求进行的“试验性表决”结果，表明我处于领先地位。在与会者之中，倾向于选拉什托维奇卡的四人，选切尔尼克的也是四人，选列纳尔特的六人，选我的七人。他们把这一结果交给顾问小组，该小组接着对此进行讨论，通宵达旦。

主席团和顾问小组1月5日早上8时又举行会议，提出列纳尔特和我两名候选人。经过相当短时间的讨论，决定性多数选我为惟一候选人，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最后，诺沃提尼也不情愿地接受这一决定。捷共中央全会通过该建议，于是我就当选为第一书记。

有时有人带着微笑和讽刺意味提到，我在上述会议上的闭幕词，不论是就内容还是就语调而言都太有礼貌，我还感谢诺沃提尼所做的工作。不过我倒想问：“表现得文明难道不好吗？”

中央委员会决定扩大主席团，增加四名新的委员，扬·皮列尔、约瑟夫·博鲁夫卡、埃米尔·里戈和约瑟夫·什帕切克当选。这是个重要步骤，因为它打破党的最高机关的平衡，以利改革。当选者之中，谁也没有改革反对者的名声。

这些事件后来称为“一月事件”，它为“布拉格之春”打开大门。我有这是个历史性时刻和它带来诸多可能性的强烈感觉。但我当时尚未看到遥远的地平线上的巨大而可怕的障碍。我在1968年1月还未想到，我们20年后所要达到的。

后来关于我如何接管诺沃提尼在党中央大楼的办公室的方法，出现了不真实的猜测。那不是未经考虑的事。在我1968年1月5日当选之后不久，我同诺沃提尼讨论了就任的技术问题。我们弄清了整个做法。我保留说，作为第一书记办公室组成部分的

所有文件和卡片留在原地，进行登记。我对诺沃提尼说，他可带走一切私人物品。他应于1月8日前迁出，他的人和我的人参与搬运。我对诺沃提尼有礼貌、怀着应有的尊敬，他毕竟还是共和国总统。

说我给予诺沃提尼以从其办公室转移某些秘密卡片的机会，这是不对的。通过严格的警察检查，可把他的私人物品同正式文件分开，不过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想避免这么做，并且，他从办公室拿走的不多。我相信，他的多数档案已在总统办公厅。

1月8日之后，诺沃提尼在党中央大楼已没有自己的房间。他的惟一办公室在赫拉德昌尼，在总统府。

当一切都办完了，我非常疲惫地回布拉迪斯拉发。那是午饭后不久。我从来也不需要睡很多觉。但我需要摆脱前几天和前几个星期的紧张。我直接回家。我稍微睡了一会儿，同妻子和孩子们度过一段时间。晚上，我去看在布拉迪斯拉发冬季体育馆举行的冰球比赛。那是个好主意。比赛令我喜欢，在欢呼的人们中间我觉得挺好。

16

越过障碍

“布拉格之春”的早期（1968年1月和4月之间）是许多评论性分析的对象，但我所阅读过的，都得出两个相反的结论。一些作者说，我走得太慢，而另一些又称，我走得太快。他们所用的时间跨度，是从我上任到苏联入侵之间的一段时间。

我的问题是，我没有水晶镜片可预见俄罗斯的入侵。在1月和8月20日之间，我实际上一刻也不相信，那会发生。因此，回过头来看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即使我在近25年之后回顾，也看不出，我可以或应该采取别的做法。

那短短的八个月的每一天，我必须注意斟酌所有冲突情况，并据此制定自己的下一步战略。党的领导机关主席团、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力量平衡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除此以外，还有一直重新出现的公众舆论，它很快成为对我的政策的最重要支持。可惜，在我能充分有效地把这一杠杆用于加速发展之前，苏联当权者就先进入这一领域。不可否认，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早在“五国集团”进行入侵以前，就已经是个不断阻碍的因素。

另外，我必须提到，在1968年1月5日之后，我在扩大了的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也尚未拥有赞成改革的多数。迫使诺沃提尼离开第一书记职位的联盟的组成复杂得多。在支持搞掉诺沃提尼的人当中，许多人对进一步的改革步骤没有准备。这我意识到了。

在1月份主席团的几次会议上，气氛沉闷，讨论限于技术问题。那些在以前的争论中互相反对的人，盯着自己对手的下一步

行动。这是暂时停火。

1 月 5 日补选的主席团四名新委员所能提供的帮助不明显。在最后几场斗争的过程中，他们都坚定地反对诺沃提尼，但当他们应该支持富于原则性的改革政策时，我能肯定的只有其中的约瑟夫·什帕切克和约瑟夫·博鲁夫卡两人。给我以影响的尤其是什帕切克，他是南摩拉维亚州党委书记，是个有学问的人。作为州委书记，他的政治基础牢固。博鲁夫卡基本上也赞成改革，但他作为农业社主席，政治基础比什帕切克差。

至于说到前政府副总理皮列尔，他过去动摇不定，我不能完全肯定，其罗盘将来把他带到何处去。他最后在 1968 年 8 月的关键时刻表现得如此勇敢，令人惊喜。

第四个人埃米尔·里戈当时是斯共东斯洛伐克钢铁厂委员会主席，情况更复杂。就出身而言，里戈是个茨冈工人，不过他有不可否认的天生智力，毕业于捷共中央高级政治学校。他同强硬路线的捍卫者瓦西尔·比拉克关系密切。里戈参加了反对诺沃提尼的斗争，但在 1968 年 1 月以后显示出不愿支持实际改革的迹象。因此，开始决定新的政治方针时，主席团增加这四名新委员并未增添多大份量。这只表明，我必须穿过怎样的密林。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当我未意识到苏联人向诸如科尔德尔和比拉克这样的人施加压力时，某些以前的盟友支持不够干扰甚至迷惑了我。他们两人，但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是成长在一切无疑服从苏联的环境中的人。他们无任何可同我相比的经历和家庭背景。按其标准，除了苏联、列宁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外，社会主义根本不存在。正如比拉克回忆录最终所证明的，对苏联方法（过去的或现在的）的任何怀疑，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想像的。当对我的政策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持有异议的苏联领导人走近这些人时，他们“脚后跟碰得直响”，遵从苏联人的“劝告”。

根据现在可看到的各种文件，比如苏联集团外交官从布拉格

发出的信件判断，我们可以推测，苏联领导人在 1968 年 2 月初以前就已开始施加压力。在以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他们对我国事务的干涉日益明显和富于侵略性。我很快就发觉，科尔德尔和比拉克只不过重弹勃列日涅夫的论调，有时是逐字逐句地重复。

但是，党的其他许多较高级干部的不受欢迎的表现，不仅仅同苏联的干涉有联系。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明显，许多干部将失去自己的地位和特权。因而，他们不同意变革只是自我保护的行动。

无论如何，主席团的最初情况使我不能采纳较激进的建议。我越来越指望党内特别是公众的压力日益增长，它迟早将使反对派软下来，然后使我能对主席团的组成进行建设性的变动。

流行重感冒也使我最初几个星期的行动放慢下来，我实际上在 1967 年 12 月就感冒了。以后好几个星期好不了，2 月底我必须履行异常重要的公务，可是又患了。

我需要征得主席团同意的最重要的事，是尽快通过行动纲领，我从 1967 年年中就致力于此，但徒劳无功。行动纲领应提出党和社会民主化的新方针。其实质是最准确地确定党及其机构的作用，限制党的专制权力，提高其对公民需要作出反应的能力。

我 1967 年 10 月第一次使用行动纲领这一概念时，远未表达一切。在 1968 年 1 月的变动之后，我也不能公开表达自己关于限制党的活动范围的构想。我不能太早唤醒保守分子。我必须小心地选择词语和步骤。甚至在列宁的著作中党的作用也常常以矛盾的方法进行解释，这使我略为轻松些。尽管如此，我知道这将是纲领最敏感的部分。

但行动纲领也必须为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和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恢复名誉而斗争，提出其他重要社会问题，包括国家联邦化问题。在我当第一书记以前，无论其中的什么也不能直截了当地做。上任后紧接着也不行，因为旧的工作方法仍延续下来。首先我需

要通过要求党的主席团批准成立行动纲领起草委员会，使制定这样的纲领的想法本身合法化。

我在当选之后不久就提出建议。我提的理由是，1966年党的“十三大”的文件已呼吁成立这样的委员会和制定这样的纲领，并且幸而提法很一般，允许作非常灵活的解释。事实表明，这是使人接受这一想法的适当途径，因为成立委员会的建议在主席团未遇到任何大的反对。于是1968年1月中就成立起草行动纲领草案的特别委员会。

很快开始反过来反对我的德拉霍米尔·科尔德尔，担任工作委员会主席，不过起草行动纲领本身需要大批专家参与，我非常了解，他们都是改革的热心人。

委员会成立五个有特定任务的工作小组。最重要的小组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和拟定经济改革构想。关于这一工作的进展的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在1月24日党的书记处的会议上就听到了。只是从后来事态发展的观点看我意识到，在同诺沃提尼的漫长斗争中浪费了许多时间。制定行动纲领是个复杂而敏感的任务。光拟定其构想就需要几个星期。其间，社会运动越来越开展，行动纲领在其影子下可能使人觉得比实际的还平常。但这是肤浅的看法。行动纲领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之春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我当选后两个星期社会中的政治事态发展，也因关于最后三次中央会议的具体消息不多而加速了。不论是放宽官方报刊，还是传达党内消息，都做得不够。发表党内消息是由中央的一个部准备的。它按老的制度工作，公布消息被认为是个形式。因此，原来诺沃提尼的失败看来不可能时编发的消息不能用，另一种说法的消息不得不赶写，到最后一刻才写好。

在我当选之后接着举行的主席团最后一次会议上，没有时间讨论这一问题。此外，还就如何说明把总统和第一书记两个职务分开的方法进行争论。因此，在报刊上除了说诺沃提尼下台、我

被选到其职位上以外，几乎未出现任何官方消息，如果我们考虑到关于这次事件流传的传说，所登的消息少得可笑。不论如何，事情传到公众中去了。我本人要求发表进一步消息。但主席团在这一问题上未能迅速达成有效的协议。多数人仍然相信，可把关于党的事务的消息保持在现有的范围内，我也未足够估计到这一问题的意义。

挺自相矛盾的是，围绕诺沃提尼弃职的片断消息从长期的观点看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们引起成千上万个党组织的激烈批评讨论，调动了一大部分普通党员的积极性，他们在过去几年多数是消极的。很快也激发了公众健康的好奇心和兴趣。

10月、12月和1月中央会议的参加者亲自向全国党组织作报告。报告人来自州县党组织和中央政工干部团，来自政府各部门、军队司令部和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

这些消息的数量和准确性因其原本来源的不同而不同，也因解释的不同而不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月中在西方发表了关于最后三次中央会议的详细而比较准确的消息，包括关于失败的政变的消息。自然，这些消息通过外国广播迅速传遍全国。

党的无数会议通过决议，对消息好像是配给的表示巨大不满。决议批评消息太简短、含糊不清，要求对发生的事件进行充分公开报道。我利用这种愤怒，在主席团1月25日会议上建议大大改变对党的最高机关的活动的报道制度。我提出定期发布关于主席团和书记处一切会议的消息的建议。由于社会上掀起愤怒之浪，主席团不能拒绝这一建议，而在几个星期之前它肯定会这么做。

至于其它方面，我1月份只在拟议中的改革方面采取了最初的一些小步骤。我发起撤销米罗斯拉夫·马穆拉的中央机关主管安全和军队的第八部部长职务，以迄今为止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的忠诚的、拥护改革的瓦茨拉夫·普尔赫利克将军取代他。我也要求亨德里赫同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就撤销对

它及其一些会员的镇压措施达成协议，这些措施是他和诺沃提尼1967年发动采取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会谈在1月中就开始进行，但亨德里赫将其又延长--个月，直到捷作协周刊能重新出版。大众传媒的公开性迅速增长，捷克地区特别明显的正式新闻检查迅速放宽。

我反对以前强硬路线捍卫者所要求的重新巩固新闻检查。我知道新闻自由是需要的，它可帮助为基本政治经济改革开辟道路。3月初，我在主席团达到将使1966年起实行的新闻检查合法化的决定撤销。正在形成的公众舆论也帮助我把亨德里赫清除出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新闻界。

1968年1月10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给我送来勃列日涅夫的对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的邀请信，访问应在1月29日和30日进行。这是不可避免的，虽则邀请不是完全受欢迎的。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火星上！

我反复考虑，我到莫斯科时，对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袖说什么。我愿意同苏联集团其它国家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的领导人交换观点。幸好恰巧在那个时候匈牙利共产党第--书记亚诺什·卡达尔给我打电话。他建议我们尽快会晤。我立即同意。我们1月20日在斯洛伐克南部的诺维-扎姆基举行会晤。

那是没有其他干部参加的非正式会晤，我们对所谈的未作记录。我们互相通报两国的情况，看来卡达尔对我的计划非常感兴趣。

卡达尔当时56岁，比我年长十岁，我想他对斯大林主义体制的经验，将帮助他理解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所面临的问题。拉科西那时错误地指责他搞所谓阴谋，这个阴谋后来又同我国的斯兰斯基丑闻联系起来，他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年，到1954年才为其恢复名誉。在1956年镇压匈牙利起义之后，苏联人利用他作为傀儡政府人物。但他很快获得所需的可进行较成功的有限改革尝试的

回旋余地。

我注意地观察卡达尔从1956年灾难起指导匈牙利经济改革的方法，并为此而敬重他。我相信在苏联集团所有领导人之中，他可能最倾向于我的观点和打算。他的谨慎支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如此，我在这上任的早期阶段决定小心行事，只向他介绍计划的一般轮廓。我不怀疑他不真诚，但我认为多听比多说明智。不过我并不隐瞒，我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大改革为时已晚得多。

看来卡达尔理解这一点，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友好地告别。晚些时候他令我深为失望，因为他缺乏更大胆地支持我国改革的勇气。他可能害怕，这样惹火苏联领导会威胁到本国的改革。后来，当我1968年8月以后获悉，卡达尔在同我会晤之后立即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向他详细通报我们讨论的情况，失望就变为痛心。因此我现在觉得，同我会晤的倡议可能不是出自卡达尔，而是出自勃列日涅夫，匈牙利领袖驯服地继续走在这条从克里姆林宫拉出来的钢丝上，直到8月入侵。每想及此，令人不快。

我1月29日赴莫斯科。只有我接到邀请，但我需要一名助手，于是我随身带中央书记处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是一次礼节性访问，不过没有隆重的仪式，对我们的会谈不作记录。我首先会见勃列日涅夫，然后会见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苏联领导所有年纪较大的成员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苏斯洛夫、基里连科和谢列斯特都在场。

勃列日涅夫要求我说明，我如何看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形势，我的政治计划怎样。当然，我事先对此作了精心准备，谈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不再补充。

首先我试图阐明我国两个民族的历史条件和当前条件，并说明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早已工业化——至少在其西部地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我国社会习惯于现代政治机构和政

治文化已数十年。我努力说明，现存的政治体制不符合我国的条件，导致日益增长的紧张和冲突，而这是停滞和当前危机的根源。社会主义制度要在捷克斯洛伐克有效地运行，变革和纠正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我小心地避免使用“改革”、“改革的”概念，更不必说“修正”的概念了，它们会增加这些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者的敌意。我代之以不断使用诸如“恢复”和“搞活”这样的词语，我知道这些词语不会同过去可能使人想起的任何罪孽异端联系起来。我也未引用马克思关于俄国不宜作为一个适于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论述。

尽管如此，当我看到那些呆板而阴郁的面孔，我就意识到，在这里难于找到理解。这些人对我来说太固执了。与革命后的早期努力不同，后期的斯大林主义在对其它国家的关系中采取自我欺骗的高人一等特别是傲慢的态度。斯大林的继承者像“大师”本人一样相信，对他们来说好的东西，对每个人来说也必定是好的。这一信念在他们的集团中把任何别的不论如何合理的论据都变成完全是多余的。

对苏联的这种固执，我的确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但我认为那不是如此无望的。我试图最有说服力地向他们保证，我们所计划的，不是反对苏联和华沙条约的利益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我们要做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特殊情况所要求的。仅此而已。最后，我要求理解。我们所需要的，是他们不要妨碍我们整理自已的房子。正如我所说的，这应当理解为符合苏联的利益。

他们说得不多。但我感到，我努力向他们说明的，同他们乐于听取的不相符。尽管如此，他们尚未表露公开分歧。对其它问题未进行讨论。肯定未像勃列日涅夫稍后所声称的那样，谈了干部问题。

第二天我回到布拉格，在桌上发现又一封同卡达尔会晤的邀

请信。我像上次那样，赶快安排于2月4日举行会晤。我们甚至会见了两次，一次在科马尔诺，即在边界的我国一方，另一次在科马罗姆，即在多瑙河的匈牙利一方。第二次会晤时，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家参加，卡达尔较详细地询问我们的改革计划。议程上也有某些较小的双边问题，不过我认为从卡达尔方面来说，这主要是又一次试探。

一般地说，这是非常活跃的外交季节，因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也几乎同时建议举行会晤。我们2月7日迅速在俄斯特拉发举行会晤。

我认为哥穆尔卡是个应几乎像卡达尔这么理解我们的问题的人。在纳粹占领期间，他在共产党地下抵抗运动中进行活动，解放后到1948年担任波兰共产党总书记。1949年成为斯大林主义清洗的牺牲品。他不像卡达尔那样被监禁起来，而是被开除出党，成为"不公开露面的"人物，直到1956年民族运动把他重新抬出来掌权。

1968年哥穆尔卡60多岁，我知道他未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拥护者的希望。但我不知道，他如此毫不让步地反对我国的改革。这我到后来才弄清。在我们会晤的正式部分，负责国际关系的捷共中央书记弗拉基米尔·寇茨基陪同我。我以在同卡达尔会谈时使用的非常相似的语言，向哥穆尔卡介绍我国的改革计划。

晚餐后哥穆尔卡提议，我们两人出去走一走。我们穿上大衣，在不远处的足球场周围散步，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懂波兰语，但哥穆尔卡也说俄语，因而我们沟通没问题。我告诉他，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取政权之后不久，进行了许多镇压，制造、犯下可怕的冤案和罪行，尚未纠正。全国像在巨石重压之下呻吟，同时我表示相信，他对此可能比未经受过的人更理解。

他低声说，他理解。我继续说道："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暂时还未通过决定，但我对你所谈的，我在脑子里已考虑很久。我决心

尽最大努力消除所有这些罪行和冤案的后果，不管受害者是共产党员、非党人士、军人、老百姓、游击队员、宗教界人士、男子、女子、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或其它少数民族成员。我相信，这是改革和民主化不可避免的第一步。我们要恢复党和社会之间的信任，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哥穆尔卡未立即回答。沉默片刻之后，他问这在我看来涉及多少人。

“好几千，”我说。“在第一阶段，我们将吸收检察院、法院、议会委员会、党的机关和人民委员会参加。在第二阶段，接着要进行的还有法院之外的恢复名誉。”

“你这指的是什么？”哥穆尔卡想了解。

“我这指的是，”我说，“为数众多的人，他们从未被送上法庭，但是受到以各种多为非法的方法进行的迫害。”

哥穆尔卡又不作声。最后他说：“我在道义和人道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点。但我担心，这一切会带来无法控制的政治后果。这可能会破坏党的地位。”

我就此对他说道：“我期待，通过把党置于新的、民主的基础之上，来恢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信任。”

哥穆尔卡又说：“是的，但是……”

我们表面上友好地告别，但我不免怀疑，他也急于向勃列日涅夫通报我对他所说的话。毫无疑问，他未能越过可允许他考虑下述可能性的界线：共产党有时可较长期地得到公众的支持和信赖。当然，与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在波兰这种情况是难于想像的……

出访莫斯科和同卡达尔及哥穆尔卡会晤，是从诺沃提尼下台到4月要到来的突破之间的活动。现在还只是2月，地上有雪，但就政治而言，正好是早春解冻。可惜，这很快就要改变了。

17

德累斯顿会晤

同哥穆尔卡会晤后两个星期，捷克斯洛伐克二月政变20周年到了，鉴于有关情况必须进行相应的庆祝。苏联集团所有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受到邀请。早在筹备期间勃列日涅夫就打电话给我，建议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最高领导人都参加这次庆祝活动。

我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但我承认我欢迎其倡议。这些领导人出席为我们提供机会，向他们保证我国的改革不会危及其战略利益。表面上也许将表明，他们间接赞同我们今后的步骤。

因此，我对勃列日涅夫的建议表示同意。他说，他将告诉其他领袖，包括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其他领导人。“社会主义阵营”同铁托的关系当时相对来说是好的。最后，正好除了铁托派自己的代表弗拉霍维奇以外，所有的总书记都来了。

在举行这种仪式时，讲话者事先交换讲话稿是个惯例。因此会面的前一天，我们把我的讲话稿送给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所有领袖。我在讲话稿中谈到改革纲领草案的主要原则。我使用了谨慎的提法和一般的词语，不过我努力使主要思想不被冲淡。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将当着勃列日涅夫的面表达出来，这将自动地使它们比较易为我在主席团的反对者所接受。

由于这是庆祝的场合，聚在一起的领袖们背后不带一般的官员。喜欢歪曲文件的顾问小组行政人员不在身边。时间也少，这也是好的。

列·勃列日涅夫几个小时后就把我的讲话稿退给我，只对两

段持有异议，这两段比其它部分说得明确。当我把它们重读一遍，我满意地发现，删去这两段不会削弱任何一个重要思想，于是我就毫不痛惜地将其删掉了。

庆祝活动以通常枯燥的方式进行。惟一拉不和谐弦的是东德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他在总统府的晚宴上公开批评我国的经济改革计划。这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即便如此，谁也不把乌布利希看作经济专家。

当时在我国国内政治生活中，迅猛燃起令人震惊的大丑闻谢伊纳案。捷共国防部主要委员会书记扬·谢伊纳将军是诺沃提尼在12月和1月中央会议期间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但军事检察官办公厅搜集的证据证明，谢伊纳在黑市上出售军队储备的草籽和苜蓿籽，开始对他进行刑事追究。

我未过问此事，因为它以正常的符合法律的方法进行。我只能想像，假如诺沃提尼还在掌权，谢伊纳及其亲密朋友诺沃提尼的儿子就容易把丑闻压下去。现在情况不同，检察官履行自己的职责。谢伊纳及其偷盗种子的罪错已不能逍遥法外。

但司法之轮转得非常慢。在二月事件周年庆祝活动结束之前，谢伊纳带着情人逃往西方。关于他出逃的消息很快就上了全国报纸的头版。这已没有新闻检查官来加以制止。

的确，谢伊纳同共和国总统家庭的联系是丑闻最敏感的部分。传媒很快就开始要求诺沃提尼也辞去其总统职务，对其最著名的追随者的辞职压力也增长了。

产生了新的广播和电视节目，这些节目鼓励听众和观众参与播放。成千上万人特别是青年人参加的公开集会，大大扩大了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政治气候在几周之内戏剧性地改变了，从我的观点看，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削弱党的主席团中的保守派。

我与自己的同事一起，决定立即利用这一情况，在3月14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为成了过去镇压受害者的一切公民全面恢复

名誉的建议。讨论时未出现任何直接反对。形式上虽未举行表决，我认为建议获得通过。政府相应机关接受了颁布所需法律措施的任务。主席团也通过行动纲领的最后一稿。该纲领还需要由4月初举行会议的中央委员会通过。

这一时期在党的机构、社会和国家组织中进行了许多重要干部变动。在瓦西尔·比拉克1月中身居斯共中央第一书记职位的斯洛伐克，公众要求我长久以来的对手和诺沃提尼的盟友米哈尔·胡吉克下台。1968年初他仍担任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但3月中就不许他自愿下台，而是将其撤职。

搞掉改革最著名的反对者的压力不断增长。公众要求撤销约瑟夫·列纳尔特的政府总理职务以及工会中央理事会、捷青年联盟、捷克斯洛伐克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其它机构领导人的职务。在公开要求诺沃提尼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的同时，也对总检察长、国防和内务部长和身居要职的其他官员提出尖锐批评。

新的公开性精神也使斯洛伐克重新要求修订1960年宪法和恢复斯洛伐克民族机关和机构的应有作用。在捷克斯洛伐克之春时期，国家联邦化逐渐成为斯洛伐克最优先的要求。国民议会1968年3月的决定重新承认布拉迪斯拉发为斯洛伐克首府，是这方面的重要一步。

这些事情的发展开始产生日益重要的国际后果，引起华沙条约盟国的不安。尤其是瓦尔特·乌布利希及其政治局开始对我国1月以来实行的变革坐立不安。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的国内局势，他们的反应是可以预料到的。对苏联领导来说，还有其它因素。

在诺沃提尼及其两位前任时期，苏联人可以各种方法控制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和秘密警察。他们也拥有批准关键性职务的"权利"。但3月中他们意识到，可能不经他们同意，就可能将亲近他们的人一脚踢开，并以其他人取而代之。因此，他们显然就决定进行干预。我回过头来估计他们是在这个时候采取这一步骤

的，是因为在3月6日至7日在索非亚举行的、我同政府总理约瑟夫·列纳尔特、外交部长瓦茨拉夫·戴维和国防部长博胡米尔·洛姆斯基将军参加的华沙条约会议上，还未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在这次会议上，谁也未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形势。会议像通常的那样进行。惟一不受欢迎的声音，是罗马尼亚对华沙条约机制运行的批评。

批评者自然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我非常注意听他的讲话，悄悄并毫无保留地赞同其观点。最使齐奥塞斯库难受的是苏联全面控制华沙条约，不让其它盟国参加最高司令部。我们最终显然也会提出同一问题，不过我们1968年3月首先面临的问题与齐奥塞斯库不同，国内改革对他来说意义不大。此时此刻在此事上出面支持齐奥塞斯库，会被立即解释为捷克斯洛伐克不履行华约义务的迹象。我知道，这就会是个策略错误。因此，我想在这里指出，不管在以后年代发生什么，齐奥塞斯库当时采取独立态度，需要很大勇气，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在对我国形势的态度上，苏联领导显然决定在索非亚会议举行日期和3月16日之间对我施加直接压力。勃列日涅夫邀请捷党政领导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特别的是，他未提出任何日期。但我后来觉得，苏共政治局当时尚未完全商定，怎么同我们会谈。这一估计正确的证据是，我收到勃列日涅夫邀请信之后两天，我国国防部长洛姆斯基将军也接到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邀请。格列奇科要求洛姆斯基率领捷克斯洛伐克军事指挥代表团到莫斯科。当洛姆斯基问我对格列奇科元帅的邀请怎么办，我劝他暂时不要接受邀请。我想等到预计将举行的最高级会晤。还在原来的双边会晤日期能加以确定之前，勃列日涅夫就打电话给我，把双边会晤改为邀请东欧各国领导人代表团到德累斯顿参加会晤，会晤应于3月23日举行。我问他会晤的议程如何，他回答说，我们将讨论集团内部的经济合作问题。我们进行准备的时间较少。

在会晤之前，我再未从勃列日涅夫或集团的其他领袖那里得到任何进一步的消息。我们组成代表团时，考虑到要讨论经济问题，代表团成员除我以外有政府总理约瑟夫·列纳尔特、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负责国民经济计划的中央书记德拉霍米尔·科尔德尔和斯共中央第一书记瓦西尔·比拉克。

德累斯顿以艺术珍品、建筑和电车闻名于世，据说坐一小时电车可治愈肾结石。在盟国1945年2月进行大轰炸之后，这些吸引人的景观保存了多少，我当时未见过。乌布利希的殷勤款待不包括参观名胜古迹。我应当补充说，一切都是纯粹的交易，突然的交易谈判。

但会晤开始后，我很快就发觉，勃列日涅夫在两件事情上欺骗我。首先，不是所有东欧国家都出席。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都不在场，后者一般至少派观察员参加整个集团的经济问题会议。其次，正如事实所表明的，在议程上也没有经济合作问题。

瓦尔特·乌布利希致开幕词，不谈五年计划和其它经常谈的话题，而是说要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对勃列日涅夫愚弄我，我气得要站起来退场。但是，我强迫自己冷静和等待。

后来我读过一篇批评文字，说我到德累斯顿去参加成立"五国法庭"的会晤。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的确依然存在：在已经清楚他们欺骗我的情况下，仍坐在那里是否错了。我迄今为止对此不能完全肯定，但事实是德累斯顿会晤并未创造什么"模式"。既未进行什么审讯，也未作出判决。那里有控告人，也有对指控的批驳。不多不少，仅此而已。我相信，会晤的意义后来被夸大了。

在乌布利希的开幕说教之后，勃列日涅夫讲话。接着，哥穆尔卡、卡达尔和日夫科夫讲话。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有厚厚一本捷

克和斯洛伐克报刊的剪报。他们不时从其中挑出“合适的引语”，想以此说明自己感到愤怒的理由。他们以不同的力度攻击我们对我国局势“失去控制”，允许观点多样性，这在他们看来近乎“反革命”。他们也夹杂提醒注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威胁”。

我遗憾地注意到，哥穆尔卡提出最尖锐的批评。乌布利希稍微不那么傲慢。勃列日涅夫戴上焦虑的父亲的面具，但实质上像哥穆尔卡或乌布利希一样刺人。

我注意到，在勃列日涅夫旁边坐着的不仅有政治局年纪较大的委员，而且还有几位苏军元帅和将军。这对这次并非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的会晤来说是异乎寻常的。我意识到，他们是作为不太温和的恫吓的工具。

当他们之中每个人都讲完话，我接着讲话。开头我不能不说，会晤议程不像通知的那样。我看了看勃列日涅夫，但他装作忙于作记录。然后，我就转谈实质性问题。我说，通过非常有选择地阅读报刊的断章取义的片断，把报刊同国家政策混为一谈，是完全不对的。由于我们取消了新闻检查，这完全是我国的内政，党的领导和政府都不能确定报纸的内容。这是记者的事。我们的任务是管理国家事务，保护公民权利，保障其幸福和发展繁荣的经济。

由于我们实行新闻自由，人们总是要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我们必须习惯于面对批评性观点，但我们认为这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现象。自由的报刊对我们来说是政治上的校正仪。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就让人们说出他们觉得怎样和想要什么。

我强调，在会上对我国的对外政策未说任何批评的话。我们遵守对外承诺，仍然是大家庭的一个牢固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家政策的重要得多的标准。我们也未改变自己的社会主义基本方针。我们只不过以民主形式丰富它。

我停了一停，接着驳斥对我的同事特别是约瑟夫·斯姆尔科

夫斯基和伊日·佩利康的不严肃的批评。我说，前面讲话者对他们的攻击是没有根据的。我指出，斯姆尔科夫斯基是共产党战前的老党员。他在纳粹占领期间表现出巨大的勇气，是1945年5月布拉格起义的领袖之一。他在50年代初受到不公正的迫害，此后又忠诚地为自己的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效力。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受到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巨大信任。谁也无权怀疑他的正直和真诚意图。

我同样保护伊日·佩利康，他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台长。我说，佩利康多年担任国际学生联合会总书记职务，他的忠诚应该是所有在座的人都熟知的。

最后，我告诉他们，我们起草了捷共新的政治纲领——行动纲领，该纲领将在下一次中央会议上进行讨论。只要文件一发表，他们就可以自己对我们的整个政治意图作出判断。

会晤在冷谈的气氛中闭幕。既未通过结论，也未通过联合宣言。其结果只是非常形式化的公报。

我们回国后采取不让集团领导人在德累斯顿进行的指责，干扰我国改革进展的做法。我的同事和我都感到，只要我们遵守我国的对外承诺，我们就可以继续坚持自己决定国内事务的权利。改革进一步开展下去。为过去罪行和冤案的受害者全面恢复名誉的法律框架，3月底准备就绪。自由的新闻工具为公众舆论的表达提供广阔的天地，这是自1948年以来的第一次。在3月28日开幕、4月初继续举行的中央会议上，通过了重要的干部决定。

在公众的压力下，诺沃提尼也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我们推荐卢德维克·斯沃博达[①]大将担任其职务。国民议会1968年3月

① 卢德维克·斯沃博达（1895—1979），1945—1950年任捷国防部长，1950—1951年任政府副总理。后遭到清洗，曾被短期监禁。1968—1975年任捷总统，1968—1976年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30 日选了他。卢·斯沃博达（当时 73 岁）是个职业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在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他也是 50 年代初政策的受害者，当时被撤销国防部长职务。然后他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农业社当会计。斯沃博达当时受到普遍尊敬。我认为，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更合适的总统候选人。

前主席团十名委员中的六名：诺沃提尼、亨德里赫、胡吉克、拉什托维奇卡、西穆涅克和杜兰斯基，在 4 月中央会议上被撤换了。除杜兰斯基外，都是诺沃提尼班子的强硬核心。选举了新的主席团。其委员名字为：弗兰季舍克·巴尔比雷克、瓦西尔·比拉克、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德拉霍米尔·科尔德尔、弗兰季舍克·克里格尔、扬·皮列尔、埃米尔·里戈、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约瑟夫·什帕切克、奥尔德日赫·什维斯特卡和我。4 月份选举的所有三名主席团候补委员列纳尔特、卡佩克和瓦楚利克，都是诺沃提尼时期的人。这三人中的最后一人，由于选举布拉格市党组织新的第一书记，很快失去自己的地位，改革的真诚支持者博胡米尔·西蒙当选为新的第一书记。

我被确认仍担任第一书记职务，也选出了新的捷共中央书记：齐萨日、科尔德尔和萨多夫斯基。切斯特米尔·齐萨日是个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涯中走运与不走运相互交替。在我们把他重新召到中央任职之前，他担任驻布加勒斯特大使，诺沃提尼把他排挤到那里去。什捷凡·萨多夫斯基个人接近我，我们曾一起在布拉迪斯拉发工作。齐萨日和萨多夫斯基都站在改革一边，萨多夫斯基较坚定，而齐萨日的变化则较复杂，尤其在入侵以后。

在新的书记处成员中，有埃夫任·埃尔班、阿洛伊斯·英德拉、瓦茨拉夫·斯拉维克、奥尔德日赫·沃列尼克和兹德涅克·姆林纳日，他们到头来或进行改革或阻碍改革。埃尔班是 1948 年以前那个时期的前社会民主党人，过去担任许多政治和行政职务。他有典型的机会主义者的名声。有些人说，英德拉从一开始就是

苏联的代理人，在8月及以后扮演了真正令人厌恶的角色。我过去记得他是个有时敢于反对诺沃提尼的人。我1968年4月接受他，主要是因科尔德尔（当时还是盟友）的推荐。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因写1968年的回忆录《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在上述所有人中最著名。他对1968年的讲述在较多问题上是有争议的，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不过，兹·姆林纳日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参与了行动纲领的起草以及整个民主化进程。瓦·斯拉维克和奥·沃列尼克鲜明地支持我。

前内务部副部长米洛什·雅盖什当选为捷共中央监督与检察委员会主席，这在一定情况下是个重要职务。他1969年之后以位居前列的正常化推行者而较闻名，后来在1989年成为胡萨克政权的掘墓人。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①] 当了政府总理，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当选为国民议会主席，弗兰季舍克·克里格尔[②] 当了民族阵线主席。

克里格尔是个医生，曾在西班牙共和军中当过外科医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据同美军达成的协议在中国工作（当国民党的医生）。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生在俄国的波兰[③]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但毕业于捷克斯洛伐克。他在查理大学获得毕业文凭，是战前的共产党员。他坚定顽强地贯彻改革，在8月入侵以前和以后都是如此。

---

① 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生于1921年，1956年起先后任捷共中央书记、捷燃料动力部长、政府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席，1968—1970年任政府总理。1966—1970年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② 弗兰季舍克·克里格尔（1908—1979），1940—1945年在中国当军医。1968年任捷民族阵线中央主席、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华约五国军队侵捷后被挟持到苏联，是惟一拒绝在《莫斯科协议》上签字的捷领导人，后又在捷国民议会投票反对通过苏军"暂时留驻"条约。

③ 此处指哈利奇，喀尔巴阡山山麓从维斯瓦河上游至普鲁特河之间的地区。该地区西部历史上属波兰，东部先后属基辅罗斯、独立、归波兰。后为奥地利属国，一次大战后属波兰。1939年东部归苏联。

自然,并非所有这些离职和提升都是公众施加压力的结果。我可让许多政治盟友担任最高职务，但许多任命也是进行不可避免的妥协的结果。此外，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仍然是老的，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不能加以更换。而对党代会我们还必须等待。

捷共中央主席团尽管是某种妥协的产物，仍然是国家最重要的机构，与前主席团有很大不同。其核心，即巴尔比雷克、切尔尼克、克里格尔、斯姆尔科夫斯基和什帕切克，现坚定地支持改革。除奥·切尔尼克外，他们都支持我，直到最后。

自然，主席团的情况不容乐观。科尔德尔从3月初起开始日益倾向于苏联的立场，比拉克和里戈已把他争取过去。皮列尔多采取中间立场，但倾向于我这一边。《红色权利报》总编辑奥尔德日赫·什维斯特卡曾参与反对诺沃提尼的斗争，但在4月份被选入主席团时就已放弃自己早先支持改革的态度。他在知识分子、自己的编辑和记者中非常不受欢迎。在公共场合和报刊上，经常对他进行批评。这显然也加速其1968年3月至8月之间的政治转变，当时他参与亲苏阴谋，走到自己生涯的谷底。

新政府的组成好些。我要说，它比党的领导对所应解决的任务有准备。在以往的体制下，政府从实际权力的观点看，总是比党的主席团低。但在公众的眼里，它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保守势力更会抵制党的主席团而不是政府的改革努力。另一方面，政府向国民议会负责，这在1968年4月已不仅仅是个纯粹的形式而已。我们的新政治纲领赋予政府以比它在这之前所拥有的多得多的权力和独立。

至少新成立的政府的某些成员值得注意，因为他们还在诺沃提尼的前追随者、政府总理约瑟夫·列纳尔特时就是新鲜血液。尽管列纳尔特在1963年取代西罗基之后、上任之初开始干得比较好，其日子已屈指可数。

经济学家奥塔·希克当了政府副总理。也有建议他当党的主

席团委员的。不过我相信，他的专业水平使他具备担任政府职务的更好条件。

古斯塔夫·胡萨克那时当了政府副总理。正如我已提到的，尽管我推荐，胡萨克1964年拒绝接受副部长职位。看来他现在有另一种感觉。1968年1月，我在布拉格接替诺沃提尼之后不久，他给我发来贺信。他在信里说，他准备回到政治生活中。2月我责成比拉克同胡萨克谈一谈，问他想做什么。胡萨克的答复是："什么都可以，如需要在布拉格也行。"因此，4月份进行干部变动时，我想起了他。

在新政府中，文化部长由米罗斯拉夫·加卢什卡担任，担任教育部长的是弗拉基米尔·卡德列茨教授，外交部长由伊日·哈耶克教授担任，所有三人都享有颇佳的改革派声誉。我们也撤换了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新的国防部长是斯洛伐克人马尔丁·楚尔，我对他非常了解，他积极反对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的未遂政变。不过，楚尔在1968年8月的表现不完全清楚。

新的内务部长是约瑟夫·帕维尔，他是西班牙内战时国际纵队的军官，经历过50年代初镇压的又一受害者。他坐了几年牢，受尽折磨而不屈服，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不用说，苏联领导对关键职位的变动肯定不大高兴。帕维尔比如采取了许多措施限制国家安全局的非法活动。这削弱了苏联对秘密警察的控制，苏联人很快就把帕维尔列入必须反对的人的名单。入侵后斯沃博达总统将帕维尔藏在兰尼的总统乡间别墅，显然救了他。

3月底至4月初的中央会议犹如洪水一样。我们始于1967年10月的斗争的第一阶段在很大程度上顺利结束，改革最严重的内部障碍被排除了。行动纲领通过了，改革派力量在主席团中占优势。老的中央委员会仍采取观望的立场。但可以预期，如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有支持我们的努力的代表参加，这一障碍也会消

失。

我们严肃认真地致力于纠正过去的冤案，有振兴我国经济的纲领。正如发自内心的“五一”庆祝活动所表明的，公众对这一努力的信任增长了。但地平线上出现了乌云，德累斯顿会晤开始给这些春光明媚的日子投上阴影。

18

从春至夏

即使干部变动是大规模的，行动纲领实际上是1968年4月中央会议的惟一最重要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捷克斯洛伐克之春的脉搏。关于该文件的决议说，其使命是提出“最近将来”的新的政治方针，但只要浏览一遍便可发觉，它重要得多：行动纲领意味着历史性转折。它奠定了对解决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几乎所有基本问题采取新的态度的基础。

“最近的将来”就是4月中央会议和原计划在1970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之间的这段时期。新的形势要求党代会大大提前举行。正是什么时候召开“十四大”的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决定性的政治事务之一。

自然，德累斯顿的批评者不许在本国发表行动纲领，压制对它的一切暗示。他们的做法是易于理解的。行动纲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文件。任何别的共产党无论何时何地都未起草过这么概括而又富于原则性的、偏离在运用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我们的纲领是逐步回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计划，民主社会主义曾在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占上风。

西方的某些共产党，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法国共产党，当时也在抛弃共产国际的不幸遗产，但它们的情况不能同我们相比。莫斯科的物质支持是它们的重要联系，虽则对意大利共产党来说已不重要。东欧集团的所有共产党

与此不同，通过强大而善钻的各级效忠者和代理人之网，同苏联党绑在一起。当这些党是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力量时，苏联人不仅钻进每个党的正式机构，而且控制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外事部门等关键职位。这种实际情况造成，任何搞独立活动的尝试，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非常困难的。

的确，行动纲领未触及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独立倡议的可能性，因为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是首要的事。我们的纲领谈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但苏联领导也习惯于插手这些领域。因此，它对行动纲领的制定未请其指教和征得其同意，我们甚至未征求其意见，感到不高兴。

自然，文件不可能也不愿意具有挑衅意味。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改革派没这么蠢。国内外情况都不允许直接拒绝苏联的学说。我们所使用的表达方式是温和、谨慎的。我们也礼仪性地引用够多的马列主义一般概念。纲领是离经叛道的，但我们尽量使它看起来不是如此。

正如序言所明确指出的，行动纲领扎根于捷克斯洛伐克现实，从我们过去的代价昂贵的经验中产生。这在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理所当然，但把从本国情况出发作为我们纲领的基础本身在当时就是够大胆的，因为在那时以前要求把苏联榜样和苏联实践作为非推行不可的模式。民族"特点"被认为只不过是个装饰而已。

纲领宣告独裁、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方法的结束，它们在社会中制造人为紧张，引起各社会集团、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反感。我们把我们的新政策建立在各社会集团之间的民主合作和信任之上。不优先照顾狭隘的党的、职业的或其它的利益。受到宪法保障、但过去未受到尊重的集会和结社自由，得到贯彻。在这方面不应有任何非法的限制。

纲领宣布恢复新闻自由，建议通过明确排除发表前检查的新闻法。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的观点应当是自由的，不应当同政府的

正式声明混为一谈。

保障迁徙自由，包括公民不仅出国旅游、而且也在那里长期或永久居留的权利，并且不被称为流亡者。宣布要通过纠正过去经法院判决的冤案及政治冤案的特别法律准则。

鉴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新关系，实行共和国联邦化，斯洛伐克民族机关和机构享有平等的地位，以及保障在联邦机关的任职。也起草有关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

在经济领域，行动纲领要求彻底非集中化和企业领导独立，以及使小的私人企业合法化，尤其是在服务行业方面。苏联领导从一开始就首先把这一建议看作复辟资本主义。勃列日涅夫在以后几个月我们的一次谈话期间，直接提出这一指责。我回答，我们需要私营部门，以改善市场状况和方便人们生活。勃列日涅夫立即顶我："小手工业者？这我们将会认得！你们的拔佳先生在未盖工厂之前，也是个小鞋匠！"这是列宁关于"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的"私人小生产的旧论断。苏联的教条主义偏执狂似乎是不可改变的！

这概括起来就是行动纲领、有 60 多页的文件的主要思想。同时我们必须不断记住有个限制：我们不能哪怕仅仅是暗示，我们打算恢复充分的较多政党的多元化民主。在苏联人的眼中，这就会意味着等于破坏社会主义。好听地称为"党的领导作用"的对政权的垄断，对苏联的共产党学说面言，是基本的和不可逾越的。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们对我们的改革的主要反对意见是，我们"正失去领导作用"。越出我们活动的这一樊篱，就会要求改变我们的国际地位，这是难于想像的。可惜我们没有像南斯拉夫那样相距遥远而有利的地理位置，它在 1948—1949 年之后敢于反抗。

还在 1948 年以前，我们的政治体制就受到民族阵线排他性质的严格限制。1948 年以后，民族阵线又被剥夺在这之前享有的威

望，因为共产党以外的政党在其中失去一切影响和独立。

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把它作为出发点。因此，我们建议至少在民族阵线内建立比较平等的关系。这可作为恢复各政治、社会力量非高高在上的伙伴关系的第一步。我们不能走得更远，但充分尊重宪法规定的自由、法制、新闻和结社自由的原则，清楚地指明我们今后的方向。

即使我的盟友和我放弃了各种推行社会主义的做法和列宁主义原则，我们不想破坏社会主义。我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不能把它同民主分开，因为社会公平是其合乎逻辑的基础。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在私人经营因素起作用的市场环境中，可更好地运行。存在许多合法的所有制形式，特别是合作社和公共所有制形式，这些形式过去主要由于对其进行斯大林式的限制，而未被有效地利用。

至于说到党，我们相信，等到过去的冤案获得纠正，它可通过做真诚有效的政治工作，重新赢得过去某个时候受到的信任。我们相信，在实行较多候选人公开竞选制时，我们也将获得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支持。我仍然认为，我们的自信是有根据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8年布拉格的“五一”庆祝活动。我的妻子当时从侧面的看台观看欢呼的人群，以深为感动的心情回忆起那一天。在多年举行导演的游行之后，这是自愿的“即兴表演”。谁也不把人们赶着去在中央提出的口号下齐步走。这回人们是自己来的，举着自己的横幅标语。其中一些是愉快的，另一些是批评性的或幽默的。心情是放松、高兴的。到处充满过去多年见所未见的颜色和鲜花。甚至造化母亲也为这一天祝福。阳光普照，天气温暖，天空湛蓝。人群自然流露的同情支持之情征服了我，他们从我们站立的低矮的看台旁边走过。

我对两个新组织非党人士俱乐部（KAN）和前政治犯协会（K 231）的成员记得很清楚，他们从我们旁边走过，呼着对我们

的政策表示支持的口号。当我看到，非党人士俱乐部今天在根本不懂 1968 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的人的领导下，走向极右派，我有时回忆起这一点。

我不禁想到，我是第一个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执政党第一书记的斯洛伐克人，由此而来的是国家中最强有力的政治地位。须知我在这以前连想也不曾想过。布拉格是最大的城市和首都，而我正在这里观看盛大的“五一”庆祝活动！因此，看见这么多的同情和友好支持对我来说双倍重要。

* *　　* *　　* *

在我 1968 年 1 月接替诺沃提尼的职务之后，我住在当时由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管理的布拉格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夜间工作以后，我在那里只度过几个小时。在布拉格，像以往在布拉迪斯拉发一样，我工作到深夜。在中央委员会宏伟的大楼里，我的窗子的灯光在夜里最后熄灭，大楼座落在伏尔塔瓦河南岸，河流在那里向东拐。只要公务允许，我每个星期六都去布拉迪斯拉发，以便至少同家里人一起度部分周末。星期一早上回布拉格。

几个星期以后，礼宾官来找我，建议我迁到较合适的住处去。我在宾馆的房间毕竟太小，我在那里接待不了来访者，还说如我的一家能同我住在一起更好。我对此未予以重视，我说我将加以考虑。但他们又来找我，要求更迫切。我表示同意，条件是他们为我找到合适的、我同妻子和儿子们可迁入的住宅。

他们带着我，让我看了几座房子，但这些房子从我家的需要和我的口味来看都太大、太豪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终于在布拉格特罗亚区找到一座房子，那里有四间卧室、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厨房。房子是属于政府的，威廉·西罗基当政府总理时曾经住过。1968 年春房子就空着。安娜、彼得、米兰和我 4 月份迁

到那里。最大的儿子帕沃尔刚开始在布拉迪斯拉发考门斯基大学医学院学习，因此同我母亲留在那里，我母亲照顾他。

1968 年 4 月党的领导机关和政府改组之后，我们准备贯彻行动纲领。苏联的干涉和个人的考虑及原因逐步促使诸如比拉克、科尔德尔和里戈这样的人，反对贯彻行动纲领。主席团的新组合很快就形成了。我在这一时期的最可靠的盟友是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弗兰季舍克·巴尔比雷克、弗兰季舍克·克里格尔、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和扬·皮列尔。书记处情况不这么有利，因为科尔德尔、列纳尔特和英德拉建立反改革集团。与此相反，什捷凡·萨多夫斯基和瓦茨拉夫·斯拉维克总是在我这一边。

恢复名誉工作的进程总是挂在我心上，我努力尽快加速之。5 月中，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一批高级军官被彻底恢复名誉，他们 1949 年受根据伪造的证据进行的清洗之害。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战前军官、1945 年 5 月布拉格起义军事指挥库特尔瓦什尔[1]将军和赫利奥多尔·皮卡[2]。

5 月底以前，政府签署法院恢复名誉法案，在这以后议会很快就通过该法律。6 月底，抵抗运动的战士被彻底恢复名誉，他们 50 年代初被清除出武装部队。同时被恢复名誉的还有几名作家和记者，他们是同样镇压行动的受害者。其中也有著名画家阿尔丰斯·穆哈的儿子伊日。

7 月底，最高法院撤销 1948 年以后时期的两起可耻的死刑。其无辜的牺牲品之一是民族社会党的国民议会议员米拉达·霍拉

---

① 卡雷尔·库特尔瓦什尔（1895—1961），1918 年作为在苏俄的捷军团军官曾同红军作战，1945 年 5 月为布拉格起义军事指挥。1949 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60 年获赦。

② 赫利奥多尔·皮卡（1897—1949），捷将军，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在俄国和法国的捷军团军官，1945—1948 年曾任捷军副总长。后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和叛国”，1949 年被判处死刑，1968 年平反。

科娃[1]博士，她被虚假地指控叛国。她是捷克斯洛伐克史上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杀害的惟一女性。另一牺牲品是左翼作家、文学评论家扎维什·卡兰德拉[2]。1950年被虚假地控告叛国、被监禁数年的国家冰球队队员，也于1968年6月彻底恢复名誉。较多恢复名誉工作在7月份通过党的系统进行，苏联入侵前两天（8月19日），内务部长约瑟夫·帕维尔制定了通过法院为斯大林式镇压的所有无辜受害者全面恢复名誉的实施框架。

苏联占领以后我们也还在继续作出这种努力，到1969年4月才被胡萨克政权制止。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这一努力在1989年12月旧政权倒台后很快就恢复了，并在逐步完成。死不能复生，痛苦不能完全治愈或忘记。但我们至少竭尽全力去做，帮助还可帮助的人。

另一个内部问题是，一批比较年轻一代的社会民主党人要求能合法地恢复自己作为政党的活动。可惜，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曾经是个政党，其左翼1921年分裂出来并建立共产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这两个党不断发生冲突，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不久，两党都被取缔。

1943年12月贝奈什总统在莫斯科时，同苏联签订了新的同盟条约，同流亡的捷共领导就大大简化战前的政党体制达成协议。

在可继续进行活动的政党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在捷克地区，他们直到1947年都相当密切地进行合作，那年新的领导要社会民主党人执行更独立自主的政策，虽则党的相

---

① 米拉达·霍拉科娃（1901—1950），1939年参加抵抗纳粹运动，后被盖世太保逮捕，1944年被判处八年徒刑，翌年获释。1945—1948年为后被取缔的捷民族社会党中委、国民议会议员和捷妇女理事会主席。1950年因"叛国和间谍罪"被判处死刑，1968年撤销判决。

② 扎维什·卡兰德拉（1902—1950），1936年因不同意斯大林的镇压被开除出捷共。1939年被盖世太保逮捕，至1945年被囚禁在集中营。1949年作为托派分子被捕，1950年被判处死刑，1968年撤销判决。

当强大的左翼仍然倾向于同共产党人合作。在1948年政变以后，社会民主党人被迫将本党并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战后东欧所有其它地方的社会民主党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当然，1968年要求恢复社会民主党是我们改革政策创造的政治气候的产物。要求的提出者在试探，正在实行的政策的界限在哪里。在他们的眼中，这是对我们良好意愿的考验。但我们的良好意愿不是可对此作出决定的惟一因素。情况不这么简单。

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起，斯大林和在列宁鼓舞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对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简直充满敌意。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甚至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以后的年代，尤其在共产党年纪较大的党员当中，这种敌意还有待克服。简而言之，在1968年春天或夏天，我们还不能直接通过捷共中央，批准恢复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不必提在勃列日涅夫的统治下，社会党人仍然是比真人大的稻草人。

我本人当时就非常尊敬像奥拉夫·帕尔梅和维利·勃兰特这样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但我不能肯定，在我国的情况下正式恢复社会民主党是否不仅可能，而且也有必要。不过我们制定了行动纲领，就是向他们靠拢。还应指出，20年以后我在已经改变了的条件下，自然而然地选择参加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

但1968年春情况不同。我看不到，我们怎么能满足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而又不引起我们国内特别是莫斯科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者的攻击。不过在此时我未采取任何行政措施，促使社会民主党人放弃组织起来的想法。我努力说服他们放慢努力，等待更有利的形势。

自然，我本人不能同社会民主党人会谈。中央委员会中有许多品德可疑的人，他们盯着我的每一步骤。此事由民族阵线主席弗兰季舍克·克里格尔和国民议会主席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同他们讨论更容易。我认为，在党的一级同社会民主党人谈也是

适宜的，因而要求新当选的布拉格市党委第一书记、捷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博胡米尔·西蒙做的时候要保密，不能透露太多。

社会民主党人的发言人是较老一辈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儿子普热米斯尔·扬尼尔和兹德涅克·贝欣涅。西蒙同他们见了几次。他要求他们理解我们的处境，避免采取会引起公众太大注意的行动。比起更受官方观点约束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克里格尔来，西蒙可走得远些。他向他们保证，我和党的领导中的其他改革派对社会民主党人不采取敌对态度。我们理解观点多样化的重要性，但我们行动必须谨慎。西蒙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到捷共非常代表大会以后再提出其要求，那时气氛就应比较适宜。

即使1968年6月我们不得不发表公开声明，拒绝正式恢复社会民主党的想法，看来他们对此是理解的。尽管他们稍后未经许可成立了中央委员会，我们未对他们采取任何其它措施。但他们至少未开始掀起争取其要求的公开运动。同苏联人的日益尖锐的冲突，很快使他们明白我们的态度。

这一时期，我们在重新调整和规范共和国内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国家法关系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根据行动纲领开展了大量旨在使国家联邦化的工作。捷共中央主席团4月底通过这一问题的进度，要求6月20日以前拟出宪法性法律的工作草案。同时也决定，该法将于捷克斯洛伐克成立50周年之际即1968年10月28日在国民议会进行讨论。

捷克5月初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受权筹建联邦内的捷克民族机关。6月底国民议会通过关于筹备国家联邦制的法律。其组成部分是建立捷克民族议会，作为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国家法伙伴。有关委员会开始起草新宪法。

在华沙条约部队入侵之前，国家政制问题几乎列入捷共中央主席团每次会议的议程。1968年8月13日还最后一次讨论这一问题。苏联人及其捷国内仆从未阻碍我们推行这一改革政策。但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感到喜欢。简单说来，他们对我们的其它改革首先是取消新闻检查甚为担心，这些改革对他们来说更可怕。他们表面上不反对朝着非集中化的方向走，但1969年以后他们重新在我国获得完全控制时，就去掉新的联邦制的最主要内容。中央集权的政权重新建立，到1989年11月以前联邦在很大程度上徒具形式。

我就任第一书记职务之后不久，开始认识到需要尽快召开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及其召开时间，对国内外、对改革派及其反对者都是件具有战略意义的事。如改革派力量能举行代表大会，它们将获得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决定性控制，同时这将大大削弱苏联在党内的第五纵队。

我们通得过的每项重大决定，都必须由捷共中央批准，包括选举主席团和书记处。我"继承"的中央委员会是1966年选出的，正如我已说过的，它的许许多多委员都是诺沃提尼的仆从，他们阻碍一切比较重要的改革。3月初公众舆论迫使相当大部分主席团委员辞去领导职务。但他们仍然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因此，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是不可避免的，大会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同时我不相信赶潮流的改革派和其他机会主义者。当我们从一种"一致"中解放出来，我担心它为另一种所代替。我害怕，假如我们行动太快、考虑不周，我们达到的可能适得其反。我致力于观点的多样化和真正交流，它可导致建立在对形势现实估计之上的共识。因此，我1968年1月底就抵制来自左及右的压力，他们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解决干部问题，迅速撤换身居要职的人。我必须说，开始时保守分子、改革的反对者施加了最强大的压力，相反的流派只慢慢在壮大。

行动纲领仍然是我首先考虑的问题。我看不出在制定新的、有约束力的政治纲领之前，大批撤换干部的意义。我得以使它在老的主席团获得通过，公众压力迫使中央委员会在4月份通过行动

纲领。在这以后，只有在这以后，再往前走才有意义。这是我的信念。

在筹备4月中央会议时，我把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老的主席团的议程上。以后4月16日又在新的主席团进行讨论。4月下半月是举行州党代表会议时期，多数代表在会上非常倾向于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相当大部分州委书记未重新当选，但他们仍然是中央委员。因此，需要召开代表大会就更显而易见了。代表大会将通过消除改革方针可能从中央委员会内部逆转的危险，使我们的前进得以完成。

我们6月初决定召开代表大会时，苏联人开始催促——肯定不是偶然的——要在我国领土上举行大规模的战术演习，公开批评我国国内事态的发展。虽然现在必须尽快召开代表大会，我仍然不愿与现有的中央委员会为敌。除了别的原因以外，也是因为不能“睡一觉”就召开代表大会。必须举行县代表会议，选举出席州代表会议的代表，他们又必须选举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必须起草代表大会文件、决议和提出干部方案。这一切都是艰巨的任务。

当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7月上半月选出时，必须确定代表大会举行的日期。这是个不易的、非常敏感的问题。因此，我考虑了两次才作决定。这一次我不相信，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我知道，苏联人多么焦急。我们在布拉格把这看作丢掉反动包袱。但从莫斯科看，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个东西是他们伸到我们汤里的匙子。

当然，我不可能准确了解，苏联领导将作何反应。我真的未想到，他们会对我国进行入侵。同时我注意到，他们试图以间接的军事及其它威胁对我们进行恫吓。因此我认为，在代表大会开幕之前不大久再公布其日期是明智的。代表已经选出，这一计策现在可以运用。但关于这样的手法考虑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

我需要书记处的关键组织者的合作，而他们出于巧合正好是我的反对者英德拉、列纳尔特和科尔德尔。

回首往事，我不相信，假如代表大会定在 7 月底而不是 9 月举行，“布拉格之春”的命运会大为不同。苏联人 8 月 20 日所干的，他们也可提前干。在作出进行入侵的决定时，其军事机器的状况不是根本因素，他们随时准备入侵。苏联不久前公开的文件证实这一结论。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阻止会完全支持我们改革的代表大会的召开。

19

华沙插曲

4 月中，中央会议以后，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给我送来其党的首脑三天前写的信件。勃列日涅夫写道，他对我国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契尔沃年科这几个月总是带着紧急信件，信件都是前几天写的。我不理解，这是由于工作马虎，或者是故意的。要知道从莫斯科飞到布拉格只需两个小时。

契尔沃年科不仅是个不成功的邮递员，而且也是个蹩脚的观察家。他对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显然没有明确的看法。他发回国内，我不久前有机会看到的报告，简直是愚昧无知的。我当时从他的愚蠢的问题就这么判断。我也记得乌克兰一名历史学家对我国驻基辅领事所说的评论。这位刚从布拉格回国的历史学家说，契尔沃年科及其代表乌达尔佐夫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绝对什么也不了解，他们对任何变革的标准解释是“反革命”。

契尔沃年科在一定程度上要对其上级对我国局势的看法负责，因此他是个对我们同苏联人的关系非常有害的官员。顺便说，他此前的任所在中国。我们可以想像他对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份责任！

愚蠢而又自负的契尔沃年科，长期与我们队伍中最著名的保守分子为友，1968 年 8 月勾结起来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合法政府的人的名单，如不将其名字列人，便不完整。

我刚拆开契尔沃年科 4 月 14 日给我送来的信件，勃列日涅夫就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会晤“谈一谈”。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主席团同

意接受邀请时，会晤日期定在5月4日至5日。我们在这以前已计划4月下半月要执行重要的国家任务和举行两轮州党代表会议，因此我们不能提出更早的日期。

大约在这个时候波兰爆发了政治风潮。波兰学生提出“全波兰盼望着自己的杜布切克”的口号，必然使哥穆尔卡的神经大受刺激。在不久前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政府公开的文件中，有一个文件引用哥穆尔卡4月中就表示的不满：“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①

4月23日，以托多尔·日夫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代表团抵达布拉格，重新签订同盟条约。保加利亚党的领袖曾经是我在德累斯顿的五个批评者之一，这一次未说什么特别批评的话。勃列日涅夫不在近处，因此日夫科夫未感到需要自我吹嘘。同保加利亚人合作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以便显示我们不改变对外政策。6月中，我们赴布达佩斯同匈牙利重新签订合作同盟条约。

苏联元帅、华沙条约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抵达时，日夫科夫还在捷克斯洛伐克。雅库鲍夫斯基在同总统斯沃博达、总理切尔尼克、国防部长楚尔将军和我的会谈当中，要求把原计划9月在我国领土上举行的多国战术大演习，提前到6月举行。

我们不喜欢这一想法，举出理由说，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这次战术演习既会引起骚动，也会造成政治复杂化。当雅库鲍夫斯基坚持要提前时，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然后他略作让步，建议改为举行只限几个国家参加的“小”演习。我不情愿地对此表示同意。这只不过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争论。我没有料到，他们会如此闻所未闻地进行欺骗，开来2.7万人，演习后又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急于撤走。以后强烈的抗议

---

① 引自捷政府1967至1970年历史事件分析委员会的档案。AK L 1353号文件。苏联驻波大使A·B·阿里斯托夫1968年4月17日的报告。——原注

持续了几个星期，他们才撤走。我们现在知道，这次“参谋演习”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我们进行恫吓，另一方面是为入侵作准备。

在同雅库鲍夫斯基会谈以后，我们5月4日到莫斯科去。代表团成员为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比拉克和我。苏方参加会谈的为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勃列日涅夫重复了在德累斯顿提出的和在不久前的信件中表示的批评。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失去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我们的经济改革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与某些消息不同，我记得清楚，勃列日涅夫未进行任何直接威胁，特别是未进行包含军事力量的威胁。

我回答道，我们对局势有不同看法。我们党不仅未失去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赢得各社会集团和各民族更多的支持。至于说到大众媒体，我提请他注意，对报纸的内容政府已不负责，因为我们取消了新闻检查。我并且提醒说，报刊大多支持我们的政策，有时批评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多样性和自由的表现。

我们的经济改革提出要保障广泛的非集中化和经营者的主动性，这可激励对更好的效率给予更高的报酬。与对其怀疑不同，这样的改革既不会在工业中，也不会在小企业中建立敌对的、反国家的基础。众所周知，捷共甚至战前就在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中受到相当大的支持。

在谈到这一点时，勃列日涅夫又提到拔佳和他的鞋，对我们想从西方获得硬通货贷款表示担心。

我说，我们真的从西方收到提供四至五亿美元贷款的建议，这笔贷款可帮助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我在你们的报刊上已看到，”我补充说，“接受西方贷款意味着把自己出卖给资本主义列强，但四亿或五亿美元贷款同我国的整个经济相比微乎其微。我们需要贷

款，与你们不同，我们没有黄金储备可提取。不过如果你们向我们提供硬通货贷款，我们愿意接受，而不需要从西方借贷。”

勃列日涅夫对此未作出反应，但切尔尼克对我说，在我说话的时候，柯西金把头转向勃列日涅夫并对他耳语：“这等于是送给反革命的礼物。”

显然，我们又几乎未就什么问题达成协议。有趣的是，勃列日涅夫事后对我们的这次会晤是怎么看的。我的消息来源是勃列日涅夫 1968 年 5 月 8 日在莫斯科向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卡达尔和日夫科夫通报情况的波方速记稿。勃列日涅夫说，他在德累斯顿就把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定性为“反革命”。（喏，如果他如是说，那也不是在正式的会议上。）然后勃列日涅夫指出，我们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时，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所有成员中只有比拉克“进行合作”。同时他强调说，“但是，杜布切克毫无希望，我对他连谈也不想谈。”[1]

我们从莫斯科回国后，我决定至少在公开场合否认我们的分歧。这也是我在随后几个月的策略。我们需要时间，我认为温和、非对抗性的言谈举止比公开论战更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必须认识到，我们只是我们自己。我国大使从全世界发回的报告证明，在我们同苏联人的争端中，我们不能指望来自任何地方的有效支持。

从我们今天所了解、24 年前只能猜测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莫斯科会晤之前许久，勃列日涅夫就开始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入侵。雅库鲍夫斯基的战术演习及与此相联的要求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我们访问莫斯科之后几天，在有波方速记稿的那次会晤期间，“五国集团”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决定始具固定形式，而不是 3 月在德累斯顿就对此作出决定的。当时他们还必须等待，因为正如齐奥塞斯库后来亲自对我说的，他也被邀请赴德累斯顿，

---

① 引自《新资料》档案。华沙，658/4 号。秘密。——原注

但他拒绝前往。到5月份，他们已不必管他。“五国集团”5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会晤，有明确的目的。

苏联5月11日关于“五国集团”会晤的宣传是种恫吓形式。柯西金5月10日给切尔尼克的信件也是如此，他在信中批评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及西德之间的边境通道上的自由化情况。柯西金声称，在到捷克斯洛伐克来的西方旅游者中有许多“间谍和破坏者”。

我们的反应是克制的。切尔尼克向柯西金保证，我们将修订捍卫我国西部边界的制度。我把契尔沃年科大使召到自己的办公室，对我国领导人未被邀请到莫斯科参加“五国集团”会晤，正式表示不安。我的抗议故意降低调子，因为我决定今后将回避参与德累斯顿之类的会晤。我们佯装一切正常，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5月，我们接待了另外两起苏联的高级军事访问。第一起是由1944至1945年指挥在我国领土上的苏联部队的科涅夫、列留申科和莫斯卡连科元帅组成的。现在他们来参加我国解放周年的庆祝活动。在这次访问期间，科涅夫直接否认苏军正在策划对捷克斯洛伐克入侵的传说。

一周之后，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礼仪性较少的代表团抵达。他带着科谢伏依元帅、奥加尔科夫将军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将军。后者访问前发表了几篇对我国局势的非常不友好的评论，遭到我国报刊的嘲讽驳斥。附带一提，叶皮谢夫和波诺马廖夫是斯大林私人秘密书记处最后还活着的成员。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意图，不足为奇。他们把这看作我们不听话。

格列奇科代表团声称，他们是来讨论现定在6月举行的参谋演习的。斯沃博达总统、切尔尼克和我接见他们时，讨论流于形式，未谈我国的内部问题。

格列奇科还在布拉格，我们就得知，柯西金突然出现在卡罗

维发利，进行"短期休息和疗养"。他未通知就来了，我们通过内部消息来源获悉他在那里。契尔沃年科为其在卡罗维发利逗留作了准备，未告我国政府。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柯西金玩弄这种东方把戏，使我们不得不拜访他。

这样，切尔尼克和我就去拜访他。但我们的讨论只不过是以往同苏联领导会谈的重复而已。说柯西金没有魅力，未免太礼貌了。他对人有时温和，有时又非常粗暴。我们在卡罗维发利找到他时，他已经休息过了，愿意听我们说，但这没有多大意义。勃列日涅夫和他经常按照众所周知的、熟练的套套互换角色：这次一个温和、另一个凶，下次相反。

柯西金访问我国后返回莫斯科，他的五天"休息和疗养"结束了。他显然未喝够卡罗维发利的矿泉水，未喝到它能起作用。如果走着喝，据说一周之后才生效。

5 月底，苏联人开始来参加暗号为"捷克森林"的参谋演习。即使许多部队开到我国来，这还是比雅库鲍夫斯基起初要求举行的大演习可以接受。

6 月 12 日，我收到勃列日涅夫的另一信件，他在信中向我建议在我方或他们方面边境地区的某个地方，举行双边非正式会晤。会晤应在 6 月 15 日或 16 日举行。我答复说，我的国内日程排得很满，要到 7 月中即我们第一轮州党代表会议之后，才能同他会晤。

勃列日涅夫要早会晤的原因（增加压力），是我要推迟会晤的原因。不过另一方面，同苏联人的任何会谈（虽无成效）至少缓和紧张。因此，令人高兴的是以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为首的议会代表团 6 月中应邀去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它地方。访问结束时，代表团同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会谈。斯姆尔科夫斯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回答了数十个有关我国改革的问题。我们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了记录稿，每个人都可看到，斯姆尔科夫斯基非

常有效地阐明了我国的政策。可惜，苏联大众媒体对此只给予微小的注意。

7月5日，勃列日涅夫给我打电话。他通知我，参加过德累斯顿会晤的六个国家的会晤将尽快举行。我应允将尽快给予答复。我给他发去书面答复。我在信中要求他说明建议举行的会晤的目的和议程。我以书面的形式请他这么做，是因为我必须向我们的主席团提出建议。当然，我在拖延时间，不过这同时又是个完全合法的要求。

勃列日涅夫在迅速发来的书面答复中建议，会晤7月15日在华沙举行。随后几天，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卡达尔和日夫科夫也来信提出同样建议。我仔细地阅读了所有五封来信，发觉它们内容和语气不同。最糟的是乌布利希的来信。该信几乎是侮辱性的，我起初想完全不予理睬。但后来我考虑，从来信的差别中可获得策略好处。

对会晤我难于随便拒绝，但我努力提出一些条件。

首先，我们希望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即包括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参加会晤。

其次，因为在我们收到的信件中，对我国局势有不同看法，首先应分别同每个国家举行双边会晤，以便在多边会晤之前弄清问题。

在与同事商量之后，我于7月12日向党的主席团提出这一答复方案。有些已决定把本人命运同苏联强硬路线领导人联系在一起的主席团委员，如科尔德尔和比拉克，要求我们无条件地接受邀请。但主席团多数支持我的建议。因此，我根据这一精神告勃列日涅夫。

随后两天，我未收到他的答复。但卡达尔打电话给我，迫切要求举行会晤。7月13日傍晚，切尔尼克和我同他在匈牙利多瑙河畔的边境城市科马罗姆进行会晤。

卡达尔显然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指示，催促我们到华沙去。他尚未收到我们对他的来信的答复，复信还在途中。我告诉他，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主席团的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我们认为会晤为时太早。看来卡达尔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太意外，我们友好地分手。他终究做了自己的工作，难道不是吗？

翌日，7 月 14 日，勃列日涅夫及其朋友在华沙举行会晤。第二天，他们发表公报，公报说“五国集团”举行了会晤。他们就捷克斯洛伐克局势交换了看法，向捷共中央发出联名信。

该信在道义上给苏联如此经常宣扬的和平共处思想本身一记耳光。正如可估计到的，信件重复了对我国改革政策的批评，我们已多次予以驳斥。它带着威胁的口气，把我们的改革说成是“反革命势力”干的事，接着要求我们镇压“反社会主义组织”、压制新闻自由。

7 月 16 日到 17 日我们在党的主席团讨论了正如关于“布拉格之春”的书籍所说的“华沙信件”。我们在复信中重申了我们在答复他们的正式邀请时已阐明了的保留意见。主席团像从前一样，不完全一致。科尔德尔和比拉克的追随者支支吾吾，说我们本应到华沙去。尽管如此，他们未走到拒绝声明草案的地步。文件获得通过。

然后我决定采取不仅我的反对者，而且较多同事也未料到的重要步骤。我建议，整个中央委员会就声明进行表决。这导致出现一种特殊情况，我的支持者担心中央委员会可能拒绝该文件，而我的反对者则担心可能予以通过。

事实说明，我的反对者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依靠公众舆论的影响看来是正确的。民意测验表明，对我们的改革政策有 78%的人支持，只有 7%反对。而对着公民，连反动分子也不敢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拒绝对“华沙信件”的复信。

中央会议 7 月 19 日举行，总统、中央监督与检察委员会委员

和当选为出席即将举行的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也来参加会议。声明最后一致通过。甚至科尔德尔、比拉克、里戈、什维斯特卡、英德拉、雅盖什和他们的其他追随者也对该文件投了赞成票。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致的重要表现。"华沙信件"毕竟是挑战性地寄给中央委员会的，我们能在这一级别给予答复。我反躬自问："整个共产党、它的整个中央委员会，可被指责为有反革命倾向吗？"

我应当补充说，还在中央委员会表决之前，但已在主席团通过之后，我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建议他们既不发表其信件，也不发表我们的复信。我提的理由是只会加剧紧张，这对谁都不利。他听了，但未给我明确的答复。次日，五国的官方报刊发表了"华沙信件"。

我们决定，也将其全文发表，但同时还发表我们的复信。不过，他们从未发表我们的立场。这使我想起1948年，当时南斯拉夫报刊发表了共产党情报局的攻击，但苏联报纸从未刊登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答复。

华沙会晤以后，为维护我们执行独立政策的权利而进行最后一轮努力的时候来临了。我们已只有六周时间可呼吸了。

20

与恐龙对话

如同每个人一样，我也经常考虑苏联垮台的原因。这一幅员辽阔的大国怎么会崩溃得如此迅速彻底呢？

对此有许多深奥的理论，但我认为，对所有理论来说主要的是有个基本的解释：体制阻碍变革。它长在僵死的学说之上，排除自然更换领袖，妨碍制定新的政治经济纲领。当他们最后努力对此做点什么，为时已晚。

1968年，当这一恐龙体制还在运行时，我们撞上了它。政治局控制着庞大的帝国，监督不让任何地方出现反对派。我3月在德累斯顿，然后5月在莫斯科亲眼所见，对我们努力做的事，他们根本不理解。

问题是要长期尝试采取恰当的行动，直到他们在文明的条件下接受我们。我乐观地认为，我们可达成变革，因为他们的暴虐不能越过一定界线。1956年粉碎匈牙利尝试早已过去。我相信，他们不会采取同样做法，要知道时代已不同了。我确信，世界大部分人同我们一起对此深信不疑。

在苏联关于“反革命”的空话背后，争论的核心并非围绕我国的社会制度转，而宁可说是围绕着我国的政治改革转的。我们相信，至少在我国，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即使苏联人要我们重新推行其一党专政模式，我也不相信，他们会由于这一分歧而开始对我们发动战争。归根结蒂，我们受到有效的同盟条约的约束，因而捷克斯洛伐克回避任何可能引起对其忠诚怀疑的

东西。并且苏联人多年宣扬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思想。难道估计到他们对此会否认、会对我们发动军事进攻是合理的吗?我不这样认为。我不觉得，我是个幻想家。我未料到，他们会采取不可避免地给自己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行动（正如今天谁也不否认的，这终于发生了）。我也未料到，他们不久之后如此背信弃义。

中央委员会7月19日通过我们对"华沙信件"的复信之后数小时，勃列日涅夫来电话。听起来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提议举行双边会晤。他未提出会晤的时间，但是他说，会晤应在苏联领土上举行。

我觉得其特点是，他对双边会谈不像以往采取毫不退让的态度，但我对他会愿意立即作出让步不抱幻想。我清楚，其主要目的是对我们施加更大的压力，加剧我们队伍中的不一致。不过，我仍在其中看到缓和紧张的可能性。

我们在主席团讨论这一建议，决定接受该建议，条件是会晤在我国领土上举行。我们不能无视我国、甚至共产党内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华沙信件"在我国大多数真心实意支持改革政策的人的眼中是骇人听闻的。

苏联的挑衅和恫吓在继续进行。参谋演习结束以后，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苏联人把部队撤走。在7月中华沙会晤期间，部队仍以蜗牛的速度撤离。

我们6月21日收到的苏方抗议，是恫吓的又一例证。抗议反对我们据说要求归还苏联人1944年吞并的外喀尔巴阡山乌克兰①(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我们弄不清，其居心何在，因为任何党的机关或政府机关对此连想也不曾想过。但苏联人把这

---

① 外喀尔巴阡山乌克兰，历史地名，在今乌克兰西南部，面积12753平方公里，人口126万(1990)，居民绝大多数为乌克兰人，其余为匈牙利、俄罗斯和罗马尼亚人。该地区10至11世纪为基辅罗斯的一部分，11世纪末起处于匈牙利的统治之下，一次世界大战后属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被匈牙利占领，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苏联。

一并不存在的问题极其严重地吹到吓人的程度。

7月中，匿名电话提醒我国警察有个秘密仓库，里面有五只装着20支美国冲锋枪和弹药的帆布包。仓库在捷克西部高速公路立交桥下。苏联和东德的传媒宣称，美国人运来了武器，以“武装我国的反革命”，在警察找到秘密仓库之前，就掀起危言耸听的运动。内务部长约瑟夫·帕维尔晚些时候对我说，调查揭露出，冲锋枪上的润滑油是苏联生产的。我国专家判定，武器来自苏联在民主德国的战争物资，苏联间谍将其放在我国。但尽管如此，苏联政府仍给我们发来强烈抗议，要求在我国西部边界部署“盟国”部队。

另一起挑衅涉及当时负责国家安全任务的中央部长瓦茨拉夫·普尔赫利克将军。在7月中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当中，普尔赫利克对各成员国在华沙条约司令部的代表名额不均进行谨慎的评论。苏联人把这作为进行公开攻击的又一借口。我承认，这在我小心翼翼避免挑衅的领域，可能是件敏感的事。从理论上说，这样的问题可扫到地毯下面去，但我们不同意像苏联人所要求的那样，把普尔赫利克撤职。我们宁愿撤销他当部长的那个部，普尔赫利克悄悄回去履行其在军队中的义务。胡萨克上台时，普尔赫利克在清洗中被一脚踢出军队，在狱中度过两年。

所有捏造的令人不快的事使居民感到不安。在当前形势下莫斯科之行是屈辱性的，因此我们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苏联领土上举行会晤是不妥的。

另一方面，拒绝同苏联人会晤也是不明智的。经彻底考虑，我7月21日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建议在科希采举行会晤，该市可满足双方的需要。科希采是个重要铁路枢纽，距离苏联边界不远，有个大机场。

几天以后，勃列日涅夫提出相当不寻常 的建议：两个代表团在蒂萨河畔切尔纳的火车站上举行会晤。蒂萨河畔的切尔纳位于

斯洛伐克和苏联边界上，有把列车搬运到俄罗斯宽轨铁路上的大型设备。当我听到勃列日涅夫的建议，我对他说，我不能肯定在这么小的城市能否找到合适的住处。他回答说，这无关紧要，因为我将乘自己的专列来。天哪，我心里说，兴许他们将在那里露营！

后来比拉克等人指责我，说我提议在这个不体面的地方举行会晤。但这是勃列日涅夫的反复无常造成的。于是，蒂萨河畔切尔纳的会谈就在我国的领土上、在火车站的铁路职工俱乐部举行。每天早上苏联人乘火车到我国的领土上来，晚上越过边界回到苏联的领土上去。

会晤于7月29日星期一开始，但很快就陷入僵局。双方像以往一样，对争论的问题持不同看法。勃列日涅夫和我只不过重申各自的立场，也要求两个代表团的其他团员发言。我们代表团的几位团员（比拉克、什维斯特卡和里戈）对现行政策谨慎地表示保留意见，但其观点难于改变总体形象。

我们商定，任何一方也不作会谈记录。我们信守诺言，但正如我们事后所了解的，苏联人不遵守。根据苏方的要求，任何记者也不许参加会谈。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如自己不能发表，也不喜欢别人公诸于世。

苏方某些干部，尤其是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但还有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有时十分无礼。比如柯西金暗示说，我党主席团委员克里格尔博士是“哈利奇的犹太人”。我严正地拒绝这一侮辱性的说法。

关于会晤进程的消息稀少，捷克斯洛伐克公众对蒂萨河畔切尔纳的会晤非常担心。我们从全国收到成千上万对我们的立场表示完全支持的信件、电报和决议。当时的口号是：“我们同你们在一起，希望你们同我们在一起。”这种团结一致是无所不包的、感人的。会晤期间有个夜晚我睡不着。我走出室外，在火车站散步。

铁路员工立即把我包围起来，说出与我在来信中读到的相同的支持的话。

第二天我在讨论的一个时刻提到，捷共享有巨大的支持。勃列日涅夫立即搬出他的自发论。他说："如果我发出指示，我马上就可收到几吨这样的来信！"他对自发有奇特的见解。

第三天已显而易见，会谈陷入僵局。不过我知道，会谈必须以某种方法结束。这时有人通知我们，勃列日涅夫患病了，在其车厢休息。会晤的参加者组成若干小组。他们在站台上散步，互相争吵。我决定探访勃列日涅夫。我至少可搞清楚，他想干什么。

我找到他时，他正穿着深色睡衣躺在床上，但我立即明白，他是在装病。他抱怨感到疲倦和头疼，但过一会儿就抛弃伪装，转入正事。他要我们同华沙条约的其它国家举行会晤。

我脑中闪过一个想法，这种会晤现在也许可作为解决"华沙信件"问题、磨掉我们争论的最尖锐的棱角、使事情正常化的途径。我算了一下，到将大大改变形势的党的代表大会，我们还需要40天平静。因此我对勃列日涅夫说，如果这样的会晤真的意味着我们关系的新开端，我们原则上不反对。我提醒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华沙信件"进行的批评。不过如果我们达成协议，会晤会通过完全不同、不重复"华沙信件"任何一点的文件，我们愿意放弃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参加会晤的要求。

他闭着双眼听，但过了片刻又复活了，并说："我想，我们可以这么做。"

午餐后我们举行主席团会议，我报告了同勃列日涅夫谈话情况。主席团同意我的建议。次日，即8月1日，代表团最后一次会谈。我在那里复述了我们达成的协议的要点，我们商定两天以后即1968年8月3日立即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六国领导人会晤。

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未达成、也未签署任何其它协议。对我国国内局势的看法仍然有分歧。由于勃列日涅夫后来进行欺骗，我

必须非常强调地提醒注意此点。

布拉迪斯拉发会晤举行时，我想知道，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对这一迅速召开的会晤作何反应。这反正不是像他们所想像的中世纪宗教会议式的法庭，我们也未像在华沙那样受到指控。这是个我们以平等的身份参加的会晤。

我已提到过勃列日涅夫在照相机前同人接吻的习惯。我在布拉迪斯拉发机场等候时，对他已有准备。我左手拿着一大束鲜花，决定用它作挡箭牌，使勃列日涅夫同我保持一段足够的距离。事情正如我所料。他立即来找我，但我成功地用花把他挡开，他抓住我拿着花的手，使劲把它举到空中。摄影记者就这样给我们拍照。不过，照片未披露此前的小小斗争。

诚然，新的联合声明，对我们来说这是会晤的主要目的，迅速成为迫切的问题。苏联人提出草案，所有代表团进行了讨论。这一草案使用的语言是可怕的，但我也未期待什么别的。它是以大家熟悉的、成为苏联政治控制主要工具之一的斯大林式语言起草的。普通的俄罗斯人自己称之为死板的语言。

起先我不太关注文件所包含的惯常用语、所有那些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复仇主义的空泛暗示。我忙于别的事。桌上摆出专家起草的第二稿时，尤其在看到文件不同“华沙信件”联系起来之后，我感到满意。实际上文本看起来像该信件从未存在过那样。到此为止，情况正常。不过，后来我要求文件包含下述明确声明：各国内部发展的特殊道路是各该党的事务。

这就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认为这样的句子不需要。我作了说明，正如几个文件证明的，这一原则已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接受，而这直接出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普遍政策。

我明确表示，如不写人这一思想，我们就不在该文件上签字。柯西金在此刻介人，提议进行妥协。文件中加进两个重要句子。一

句说，每个共产党将创造性地解决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另一句（更明确地）重新提出平等、维护主权、国家独立和领土不可侵犯的原则。

稍后，苏联宣传者引用声明序言的另一句话，在他们看来，那句话授权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入侵。这句话说，支持、捍卫和巩固集团各国取得的成就是所有国家共同的国际主义义务。不难判断，上述句子中哪一句应当优先。不偏不倚地阅读文件证实我的解释，而不会为军事占领辩护。

会晤后的第二天，我们返回布拉格，我在电视中强调，我们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都未接受任何秘密协议。宣言是我们签署的惟一文件，它应为我国的改革开辟新的需要的空间。甚至现在我也提出每个正常的、有礼貌的人当时也会提出的问题：假如苏联人的意图截然相反，为什么他们在布拉迪斯拉发承诺不干涉我国的内政？《华盛顿邮报》在布拉迪斯拉发宣言发表以后对其进行评论时，得出类似的结论。它把布拉迪斯拉发会晤说成是“苏联的吉隆滩”，这是影射美国对古巴猪湾的入侵失败（1961 年 4 月）。会晤被解释为苏联的让步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胜利。

我也相当满意地阅读了卡达尔 8 月 7 日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布拉迪斯拉发会晤是围绕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争端的转折点。他指出，在兄弟共产党的活动中优先使用政治手段。也许他们也欺骗了卡达尔？还是他骗人？

对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让步和 8 月 21 日要发生的事件之间明显的矛盾，可用一般而又深思熟虑地把他们所签署的和他们真正想要的互相替换来解释。他们利用事后无耻篡改布拉迪斯拉发宣言，来为其行动辨解。这是在 1968 年 8 月 18 日莫斯科“五国集团”会晤期间实现的，他们在会上通过了发动入侵的最后决定。我们从不久前才公开的这次会晤的速记稿了解这一点。

勃列日涅夫在那里宣称，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达成协议"，捷共将重新实行新闻检查，取缔非党人士俱乐部（KAN）和前政治犯协会（231俱乐部）。勃列日涅夫接着说，也"商定"将主席团委员弗兰季舍克·克里格尔、中央书记切斯特米尔·齐萨日和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台长伊日·佩利康撤职。勃列日涅夫补充道，这一"协议"是布拉迪斯拉发会晤的基础。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彰明昭著的谎言。苏联人带着这些要求来，但我们坚决予以拒绝，我们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克达成的惟一协议是，我们将到布拉迪斯拉发去。岂有它哉。

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会晤上说，"杜布切克已站到右翼势力一边"。①

假如我们以为，勃列日涅夫欺骗乌布利希等人，以使他们同意入侵，我们就太原谅他们了。当然，他们对那些骗人谎言总的说来是喜欢听的。

从布拉迪斯拉发会晤至三周后夜间入侵期间，在我国未发生任何比较重大的、可被当作导致8月21日之事的挑衅的事件和变化。那是夏天休假的时间，甚至对政治工作者来说也是如此。成千上万人利用新的可能进行旅游，在国外度假。紧张开始普遍缓和，我们终于有希望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的感觉占了上风。

8月9日，约·布·铁托总统抵达布拉格进行正式访问。一群群人在从机场到总统府的道路两旁夹道欢迎他。我不禁回忆起12年前在莫斯科对他的凯旋式欢迎。在我们举行会谈时，铁托对我国的政策表示完全支持。就像全世界许多政治家一样，他也相信，布拉迪斯拉发会晤是苏联让步的标志。我们一致认为，苏联人仍将继续以各种方法攻击我们，将努力使改革放慢和缩小其规模。我

① 1968年8月1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和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会议速记稿。引自《新资料》档案。华沙，未编号。秘密。——原注

对他说，他们从 3 月起就已这么做，我们迄今为止在作出某些重要决定时，还必须不断看他们的脸色。

几天以后，8 月 13 日，尼·齐奥塞斯库总统来进行计划已久的访问，届时我们重签了我国同罗马尼亚的同盟合作条约。正如我们对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所做的那样。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不同，它是华沙条约成员国，因此齐奥塞斯库的地位从这一观点来看对我们而言具有更直接的重要性。当然，他随后拒绝参加对我国的入侵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布拉格街上的人群也热烈欢迎齐奥塞斯库。在我们会谈时他向我保证，罗马尼亚不会改变其态度，不采取任何反对我们的步骤。我向他通报我们的国内政治经济纲领，他只听我讲，并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知道，他不是个伟大的改革家，对我们的态度对他来说是实行务实政策的事，在承认中国和以色列问题上他也执行这样的政策。

瓦·乌布利希是另一类来访者。他同勃列日涅夫一起，在捷克斯洛伐克是最不受欢迎的外国国家领导人。因此当他抵达卡罗维发利时，未成为当地欢呼的对象，我相信，他未期待受欢呼。他随身带来两位政治局委员，名为昂纳克和斯托夫，因此我也在两名主席团委员即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的陪同下，同他在这一温泉疗养城市举行会晤。

要在随便什么事情上能同意蓄着有名山羊胡子的人乌布利希的观点，这需要特别容忍。他是个在斯大林时期就变成化石的教条主义者，他本人使我反感。我听说他喜欢打排球，但当我看着他，我难于想像他从事任何正常的体力活动。尽管如此，我也必须欢迎，我们见了面、谈了话，即使我们未达成一致。这是通向紧张缓和的相对无痛之路。我对这次会晤只有模糊的记忆，但我记得，当乌布利希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在民主德国没有新闻检查，使记者们开怀大笑。

勃列日涅夫8月13日又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及其朋友对我们执行布拉迪斯拉发“协议”的情况不满意。我耐心详细地向他说明，我们严格按照宣言办事。现在我们忙于筹备党的代表大会，他肯定非常了解，这是多么艰巨的工作。谈话时，他对不存在的蒂萨河畔切尔纳的“协议”未作直接的或别的暗示，后来他就此在莫斯科向“五国集团”作报告。他知道，这是神话。

当我说，我们这时主要忙于筹备计划在1968年9月9日开幕的党的代表大会，并未夸大。文件、决议在起草，一切组织问题都在书记处和主席团的会议上讨论。主席团在入侵前的最后两次会议（8月13日和20日），几乎全是讨论这一议程的。

8月17日卡达尔给我打电话，建议我们当天晚上在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边境上举行会晤。我接受了该建议。

我同卡达尔会晤时，他看起来是轻松、和解的。他未说明任何特别理由，为什么要同我会晤，而我在这件事情上也未坚持要他说明。谈话总的说来是非正式的。卡达尔重申其建议，要我们采取把新闻自由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的步骤。我对他说，我们已经在做，同我们的记者分批和个别谈过。我们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在这些会上说明我国政策的原则和做法，在像我们这样一个法律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我必须强调，卡达尔对于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可能性未作任何暗示。我们分别时，我又对他说，对我国改革的批评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根据的。他看着我并补充道：“不过你终究会认识的，不是吗？”不错，我现在知道，他是按勃列日涅夫的指示同我举行会晤的。就其方式而言，他像其他人中的任何人一样，是“列宁主义道德”的产物。第二天，即8月18日，他去莫斯科参与作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

我在布拉迪斯拉发自己家里过了一夜，星期日返回布拉格。8

月 19 日星期一，我主要忙于准备拟于次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的材料。

布拉格的 8 月 20 日是宁静、温暖、晴朗的一天。"盟国"的坦克几个小时以后可能开始向我们压来的任何想法，都是不可想像的。

对某些人来说，甚至当坦克已出现在街上，这也是难于想像的。我的亲密朋友、当时担任斯共州委书记的安东·贾日基，深夜从班斯卡-比斯特里察乘小轿车回布拉迪斯拉发。他在该市街上看见某种奇怪的灯光，然后看见坦克、载重卡车和穿着外国制服的军人——那里的入侵者从南面来，来自匈牙利。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们显然在这里拍电影。"他绕道回家，躺下睡觉。过了五分钟，有入叫道："俄国人来了。"

21

入侵与绑架

8 月 20 日，星期二，是 8 月底典型的一天，天气温暖，太阳为雾所笼罩。布拉格到处是游客，一家家在公园里散步或坐在长椅上。不仅首都，而且全国都极其平静。成千上万的人还在休假，数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利用取消旅游限制之机，在国外旅游。

入侵前夜，星期一，安娜的胆痛病复发。星期二早上，我不得不再次把她送去住院。我们分别时，我对她提到，我下午有个长会，但明天一定来看她。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来看她。

计划在下午早些时候举行的主席团会议，是应于三周后召开的“十四大”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主要议程为讨论代表大会报告稿、决议草案和选举党的中央机关的新委员。假如代表大会像原计划的那样在正常的情况下举行，可巩固“布拉格之春”成果，为贯彻行动纲领和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会议于下午一点之后不久开始。除约瑟夫·列纳尔特据说生病外，所有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出席。(列纳尔特很快就好了，因半夜之后他在苏联使馆已有许多事。)

中央书记切·齐萨日、阿·英德拉、兹·姆林纳日、瓦·斯拉维克、什·萨多夫斯基和奥·沃列尼克也出席。在党的系统中，书记处是个重要环节。不过其成员如不是主席团委员，在主席团无表决权。主席团的 11 名委员科尔德尔、比拉克、什维斯特卡、巴尔比雷克、里戈、皮列尔、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克里格尔、什帕切克和我，才能就原则性政治问题作出决定。

除了筹备代表大会以外，议程上只有新的综合新闻部起草的关于政治局势的报告。我看过报告，未在其中找到任何突出的东西。但主席团会议的两位参加者科尔德尔和中央书记英德拉，在上次会议上建议从报告中得出某些结论，对此没有异议。这两人自愿承担这一任务。同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起草文件相比，此事只具有次要的意义，我对此未给予巨大注意。

在我的一堆信件中，也有一封勃列日涅夫的来信，该信是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星期日晚上（大约十点）递交给我的。尽管送信的时间异乎寻常，信中未谈任何紧急的事。入侵后强加给我们的、"正常化"时期的某些领导干部，如胡萨克和比拉克，后来声称，该信包含了明显的最后通牒和有入侵危险的明确警告。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该信只不过是苏联人自二月以来就提出的相同意见的重复，与苏联以往的信件或勃列日涅夫的电话大同小异。那封信我仔细地读了几遍，甚至入侵之后也读，未见其中有任何可说明胡萨克和比拉克的说法有根据的东西。无论如何我感到，勃列日涅夫一再重复的一切，在蒂萨河畔切尔纳的会谈期间和布拉迪斯拉发宣言中已解决。

在捷克斯洛伐克之春那几个月我都清楚，苏联批评的目的在于迫使我限制乃至放弃我国的改革。但他们从未明确地表示，要我后退多远。模棱两可是制度的特征。党内交流的特点往往是七拼八凑、间接暗示和令人混乱地大谈意识形态原理及俄国历史事件。这有碍沟通，达成的协议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苏联也使用诸如"民主"或"主权"这样的基本概念，但又从意义上对其进行阉割，或者使其互相对立。

"党的领导作用"是个特别讨人喜欢的模棱两可的概念。苏联人不断地使用它，我们会谈时也为它花了许多时间。当我们避免不了使用这一概念，我们就努力与他们截然不同地去理解和贯彻它。苏联人把党的领导作用理解为靠武力维持的完全的政治垄断。

根据我的理解，党的领导作用意味着争取人民的信任。不论如何，我们所想的是不同的两回事。

对我来说理所当然的是，每个党和国家的政治实践完全应当是其内政。在这点上我是不退让的，我认为我们国内讨论和决定的自由是极其重要的。我决心捍卫它。要知道只有根本的改革，才能把社会主义从战后斯大林主义者铅一般沉重的臀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死板模仿苏联的榜样时，把重压加到我国头上。

在我们同苏联领导人的交谈中，也使用过其它多义、令人混乱的概念。只有在一点上，在保持我国的“同盟”和我国属于华沙条约一事上，始终是明确的。我表示同意，因为这涉及他们自己的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反复确认我国的对外承诺一直有效。

主席团会议以对为党的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进行实事求是和平心静气的讨论开始。但傍晚的一个时刻科尔德尔突然要求我们推迟对代表大会材料后半部分的讨论，改为讨论关于政局的报告。虽然我们对科尔德尔这一举动的目的何在不得而知，多数在座的委员出于实际的原因对此表示反对。

科尔德尔及其同伙英德拉根本无意得出对上述报告稿子有意义的任何结论。他们并未这么做，而是不顾多数与会者的愤怒，提出实际重复“华沙信件”包含的批评的宣言草案。这意味着从蒂萨河畔切尔纳会晤和布拉迪斯拉发宣言全面后退，是非常带有侮辱性的，以致只有另外两名主席团委员比拉克和里戈支持科尔德尔的做法。（英德拉是书记，不能表决。）但我了解到（除了别的以外，也从比拉克的回忆录中得知），阴谋分子估计多数主席团委员现将支持他们起草的宣言。难怪他们的阴谋以彻底失败告终。

我们拒绝科尔德尔和英德拉的建议后，继续讨论代表大会文件。当时已经是晚上较晚的时候，我们边开会边用便餐。苏联部队在我国边界附近特别是在民主德国调动的最初消息传来时，紧张加剧了。回过头来看，严重的是我们未听到准备占领布拉格鲁

津涅机场的消息，尽管准备工作从晚间早些时候起就在进行，而入侵正是从那里开始的。

我对来自边境地区的消息未给予巨大注意，将其视为恫吓战术。但午夜之前不久有人把切尔尼克总理叫去听电话，国防部长楚尔将军向他报告，发生了苏军及其四支盟军入侵事件。切尔尼克回来后说，国防部被占领，苏联人把楚尔扣押在其办公室里，只许他打电话给总理和向其报告入侵事件。这引起的反应，就如同炸弹爆炸一样。

我必须承认，我已不能准确地回忆，我们在紧接着的时刻做什么。自然，这条消息引起一阵愤怒而混乱的辩论，我未参加这一辩论。在震惊片刻之后，我努力使自己清醒起来，迅速理清思路。我国的局势完全改变了。我对苏联意图的判断看来是不对的。我努力分析，我错在哪里，为什么我对他们估计错了。

1964 年我就清楚，他们搞掉尼·谢·赫鲁晓夫，不是像他们所说的，仅仅是因为他年老有病。但赫鲁晓夫在进行引人注目的改革时，也犯了许多错误，拐弯太急，做法粗暴。我以此来说明他自己的政治局反过来反对他的原因。四年之后仍颇难了解，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在扭转赫鲁晓夫的改革方面将走多远。我同意西方和我国专家的观点，他们总的说来不会放弃改革。对内或对外都不会放弃。对我国的入侵改变了这一切。

前几个月我倾向于相信，苏联人反对我国的改革是出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经验，而不是出于深思熟虑的反对改革。直到最后一刻我都真的不相信，苏联领导人会仅仅为了破坏和扭转我国的改革，而对我国发动侵略。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只考虑这种行动的国际后果，也是如此。此外，这同我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价值的最深切的信念是对立的。但这天夜里我懂得，我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以后几天和几个月的残酷经历才使我认识到，我同这些卑劣者有事可做。不过这是个影响我以后

整个生活的经验。

任何同 1956 年的匈牙利相类比我觉得也是荒谬的。首先，时间改变了。最近大约十年来，苏联人不断努力显示自己是侵略的不懈反对者，坚决推行国际和平共处。我曾自问，他们现在是否决定通过对自己的盟国进行如此骇人听闻的侵略，来破坏这一精心塑造的形象。其次，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不是 1956 年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不同，不是希特勒的盟国，而是纳粹侵略最初的牺牲品之一和联合国的创始国。国际上对未受到挑衅而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会比对 1956 年干涉匈牙利的反应坏得多。我不相信苏联人会置此于不顾，以这种方法将自己的声誉孤注一掷。

我承认，我的考虑可能是幼稚的，其根源在于朴素的良好意愿和正常的人的礼貌。在文明的条件下，类似的受害者一般估计不到会遭受突然袭击，直到这天的午夜之前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尽管有些问题和矛盾，基本上还是文明的。我根本就未料到，主席团会议将以追捕和绑架其一半委员包括我在内而告结束。

对我不能接受上述事实，可部分地以我们对苏联领导了解得少来解释。我们不了解，勃列日涅夫作为总书记手中已掌握多少权力，还有多少必须同其他的人一起分享。就是赫鲁晓夫也需要大约四年时间稳定自己的权力。

诺沃提尼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特别是在苏联领导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长期部署其部队期间，了解这些事情肯定多得多，他在苏联领导的各派之间周旋。但最终甚至连诺沃提尼可能也失算了，低估了勃列日涅夫的能力。当然，我 1968 年 1 月接替诺沃提尼的职务时，他未同我交流其经验。

当我回首往事，我看到，蒂萨河畔切尔纳会谈使得能够理解某种东西，但这还不够。而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人、任

何部门或机构专门彻底客观分析苏联的体制。可要知道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反苏。因此，任何对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彻底分析，从未送到我的办公桌上来。我不能肯定，西方对苏联 1964 至 1968 年政策的上述方面了解多少，但是我想，那里对新斯大林主义的明确看法也是作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后果才出现的。

* *　　* *　　* *

主席团会议继续以某种方式进行到切尔尼克报告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这时我想起勃列日涅夫的信，我把它从信封里抽出来，向与会者宣读。我想表明，在这封信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可解释为入侵警告。那只不过是老的正统的大杂烩，对捷克斯洛伐克报刊发表的这篇或那篇文章或漫画的意见。有人说，20 世纪中期反正谁也不期待，因某些漫画而打仗。谁也未说，同正在发生的事联系起来，这封信会有某种特殊的重要意义。

我意识到，我们必须通过声明，表示自己的愤慨和态度。此时此刻我尤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苏联人发动武装进攻，大军从各个方面向我们涌来，决心粉碎任何反抗。我了解，捷克和斯洛伐克公众支持我们的改革，会坚决起来反对干涉。人们将等我们说话。我们必须表明坚决反对侵略，但同时又尽量避免多余的流血。鉴于我国武装部队的组织和部署状况，军事抵抗是不可能的。命令起来抵抗只能导致地方性的战斗，会证实苏联的指责：存在有组织的“反革命”。

我们决定要求斯沃博达总统表明其观点。在我们打电话后 40 分钟之内，他来了。其间，契尔沃年科到总统府来，正式向他“通报”入侵事件。两位中央书记切·齐萨日和兹·姆林纳日负责起草主席团声明。不久之后，他们带来表达多数委员坚定态度的

声明稿。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不过讨论只导致非实质性的改动。比如，我们删去说明军事抵抗为什么不可能的句子。我个人认为，根本不提更好。

声明是向共和国全体人民发表的，现全文抄录如下：

“昨天，8月20日，大约23点，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界。这是在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政府总理和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及这些机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

捷共中央主席团当时正在开会，讨论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席团呼吁我们共和国的全体公民保持平静，对正在开来的武装部队不要进行抵抗。因此，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或工人纠察队也未得到保卫祖国的命令。

主席团相信，这一行动不仅违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一切原则，而且也违背国际法基本准则。

国家、捷共和民族阵线的一切领导人都坚守其职位，他们是作为人民和本组织成员代表、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现行法律及其它规定当选担任这些职务的。

根据宪法当选的领导人正召集国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立即开会，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召开捷共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局势。

捷共中央主席团

8月21日”

8月21日一点半，声明草案付诸表决时，七票赞成，四票反对。同我一起投票赞成声明的是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切尔尼克、皮列尔和巴尔比雷克。投反对票的是比拉克、科尔德尔、什维斯特卡和里戈。多数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也支持

决议。根据我的回忆，只有雅盖什、卡佩克和英德拉反对。同时，他们之中谁也未对苏联干涉公开表示支持，但避而不谈真正想什么。他们肯定意识到，全社会将谴责他们。正如我们后来所了解的，苏联人提早几天告诉这些人要入侵，而他们则允诺将为此制造“合法的”根据。在这点上，他们完全未能得逞。

或许他们已知道，他们未能为入侵提供合法的借口，是大错而特错。虽然吉斯林们可能已了解，但我们还不了解，苏联人已在全世界散布塔斯社的正式公告，他们在公告中声称，入侵是对捷克斯洛代克“党和国家机关”要求的答复。因此，我们的声明非常重要。它揭露塔斯社的公告是谎言，入侵完全是侵略。

会议以对声明进行表决而结束。凌晨两点左右，切尔尼克总理根据通过的决定到其办公室，斯沃博达总统回总统府。

我想起同布拉格党的第一书记博胡米尔·西蒙关于能否立即召开党的“十四大”或至少当选代表的代表会议的谈话。我不隐讳，我担心代表集中在一起时，可能被俘虏和枪杀，因此我们商定，市党委将试试在秘密地点召开代表会议。

又过了两个小时。空中响彻飞机发动机的轰隆声。正如我们后来获悉的，在布拉格的鲁津涅机场，每分钟有一架苏联飞机降落，运来坦克、装甲车和部队。

后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撤离大楼，不隐蔽起来，不领导抵抗。我们尤其是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博胡米尔·西蒙和其他人，毫无疑问对此进行过考虑。但我们觉得，这会违背我们只进行政治抵抗的集体决定，该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坚守岗位，阻止通敌分子和叛徒取代我们的可能性。不错，我们意识到，他们可能从肉体上把我们干掉，但这同干脆擅离职守是另一回事。因此，我们留在党中央大楼内等着。

这时我走出办公室，在大楼宽敞的走廊里散步。我看到，党中央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同我们一起坚守自己的岗位。我想起，在

苏联伞兵和克格勃到来以前，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桌上的电话，好象期待着有人还会打电话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天大的误会。

在这期间，在党中央大楼前聚集了许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年青人，举着国旗，我听到他们呼喊我的名字，他们唱国歌，甚至唱国际歌。多么辛辣的讽刺！

大约清晨四点左右，一辆黑色的伏尔加牌小轿车带着坦克和装甲车队，沿着横跨伏尔塔瓦河的赫拉维克桥，朝着大楼开来。车队对着人群开去，人们开始后退，不过不太快。于是就发生冲突，苏联人用冲锋枪开火射击。他们当着我们的面打死了一名青年。斯姆尔科夫斯基勃然大怒地抓起电话、拨号并对电话线另一端的某个人叫嚷，要他们停止杀人。我以为他在同契尔沃年科谈话，但后来我才想起斯姆尔科夫斯基说的是捷克语，而契尔沃年科不会捷克语。

然后我们看到伞兵即“空中步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手握冲锋枪，迅速包围大楼。不久之后，一切电话都不通了。

天开始亮，一支由几名军官率领的部队冲入大楼。大约七八个苏联伞兵和一两名较低级的军官冲进我的办公室，堵住窗户和相通的门，这时已经是早晨了。我觉得这好像是武装的破门而入。我下意识地朝电话机挪动，但一个军人把冲锋枪对准我，抓起电话并拔掉电话线。

我已记不准，我们还留在我的办公室的是几个人，但我知道，在那里的有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萨多夫斯基和西蒙。可能还有姆林纳日和斯拉维克。然后主门又飞一般地打开，走进来的是几个克格勃较高级的军官。其中有位身材矮小、佩带高级勋章的上校和我以前在某个地方已碰到过的苏联译员（我想，他几周前在布拉格陪过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小个子上校迅速在当时在场的捷共领导人名单上勾划，并说他把我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我们一坐在桌子周围，真的被看护起来。我们每个

人都有一支瞄准头顶的冲锋枪。

大约八九点之间，克格勃的一名军官命令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和我跟他走。我们出来时，我看到我的办公室主任索雅克，我悄悄对他说，要他看好我的装有正式文件的公文包。我不愿让苏联人夺得这些文件。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索雅克是苏联的帮凶之一。我一周后回国时，找到公文包，但我所担心的文件丢失了。

克格勃军官带着我们经过走廊到改革派中央书记切斯特米尔·齐萨日的办公室，后者在这之前已躲藏起来。在齐萨日办公室等着我们的是苏联的几名军官，还有一些穿便服的人，他们原来是来自国家安全局的我们自己的"志愿者"。他们表面上被指定来逮捕我们。其中之一机械地照本宣科道："我以英德拉同志为首的工农政府的名义逮捕你们。"在停顿片刻之后他又补充说，两个小时内我们将被送上英德拉同志主持的"革命法庭"。

性格火暴的斯姆尔科夫斯基，立即提出关于这个"法庭"合法性的嘲笑性的问题。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同这些人说话毫无意义。

他们让我们挨着齐萨日办公室的长方桌坐下。我们每个人面向自己的看守——上校或中校坐着。又过了大约两个钟头，一个克格勃军官走进来，命令我跟他走。我的后面跟着一名上校，他们带着我走下楼梯，经过走廊到后门，走进院子，那里有排成队的坦克和其它军用车辆。他们命令我爬上有圆形天窗的八轮装甲车，通过天窗把我塞进车里。过了片刻，他们把弗兰季舍克·克里格尔也塞进去，车子开动了。我努力根据车子拐弯的方向猜测，他们要把我们拉到何处去。过了一会儿，我判断他们可能要把我们拉到鲁津涅机场。我以为目的地可能是50年代初修建的可怕的鲁津涅监狱，当时有名的镇压就是在那里进行的。我仍然不能肯定，我们在哪里，因此我就使了一计。

我佯装喘不过气来，要求他们打开盖子透透气。我发觉，这使他们感到紧张。他们显然得到把我活着拉到目的地的命令。他们打开盖子后，我站起来并把头伸到外面。那是条我认得的街道。两旁是住宅，人们从窗里往外看。我才知道，他们正把我们拉到机场去。当然，他们迅速把我拉下来，不过我已看够了。

中午过后不久，我们到达机场。在那儿，他们把克里格尔和我带到底层的一个办公室里。他们在旁边的办公室里扣押了斯姆尔科夫斯基、西蒙和什帕切克，但我当时对此并不知道。我们所有五个在党中央大楼被捕的人，如今都在机场，后来他们又让切尔尼克同我们会合，他们是在总理办公室将其逮捕的。

又等了几个小时，我问军官，我能否到外面呼吸点空气。他犹豫了片刻，但后来点头了，把我带出大楼。时间已经是晚上，但天尚未全黑。不久之后，我发觉人们从大楼玻璃幕墙后面注视我。他们看见我，这给我以希望。我被带进去时，注意到克里格尔已不在那里。只有我自己一人，还有几个看守。夜晚来临了。

过了不久，他们命令我顺着跑道走向一架飞机。他们把我推进飞机，让我在那里坐了片刻。

我当时意识到，他们的计划受阻了，因为他们显然不知道，对我该怎么办。当约一小时后他们命令我走下飞机，把我带进另一架飞机，我的这种印象更加增强了。这一回用的是图型号的飞机，而前一架我则辨别不出，可能是安型号的飞机。此后不久，飞机起飞了。

我已不能准确地回忆，我们在空中多长时间，大概一至两小时。然后我们降落在一个备用机场，机场被挖出的大土堆包围，显然尚未修好。我估计，我们在波兰南部的某个地方。到后来我才得知，那个地方叫累格尼察。他们把我带到一座木头房子，我在那里看到小个子上校，他在布拉格逮捕我们，国家安全局的捷克人提出“革命法庭”的提法时，他也在场。我再次意识到，他们

有什么事进行得不顺利。否则，为什么会变来变去、拖了那么长时间？

在第一次停留之后，另一阶段到来了，我们降落在外喀尔巴阡山乌克兰的一个机场，可能是乌日哥罗德机场。切尔尼克和西蒙已在那里，但我未看到克里格尔、斯姆尔科夫斯基和什帕切克。

在乌日哥罗德机场，欢迎我们的是一支分队的看上去像田径运动员、身穿便服的克格勃高级军官，他们把我们带到几辆停在停机坪旁边的战地车前。切尔尼克拒不上车，他们硬要把他推进去。我跳下车，用俄语大声叫道："你们干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他是主权国家的总理吗？"高大汉子顷刻呆立不动，让切尔尼克自己上车。

我们坐车上山岗爬了约一小时，来到有片山上别墅的地方，他们把我们每个人送进单独的房间。8月22日就这样过去了。

我睡得挺少，多数时间我是在考虑从我被捕以来一连串事件中度过的。我已确信，苏联人不得不改变其原定计划。现在发生的，不是他们最初宣布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消灭计划。这看来越来越像是临时处置。我注意到，最近几个钟头我的看守的举动也缓和些，甚至礼貌些。由于与世完全隔绝，看不到报纸和听不到广播，我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和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只能猜测什么迫使苏联人改变计划。

我的估计在第二天，8月23日星期五，就证实了。午前不久，他们把我带出房间，给我戴上不透明的墨镜，带我上汽车。汽车开动了，这次是下山。毫无疑问，是沿着我们在这以前一天爬的同一条路走。

大概过了一小时，我们停住了。他们把我带进某座建筑物、电梯，在短时间的上升之后又把我推进某个办公室。在那里，他们终于从我的眼睛上摘下墨镜。我环视一下，根本不必费劲去猜，我在何处。我是在某个党的高级干部或地方苏维埃负责人的办公室

里。为什么要搞带墨镜的化装活动，我对此从来也不理解。在目前情况下，这没有任何意义。

我是在州党委办公室里，这我根据那里有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很快就判断出来了。我深信不疑，在乌日哥罗德没有第二部这样的电话。稍顷，党委书记桌上的电话响起来了，他们要我拿起听筒。在电话的另一端说话的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

当时波德戈尔内是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就是苏联最高领导成员。他们为什么挑选他同我谈话，我不知道。他很有礼貌，说话温和，就其方式而言几乎是优雅的，我想，他甚至问我过得怎样！但这并未使我感到意外。他们习惯于这么做。

波德戈尔内说："我们必须谈一谈。"

我尖锐地回答："谈什么、在哪里谈？"

他对问题的第一部分未作出反应，但他说，我们将在莫斯科谈。

我就此说道："你们想怎么把我弄到那里去？是把我当作囚犯吗？首先我需要知道，同我一起被捕的其他人在哪里。只要我们所有的人不在一起，我不愿考虑你们的建议。"

他说，他将办理此事，我们很快就将在克里姆林宫见面。

他未信守任何诺言。他们把我作为囚犯拉到莫斯科去，未让我同其他被捕者会合。在那些所谓会谈中，无论什么也不是正常、诚实或自愿的。他们在占领我国、以"革命法庭"可能还有行刑队相威胁三天之后，又需要同我"谈一谈"。这毕竟是个变化。我现在想了解的是，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变化。

22

在克里姆林宫

莫斯科时间大约上午 11 点，他们把我拉到克里姆林宫。我的的手表在外喀尔巴阡山的某个地方停了，因此我对究竟是几点钟只有模糊的记忆。不过，我今天可根据文件来编写那几天的准确的大事记。

在克里姆林宫，他们未让我从身上洗去前三天的灰尘和污物。他们把我直接带去参加正如一个克格勃的人所说的“会晤”。我记得有高大的门，门后是前厅，穿过另一道门，然后是摆着长方形桌子的大办公室。在那里，我见到了对罪恶入侵我国负有最大责任的四个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沃罗诺夫。今天可开玩笑说是“四人帮”。不过，这一说法 1968 年尚未流行。它流行于别的时间、别的国家。

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苏斯洛夫没在座，而由沃罗诺夫代替。不是沃罗诺夫好些，而是我相信，苏斯洛夫的威望高得多。沃罗诺夫当时是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可能因此而把他往前推，让他坐在柯西金旁边。

我想，他们在“会晤”前连澡也不让我洗，是故意的。他们想让我感到受凌辱、被打败，但我无此感觉。到头来，应感到耻辱的不是我。

沉默了片刻。然后波德戈尔内指着桌子另一边的椅子，要我坐下。没有任何表面上的问候或握手。

看来他们好像要给自己戴上最漂亮的面具，但即使如此，我

也觉得，他们并不感到难堪。他们真正的傲慢很难允许有这样的敏感性。只有正常的人干坏事时，才会感到羞耻。不过，我想起，勃列日涅夫还是往旁边看，好像回避正视，而柯西金的下巴也比平常略低。只有波德戈尔内看起来大致上还自然。对沃罗诺夫，我回忆不起来。但所有的人都是出色的演员。

我感到诧异，他们为什么只想同我谈。我们主席团其他被绑架的委员，尤其是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不应当参加吗？后来我脑子里一闪，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可能正想了解，他们的“疗法”对我有没有疗效。它对我毫无疗效。

当时我还不知道，斯沃博达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他领导人午后不久就来到莫斯科，现正在克里姆林宫。我也不知道，苏联人已同他们会谈许久。

与我和其他被绑架的人不同，斯沃博达总统及其小组是自愿来的。莫斯科之行是斯沃博达自己的决定。据可靠的目击者说，他是在入侵的第二天受到契尔沃年科大使要其承认“工农革命政府”合法的强大压力时，作出这一决定的。

某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分析家认为，总统的决定策略上是不对的，对人民反抗事业是有害的。但我对此不这么看。年已 73 岁的斯沃博达将军不是个政治家，而是个老军人。他主要关心的是避免手无寸铁的居民和占领军之间的流血。他知道，必须迅速采取某种行动。除了莫斯科之行，他是否也考虑其它可能性，我不得而知。后来他告诉我，他向契尔沃年科表明自己的决心，宁愿开枪自杀，也不愿使以英德拉为首的政府合法化。

无论如何，当主要责任突然落到他的肩上，他必定感到被挤到墙角、绝望。因此，他决定去找整个灾难的根源，试图避免屠杀，他毫不怀疑苏联人干得出来。我能理解他的处境。

老实说，斯沃博达在占领后一昼夜捍卫自己的立场总的说来是好的。起初他可能不知道，对苏联提出的承认傀儡政府合法的

要求作何反应。幸好契尔沃年科和我们国内的通敌分子不是总统可与之商讨的惟一的一些人。斯沃博达坚决拒绝契尔沃年科要求的决定，比如受到农业部长约瑟夫·博鲁夫卡的强烈影响。斯沃博达非常信任他，因此当博鲁夫卡说，英德拉“政府”绝不可得到总统威望的确认，他的反应是：“好吧，既然你这么说……”

我想，总统决定去莫斯科，苏联人起初不太高兴。他们想利用他为建立吉斯林政权“祝福”。直到他们意识到，从杜布切克向英德拉的顺利过渡只不过是个幻想，才不得不改变态度。他们从政治上对入侵的整个辩解，变为国际丑闻。其结果根本不是他们原来所想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同意进行“美容式的谈判”。但为此他们当然不仅需要斯沃博达，而且也需要我和其他他们原来想“除掉”的人。

因此，在他们把我带到克里姆林宫以前至少八小时，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最高领袖先同斯沃博达谈话，后同其小组的其他成员个别谈话。苏联人优先采取的是个别审问。他们想弄清楚，谁采取什么立场，以便能分裂我们。

斯沃博达随身带到莫斯科的是国防部长马尔丁·楚尔、政府副总理古斯塔夫·胡萨克和司法部长博胡斯拉夫·库切拉。库切拉是社会党主席，应代表民族阵线共产党以外的党派。这三个人实际上代表了政府的另一部分，政府在切尔尼克总理被绑架及其所在地被占领之后，在总统府找到了避难所。

斯沃博达决定随身带到莫斯科的还有剩下的党的领导中的三名成员，由他们自己挑选。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因此，除了皮列尔以外，他还带了比拉克和英德拉。这样，勃列日涅夫及其朋友就能直接从阴谋分子那里了解到，其计划为什么未能实现。正如我所说的，当我坐到勃列日涅夫及其三个同伙对面，绝对不知道他们来了。我不愿意“谈判”。我感到愤怒，但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不久前，我获得苏联关于这次会晤的速记记录，可用它来帮助回忆。记录不全，只有 52 页。缺少会晤的结束部分，但看来记得是准确的。[①]

勃列日涅夫出于某种原因开始对我称“你”。在这以前，我们从未这样互相称呼，因此这如果不是使我觉得虚假的话，至少是使我觉得特别。我在回答时一直正式使用“您”。

勃列日涅夫首先问，切尔尼克怎样。我回答他，不好。然后波德戈尔内问，我指的是身体不好，还是心理状态不好。我对此答道：“季热洛。”这在此可译作“痛若”。

然后，勃列日涅夫用老子的声调说话。他说：“我们建议不对过去而对当前局势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让我们一起努力寻求某种解决局势的方法。”

我回答说，我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就受到向前看的指教。接着我坚持，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以后我国各方面的局势都是平静的，没有任何理由进行军事干涉。我强调：“假如我不对你们说，因出兵而发生的事是个带有悲惨后果的政治大错误，那我就不对了。”

我补充说，我现在对国内的情况什么也不了解。我最后从自己办公室的窗户往外看到的，是聚集在党中央大楼前为数几百的人群，他们齐声呼喊：“斯沃博达”、“杜布切克”。然后我就听到枪声……

接着，他们引用摆在自己面前的各种报纸，而秘书又跑着送来新的消息，他们似乎临时又试图以此把我拉回到眼前。其中有许多夸张的表演。尽管如此，我从中了解到几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获悉，正如我在被绑架之前不久同博胡米尔·西蒙所讨论的那样，捷共“十四大”在布拉格秘密召开。他们选举了新的领导，其中没有叛徒的位置。我从中也可得出某些更广泛的结论：苏联取

① 会谈速记记录。1968 年 8 月 23 日。302 号文件及其它。——原注

代党和国家合法机关的计划未能实现，全国必定广泛开展消极抵抗。干涉的发动者现在拼命寻求某种“解决办法”。

勃列日涅夫说，有些人背着我策划“反革命”，要我在其“解决办法”中起主要作用。对这些建议，我未作出反应。我代之以要求他们允许我与同事谈话。

他们不止一次从其资料中抽出点什么，我知道是毫无根据的东西。这仅仅证明，他们对我国的情况懂得多么少。比如，柯西金宣读的一条消息声称，在出席“十四大”的代表之中只有五个斯洛伐克人，科尔德尔、西蒙、皮列尔和萨多夫斯基。但在列举名字的四人（而非五人）中只有一个斯洛伐克人，萨多夫斯基。他们老是把胡萨克同克卢萨克混为一谈，后者是斯沃博达的女婿、我国驻纽约外交使团的团长。在另一情况下他们对我说，苏军救了奥尔德日赫·什维斯特卡，他据说被其编辑扣在《红色权利报》大楼内。正如我后来所了解的，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其办公室发现他喝醉了，就把他送到苏联使馆，让他睡个够。

柯西金声称，赫布（捷克西部城市）正在举行有2.5万名苏台德德意志族人参加的集会。我从我国自由的报刊上刊登了几个星期的消息中了解得相当多，说得出来，这不是发生在赫布，而是发生在西德。我的话使柯西金陷入尴尬的境地，然后他语无伦次地说，苏军部队到达赫布时，“那里空无一人”。

他几次说，当时在布拉格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是非法的。我回答说：“多数代表有权召开代表大会。”波德戈尔内接着抱怨，代表大会是在原主席团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我顶了他：“他们不在国内。”

他们还就斯沃博达的莫斯科之行进行最大的欺骗。他们假装，斯沃博达尚未在那里，而是才要到达。“卢德维克·伊万诺维奇正在空中，”比如波德戈尔内就这么说。他们为什么进行欺骗，我至今不得而知。

正如速记记录所表明的，整个会晤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到要结束时，他们才把切尔尼克带来，但他几乎未参加谈话。在记录中，他只说了两次，而且非常简短。在据说他同意苏联提出的宣布在布拉格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无效的要求的地方，他们未直接引用他的话，而仅仅是转述。

苏联四位领袖中最好斗、最强硬的是柯西金。他作了许多明显排犹的暗示，攻击我党中央的犹太委员，尤其是弗兰季舍克·克里格尔和奥塔·希克。

了解勃列日涅夫对这次会晤怎么看是有趣的。我现在根据波方的记录，引用他8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向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和“五国集团”其他领导人进行的通报。[1]

“杜布切克采取的态度比切尔尼克坏”，勃列日涅夫对其同伙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杜布切克的问题，以后就让英德拉领导中央委员会……但重要的是要让杜布切克同意宣布代表大会无效。如果他对此表示同意，就让英德拉当第二书记。然后就有可能搞掉杜布切克。”

哥穆尔卡就此说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不存在。它已变成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集团，并同反革命联合起来。”

会晤未得出任何结论，会晤结束时苏联的四位掌权者仍坐在桌子对面，有人把我带到我进来那道门对面的另一道门。我记不得，切尔尼克是否同我一起走。我走到宽敞的前厅，意外地见到几张熟悉的面孔。我立即看到斯沃博达总统的白发苍苍的脑袋，情不自禁地走近他。我对在那里看见他，感到由衷高兴。我意识到，我已不再是独自一人。

---

① 1968年8月24日至2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和苏联党政代表团会晤记录。摘自《新资料》档案。华沙，文件未编号。秘密。——原注。

斯沃博达和我两人多年保持亲切的个人关系，互相非常敬重。我们实际上对“布拉格之春”各个方面的看法都一致。斯沃博达当时是改革的真诚支持者。他对旧政权有痛苦的经验，看来理解我们所致力的变革的重要性。因此，尽管处境令人遗憾，当我看到他，我还是感到莫大的欣慰。

但当我正视他的目光，我对他拘谨而冷漠的表情感到震惊。说真的，斯沃博达从未显得很随便，他一向有前军人的严谨作风。但在那冷淡的瞬间，他的面孔带有的几乎是敌对的色彩，似乎有什么东西刺伤了他最深的感情。后来，我几乎忘了那种感受，可惜这件事我从未问过他。

这奇怪的一瞬持续的时间不长于一两秒钟，我不能肯定，别人是否也注意到这一点。斯沃博达的表情后来放松了，我们开始谈话。我们交流了各自的情况和关于国内局势的消息。

我第一次得知苏联要我们签署各种文件的要求，这些文件可能意味着某种如何摆脱僵局的“协议”。他们还要我们签署所谓互相承担义务的清单。我很容易就猜到，他们真正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他们要我们做的是，事后给他们以进行武装侵略的权利。我说，我绝对拒绝参与这种弄虚作假。我指出，我们没有任何合乎宪法的权利，背着政府和议会、不经它们批准，接受某些协议。斯沃博达辩解说，特殊情况允许采取不合法的步骤，力图以此改变我的看法。

我不能强迫自己接受我认为方法上不允许、屈辱、完全不严肃的东西。我生气地对他们说，我宁愿辞职，完全置身事外。

斯沃博达及其他人在考虑妥协时，尚未准备接受苏联人强加的投降行为。在这一阶段，斯沃博达在捍卫我国的立场时总的说来还是坚定的。到晚些时候，当他已经疲惫、陷入急躁的无可奈何之中，他才变得比较迁就。

切尔尼克认为，除了努力同苏联人谈判以外，没有别的道路

可走，并希望达到不失体面的妥协。次日被带到克里姆林宫的斯姆尔科夫斯基，也采取类似的立场。我就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倔强地坚持拒不参加同苏联人举行的任何谈判。

在同斯沃博达谈话时，大约凌晨三点，我感到不舒服。几天来的疲惫和紧张开始使我支持不住。斯沃博达随行人员中的医生建议我在给总统小组住的一个房间里休息，并给我一些粉剂安眠药。但苏联领导人激烈反对："克里姆林宫不是宾馆，"他们当中的一人说。于是，他们就把我带下来上车，送到某个我可睡觉的宿舍。后来我了解到，他们也把其他被绑架的领导人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西蒙和什帕切克扣押在克里姆林宫之外。

我睡了几乎一整天。那是 8 月 24 日，星期六。他们下午晚些时候才叫醒我，并要我准备去克里姆林宫。我仍然感到不舒服，比前一天更累。后来有人问我，是不是有某个苏联医生在宿舍给我看病。是否有这样的事，我真的记不得。

在克里姆林宫，我又见到捷克斯洛伐克小组，它再次强迫我参加同苏联人的"谈判"。我又拒不参加。我一直在考虑，如何赢得时间。苏联人显然需要迅速的解决，而我则在盘算，推迟可帮助我们取得某些让步。无论如何，我坚持要他们把我们党的其他领导成员也送到克里姆林宫来。否则，我们不能全体行动。

这时，我又不得不躺下，因此他们把我带到为斯沃博达小组订的一个房间。在我休息时，苏联领导人迅速接受我的要求，用飞机把另外六位干部姆林纳日、列纳尔特、巴尔比雷克、雅盖什、里戈和什维斯特卡运到莫斯科。兹德涅克·姆林纳日来看我，并向我提供关于国内局势即消极抵抗、党代表大会的讨论和其它情况的简短消息。我星期六晚上一离开我们的小组，同苏联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就立即继续举行。斯姆尔科夫斯基来告诉我，会晤是如何进行的。他也告诉我来自国内的其它新闻，国内局势异常紧张。苏联人显然无法使广播电台和数十家报纸沉默，报纸在占

领军的鼻子底下继续出版发行。

我了解到，叛徒彻底孤立。实际上现有一切政治和社会组织都坚定地支持改革政策，要求外国军队撤走以及整个领导尤其是已知被绑架的人从莫斯科安全出来。

我对下述消息感到高兴：我们得到国际上的广泛支持，包括大多数西方共产党的支持。美国把苏联侵略我国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我国外长中断在南斯拉夫休假，正在赴联合国途中，要在那里对入侵提出抗议。

当然，这一切是令人鼓舞的。但这改变不了我国被庞大的军事机器占领、世界上没有力量能把它赶出去的基本事实。不过，居民的一致抵抗已使干涉的政治理由站不住脚。这迫使苏联人放弃不受欢迎的直接建立军政府。这对他们来说，不论意识形态上还是政治上，不论在国内或在国外，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种形式的政府会暴露整个行动是侵占别国。的确是如此。

因此，苏联领导不得不"扳道岔"，力图强迫我们"谈判"，后又对其进行欺骗报道。比如，当斯沃博达到达莫斯科，苏联领导迅速为他准备了"热烈"欢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一半政治局委员在机场迎候。然后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同他坐着敞篷汽车，在奉命站满沿途人行道的"欢呼的人群"中间，穿过莫斯科。苏联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装模作样地加以转播，以便使全世界看到，我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友谊"。

但尽管进行这样的报道，苏联领导对"谈判"出好的结果准备得并不好。正如我从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处了解到的，谈判是混乱的，在开始阶段无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目的。直到最后一天，8 月 25 日，星期日，仍未举行两个"代表团"的任何正式会晤。结束这出戏第二阶段的最后文件的内容，只是个别人或非常小的小组之间的分开交谈。

我未直接参加这些谈话。最初，同苏联人谈的是斯沃博达。后

来，当他们改变关于对我和其他被绑架的主席团委员怎么办的看法，参加会谈的主要是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至于说到诸如比拉克或英德拉这样的同伙，连苏联人对他们显然也已不重视。我们小组的多数成员反对我辞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建议，他们反复坚持要我留任和参加会谈。特别是斯沃博达坚持这一点，几次强调说明达成妥协不可避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得到的印象是，只要能消除爆炸性的局势，他准备作出几乎任何让步。

切尔尼克太乐观。他认为，我们的地位是强有力的，足以迫使苏联人在实质性问题上让步。我想，斯姆尔科夫斯基比较现实，他向来从各个方面看问题。他承认，让我参加会谈并取得成果对苏联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同意我的意见，只要没有希望达成相当可接受的妥协，我就不参加直接会谈。

由于苏联领导未能以 1956 年匈牙利式的某种听话的党和国家混合机构，取代我国的合法领导，他们提出的我们自己要求入侵的说法，就毫不足信。现在他们想要使侵略合法化，要我们正式承认，侵略是“不可避免的”，我国有“反革命”。这是意识形态上具有决定意义，而又最有争议的一点，我们看到，这对他们、特别是对苏联当时的马列主义大教士苏斯洛夫多么重要。他们也力图强迫我们承认“华沙信件”提出的警告仍然有效。这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学说上的骗人手法，而对他们来说却是极其严重的事。在长期推行斯大林主义制度期间，宗教教条和意识形态被混为一谈，因此他们不能接受一个“兄弟党”可坚持自己的观点的事实。须知这可能鼓励其它党仿效！

我国的改革政策及其体现行动纲领最使他们如鲠在喉。行动纲领对他们来说是个特别为难的问题，因为他们不能对它进行直接、具体的攻击。因此，他们从未在本国的新闻媒介上发表行动纲领，他们的批评总是不明确，充满教条主义和歪曲的解释。他们这样做也有其国内的原因，因为他们仍然力图扭转赫鲁晓夫的

改革。但他们的做法，以不危及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为限。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他们自己的非斯大林主义化在捷克斯洛伐克特殊条件下的合乎逻辑的继续，他们攻击行动纲领不得不选择间接的途径，使用他们拿手的意识形态大杂烩。

他们还有另外两个要求。首先，他们要我们宣布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无效，代表大会是入侵后第二天夜里开始在布拉格秘密举行的。正如我提到过的，代表大会已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把苏联傀儡排除在外。其次，他们坚持要我们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从议程上撤销华沙条约侵略我国的问题。

由于我未直接参加会谈，我只能根据第二手资料作关于会谈的报告。但同时我认为，如果我说，我不是会谈的旁观者，这是符合实际的。我们的领导人，尤其是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什帕切克、西蒙和姆林纳日等人，不断向我通报。他们征求我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我有问必答。因此，我间接地参加了会谈，但我不能强迫自己直接参加。我这个人比较爱动感情，因此我对他们不讲道德的气愤太大。

另一方面，我知道，必须找到某种摆脱现存局面的出路。我总的同意总统的观点，局势不稳持续的时间越长，国内发生流血冲突的危险越大。但我不同意他仅仅为了打破僵局、而愿意牺牲如此之多，牺牲我们的一切理想和原则。因此，我留在幕后，主要依靠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他们在会谈中也采用我的建议。

从总统小组抵达莫斯科到 8 月 24 日星期六晚上，这些初步接触的第一阶段总共持续了大约 30 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实际了解到，苏联人真正要的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可调整我们自己的步骤。这样，到下一阶段，我们就可择善而从。

23

莫斯科协议

星期六夜里或 8 月 25 日星期日早晨，我们商定，是提出对案的适当时候了。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进行主要谈判，他们在先同我讨论后再去谈。我们对这一步骤的结果如何的估计不一，但对做法的观点基本一致。

提出的文本的内容和语气类似我们对 7 月“华沙信件”的答复，只不过因为反映占领的现实，调子低些。草案重申我们拒不承认我国存在反革命，毫不让步地捍卫行动纲领，认定入侵是“可悲的误会”或“可悲的错误”（我不能完全肯定，用了哪个词），要求苏联承担撤走部队的义务。我们感到，这是可接受的谈判基础。这在目前情况下是否现实，是另一回事。

8 月 25 日星期日当天，斯姆尔科夫斯基来告诉我，苏联人以狂傲和威胁的态度回答我们的草案，坚决拒绝草案中列举的一切要点。他们声称切尔尼克的草案是“最后通牒”，柯西金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说，我们并不处于可提要求的地位。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可等到我们理解时为止。

他们也意识到，我们小组内正在出现不一致，并努力利用之。在此，我指的不是比拉克和英德拉，他们已被排除在外。任何一方都不给他们以注意。我指的宁可说是斯沃博达总统，及其在我们反对苏联最糟糕的要求时日益增长的急躁。但最严重的是，胡萨克逐渐脱离我们。

我从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处了解到，胡萨克几乎已完

全站到苏联方面。其证明主要是他令人意外地支持苏联提出的宣布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无效的要求。这一要求分裂了我们的队伍，最后我们被迫接受。我们的谈判态度因此而显著削弱。

胡萨克以没有足够的斯洛伐克人出席布拉格的代表大会，来说明自己改变立场的原因。这是借口，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占领把国家的交通运输系统破坏到如此程度，以致许多代表不能到达布拉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萨克拒绝承认的代表大会，在正常的情况下，会在斯洛伐克代表包括胡萨克的充分参加下举行。在会谈的过程中，胡萨克越来越采取所谓“客观的”和“现实的”立场，这种立场向苏联人表明，他与我们当中的多数人不同，愿意合作、“明智”。后来，他们因此而奖赏他。不过我立刻理解，为什么柯西金就“只有五个斯洛伐克人”参加十四次党代会大作文章。

当时，斯沃博达和胡萨克都不是党的主席团委员，从这一角度看，他们不应当干涉党的事务。但那是特殊情况，苏联人自己迅速把会谈说成是“党和国家的”事务。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使他们能利用我方任何一个集团愿意接受其条件的人，但这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使他们干涉党和国家的事务正当化。

在这种情况下，总统职务赋予斯沃博达以远远超过其通常作用和宪法规定的实际权力的地位。至于胡萨克，他虽然只不过是个副总理，一般都知道，他在国内享有受到残酷迫害的前囚犯的名声和不久前赢得的改革派的声誉，因此一般估计，很快将被选为斯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取代爱阿谀奉承的比拉克。这一前景大大加强了其地位。他直到入侵前的最后数小时还在打改革派的牌，因此在斯洛伐克党的队伍中的地位得以上升，这现在更向他造成的创伤洒了一把盐。

苏联领导人拒绝切尔尼克的协议草案以后数小时，他们给我们送来了自己的、后来以“议定书”闻名的文件草案。它比后来

签署的文件更糟糕并长得多。苏联的这一“草案”重申要我们承认我国存在反革命和入侵合法的要求。它完全不提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它要求我们宣布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无效，重新实行新闻检查，撤换现任的广播电台台长和电视台台长。在文件的一个部分，他们坚持要我们让其同伙英德拉和比拉克留任，另一部分又有我们应从政治上搞掉的人的名单。其中包括克里格尔、齐萨日和三名政府成员：副总理奥·希克、外交部长伊·哈耶克和内务部长约·帕维尔。

这样的议定书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也告诉他们这一点。至少他们终于提出要求清单，这使情况发生质的变化。我们就可判断，这一清单是其最高要求。我们就把它当作取得较好结果的出发点。我们努力对苏联草案进行修改、变动和删节。

在我们8月25日和26日煞费苦心地做完这一“书面”工作之后，产生了看起来仍然可怕、但比原来已可接受得多的文本。比如，苏联人同意不再要求我们承认入侵合法和存在反革命。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责成他们撤军的话一句也不接受。特别使我们感到气愤的是他们硬要强加给我们的语气，这种语气应引起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出于自己的主动，至少也是出于自愿的印象。

我们像在通过布拉迪斯拉发宣布时那样，接受了几点，因为其不明确、华面不实的语言允许作不止一种解释。文件的第五点就是这样的例子，在这一点中苏联人许诺“只要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不复存在”，将逐步撤走自己的部队。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威胁从未存在，这一点至少确定占领的“暂时”性质。当然，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大杂烩带给我们的甚少，但从当前的观点看，看起来并非那么没有希望。

1968年8月26日早晨早些时候在克里姆林宫的会晤上，我们小组的多数人准备签署“议定书”。对这次会晤，我仍未参加。在上述多数人中有比拉克和英德拉，同他们在一起的有列纳尔特、

皮列尔和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大使、诺沃提尼时期多年的中央书记弗拉基米尔·寇茨基。但更重要的是，斯沃博达总统、胡萨克、楚尔将军和非共产党的司法部长库切拉也表示愿意签署。

即 20 个可能的签字者中有 13 人准备签署，其余七人中至少切尔尼克总理很倾向于同他们一起签。剩下的是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西蒙、姆林纳日、克里格尔和我。

克里格尔的情况特殊，他也未参加同苏联人的任何直接接触。但他的情况与我不同。他在 8 月 26 日以前没有可能自由作出决定，因为他们把他单独扣押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某个地方，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对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斯沃博达和其他人提出的有关克里格尔的许多问题，苏联人答复时总是躲躲闪闪。他们只说，他没事、平安。

只有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应当要求斯沃博达，要他对苏联人说，没有克里格尔参加我们什么也不谈。不过，8 月 26 日夜晚以前两国小组的任何正式会晤都未举行。以往的所有讨论都是非正式地在个别人之间或很小的小组里进行。直到 8 月 26 日星期一早晨，苏联人才接受我们的要求，把克里格尔带到克里姆林宫来。

我仍在自己的房间里，当克里格尔已经离开，我才得知他来了。斯姆尔科夫斯基向他通报整个事态的发展情况，让他读议定书草案。然后，切尔尼克和斯沃博达同他谈。克里格尔坚决拒绝参加谈判和签署任何文件。他要求把他带回住的地方。

当然，我完全理解克里格尔的立场。假如我处在他的地位，我毫无疑问也会这么做。苏联人后来建议克里格尔参加两国小组的最后会见。我立刻感到，其意图是利用克里格尔的反面立场来揭露我们小组内的分歧。他们想以此削弱我们进一步修改议定书草案的努力。我强烈反对苏联的这一建议，克里格尔置身“谈判”之外的决定必须得到尊重。

不过，虽然我们在拒绝参加会晤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克里格尔的地位和我的处境还是不同的。对国内外的许多人来说，我的名字成为“布拉格之春”和我们为捍卫它、反对苏联的压力而斗争的体现。因此，我个人对国内人们的生命负有主要的、不可否认的责任，他们肯定会把我拒绝签署议定书看作是鼓励进行积极抵抗。我不相信，我有这么做的权利，我想防止流血。许多年之后，我的结论得到了证实。我从苏联高级领导人、尤其是从1968年苏军高级司令部成员耶尔肖夫将军那里了解到，苏军只在等待积极抵抗的信号，以便对它进行坚决镇压。

当时暴力镇压抵抗的实际威胁表明，很难把我们的决定看作是“自愿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以武力和恫吓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经典例证。这样的条约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具有可怕的性质：它看起来几乎像希特勒1939年3月15日在柏林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战前最后一任总统埃米尔·哈赫博士的捷克与摩拉维亚保护国的翻版。

我感到，我们在莫斯科可负责任地做的一切，是努力减少损失和为今后的独立行动保存尽量多的余地。苦苦思索之后，我得出看法，8月26日星期一同苏联人争单词和词组没有意义。我努力掂量他们同其原要求相比所作让步的份量。我希望，我们将来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草案的最后一稿未使入侵合法化。它未提存在反革命，未重弹“华沙信件”的论据，未证明我国的改革政策不正确。

我们甚至得以达到使苏联人含糊确认这些改革是我们今后取向的基础。引用捷共中央1968年5月决议的意义也在于此，苏联人同意这些决议作为我们今后政策的基础，而这些决议实际上确认大约98%的行动纲领原则。

的确，这些局部的让步并未使我对议定书中所留下的一切不感到令人作呕。那仍然是个强加于人的协议。15点之一甚至“为

了两个共产党”及其“友谊”，宣布议定书是机密的，似乎在当前情况下保密是可能的。议定书使用误导的语言，所有引用“我们的意图”或“我们的决定”的话都是虚假的。但在看着来之不易的让步时，我仍相信，假如没有内部的背叛，我们还可挽救我国相当大部分的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我最终决定参加计划于8月26日星期一下午晚些时候举行的同苏联领导的“全体”会晤。这是我们几天前被绑架以来，我同他们的首次会见。我只是在议定书的某些部分又作些改动之后，才决定签署的。最重要的改动是，明确指出占领是暂时的，确定苏联部队撤走的条件。

当我们走进会议室，苏共政治局委员已坐在长方形的长桌旁。我们坐到他们的对面。切尔尼克坐在我的左面，斯姆尔科夫斯基坐在右边。我期待这是一次实事求是的、用于逐段修改议定书草案的会见。不过，勃列日涅夫在会谈开始时发表了充满外交辞令的讲话。我眼睛看着桌子，对他的话我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但当他讲，其政治局怀着遗憾的心情决定派坦克到我国，我感到不舒服，心中怒火又升起。尽管如此，我尽量自持，保持平静。

我们达成一致，我方由切尔尼克先发言。他平静而又实事求是地捍卫改革政策，指出入侵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消极后果。

苏共政治局的一个委员，我想是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以侮辱性的话打断切尔尼克对一点的阐述。切尔尼克一结束讲话，勃列日涅夫就插话，反对他对入侵的否定评价。因此，我也认为有责任对此表示立场。

我不期待我能改变桌子对面的对手的观点。但我感到，我必须公开、直接和诚实地说明我国的事件。再过片刻，我们就应当签署充满欺骗和伪装的屈辱性文件，该文件是以残暴武力和威胁强加给我们的。面对这种最后的屈辱，即使仅仅为了记录在案，我

也感到有责任公开直接表态。

我没有事先拟好的讲稿，因此我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与切尔尼克不同，会讲俄语。我注意到，看起来不快的苏共政治局委员还在注意听。他们之中谁也未试图打断我。

我逐点分析我国的形势。我指出，我国的改革为时已晚，早就绝对需要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声誉被以往的政策严重败坏，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进行重大的变革，我们就不能从原地前进。行动纲领是这些改革的基础，受到党和公众多数的支持。我国的改革并不威胁，而是相反地巩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忠诚，这也意味着忠于对外承诺和我国的同盟。但苏联对我国改革的批评，从一开始就是出自于不了解和无视我国的国内情况。这是我们为什么拒绝批评的理由。入侵是个悲剧，其后果在我国人们的思想上和心目中永远无可挽回。我最后说，所提的文件更扩大了这一悲剧。虽然我们将被迫签署议定书，但必须懂得，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从长远的观点看，甚至使问题恶化。

当我讲完时，会场非常安静。然后，勃列日涅夫讲话。这一次，他把一切同志式团结和永恒友谊的华丽词藻抛在一边，只限于谈现实的政治。他明确地表明，思想和理想总的说来是次要的。现在，他以毛泽东著名的“枪杆子”理论对付我们。他暴露了自己和整个政治局的面目。这是一群有封建观点的厚颜无耻的、狂妄的官僚，他们除了为自己以外，早已不再为任何什么服务了。

他说，捷克斯洛伐克自最后一次战争结束以来是苏联安全区的一部分，苏联无意放弃它。由于出现了捷克斯洛伐克之春，苏共政治局最担心的是我国走向独立。有碍于他的是，我事先未送讲话稿去批准，进行干部变动未征得他的允许。对此，他们不能容忍。当我们未屈服于其它形式的压力，他们就入侵我国。他看起来对其所说的话，感到非常高兴。勃列日涅夫如同别的时候一样，现在也能自己把自已感动得涕泗滂沱。

我意识到，在这个疯人院里，我所赞美和崇敬的理想，我们签订的条约，我们参加的国际组织，无论什么都毫无意义。对他所说的话，我深表不赞同。此前，当我试图阐明自己的立场，我已对他说过。但勃列日涅夫突然站起来，他面红耳赤，浓眉紧蹙，开始对我叫嚷，我们的一切谈判显然毫无用处。然后，他转身慢慢走出房间。所有政治局委员几乎像军人一样跟着他走。

在他们正步走开时，我迅速地考虑总的情况和自己在其中的地位。勃列日涅夫所说的话的基础是，我国是苏联人的殖民地，如何管理我国的事务，是他们的事情。这不以我们对本国形势的理解为转移。我们事情办得好或坏，根本无关紧要。一切只取决于他们批准与否。在这种情况下，同他们签署另一个毫无价值的“协议”，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

苏共政治局最后一名委员身后一关门，我就说：“我认为，这些谈判没有什么意义。你们听取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们呢?”因为过了片刻未得到回答，我补充道：“这不取决于我们签署什么与否。即便如此，他们也将为所欲为。我不签那个议定书。”

在桌子的我们还坐着的这一边，开始动起来。所有的人逐步站起来，开始随便交谈。斯沃博达走近我说，现在为时已晚，我必须签字。切尔尼克说得实际，假如我们现在不签字，他们将来可能会强迫我们签署糟糕得多的东西。斯姆尔科夫斯基不能肯定，但是他说，如果我们考虑一切，没有选择余地，我们必须签署议定书。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他谈了同1939年哈赫总统从柏林回国的比较。“他们成功地放慢事态的发展，拯救许多人，”他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斯姆尔科夫斯基一生信仰的结束，因为他找不出纳粹分子和苏联领导之间的差别。

经过许多讨论和几乎每个人的说服，我不情愿地回到与早晨采取的近似的立场。在这段时间内，夜幕降临了，准备举行新的

会晤。我们在同一个会议厅会见，坐在同一张桌旁。

在这最后一次会晤上，已没有任何讲话。这可能是为了避免不同意见再次爆发出来。我们直接开始逐段分析研究议定书。苏联人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几处改动。我关心的主要是部队撤走问题。通过修改议定书第五点的提法，这部分地达到了，虽则不像我所希望的那么明显。

可惜，为了让苏联承担虽未具体写明、但可能撤走部队包括将其撤出大城市的义务，我们不得不特别是在干部问题上作出自己的让步，从联合国安理会撤回对入侵的控告。勃列日涅夫和其他的人在过去几天的一切会见中都坚持这两点。而当要搞书面文件，尽管该文件按照他们的意见应当是机密的，他们不愿意正式写上其要求。但勃列日涅夫口头上明确坚持要我们让他们显然的代理人留任，并相反地解除一些改革派的职务。他明确地表明，如果他们在可能撤走部队问题上的确应当对我们作出某种让步的话，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满足上述两项要求。

还讨论了议定书范围之外的几件事，其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把在未被承认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一定数量的中央委员，补进现有的捷共中央的原则。我对勃列日涅夫说，宣布代表大会无效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因为大多数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必须以某种方法对他们的意志表示尊重。解决办法之一是将其中的一些人吸收到现存的中央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对此未直接拒绝，这样我们就得以在议定书中及其周围赢得一个可回旋的“灰区”。

午夜之前不久，经过修改加工的议定书拟好待签。

我不能预料，我们争得的最后改动有什么实际意义。我感到伤心、疲惫、屈辱。当他们带经修改加工和重新打印的议定书来签字，放进摄像师和摄影师时，这些感觉是最强烈的。勃列日涅夫在此虽忽略了一个不好办的细节，却记得作广告。我们签署的议定书是机密的，无论如何应当保密！

时为子夜之前不久，星期二凌晨两点来钟我们应离开乘飞机回国。在他们给我们送某种茶点时，我环顾四周，寻找克里格尔，看他是否已同我们会合。我没看见他，大声问他在哪里。为什么他没同我们在一起呢？

可以看出，苏联人不愿让他同我们一起返回布拉格。勃列日涅夫所说的理由是，惟一未签署议定书的人在场可能造成政治困难。我拒绝把克里格尔留在那里，斯沃博达、斯姆尔科夫斯基、西蒙等人在这点上也坚决支持我。最后，勃列日涅夫让步了。我们应当出发去机场，勃列日涅夫允诺，克里格尔也将在那里。我们抵达机场后，在未弄清他是否真的在那里以前，拒绝登机。他已在飞机上等着我们。新的时期开始之前，就不是很信任。

起飞后，我们的一切思想转向国内。我们清楚，这不是荣归故里。我们带回的消息，只有很少的人喜欢听。我们打了一次败仗，但形象地说，避免了战争。我们当中的六人被俘而不是出游归来。

我们带回的消息，很难说是出人意料的。此外，我们对议定书可公开说的，极其有限。当飞机慢慢降落，我意识到，这是我直接面临的任务的最困难之处。如何不将全部真相说出，而又不说假话呢？

24

正常化之始

8 月底开始的时期，是众所周知的“正常化”时期。还记得这一时期的人中，很少有能回忆起它而不感到憎恶和不进行辛辣讽刺的。

对人们来说，这些天最复杂的方面之一必定是大众媒体性质的突然改变。一般使用其自然意义的词语，突然颠倒过来，从而形成苏联人强加给我们的颠倒用语。这是个大花招，其背后斗争在继续进行。

“正常化”一词首次出现在苏联的莫斯科议定书草案中。但它未引起我方的任何特别注意。我们把注意为集中在我们知道同我们关系最大的事情，如入侵的合法性或能确定占领是暂时的声明的重要性上。与此相比，正常化这一概念看来并非就是不祥的。我们觉得，在入侵之后使事情走上正轨是个自然而然的要求。不过，对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苏联领导和我们有不同看法。

不仅议定书，而且我们努力改变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政策的方向的整个时期，都充满模棱两可。苏联人几次带着傲慢的自信对我们说，不管我们做什么，时间都对他们有利。我毫不怀疑，他们的意图是只要条件允许，就实行限制。相反地，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决心只要能够抵制干涉，就抵制。

我们处在特殊的境遇之中。一方面，我国被大军占领，他们通过威胁要进行血腥镇压把议定书强加给我们。另一方面，我们的对手遭到挫折，未能找到可取的、可为侵略辩解的政治解决办

法。他们找到的摆脱这一僵局的部分出路，是不得不释放我们，甚至把我们重新安到原来的职务上。这证实了一个刺刀价值有限的古老真理：可用刺刀做许多事情，但不能坐在刺刀上。

虽然我们的情况不是毫无希望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在斗争中是比较弱的。如何继续进行抵抗，有许多方法。但一切取决于我们队伍的团结，上面干部、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之间的团结。

至于说到上面的团结，我们被迫留用的仆从使情况复杂化，同时相反地我们不得不撤换几名重要的改革派。在正常化早期，我们还有某种自由挑选人来接替对苏联人来说不可接受的人；而他们在我们队伍中的代理人大家又很熟悉，公众有效地使他们难于起作用。

比较严重的任务是维护我们和公众之间的团结。关于克里姆林宫里发生了什么的正式消息，是以“双边”公报的形式提供的，公报是苏联人发表的，所包含的全是谎言和废话。我们在莫斯科滞留被描写成“同志式的访问”，就议定书文本进行的争吵被说成是“同志式的讨论”。因此，我国公民可能有这样的印象：我们在莫斯科放弃了人道的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我们完全屈服了。

非常艰巨的说明新形势的任务主要落在我的身上。我们商定，由斯沃博达先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分别向政府和国民议会通报。我的任务是8月27日令人难受的那一天晚上六点半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表讲话，向公众作报告。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的公开讲话计划在随后几天发表。

在我写好讲话稿时，我已知道，斯沃博达总统说了什么。斯沃博达的讲话与在莫斯科的表现相反，非常乐观，甚至有反抗性。他说，我们“一步也不”从我们以往的政策后退。但他的我们同苏联人达成其部队逐步完全撤走的协议的说法，是无法解释的。这种不正确的说法可能使人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他可能累了，没有时间修改其讲话起草者为其准备的东西。

我把一切别的事放在一边，对为我起草的讲话稿进行了重大修改，在现场直播宣读讲话时，也作了其它几处改动。我负有重大责任。全国每一台电视机和每一台收音机都打开了。儿童也收听。不仅观众和听众的数量出乎我的意外，而且我也意识到他们的思想处于什么状况。

我在可说什么方面受到限制，但我决定不说任何可能引起幻想的话。我在讲话中主要谈了四点。

首先，我未刺激苏联人，努力对人们在我们经历不快的遭遇期间所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其次，我明确告诉大家，我们失去了行动自由，并说我们今后的活动将“在不仅仅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开展。再次，我宣布，外国部队尽快完全撤走将是我们一切努力的最重要的目的。我想以此使斯沃博达此前的说法变得现实些，因为我们手中不掌握任何苏方承担的“义务”，而只有占领是“暂时的”说法。最后，我强调需要团结。我说：“只有我们步调一致才能确保我们今后政策的成功。”这不仅仅是声明，这是迫切的要求。

我难于控制感情。特别是当我读到说的不都是真话的部分，更是如此。我有两三次不得不强忍不让眼泪落下，哽咽得讲不下去。我指望于多年来和入侵之前数月来在居民中赢得的信任。我确信，我在这一艰难的时刻也不说谎话，而只不过是不能说比我所说的更多的话。

我想，我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我们的处境怎样以及我们面临着什么的现实图景。边界仍然开放，一切对未来感到担心害怕的人，都可自由离境。我的意图不是发动大规模外逃。只有入侵及其后果才造成十多万人在随后的几周离境出走。

我们回国后一两天，我也同在秘密召开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见面，代表大会从我被绑架的第二天即8月22日夜间直到我们从莫斯科回国，不断举行会议。代表大

会在布拉格维索昌尼区一家工厂的大厅里举行。苏联人查不出它举行的地点，或者我们在莫斯科谈判期间，他们不敢对它发起进攻。尽管工人纠察队指挥部的部分人属于改革的反对派，工人纠察队的队伍守卫整个地区。

新的中央委员会由公认的经济学家文内克·希尔汉教授领导，代表大会指定在我不在期间，由他代理我的职务。我向中央委员通报了苏联人强加给我们的承诺，包括宣布代表大会的结果无效。我向他们阐明自己的立场，同他们交流如何回避这些限制的想法。他们表示理解，答应予以支持。

局势富有爆炸性，因为对占领军的敌视增长了。公众知道，苏联领导未能建立叛徒政府，国际社会对其侵略进行谴责。入侵者查封了电视台，但地下的、后来还有公开合法的广播电台每天广播 24 小时。日报和周刊继续自由刊载，尽管其编辑部被占领。一句话，它们走入地下。

因此，公众显然认为我们的地位比实际真正的好得多。在我们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国民议会、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和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仍通过决议，把外国部队撤走作为主要要求之一。这些决议所提的虽然是正当的，可惜无希望实现。相反地，苏军司令部开始提出新的条件。甚至在商定的部队从人口密集的中心撤出——这是预计的部队撤走的第一阶段——以前就提出。比如，在布拉格他们坚持，在部队开始撤出以前，就要去掉一切反占领标语口号和声明。

各地居民都表现出对占领军的敌视。城市和乡村贴满反对占领的标语口号。全国交通运输标志被搞掉或挪动，以使占领者晕头转向。

到处在进行口头辩论。我们知道，占领军已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地区打死打伤数十名公民。局势真的富有爆炸性。我们有重大理由担心进一步大流血。

因此，我们决定向公众发出紧急号召，要求他们在为部队撤走创造条件方面给予理解和进行合作。在号召书上签字的有总统、国民议会主席、政府总理和我，用的是党中央的名义。同时，我们成立了由各最高组织的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解决因占领军驻扎而产生的技术问题。负责同苏军司令部联络的军事小组是这一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确迫切需要某种机制来解决地方的特殊问题，因为其中一些问题有失控的危险。

我不断同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斯沃博达磋商问题。整个捷共中央主席团包括中央书记，其中只缺据说因患病而住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的英德拉一人，在我们回国的当天夜里见了短暂一面，然后又于8月28日星期三见面。地点仍在总统府。苏联部队继续占领中央办公厅以及其它许多建筑物，包括出版社、编辑部、甚至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

我们不得不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是指示外交部长伊·哈耶克要求从联合国安理会议程上撤回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告。这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的最坚决的要求之一，假如我们不予以满足，他们对撤军就会根本不加以考虑。同样地，由于苏联坚决要求"控制报刊和其它大众媒体"，我们也不得不采取某种措施。俄文本议定书使用的词语是"弗拉杰尼耶"，这译成捷克语或斯洛伐克语时只能译作"控制"，这实际上极好地表达了苏联对必须如何对待大众媒体的理解。

我的改革派同事和我都不能接受苏联的这一"控制"想法，这种想法也违背他们自己的宪法。我国的新闻自由从今春以来就受到保障。我们也取消了新闻检查。正如我们在莫斯科就已指出的，回到1月以前的状态是非法的。有些历史学家时至今日还相信，入侵的最初目的是粉碎我国的新闻自由。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做点什么，以便向苏联人表明，我们在这方面正在采取某种措施。但与此同时，我们仍努力忠于我国的原则，遵守本国

的法律。外国部队的驻扎在这点上反而帮了我们的忙。议定书第一条涉及侵略军的笨拙提法，使我们能采用“对新闻进行暂时控制”的想法，作为因国家被“暂时”占领而采取的措施。

政府设立暂时的报刊新闻局。我们要求一位以同情我们的改革闻名的编辑，主持这一机构的工作，他接受了这一职务。该局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根据自愿限制进行工作。这不是发表前的审查，我们也无意这么做。

自然，苏联领导对此不喜欢。他们认为这做得不够，不断对我施加压力，要我不仅实行诺沃提尼时期的严格检查，而且甚至对大众媒体进行斯大林独裁年代推行的完全控制。在这些问题上，我从未屈从。苏联人不得不又等八个多月，才如愿以偿。我的后任古·胡萨克决定这么做。

我们从莫斯科回国时，在布拉迪斯拉发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为期两天的斯洛伐克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8 月 29 日闭幕的代表大会，充满入侵前时期的思想自由精神，这种精神与其说是受到残暴占领的惊吓，倒不如说是因此而得到加强。代表大会选举了斯洛伐克新的领导，把老教条主义路线的代表和苏联的代理人完全排除在外。最重要的结果是撤销瓦西尔·比拉克的斯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选举古斯塔夫·胡萨克取代他。

胡萨克直到入侵前的最后一天，采取民主改革忠实支持者的态度。多数代表认为他同比拉克正好相反。的确，他们互相不喜欢，比拉克长期认为胡萨克是个自由派和沙龙式共产党人，前斯大林主义信徒就把他当作这样的人。战前就属于名列前茅的共产党知识分子的胡萨克，难于掩饰自己看不起枯燥乏味的比拉克。

简而言之，假如胡萨克在这之前不一再表示支持民主化进程，不表示自己个人忠于我，代表大会无论何时也不会选举他为第一书记。今天我可补充：假如代表们了解他在莫斯科的表现，也不会选他。比如他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了这样的话：“我完全支

持杜布切克的政策，我参与了这一政策的制定，将完全支持杜布切克。我或者同他一起留下，或者同他一起离开。”代表大会闭幕时也一致通过给我的公开信，信中说：

“亲爱的杜布切克同志！在你同主观权力的政权作斗争的那些困难时刻以及在你1968年1月以后为新的、健康的变革而斗争期间，我们同你在一起。在最近几天的那些紧张时刻，我们站在你的一边。我们过去思想上同你在一起，今后行动上也将同你在一起。我们知道，你面临许多困难任务。我们愿意同你在一起、在你的领导下来解决它们……”

他们在胡萨克主持大会的情况下通过该信。

我个人认为，胡萨克在1968年春夏采取支持改革的立场，是其痛苦经历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他在斯大林主义政权时期坐牢九年。胡萨克在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估计，苏联部队将在“数月”内撤走。这种乐观主义说起来肯定非常好听，却是荒谬的，我想他是知道的。人们只能猜测，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必须看到，党的宣传过去指责胡萨克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起了飞去来器的效果。在斯洛伐克人的心目中，此事现在从罪行变为优点。因此，胡萨克不论在莫斯科，还是现在都又开始打民族牌。他意识到，苏联人将支持他的这一努力。对斯洛伐克提出的国家联邦化的正当要求，苏联领导1945年、1948年、甚至1967年仍连听也不愿意听，可1968年8月以后却把它看作如果不是直接打败、至少也是削弱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有用工具。而胡萨克则应当成为他们的“扳道工”。

当然，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也表决通过要求国家联邦化的决议。正如行动纲领所已规定的。这是个由来已久的、正当的要求，可惜如今正在令人感到遗憾的情况下实现。捷克地区和斯洛

伐克的诺沃提尼旧政权的领导人竭力利用它来使改革政策归于失败。

两天以后，8月31日日，捷共中央在布拉格总统府召开会议。会议为期一天，议程主要有两点。首先，向中央委员会通报在莫斯科“谈判”情况，并要求予以批准；其次，进行苏联人要求作出和我们在这期间建议作出的干部变动。我就第一点作了主要报告，谈了比在电视广播里可说的多得多的细节。我说明，我们并不是自愿地接受“议定书”的。但我同时又解释，我们为什么认为，即使在强加的协议造成的条件下，我们也还有希望捍卫我国的改革，尽管进行改革将困难、缓慢得多。我们的当务之急，首先仍然是占领军尽快撤走。

在斯沃博达总统发表简短的声明以后，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传达了议定书的具体内容。接着，进行了短时间的讨论。中央委员会现在既对我们在莫斯科会谈的实际情况，也对正在开始的“正常化”，有个清楚的了解。会议表决通过议定书，其中特别有两点对党的事务影响最大，这就是宣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无效和把下一次代表大会推迟到“正常化”结束时才举行。

在同一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捷克地区共产党人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这是在实现国家联邦化和比较对称的政治安排方面的重要一步。当时，从组织方面来说没有捷克共产党，而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从属于它的斯洛伐克共产党。因此，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党员都欢迎建立捷克共产党的想法，因为这样的党可消除旧的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不正常状况，以两个平等的党取代它，而这两个党又可根据需要自由地建立联合的联邦党组织。议定书中没有什么东西可排除这种步骤，但这一步骤后来却成为苏联人决定阻止的东西。

几个反对改革的委员，点名说就是比拉克、科尔德尔和雅盖什，要求发表“声明”，在中央委员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激动，甚至

开心。同时，比拉克及其同伙回避明确地说，他们未要求苏联人来和保护其政治地位。他们代之“以自己的人格”一般地、煞有介事地保证，他们从来没有、最近十天也没有干什么坏事。这与其说是使听众信服，倒不如说是使他们开心。比拉克在自己大约15年后写的回忆录中清楚表明，整个集团根据同占领势力达成的秘密协议策划政变，并继续同它们合作。这就是这些人的“人格”。

我在讨论第二点时建议作出的干部变动，对我国改革要继续进行具有重大意义。正如我们事先计划好的，秘密召开的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也出席会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人，优先出席。我努力将其中的80人吸收到现有的中央委员会，并据此改组主席团。我相信，这两个步骤至少将部分承认民主当选代表的意志的有效性，巩固改革力量在党的领导中的地位，加强我们今后同苏联人讨论对议定书的解释时的力量。

从策略观点看重要的是，议定书未明确禁止这一做法。它也未对我们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代表选举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它只要求将代表大会推迟到国内局势“正常化”的时候举行。根据我们的这一理解，当选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未失去资格，我们不必举行新的代表选举。中央委员会通过我的两个建议。我们也递补了另外七名前中央候补委员为中央正式委员。

然后，新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改组主席团，从中剔除比拉克和英德拉集团中苏联人未明确坚持要留下的三人科尔德尔、里戈和什维斯特卡。他们的另一个同路人、主席团候补委员安东宁·卡佩克也落选了。可惜，根据苏联领导的明确要求，弗兰季舍克·克里格尔也不得不离开主席团，切斯特米尔·齐萨日则离开书记处。但中央委员会又给主席团增添了另外15名新委员，包括当选为名誉委员的斯沃博达总统。

所有新委员在我国复兴进程的几个月中都对改革表示完全支

持。在新主席团中，还有前社会民主党人埃夫任·埃尔班，他取代克里格尔担任民族阵线主席职务。胡萨克作为斯共中央新的第一书记，也当上了主席团委员。这些措施意味着在党的最高机构中大大削弱反对改革的势力，但在占领的条件下已不能相应地发挥作用。中央委员会也撤销了奥尔德日赫·什维斯特卡的《红色权利报》总编辑职务。

中央委员会这次在布拉格总统府举行会议期间，正好在就吸收新委员进行表决之前，勃列日涅夫给我打电话。有人显然不断向他报告会议的情况。

“那里发生什么事？”勃列日涅夫急着问。“你们努力把谁带进中央委员会？”

正确的应当是告诉他，这不是他的事。但我国的情况迫使我顶住诱惑。我代之以坚持自己的打算。

“我们要扩大中央委员会，增加 87 名新委员，”我答道。“其中七名是前候补委员。其他的由州委书记从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提名。”

“这不是改变中央委员会组成的民主方法，”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感到喜欢的是，正好是他谈民主方法。其最新的民主方法以坦克涌上布拉格桥头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是必要的妥协，”我说。“我已对您说过，我们将这么做，”我补充道。

“您没说，他们会这么多。”他提高声音答道。

“您也没说，他们应当是多少。所以我以为，87 这个数目合适。”

当他无礼地回答：“他们太多了，这我不喜欢。”我想像得到他双眉紧蹙。

“现在对这不论怎么办都已经晚了，”我不屈从。“如果我们在

这个时刻提议改变，每个人都会知道，是您下的命令。他们都知道，您叫我。”

他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不得不（不情愿地）让步。

满足苏联对干部变动的其它要求已是政府的事了。苏联领导特别坚持要撤换内务部长约瑟夫·帕维尔。接替他的是比尔森党的州委书记扬·佩尔纳日，那不是什么激进派，但也不是改革的反对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台长兹德涅克·海兹拉尔和伊日·佩利康也不得不离职，但我们不许已知的苏联代理人取代他们。但我们同时自己撤换了捷通社和邮电部的领导人，他们在入侵过程中表明是苏联的直接代理人。

正常化的第一个时期通过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改组、政府和大众媒体的干部变动而告结束。当我们考虑了一切，证实了我们的信念，不是一切全完了，通过适当和有目的的行动我们仍可保持许多夺得的阵地。我们队伍当时仍然占优势的团结，居民的支持，提供进行有效的沉默抵抗的可能性。我迫切地意识到，必须保持这种团结。不过对手也意识到，这会产生什么。

25

退　却

我从莫斯科回国以后不久，安娜也从医院来看我，这样我们就静静而又高兴地在家中小坐片刻。要知道我只差毫发就摆脱不了险境，难道不是吗？我父亲感到不适，可他也来了，发生的事动摇了他所相信的一切。一年以后，他去世了。

我承认，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对家庭的事可能说得不多。但这不应当被理解为享受和珍惜家庭生活的能力不足。我终究除了同自己的家庭以外，从来没有别的私生活，我坚信私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应当尊重政治家的隐私权。

我很少提到自己家庭的成员，这不应当使读者认为，我不尊重他们、不依靠他们的支持。首先，我的妻子勇敢地支持我，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也支持我。当我们1968年8月底全家团聚时，我们知道，我们今后面临着比过去更难巨的考验。

* *　　* *　　* *

入侵之后，退却的时期到来了。别无它法。我们管理被占领国家的事务，苏联冲锋枪枪口和大炮炮口几乎瞄准每个举动。但正如我已说过的，武器的力量有限。

当我谈退却时，有件事必须说明。在1969年4月以前，退却任何时刻也不像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那样，是灾难性的。至少从我和我的盟友的方面来说，那是有组织的退却，未进行深思熟虑

的抵抗，我们一寸土地也不放弃。直到1969年4月胡萨克就任党的新第一书记，未进行清洗、逮捕和迫害。我们甚至继续为过去镇压的受害者恢复名誉。不论如何，新闻仍然是自由的。无论哪个科学家或记者都不以擦窗子为生，文化生活又丰富了，到国外旅游也仍然不受限制。要保持获得的阵地，就要有抵制日益增长的采用新斯大林主义做法的压力的政治意愿和决心。

那肯定不是光荣的时期。我们不能继续执行扩大民主改革的政策，只能捍卫过去取得、现在尚存的成果。为了防止更糟得多的情况发生，我们被迫作出惨痛的、屈辱性的让步。我不能说，我为那个时期感到骄傲，或者回忆起它不感到痛苦。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队伍中有些人当了逃兵，出现了新的自愿从事超额劳动的人，出现了野心家，他们感到机会来了。

我提请读者注意我们在莫斯科"谈判"时反对的四个基本点：不承认入侵和占领的合法性；不承认有"反革命"；不接受对我们对"华沙信件"的复信的批评；坚持行动纲领。我个人感到，我要么必须坚定地坚持所有四点，要么必须辞职。放弃其中的任何一点，就会打开镇压的闸门。在公开讲话中，我略微隐晦地提醒，假如我们放弃这些原则，将带来"无穷的后果"。不幸让我言中。

失去诸如弗·克里格尔、约·帕维尔、奥·希克等这样的改革的忠实支持者，使我特别痛心。我们理智上理解在这些要求上向苏联的压力让步不可避免，不过这未使我的感情大变。切尔尼克或我与每位离任的同事都见了面，他们毫无例外地对此表示理解。我们在国家管理机构为他们所有的人安排不错的位置。有些到国外当外交官。比如伊日·佩利康被任命为我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参赞。

弗·克里格尔自己决定放弃主席团委员和民族阵线主席职务。他仍当中央委员和国民议会议员。我必须承认，克里格尔不仅有理由对长期抵抗的前景感到悲观，而且他也认为，整个"有

组织的退却”政策没有意义。但他同时又提不出任何合理的解决办法，而这从我的务实观点来看是难于理解的。因此，我们未达成一致。不过，我们还是朋友。我向他保证，只要我当第一书记，绝不允许让他受到迫害。我履行了这一诺言。

的确，产生了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尽管我们得以阻止把最糟糕的措施列入莫斯科协议，议定书作为一个整体和占领军呆在我们背后使得很难执行积极的政策。而我们非常需要的正是积极政策。这从捷克和斯洛伐克公众的观点来看也是异常重要的，因为完全失去前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道德败坏。

8 月底的中央会议以后，我很快就提出把行动纲领还可执行之点理出来。占领表明，有目的公开推动保障公民诸如结社自由的权利，正式鼓励成立新的自愿组织，都不能考虑。我们只能保持和捍卫我们已经取得的东西。但我终究看到有两个方面，可继续执行行动纲领而又不冒同苏联人进行直接斗争的风险，即实行国家联邦化和经济改革的计划。

联邦化的步骤立刻就采取。捷克民族议会代表团 9 月就到布拉迪斯拉发来进行会谈。政府 10 月初通过宪法性法律草案，几天后提交给国民议会。议会 10 月 27 日通过该法律。斯沃博达总统三天后来布拉迪斯拉发签署文件，届时在布拉迪斯拉发宫举行隆重仪式。

所定时间完全不是偶然的。隆重宣告捷克与斯洛伐克联邦成立之日，恰好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于 1918 年成立 50 周年。苏联人对这一进程未进行干预。他们有自己的指导联邦制运行的方法。其目的是在布拉格恢复听话的政权中心。但 1968 年秋国家的联邦化对我们来说是个伟大成就。它帮助维持行动纲领的生命，满足斯洛伐克民族的历史要求。从短期的观点看，它后来遭到可悲的失败，但从长远的观点看，联邦存在的时间应当比勃列日涅夫和胡萨克时代长。

正如我已提到过的，国家联邦化的政治后果之一应当是建立单独的捷克共产党，以便使共和国新的政治结构平衡些。今后捷共应开展一体化和协调活动，而不应当干预两个民族政党的内部事务。难怪我们在这方面很快遭到苏联的直接反对，这为下次捷共中央会议的筹备工作投上阴影。

苏联人开始毫不退让、一步步压制我国的改革。他们插手各级的问题，“提拿鬼魂”。我们尽可能捍卫我国的事业。9月底我们取得重大成就，苏军部队撤出大城市，从而稍微限制对武力的直接使用。在占领的最初几周，残暴的干预并非罕见。比如在俄斯特拉发，苏军的一支分队一再占领州报《新自由报》编辑部。9月中，他们绑架了其编辑伊万·库比切克，并威胁说，如果他不放弃新闻工作，就要杀他。只有在我们提出坚决抗议以后，他才获释。

即使苏联人撤离市区，对我国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的压力因此而略撤缓和，党政机构内部的瘫痪程度仍不断提高。

10月，他们试验强迫我们签订使在我国领土上驻军合法化的“条约”的方法。因为他们的吉斯林代理人未能代其做这一工作，他们就决定通过进行直接恫吓来推行之。

10月初，他们便把切尔尼克、胡萨克和我叫到莫斯科进行“会谈”。他们不让我们挑选代表团团员。他们自己挑选，未把斯姆尔科夫斯基列人。我第一次面对苏联领导而没有这位最亲密的盟友在身边。

我们于10月3日会见。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像以往一样，贯彻自己对“正常化”的理解，而不考虑我的反应。尽管如此，我还是表示了立场。同时，对应调整苏联部队在我国领土上留驻的“条约”，未进行任何讨论。我们回国后，党的主席团于10月10日讨论我们此行的结果，不过仍然没有要发生什么的明显迹象。

1968年10月14日，柯西金命令切尔尼克返回莫斯科。在那里他们对他说，关于苏联部队在我国留驻的“条约”应当在两天内签署。他们把这变成纯粹政府的事，而完全无视我和党的领导。切尔尼克刚回到国内，柯西金同格列奇科元帅一起就在布拉格降落，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斯沃博达总统，“条约”必须立即签署。同时他们明确地表明，另一种解决办法将是再次占领布拉格和其它城市。

斯沃博达未表示反对。我们拼命努力寻求拒绝这一最新强制命令的办法。但柯西金和格列奇科根本不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能按正常的程序批准“条约”。“条约”必须立即当场签署，国民议会也被以同样的方法强迫批准。

在正常的情况下，议会的三个委员会会分头仔细研究“条约”文本。但在柯西金的压力下，却召开三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尽管如此，事先听取外交部副部长报告的三个委员会，也拒绝“条约”草案。

他们立刻对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威胁说，如果反抗继续下去，一切后果都可能产生。格列奇科威胁要命令部队重新占领人口密集的中心，也提到其它的直接威胁，其中也可能包括逮捕。所有威胁的话都是口头说的，无论哪儿也不作记录。我们连忙怀着沉重的心情作出决定，如果“条约”明确确定占领是暂时的，可获得通过。尽管如此，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只要是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它也是非法的。

于是，10月18日，难过的、有三百名议员的国民议会，就愤然通过“条约”。四票反对，十票弃权。我们同斯姆尔科夫斯基一起，如同大多数议员一样，出于策略原因投了“赞成”票。我知道，全国许多人对我们的表决感到震惊，尽管他们对粗暴的讹诈迫使我们这么做表示理解。我个人把我们的表决当作避免我国城市被重新占领、接着不免燃起怒火的方法。由于条约确定占领是

“暂时的”、占领是在非法的条件下发生的，我不认为条约是有效的，更不认为它可使占领本身合法化。不过，另一方面并不意味着，那不是非常痛苦的表决。

10 月和 11 月上半月，我访问了捷克地区和斯洛伐克的一些工厂，努力说明我们的地位和我们不得不在其中生活的条件。当我看到，许多人不理解形势的复杂性，我感到悲观失望。他们仍然支持我们，但同时厌恶对苏联人的让步。有些人的行动使人觉得，似乎国家未被占领，我们可做自己想到的事。自然而坦率的沟通越来越不够。

同时，苏联人掀起直接指责党内改革派力量从事“犯罪活动”的运动。首先采用“健康力量”的提法，意在鼓励投敌者和叛徒。他们队伍中的极端分子开始在苏联人的支持下组织起来。我们很快就处在敌人的交叉火力之下，他们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而我们（没有不久以前有过的坦率沟通）找不到通过战场的道路。

在这种气氛中，我们试图筹备 11 月捷共中央会议。对其作为一种能引导事态发展的力量的决定，我们赋予巨大意义。

我们在主席团仍然拥有足够的、支持占领前的改革政策的多数。我们起草了决议草案，有几点内容我认为是重要的。

首先我们强烈谴责 1968 年 1 月以前旧政权的政治实践，如果我们考虑到入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恢复这种实践的话，这是重要的。我们继续强调经济改革，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经济改革的理由。行动纲领再次被确认为对今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

虽然这里有巨大障碍，我们表面上强调，我们不做什么破坏莫斯科议定书的事。我们也被迫放慢组建捷克共产党的速度，建党工作停留在筹备阶段。我们成立了捷克地区党务管理局。可惜，前部分改革派、不久之后表现为正常化派的卢博米尔·什特劳加

尔[1]，当选为这一机构的主席。我未插手，因我作为斯洛伐克人不想太过问捷克共产党干部的选拔。可惜什特劳加尔在党的领导中的地位加强了。他以后的表现可同胡萨克相比。他们两人当时要对削弱我们的防线负最大责任。

尽管如此，11月中央会议的结果不能说仅仅是消极的。入侵后三个月，我们仍然能捍卫相当大部分改革，这后来在关于这次会议的评论中并非总是得到足够的评价。

在布拉格举行11月会议的同时，波兰共产党代表大会在华沙召开，勃列日涅夫率领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出席。我突然想起，把我们的决议草案带到华沙，让勃列日涅夫过目。在当前情况下，我不把这看作是什么屈辱的事。对此，我毋宁说是从策略的观点来理解。如果勃列日涅夫批准草案，这可减缓捷共内部极端保守派的上升。我觉得，正如我对他所了解的，他将因我们征求其意见而感到高兴。

从这一点看，我没有错。勃列日涅夫在草案中未找到任何他可反对的东西。但我犯了一个错误，除带切尔尼克外，把胡萨克也带上了。我认为，如果我们仍然是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时勃列日涅夫挑选的那三个人，将有助于事。我未料到胡萨克会带来什么困难，因为在起草11月决议时，他对其无任何保留。但是，他在华沙突然（未事先对我提到过）对勃列日涅夫说，决议应当包含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谴责。正如可料到的，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这一想法，坚持要我们把它写入决议。切尔尼克犹豫不决地同意这一意见，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予以考虑。

胡萨克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他越来越成为勃列日涅夫的走

---

[1] 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1924— ），1959年起先后任捷农林水利部长和内务部长，1965年当选为捷共中央书记，1968年任副总理。反对苏联入侵，但后来逐步变为“正常化派”。1968年11月起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克地区党务管理局主席，1970—1988年任总理。

狗。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右倾机会主义”要把反对作出新的让步及坚定支持改革政策的人分开。我知道，我也将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虽则他们对我尚未立即如此称呼。

我从来不喜欢这个自列宁时期起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使用的贬义词。我认为“修正主义”和“反革命”的概念是错误和危险的，因为它们不止一次成为镇压的借口。诚然，“右倾机会主义”属于这一范畴。我担心，通过这样的提法是个严重错误，我的拥护者将对此感到失望。最后，我在压力下得出结论，这不意味着接受苏联的“反革命”概念，换取勃列日涅夫支持整个决议可能是值得的。政治的确难得是简单的事。

我们凌晨从华沙归来，决议未遭到大力反对，迅速获得通过。甚至“石器时代的斗士”获悉勃列日涅夫为决议“祝福”后，也投票赞成。根据我们继续贯彻行动纲领的决心，我们乐观地把决议称为“党在今后时期的主要任务”。

令人难过的是，决议引起了普遍不同意的大浪潮，尤其在捷克地区更是如此。布拉格和布尔诺的大学生举行三天罢课，几个知识分子组织的协会在指出决议的调和方面时，批评11月中央会议背叛“布拉格之春”和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之春。这使我非常伤心，因为我对此不这样看。改革运动各部分之间沟通和理解的可能性又削弱了。

我必须承认，我同捷克的某些改革派可能不总是互相理解。我确信，我在许多情况下采取比较清醒的立场，并相信较有耐心，而不愿冲动行事。我的天生的斯洛伐克谨慎小心有时被不正确地解释为犹豫不决。

1968年年底，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公开态度在许多方面背道而驰。8月份，对苏联入侵的愤怒在国家的两个地区同样强烈。如今，捷克的态度朝着忽视我国抵抗的合理可能性的方向，越来越激进化。在斯洛伐克，局势稳定得多。我认为，这不是迁就占

领或无可奈何。这肯定不仅仅是胡萨克玩弄手法的结果。斯相对平静与其优先的问题和捷克不同以及有较大程度的现实主义有关。除胡萨克和比拉克外，仇恨也未像影响斯洛伐克反对派政治家的对手之间的关系那样，影响斯反对派政治家之间的关系。这是两种不同政治现实的后果。1969 年 4 月以后，我又发现，无可奈何的情绪在捷克地区传播比在斯洛伐克快得多，同时具有某种虚无主义的特点。

* *　　* *　　* *

11 月会议以后三个星期，他们又把我们召到苏联。这次是到基辅。勃列日涅夫又要同我们“讨论我国的局势”。苏联人也就我国代表团的组成提出“建议”：斯沃博达、切尔尼克、胡萨克、什特劳加尔和我。我开始慢慢“处于”随机应变者之中。

在我们出发之前，主席团内对如何介绍我国局势没有分歧。会晤开始时，我根据勃列日涅夫不久前批准的决议，报告我国国内局势。讨论平静地进行，似乎不会发生不快的意外。后来，什特劳加尔突然说：“我们应当解决我国的干部问题，特别是在县一级。”他事先未以暗示警告我，他将提出这一危险的建议。其实质是，我们应该将在“布拉格之春”时期当选的成千上万地方干部撤职。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在地方和县一级发动清洗，这种清洗不可避免地会方向朝上继续进行下去。

对我而言，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勃列日涅夫听到此，当然感到高兴。他用手掌拍桌以示赞同，并说：“什特劳加尔同志的建议提得对！”胡萨克急忙支持什特劳加尔的建议。显然，我们被分化瓦解了。斯沃博达一声不吭，似乎不在那里。切尔尼克也是消极的。我表示反对，援引法律准则和党规加以说明。我的处境因此而不妙。

在这次灾难性的基辅之行以后，我又开始认真考虑辞去第一书记职务问题。对我们改革政策的支持，受到严重破坏。“正常化”的新帮凶胡萨克和什特劳加尔自诩为“现实主义者”，同先前的代理人和 8 月 21 日的通敌者一起搞阴谋。公民尤其是捷克地区的公民，越来越闹不清，应该支持谁和什么。作为一项有组织的、协调的政策开始的退却，有变成彻底失败的危险。

我如同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特别是斯姆尔科夫斯基一样，有这样的想法。我自问：“如果我正好现在下台，会发生什么？”但是，这样的举动无疑会加强极端保守派，更加加快放弃改革。斯姆尔科夫斯基说，在我辞职后，什特劳加尔和胡萨克已要求进行的清洗，就会跟着来，其它迫害会继续进行下去。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指出，我们坚持的时间越长，那些受到即将发生的政变威胁的人，就可作越好的准备。

我听取了并加以考虑。在我看来，有两种失败。被苏联人打败是一回事，被叛徒和只关心自己的政客出卖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决定暂不弃职。许多年之后，我也不能肯定，我应当何时下台。归根结蒂，由于我决定留任，走狗接管的时间推迟了四五个月。

1968 年的圣诞节是不平静的。

26

背叛之果

1968年圣诞节，胡萨克发表电视讲话，要求由“斯洛伐克民族的领导人”担任新的议会主席。

胡萨克此举的时间选择在实行国家联邦制之前。从1969年1月1日起，国民议会应当变成联邦议会。

胡萨克利用向联邦化过渡，要求国家的四个最高政治职务，由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平分。当时，总统、政府总理和议会主席职务，由捷克人斯洛博达、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担任。只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一职，由我这个斯洛伐克人担任。

胡萨克事先未同我讨论其“倡议”，而是突然、没有提醒就提出要求。那是个肯定会提高其在苏联眼中地位的策略步骤。我怀疑，他事先同苏联人商量过。他必然对此感到高兴。

在正常情况下可预期，他意在争取政府总理职务，而非议会主席职务。但是，他不仅仅致力于贯彻由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平分最高职务的原则。他还追求别的目的。从这一观点看，要求由斯洛伐克人取代切尔尼克总理，政治上给他带来的就少了。切尔尼克当时已动摇不定，胡萨克不把他看作自己实行进一步计划的障碍。他此举是针对苏联人想要搞掉、因此经常在报刊上进行攻击的我的主要盟友。肯定并非偶然的是，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流传苏联人策划搞的颠覆性小册子，他们在书中把斯姆尔科夫斯基称为“两面派政客”。现在，对其正中下怀。

胡萨克的狡诈堪称典范。不论他运用民族原则多么虚伪，他

的要求基本上是正当的，不能不予以考虑。我因此而陷入特别困难的境地，因为我如果不失去斯洛伐克的支持，就驳不倒他的论据。另一方面，如果我什么也不采取，在捷克人中就要为此而付出代价。我预见到此举不可避免的可悲后果。如果斯姆尔科夫斯基失去作为联邦议会主席的地位，他也将失去在党的主席团的地位，因为长期的作法把这两个职务连在了一起。胡萨克从背后扎上一刀，意味着从 1968 年 8 月至 1969 年 4 月这一时期一切背叛中最恶劣的背叛。

斯姆尔科夫斯基立即理解胡萨克此举的意图，并即刻去职，省得我为难。取代斯姆尔科夫斯基的是斯洛伐克人彼得·佐洛特卡，他在这之前刚被任命为第一届联邦政府副总理。斯姆尔科夫斯基后来当选为联邦议会副主席和人民院主席。

最高领导中的新人彼·佐洛特卡是个 44 岁的法学家。他从 1966 年起为斯共中央委员，从 1963 年起担任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司法部长。他还担任捷克斯洛伐克驻海牙国际法庭代表。他 1969 年得以高升，为此特别感激胡萨克的支持。我们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上算的。1969 年 4 月，佐洛特卡取代斯姆尔科夫斯基在捷共中央主席团的职务，后来在被占领制度下长期担任最高职务，直到该制度于 1989 年灭亡。

搞掉斯姆尔科夫斯基的手法激起了巨大愤慨。最强烈的抗议来自捷克地区，斯姆尔科夫斯基在那里是个民族英雄。他勇敢地发表电视讲话，要求公众理解形势。他呼吁人们接受他离开议会主席之职，不要举行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

但是，把他撤职引起“布拉格之春”许多正直支持者的深切忿懑和失望，他们感到屈辱和被出卖。在这种愤激的气氛中，查理大学哲学系的青年学生扬·帕拉赫 1969 年 1 月 16 日在布拉格市中心自焚。人们把他送到医院，但他于两天后身亡。

帕拉赫的牺牲震惊全国。在这之前，类似的事件在捷克斯洛

伐克从未发生过（据我所知，在欧洲的其它地方也从未发生过）。这证明尤其是青年人面对在我国使用卑劣手法的外国压倒势力感到极度绝望。

几天以后，另一位青年人在比尔森效法帕拉赫的榜样。后来，在布尔诺和布拉格又发生两起引火自焚事件。这些稍晚的事件不大为人所知，因为政府努力隐瞒消息，以便防止公众重又感到不安。

我对这些自杀感到震惊。在帕拉赫作出生死攸关的姿态那天，我主持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委弗拉基米尔·寇茨基在会上建议撤销捷共中央主席团关于8月21日谴责苏联入侵的著名声明。幸好其建议遭到拒绝。但是，他当时就敢于提出这一问题，这清楚地表明，正在到来的是个怎样的时期。

我感到精疲力竭。我越来越怀疑我12月的留任决定的正确性。此外，我还得了难受的感冒、发高烧。中央会议后一天，1月18日，我去布拉迪斯拉发。我在家卧床一两天，然后不得不上医院。帕拉赫死时，我正好住院。在2月4日以前，我参加不了正式活动，以后又同病毒性疾病斗争了两个星期。

帕拉赫的葬礼变成捍卫我国改革政策和抗议苏联占领的大规模示威。人民对捷克斯洛伐克之春的深刻支持再次表现出来。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我国国内的反对者稍微放慢步伐，他们在公众中处境孤立仍然十分明显。尽管他们慢慢钻到国家的最高职位上去，还没有力量和勇气给予我们的改革政策以最后一击。为此，他们仍需要苏联人的“兄弟般援助”。

1969年3月，举行每年一次的世界冰球锦标赛，这次在斯德哥尔摩举行。3月28日，全国观看捷克斯洛伐克队同苏联队比赛。要知道，这不仅仅是冰球比赛。这是对残暴入侵的回敬，当我们在小组里以2∶0打败苏联人，我也感到激动。那就像个民族节日，赛后成千上万人涌上街头。每个人必然都注意到庆祝活动的反苏

色彩。但这同一周之后我们队在决赛中对苏联人的第二次胜利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这次我们以4：3取胜，大大地打击了苏联队的自信。

在我国，更多得多的人走上街头庆祝这一胜利。在布拉格本市，据估计有15万人左右聚集在一起。他们想互相鼓励。不过事实表明，苏联人及其在国家安全局的代理人也准备利用这一事件。

在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广场，一群化装成城市勤杂工的秘密警察，在苏联航空公司办事处前卸了一堆铺路石块。正如我们现在从警察局文件所了解的，整个行动由捷克内务部长、苏联代理人约瑟夫·格勒塞尔直接监督。他们的确利用我们队的胜利和预计会在广场上举行的庆祝活动。我不想在此助长曾出现过的苏联队是否得到故意输掉这场比赛的“劝告”的猜测，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事实是，他们通过输掉这场比赛，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给苏联对外政策帮了大忙。但我们队的拼搏真的堪称模范。

冰球赛的电视转播一结束，街上就迅速站满人。瓦茨拉夫广场人满为患。我们现在已知道，混在人群中的特务开始朝苏联航空公司橱窗扔石块。几个公民也同他们一起干。他们把橱窗砸坏了，仅此而已。这是导致对我们进行公开攻击的一系列事件的第一幕。攻击是有准备、协调一致的。

晚上11点左右，苏联人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对街上的公民进行干预。午夜前，国防部长马·楚尔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准许动用军队对付示威者。我表示拒绝并对他说，我无论何时也不会同意动用武装部队对付本国人民。最后，公安局未遇到大的困难，就控制了局势。

但是，苏联人及其走狗感到这是个机会，决定搞突然袭击。1969年3月31日，格列奇科元帅未通知我国当局，就降落在布拉格东北约40公里处的米洛维采军用机场。苏联人从入侵时起控制了该机场。他随身带来负责军事事务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V·S

·谢苗诺夫。4 月 1 日，格列奇科和谢苗诺夫就投入工作。格列奇科到我国国防部军事委员会，他在那里傲慢地提出纯政治性的要求：首先，实行新闻检查；其次，动用我国自己的武装部队镇压“反革命”。格列奇科威胁说，在继续举行示威的情况下，苏联部队将在自己驻地附近动用武器。

楚尔在我要在总统府会见格列奇科和谢苗诺夫之前不久，向我报告苏联的这些要求。谢苗诺夫向我递交苏方要求清单，我必须说，他比格列奇科更傲慢。我回答说，我国人民有权公开表达自己的喜或忧。我们已动用了足够的手段来维持公共秩序。我们决心不动用武力，我们牢靠地控制着局势。

没有任何反应。谢苗诺夫机械地重申其要求，似乎我什么也没说。除此之外，他还谈了几点对我国政治领导的非常消极的评价。此刻我知道，他们已决定强迫进行干部变动，以便最终粉碎反抗。

我对他的话考虑了片刻。然后，我要求他澄清。他的回答原话是：“必须砍掉反革命的脑袋。”这已像水晶一样透明。改革派，尤其是我本人，成了主要靶子。我不能想像，已受到相当大的孤立的我，怎么能继续顶住压力。11 月以来，我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情况大大地恶化了。斯姆尔科夫斯基有离任的危险。他虽仍然是主席团委员，但他的非常有限的地位和苏联继续进行的攻击，缩小了他的作用。在民众之中，他仍然非常受欢迎。但这已不像“坐在苏联坦克上”的人那么有份量。至于斯沃博达，他越来越束手无策、消极、甚至漠不关心。被压垮的切尔尼克，越来越迁就。我知道，我不能继续顶下去。

主席团中的改革派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对我的支持取决于一两票。我知道，我最后将不得不弃职，但我千方百计试图想出某种避免镇压的方法。

在这种心态下，我建议谢苗诺夫再次到我的办公室访问我，以

便在他走前谈一谈。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于1969年4月11日见面。在这之前一天，格列奇科元帅通知我军总参谋长鲁索夫将军，又一些为数8000人的苏联部队正向捷克斯洛伐克开来，这更使我愤慨。

谢苗诺夫开始提出新的要求，其中最具有侮辱性的是，要我们惩处捷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关于苏联入侵的文件一书的出版者约瑟夫·马采克院士，以儆效尤。该书在这之前不久出版，名为《黑皮书》。这本书的出版是新闻自由的表现，我们在入侵后约七个月还努力保持这种自由。

我对谢苗诺夫的话未作出反应，我的做法同他在我们早些时候见面时一样，不理他的话。我的印象是，他仍然期待我放弃主张，顺从地满足他们恢复过去时期所熟悉的警察国家的要求。他们显然还认为，由其名字最常同我国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人，来撤销改革最合适。

当然，我无论何时也不会这样做，我想，这对他们来说，在当时可能就已足够清楚了。我停顿了片刻后说，我必须考虑怎么做，才能既使他们感到满意，同时又使我仍忠于自己的原则。

我对此未更具体地说明，谢苗诺夫也未要求我这么做。不过我注意到，在我讲话时他的表情有点改变，他仔细地观察我。

谢苗诺夫离开后不久，我把自己的两个多年秘书约瑟夫·盖多什和奥尔德日赫·雅罗什叫来。那是我来布拉格之前几年，就同我一起在布拉迪斯拉发工作的亲密朋友。我把自己的辞职决定告诉他们。在相反的情况下，苏联人会策划另一次挑衅，又会导致公众不安，甚至导致流血。

我说，我将为自己弃职提出一定条件。我试图通过这种办法，把中央委员会1968年11月开始进行的消极抵抗，至少再延长一些。这样就可避免我最担心的大规模镇压。

两位朋友一致认为，苏联人肯定会玩弄肮脏的手法，以便使

我屈服，而自愿弃职，如果准备得好，可能是避免这种情况的途径之一。到我卸任后，镇压可推迟多长时间，这是个我们三人之中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同一天，我先后去告诉切尔尼克、斯沃博达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出乎我的意外，切尔尼克不仅未表现出任何特殊感情，而且我觉得，他甚至准备赞同我的决定。他也未考虑我辞职以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他的态度使我感到失望，因为我知道，他从一开始就同我在一起，同改革关系密切。没有别的、我可实事求是地提议作自己接班人的领导人。

斯沃博达考虑的时间比切尔尼克长，然后才作出反应。我清楚，表态对他来说是不易的。但稍顷，他双手合十，放在桌上，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理解你。可能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最后，我去找斯姆尔科夫斯基。我必须说，他从未失去战斗精神，但当时也认为，我们光荣地坚守岗位已够长了。"等着瞧吧，在你辞职以后，我们还能做什么。他们还没有扒下我们的皮，对吗？"

在我准备弃职的同一天，胡萨克在尼特拉发表讲话，终于对我进行直接攻击。他宣布，整顿国家的时候到了。他批评我"软弱"，因为我拒绝这么做。他的行动是符合苏联教师爷的想法的。正如我后来了解到的，他在这之前不久曾同勃列日涅夫在乌日哥罗德举行秘密会晤，后者显然鼓励他夺取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1969年4月12日，我正式告知主席团：我决定辞职。我是在筹备定于4月17日举行的下次中央会议的消息已公布的时候，宣布辞职的。随后进行的短时间讨论，集中在由谁继任的问题上。

在中央委员会中，已有一大批胡萨克的支持者。其中不仅有非常著名的任何改革的反对者，而且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还有许多我8月份从党的"非法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带来的中央委员。这批人以历史学家、胡萨克当时的朋友米兰·许伯尔为首，他出于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原因相信，胡萨克能比我有效得多地捍卫我国的改革政策。三年以后，许伯尔身陷囹圄，他的“朋友”胡萨克把他关了六年。

当然，当我想到胡萨克要接替我的职位，我感到非常不安。我尽自己所能，努力阻止他当选，在主席团4月12日会议上我提议切尔尼克作自己的接班人。

但是，切尔尼克对仅仅考虑是否担任这一职务也加以拒绝，因此胡萨克成为惟一的候选人。此时此刻，我决定当着胡萨克的面公开宣布，我为什么反对他继任。我说，我比其他人更长地注意到他严重的性格缺陷和毫无顾忌。它们在战后最初年代就充分表现出来。不久前的几个星期表明，我说，胡萨克尽管对斯大林主义政权有过痛苦的经验，他未大变。我担心他轻易放弃我们1968年8月在莫斯科得以捍卫的一切，甚至包括我们仍在捍卫的有限改革。

主席团在这次会议上未通过任何最后决定。但是，对胡萨克候选资格的支持是强有力的，虽则我知道，倾向于选他的人中，也有一些人像我一样，有不祥的预感。

在下次主席团会议之前，我再次到总统府同斯沃博达谈话。我不是个乐观主义者，但我认为，他也许还是可运用自己勿庸置疑的威望、以某种方法改变主席团内的局面。我再次向他说明，我对提胡萨克为候选人为什么如此犹豫不决。我说，胡萨克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将背叛我们的原则，放手为勃列日涅夫效劳，还将推行镇压政策。

斯沃博达听是听了，但我觉得，他不愿谈胡萨克，难于专心听我对他所说的话。我发觉，他突然从所坐的低矮沙发上滑下，似乎要跪在我面前。他保持这种异乎寻常的姿势，把脸朝着我说：

“天哪，萨沙[1]，请你原谅，我必须对你说句话。要知道，我已经答应格列奇科，你将辞职。”

他不能谈任何别的话。我为这位老人感到惋惜。他显然太疲乏了，因而干不了过去某个时候可能希望干的事。我离开时，我们两人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都有点不知所措。

在随后 4 月 17 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他们把我“挤到墙角”。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胡萨克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在 19 名与会者中，他获得除我和另一人外所有的票。

表决前我的最后一个步骤，是试图恢复我们的承诺：贯彻入侵后我国政策的四项基本原则。始终不渝地忠于这些原则，是防止镇压的惟一可能的保证。我说，这是我同意选举胡萨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条件。

全体与会者表示同意。

会上也讨论了我的其它可能的任务，强迫我留任主席团委员。胡萨克建议我接受联邦议会主席职务。我对是否接受这一职务犹豫不决。实际上我同意接受只有一个理由：如果我留下，我也许可阻止胡萨克毫无疑问藏在“袖中”的某些做法。

1969 年 4 月 17 日，捷共中央全会正式通过上述变动。会议接受我辞职，胡萨克以足够的多数当选为第一书记。也选出了新的主席团，改革派自 1968 年 4 月以来第一次处于明显少数。

---

① 萨沙，亚历山大的昵称。

27

“布拉格之春”的夭亡

胡萨克就职以后不久，我的最大担心变成现实。许多编辑被解雇，由听话的人取代。对杂志，他们用别的方法控制不了，就勒令停刊。如对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周刊《通讯》、捷克斯洛伐克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周刊《记者》和高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出版的《大学生报》。开始进行逮捕，尤其是在捷克地区。他们把以支持改革闻名的党的州委书记撤职（首先是在布拉格和布尔诺）。新任命的州委书记开始把县一级的改革派干部撤掉。关于取缔各种组织的消息几乎每天都发表。

在那几个星期，胡萨克特别通过根据自己的需要匆忙“改组”的党的书记处进行工作。在4月变动后我仍然参加的、开得少的主席团会议的过程中，我几乎对议程上的一切都不同意。但我落得孤身一人，逐渐放弃一切党的活动。在中央委员会5月会议上，我反对开除胡萨克的直接挡路人，即克里格尔、斯拉维克、希克、沃兹隆等。

我记得，那是父亲逝世后次日的事。我立即去举办他的葬礼。我们把他埋葬在家乡乌赫罗维茨的公墓上。许多人来同他告别。然而，那是个静默、悲哀的仪式。我摆脱不了这样的感觉：父亲所信仰的一切，都同他一起死了。

党的报刊，特别是在新的极端主义的总编辑“指挥下”的《红色权利报》和好打击报复的奥尔德日赫·什维斯特卡出版的《论坛》发起反对我的运动。他们以50年代初闻名的告密笔法，指

责我犯有一切可能的错误和罪行。我一再要求给我答辩的权利。但正如我所预料的，他们根本不理我。

联邦议会中有消沉、无可奈何的情绪。从其议程中，我几乎不记得什么别的，只记得因前一年事件而晚通过的1969年国家预算。每个人显然都懂得，尽管行动纲领有其意图，议会的意义和使命不会增大，而只会回到过去某个时候的水平。

在联邦议会，我至少又接近斯姆尔科夫斯基。他仍然是其副主席、人民院主席。我们谈到我们两人将不得不离职的不可避免的时刻。斯姆尔科夫斯基认为，不必为胡萨克提供方便。“等最后一仗吧，”他说。我不掩饰，我不是这样的乐观主义者，但我尽量坚持。

当时，我只偶尔参加公开活动。我在前纳粹集中营特雷津的纪念大会上讲了话。在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进行正式拜会时，我必须在联邦议会的办公室里接见他。我又见过斯沃博达总统两次，一次是他在我当选担任新职后接见我，另一次是在布拉迪斯拉发庆祝考门斯基大学建校50周年的仪式上。斯沃博达在我看来非常抑郁寡欢和拘谨，似乎在机械地执行自己的义务，仅此而已。

7月24日，我最后一次参加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胡萨克在会上为苏联入侵一周年时如何维持公共秩序而担心。不过，暂时未讨论具体“措施”。这次会议以后，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我很快分别收到胡萨克的特别指示，要我们待在布拉格以外的地方，直到撤销禁令时为止。

斯姆尔科夫斯基到低塔特拉山的某个地方休息。我返回布拉迪斯拉发，两个月以前我家又迁到那里。的确，联邦议会不开会，到9月才要开。因此，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我都没有任何正式理由待在布拉格。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胡萨克政权事前几周就已准备镇压入侵一周年时的任何公开示威。但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因为这

是一次秘密行动，是党的书记处和内务部职权范围内的事，根本未提到议会主席团，我在那里办公。

现在我知道，胡萨克详细地制订了应急准备工作。军队受命组建和训练控制街头事态的特种部队。为同一目的，也成立了警察特种部队。从哥穆尔卡的波兰特种防暴警察“佐莫”的武库里搬来了催泪瓦斯、塑料盾牌和大警棍。胡萨克显然渴望向勃列日涅夫表明，他是多么坚决果断。

1969 年 7 月，法国《世界报》记者采访我。除其它以外，他问我，我的观点从去年以来是否改变。我对他说，不，我仍然倾向于“布拉格之春”的理想。这显然激怒了胡萨克，入侵一周年前大约两周，他要求我把对自己观点的书面“更正”寄到书记处。我决定不理他的要求。

8 月份，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塞涅茨的湖边度过的，我同儿子们和几位朋友一起在那里盖家庭别墅。我在那段时间的惟一一次公开讲话，也是 8 月 21 日一周年前的最后一次讲话，是在米雅瓦河畔的塞尼察选区的讲话，在此之前许久有人就邀请我到那里去。当地的居民和干部非常亲切地接待我。但是，当我看到，他们因去年的希望破灭而多么沮丧，我感到难过。

然后，占领一周年到了。在共和国的 30 多个城市里都举行了公开抗议。规模最大的抗议在布拉格、布尔诺、布拉迪斯拉发和科希采举行。胡萨克政权动员了 3.5 万多名士兵、警察和民兵袭击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至少有五人（但可能多得多）丧生。遇难者当中，有三人不足 20 岁。

广播电台只播放片断消息，但当遇难者数目开始增加，胡萨克竭力要联邦议会主席团颁布戒严令。他想借此使恐怖活动合法化，力图洗刷掉双手已沾满的鲜血。但此时此刻在布拉格没有人有权召开联邦议会主席团会议。这是主席即我或两个副主席之一即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或达利博尔・哈奈斯的特权。哈奈斯

在国外，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我被勒令待在布拉格以外的地方。

的确，胡萨克不大关心合法“手续”。他找了一个心甘情愿的仆从，人民院议员约瑟夫·加布里什卡，后者负责这一行动的行政方面。此人非法地决定于8月21日上午召开联邦议会主席团会议。但由于议会休会，到会人数不够，不能作出决议，次日也仍然缺少两票。

内务部副部长、国家安全局上校扬·马耶尔来向议会“主席团”通报情况，强迫它非法通过政府采取的措施。但这对胡萨克还不够。

1969年8月22日星期三，他召开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讨论通过所提戒严令草案。草案由切尔尼克提出，他如今做许多事情，以满足胡萨克的要求和救自己。（可惜，为时不长。）捷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准则（称为联邦议会主席团第99号法律措施）同意在戒严体制下镇压反对派，后来以“警棍法”闻名于世。但是，由不足数的联邦议会主席团批准实际已执行的行动，并不等于通过今后可推行的戒严体制。不过，这正是胡萨克当时所需要的——由此变成法律。只由党的主席团通过对他来说还不够，他需要的是联邦议会表决通过。

也许我根本不必提到，他们未请我到布拉格出席上述党的主席团会议。胡萨克很清楚，我会反对草案，虽则我的与会一点也改变不了会议的决定。党的主席团会议于午后不久举行，胡萨克立即从会上把文本寄到联邦议会给加布里什卡。但可能附带指示，不要马上办。胡萨克显然作出决定，在联邦议会，应当由我使镇压的立法合法化。

当他们命令我立即到布拉格主持联邦议会主席团下次会议时，我仍在塞涅茨。一切都仓仓促促。我大约下午三点多钟飞抵布拉格。

当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加布里什卡已在那里等着我，带着

胡萨克的紧急指示，要我立即把法律措施草案提交给联邦议会主席团通过。

我拒绝让人赶着走，规定了仔细研究文本的时间。我根本不喜欢它。

但是，法律措施本身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查明，在我到来以前，议会程序规章完全被忽略了，因此我坚持对其要遵守。我要求，首先由联邦议会的法律专家讨论草案。我们需要知道，草案是否符合宪法和其它法律。我说，等到我们收到对此的立法表态，联邦议会主席团和我本人才能负责地对草案作出评价。

我向主席团的其他委员提出这些反对意见，他们在这之前已作出“不断开会”的保证。我也提出政治保留：“如此严厉的法律措施究竟有否必要？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其它相应法律吗？”

我希望，法律措施草案将遭到拒绝。但我不得不采取程序性策略，因为同仁对反对这种立法的支持，现在不仅在整个议会，而且在其主席团，至少是微弱的。恰恰在这里，我的观点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只有切斯特米尔·齐萨日具体地考虑到高等学校的情况，对法律措施草案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任何别人未表示任何保留，看来他们取而代之的是，决心不顾正常做法，通过他们之中多数实际上已通过的东西。然后，许多人尤其是约瑟夫·瓦洛开始对我进行粗暴的攻击。

我利用自己要求休会的权利，使法律专家能研究草案。此时此刻，我不能做得更多。我把不能作出决议的反对意见，留到晚些时候提出。

此后不久，胡萨克来了，硬要参加会议。胡萨克不是议会议员，无权待在那里。虽然我是人民院的一员，我担任第一书记时，从未这么做。但在胡萨克的眼里，议会简单说来只不过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是党的“传动杠杆”。

胡萨克一坐下来，就开始对我叫嚷，如果法律措施草案未获

得通过和不公布，我就要对进一步的人员伤亡负责。他说，布尔诺街上的人群正在从自行车赛场到足球赛场的路上，因而有以料想不到的方法爆发出来的危险。他接着说，法律措施是马上就需要的，以便使得能够撤销足球比赛和把人从运动场引开。

胡萨克不断用手指指着我并反复说，如果我继续推迟通过所提措施，我个人就要对进一步的人员伤亡负责。我累了、和缓了，在这点上放弃了。但我对法律措施未投赞成票。简而言之，我主持了通过法律措施的仪式。从程序角度看，它完全是非法的，这更增添我的痛苦。

我的、后来使我终生难过的大错误是，我最后签署法律措施。我必须补充，签署法律和法律措施是议长的例行公事，不管议员通过法律与否。不过，这次情况非同寻常。今天我知道，我应当拒绝签署。但是，那是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在那里完全是孤身一人，我也未考虑到一切后果。不过，我无论何时对此也不会不后悔。我不想为自己辩解，只能补充说明情况。

胡萨克脸带冷淡而讥讽的表情，立即离去。他得胜了。第 99 号法律措施次日在各大众媒体上公布。当然，他们未忘记提到，由斯沃博达、切尔尼克和杜布切克签署。他们就这样发表了关于“布拉格之春”结束的讣告，上面有三人签字，其名字同它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千百万人来说，这是令人沮丧的消息，有些人甚至拒不相信，这是真的。

不久之后，我的不祥预感变成了现实。对法律措施，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读。我在 9 月 8 日致切尔尼克的信中，要求他尽快公布程序性修订，以防止对上述措施第四条中“反社会主义活动”笼统提法的任何滥用。我从未得到答复。

两个星期以后，捷共中央主席团在我缺席的情况下，解除我的联邦议会主席职务，并把我从党的主席团撤了。决议在 9 月 25 日至 26 日的中央会议上得到正式确认。切尔尼克在那里低三下四

地收回自己对“布拉格之春”的支持，因此而可再留任政府总理几个月。这一“赦免期”过后，他们也把他撤了，以什特劳加尔取而代之，后者同胡萨克和比拉克一起组成随后多年的三驾马车。

在同一次会上，我也有与切尔尼克类似的机会——收回支持、卑躬屈节和扑灭对我国多数人来说是希望之火的东西。为此，正如我后来所了解到的，他们对我愿意以某种小的闲差、也许是布拉迪斯拉发市长之职作为回报。

我拒绝了，未收回支持，而是利用最后一次机会在这次大会上发表讲话，重新提出自己的观点。

我为自己从 1967 年 10 月以来的一切行动、特别是“布拉格之春”和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之春过程中的做法辩护。我对什么也不后悔，未作出自我批评，而是捍卫自己的立场，直到最后。我在会议结束以前离开，一周以后去信通知，我放弃捷共和斯共中央委员资格。

捷共中央 9 月全会结束了“正常化”进程。它意味着最近 20 个月的整出戏达到高潮，胡萨克取消了我们反抗赖以建立的四项基本原则。他们把入侵重新评价为防止了“反革命”的“国际主义援助”。捷共中央主席团 1968 年 8 月 21 日关于占领我国的历史性决议，被宣布为无效。他们把入侵后立即召开的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宣布为非法“反党”行动。

这一切是我最担心的步骤。清洗和大规模迫害的闸门打开了。

他们立即把许多中央委员包括斯姆尔科夫斯基开除出党。同时策略上又决定，暂时不把我彻底搞掉。胡萨克对此显然尚未感到足够自信。正如事实所表明的，他还需要另外九个月时间。

28

"流亡"土耳其

中央会议结束以前，我就离开布拉格回布拉迪斯拉发，回到自己在斯拉温附近的家。1969年4月，全家长期迁到那里。我们又住在米希克街的老家。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终于可开始整理屋内及其周围的东西。较小的活计和修理，我总是自己干，但自1967年秋天以来，我没有时间这么做。

我清楚，我将不得不找工作做。我刚49岁，离退休还远。我不急于找工作，因为我需要休息几个星期，以便振作精神。我也估计，"他们"不会允许我根据自己的选择接受工作。诺沃提尼时期的作法又开始使用，我知道，胡萨克想要自己决定一切，包括我今后的工作和工资。

事情正如我所料。10月中，他们把我叫到瓦西尔·比拉克在布拉格的办公室。在我当政时期，他丢掉斯共第一书记职务，但入侵以后，苏联人强迫我们让他留在捷共中央主席团。现在，他还是负责对外关系的中央书记。

比拉克对我摆出上级的架势。他坐在大写字台后，直接进入正题。他告诉我，主席团决定派我到加纳当大使。

假如他们决定让我管鸡场，我也不会感到如此惊讶。我头脑中一直在考虑，他们选择的为什么正好是加纳。可接受的恩克鲁玛总统政权两年前被推翻，正在掌权的是一些对苏联持敌视态度的军官。这几乎不会使他们便于对我进行监视。经彻底考虑我才懂得，他们对把我送到哪里，真的无所谓，只要送得远就行了。

我对比拉克直说，我对他的建议不感兴趣，我既不想去非洲，也不想去任何其它地方。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我便回家了。

但家里情况不好。安娜精神上很痛苦。她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反应越来越敏感。对我的公开攻击日益增多，这对她触动很大。她的慢性胆囊病也使情况恶化了。当我看到她处于这种状况，我非常难过。

那是令人沮丧的时期。随着“正常化”的进展，政治渣滓（在苏联入侵时期的代理人和帮凶的领导下）从四面八方冒出来。他们谴责“布拉格之春”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宣布一切捍卫我国独立、反对苏联干涉的决定无效。党、政府、议会以及一切大的社会组织都这么做。

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不久前的支持者当中，只有很少的人愿意以撤销我们以前的一切原则为代价，而继续留任。奥·切尔尼克和切·齐萨日继续担任联邦政府总理和捷克民族议会主席职务。对此，我很难忍受、反感。在我们 1968 年 8 月的决定被宣布无效以后，已没有什么可捍卫的了，留在这么高的职位上对公众起误导和败坏作用。自然，尽管如此，不久之后他们也被从这些职位上一脚踢开。

我拒绝比拉克去加纳的建议以后不久，致函捷共中央主席团，强烈反驳新闻媒介上的攻击。我要求把该信发给全体中央委员。

两个星期以后，我收到胡萨克的回信，他在信中拒绝我的要求。他威胁命令我在两周内告诉主席团，我是否同意党现在的政治方针。显然，胡萨克正在准备采取另一个反对我的步骤：把我开除出捷共。不过，他由于某种原因仍在踌躇。他可能担心，会出现某种未料到的政治复杂化。

几周以来，我每天晚上同安娜讨论我们的处境。当我告诉她，比拉克建议我到国外做外交工作，她把这一机会作为至少一段时间的逃避途径。她简直绝望了。

我努力向她解释，这可能是个圈套。他们现在让我离开，但以后将不准我回国。即使我尊重每个人离开国家的权利，我不能想像，我怎么能流亡。但我说服不了安娜，对我们的争论感觉甚为恶劣。

我怀疑，我们的房子当时已被窃听，以胡萨克为首的领导了解我们家的争论。不久以后，他们又把我叫到布拉格，向我提出另一个外交岗位，这次是在土耳其。

当我回家后把这告诉安娜，我们再次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安娜非常坚持地要求接受建议，反对我关于圈套的想法。我非常不情愿地表示同意，我将接受建议。

我在布拉格的外交部度过几个星期，得到关于外交工作的基本指示和关于土耳其的消息。12月15日，他们公开宣布，我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共和国大使。我带着讽刺想起另一个流亡土耳其的政治家。1929年，托洛茨基被赶到那里。

我们计划于1970年1月16日离境。离开之前，我回复胡萨克要求我对其政治路线表示同意的信。我拒绝他的暗中威胁，再次对新闻媒介上开展的诽谤运动提出抗议。

在我离开以前不久，斯沃博达总统邀请我赴私人晚宴。他显然想向我表示友好，但我不禁有这样的感觉：这宁可说是个满足他自己需要的机会。

通常的惯例是，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在新大使赴任前接见他们。但是，胡萨克对同我会见不感兴趣。我想说的是，假如他有正常的感情，他不想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1月16日，我和安娜乘捷克斯洛伐克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安卡拉。飞机只坐满一半，我怀疑，旅客中有许多人来自国家安全局。飞机上有两位捷克年青的空中小姐，当她们看见我和妻子一起登机，忍不住流泪。在飞行过程中，她们服务非常周到、殷勤，这使我们深为感动。但是，得到相应报告的当局，对此另有看法。

正如后来我所了解到的，两位空中小姐回国后都立即被停职，后来又被捷克斯洛伐克航空公司解雇。

我们抵达安卡拉机场的情景令人难忘。星期五是穆斯林节日，因此，一群群人到机场友好地欢迎我。在那里的还有数十名记者和摄影师。土耳其警察不得不叫来增援部队，以控制局面。他们请我们坐在一个小会客室里等，直到打开从机场进城的道路。一位摄影师打破会客室的窗子，为的是能给我们拍照，结果划伤了手。土耳其政府代表根本未走到我面前，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临时代办克纳普得以挤过人群。

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能驶离机场。我对所看到的、外国人的一切友好表示完全感到意外，他们自发来表达对我和我的祖国的同情。

驻安卡拉大使馆官邸是舒适的，但几个月以后我们仍感到，我们住在宾馆里，这不是真正的家。

大使馆就其人数而言是小的。它由五六名外交使团成员和若干其他人员如司机和技术员组成。我本人认识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以前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中斯洛伐克州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司机。

我不太关心，谁的信仰如何。不过我估计，大使馆的全体人员都为我国的内务部工作。除了一个在我之后不久来的甚为明显的侦探外，他们对我都有礼貌。看来，侦探的惟一工作是跟踪我的每一步。

我在土耳其外交部递交国书后，土耳其最高领导人包括杰弗代特·苏纳伊总统接见我。他们竭力向我表示同情。我无论何时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友好和理解。

令人感到愉快的是，我在所到之处，都受到类似的同情。在前拜占庭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我抵达的消息迅速传开。在那里包括在郊区，不论我和安妮在什么地方停留，哪怕只是为了喝杯

饮料，一群友好的人就聚集起来，他们来向我致意和表示同情。

20 多年以后，当我又担任捷克与斯洛伐克议会主席，我有机会应土耳其政府的殷切邀请，再次访问这一引人注目的国家。出发前我想起，1970 年 6 月出乎意料突然离任时，我未将外交官证还给土耳其外交部。因此，我把它随身带着，交给土耳其当局，并表示歉意。次日，他们把它退还给我，要求我留作纪念。

我在安卡拉时，胡萨克作了巨大努力，要使我的居留不快。对此，我很难作别的解释，只能解释为他笨拙地试图迫使我要求政治避难。他们甚至派出一个特别委员会，据说要调查大使馆的情况。我得以不理这一要我非法流亡的笨拙压力。我决心坚持不流亡。

许多西方政府对我表示，假如我决定不回捷克斯洛伐克，它们愿意接待我。我忘不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典和其它国家的慷慨大方。我向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说明，我必须回国。我感到，我有义务留在甲板上，不管后果如何。我的岗位在祖国。

但是，事实表明，回国也不简单。四五月份，我从各种渠道获悉，胡萨克及其同伙有意阻止我回国。因此，我努力订捷克斯洛伐克航空公司到布拉格的机票。当他们第三次告诉我，难得满座的航班没有空位，我就知道，我最坏的预料证实了。我不得不寻找弯路。我继续佯装，我在等待捷克斯洛伐克航空公司的机座。我不得不故意告诉安娜，让她有所准备，她将不得不独自留在安卡拉一段时间，并装成好像我也在那里。

幸运的是，我得到捷克斯洛伐克一些技术员的帮助，他们在土耳其的工厂里安装机器。给我帮助最多的是什科达工厂的一位工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同他一起在杜布尼察工作。在这些好人的帮助下，我买到了匈牙利航空公司从伊斯坦布尔到布达佩斯的机票。我知道，我从那里容易越过边界到达布拉迪斯拉发。

有一天夜里，我偷偷溜出大使馆，叫了一辆出租车上火车站，买了到伊斯坦布尔的车票，正好及时抵达那里，赶上到布达佩斯的匈牙利飞机。实际上，我这次秘密之行遇到的困难并不多。当我们飞上天空，我松了一口气。

我降落在布达佩斯时，是6月初。但事实表明，匈牙利人友好只到一定程度。我从不怀疑，卡达尔一得知，我正在赴布达佩斯途中，他会独自决定对我怎么办。通知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肯定是他。

在布达佩斯机场等着我的，是共产党西斯洛伐克州委前第一书记弗兰季舍克·德沃尔斯基。他坐着公家的车来，不是把我拉到布拉迪斯拉发的家里，而是直接拉到布拉格捷共中央监督与检察委员会。以胡萨克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已重新运行。其作法表明，他实际上是如何关心斯洛伐克的主权的。

我现在想不起来，德沃尔斯基当时的正式地位怎样，我猜测他已当上了驻布达佩斯大使，但肯定属于胡萨克的新组织结构。在赴布拉格途中，我们未说话，我说不好，这仅仅是鉴于有司机在侧，还是出于别的原因。

在布拉格，他们立即通知我，我被开除出党。但是，仅仅因此而把我拉到那里，是白费钱。要知道，当时此类消息一般只在报纸上发表。现在，我至少已可回到布拉迪斯拉发的家里。最主要的是，他们逼我流亡国外的计划未得逞。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捷共中央公开宣布把我开除出党，但这使我难受的程度，比安娜仍在安卡拉、回国很困难小得多。

正如她后来告诉我的，她不得不忍受大使馆人员给造成的许多痛苦，他们因我逃走而勃然大怒。幸好她同土耳其的一位家庭主妇交朋友，我相信，土耳其和外国报刊上很快出现的关于我妻子的危急状况的消息来源正是她。国际大众媒体的报道，迫使胡萨克放弃可将她扣作人质的想法。

我要求外交部准许我们的一个儿子去安卡拉，以帮助他母亲打点行李和离开。但是，他们对我不屑于答复。

安娜回国时，精疲力尽。但她不得不经受的屈辱，激起她新的反抗。

她感动地回忆起友好的土耳其人，他们在她被拉到机场之日，聚集在大使馆前，用水浇汽车轮子，这在土耳其是传统的友好姿态。

在随后的许多年，我们真的需要我们所得到的那一切祝福。

29

在复活的"老大哥"统治下的生活

从土耳其回国以后，我很快就开始寻找工作。我想找的是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因为我知道，他们不让我做什么别的工作。幸而我向来有一双灵巧的手，未忘掉年青时学到的手艺。我的要求不高，首先是工作单位离家不远。

我阅读广告栏上的招工启事，最后搞了一个大约20家招收锻工、电焊工和镟工的工厂和车间的名单。鉴于这些工种的人员相对不足，我估计不会有较大的困难。

但是，我估计错了。没过多久，我就发觉，"他们"在我周围筑了一道无形的围墙。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我要做的工作。我如何决定做工挣钱以维持生计，并不取决于我。许久以后，我得知党的新领导把我作为头等大事，在那几周对我的命运进行了多次讨论。当然，他们想使我尽量脱离公众。

当时，在我国有整整一支被解雇者大军（像我），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工作岗位。在1969—1970年清洗期间，将近50万党员被开除出共产党或被除名。他们被迫离开以往的工作岗位，寻找新的职业。许多同情改革的党外群众也遭到类似命运。捷克地区的清洗特别凶狠，但这并不意味着斯洛伐克的"正常化派"不那么卖力。不过，在斯洛伐克情况终究还是有所不同，"正常化派"偶尔使用较和缓的施压手段。但这并非普遍适用。每件事情都不一样。

受害最大的职业是记者、政论家和科学家（其中特别是哲学

家和历史学家)。不过,没有一个专业能幸免。许多军官不得不离开武装部队。遭到镇压的还有作家、高等院校工作人员和低一些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他们不把最优秀和最正直的人解雇或上黑名单的领域甚少。因此,我处在一个良好的群体中,是数十万不屈服、不否认自己的感情、不撤销自己的信念的人之一。当然,我受到特别注意,因为在新统治者的眼中,我是个特别危险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在家计算,如果我根本不工作,我们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我们只有不多的积蓄,7.5 万克朗左右,这在黑市上约等于三千美元。我们有一部西姆卡牌的旧车,有些积蓄投人到在塞涅茨盖别墅中去。我们的财政储备对五口之家来说非常有限。我们的长子帕沃尔 21 岁,幸好在考门斯基大学医学系学习,彼得也已上大学,米兰在上中学。最后,准许他们结束学业,但后来他们已不能自己挑选工作,不得到国外旅游。

长期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我母亲,她以微薄的退休金帮助我们。安娜身体不适,不能全天工作。假如她试图这么做,肯定会给她制造困难。我不得不独自照顾家庭。

母亲 1971 年去世,享年 74 岁。她一生都是党员,清洗发动起来后,她知道,很快就会把她叫去问,她同意占领与否。只有肯定的答复才能保证她继续留在党内。

未等把她叫去,她就退回党证,并附上一封手写感人的长信,简单而又雄辩地表明,她为什么在苏联占领期间不能当党员。我还可补充,在 1969 年或 1970 年还活着的战前共产党员中,相当大部分人也这么做。

1970 年 10 月底某一天,他们把我叫到布拉迪斯拉发的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见我的是新的斯共第一书记约瑟夫·列纳尔特。他终于因自己在 1968 年 8 月采取的态度而得到回报:既在布拉格,又在布拉迪斯拉发回到高级职位。由比列纳尔特低

的某个干部同我谈话，或许更恰当，但他显然不愿意失去因看到我受贬和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而感到高兴的机会。

列纳尔特告诉我，我被开除出党。鉴于他们这么做时，我出席了，这是条多余的消息。然后他说，他们在为我找工作，我应当等候通知。

我别无它法，只能服从决定。不过，我还有拒绝我反感的工作的自由。

在随后的几周中，他们至少向我推荐三种工作，我都拒绝了。首先是因为工作单位离得非常远，到其中一处去上班，我要耗费三个小时。最后，他们向我推荐国营西斯洛伐克林场克拉斯尼亚尼林业管理局（在布拉迪斯拉发边缘）机械师的工作。我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1970年12月上班。

我一般负责从推土机和翻斗车到链条锯各种机器的维修和运转。几个月以后，他们把我分配到车间，我在那里修理西方生产的链条锯（Stihl 和 Husquarna 牌）和损坏的机器。

我在克拉斯尼亚尼起初的工资是每月2200克朗，这是当时工人的平均工资。如同其他职工一样，我多数年份的末了也得到为数不多的补发工资，这样，当我1981年退休时，我每月挣3000克朗左右。

我在克拉斯尼亚尼上班后，不论企业领导，还是同事，对我都好。经理是米罗斯拉夫·汉纳克，我过去认得他。但是，1971年我就成为较大的迫害的对象。我不断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这消极地影响我与同事的关系，他们害怕同我说话。当局又采取另一些步骤，以便把我变成“不存在的”人。他们逐渐把我开除出我参加的一切组织，包括斯洛伐克打猎协会、工会、甚至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战士协会。对这些行动，我写了正式抗议，但从未得到答复。

和蔼可亲的汉纳克先生很快就被一个名叫朱里什的粗暴而又

不友好的人所取代，他们毫无疑问把他安插在那里监视我。有一次，他把我叫到其办公室，我在那里看见一个邮递员站在角落里。邮递员面前桌上有一堆从国外寄给我的信件，全是挂号信。他对我说，我必须签字，以表明收到信件。我知道，一切寄给我或我的家庭的邮件，尤其是来自国外的信件，他们都叫警察进行检查。实际上，我多年不许接收任何外国邮件。问题在于如果是挂号信，外国发信人对捷克斯洛伐克邮局"丢失"信件，有权要求它以硬通货赔偿。因此我认为，他们想强迫我签收，但并不打算把信件交给我。

于是，我就拿起钢笔，首先写下日期，同时又注意地盯着经理。他以为我已签字，迅速把信扒进抽屉。我开心地看了他一眼，走出房间。我虽然未收到信件，但他也未得到我的签名。

我很快就得知，信件来自法国和意大利，对我国镇压的受害者表示声援。他们一再给我寄来访问邀请。

从 1970 年秋至 1989 年，我不断受到警察的监视，我的妻子也是如此。我估计，他们也跟踪我母亲和儿子。国家安全局的汽车停在我们房前三年多。后来，他们把车停在大约高 30 米的街上。在正门前，几乎总是站着一两名穿便服的军官或穿制服的警察。有时，他们阻止任何人拜访我们。别的时候，他们干脆要求访问者出示身份证。80 年代后半期，监视开始变得不那么明显，但他们继续以这种或那种方法进行跟踪，直到 1989 年 11 月其政权像用纸牌搭成小房子一样崩溃。

每天在我乘坐上下班的电车里，至少有三个便衣军官跟踪我。其中两个通常同我一起上车，每人把住一个出口，一路上对我进行监视。第四个坐小轿车跟在电车后面，有时还带着另一人。简而言之，有一帮人跟着我。

过了几个星期，我就记得多数这些人的面孔，他们并不太努力隐瞒自己的身份。自然，不论在车厢里，还是在电车站上，都

有许多人认识我，向我致意。经常有生人走近我，问我过得怎样，并努力对我表示同情。

我很快就注意到，对每个向我致意的人，只要他一下车，秘密警察马上就盯梢。后来，我从受到如此注意的人那里获悉，他们被拦住，不得不出示身份证，几天后又被叫去审问。有些人受到威胁，如果还同我说话，将会丢掉工作。这些作法使我感到难过，因此我决定回避继续接触。我不希望，某个人因对我表示同情而遇到不快。这样，他们实际上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把我同人们隔绝开来。

有一次，我走近一个我多次看见跟在我后头的秘密警察，对他说："既然你们两个老是乘电车，还有一个乘小轿车跟我，假如你们干脆把我拉去上班，不是更经济吗？"他看了看我，考虑了片刻，答道："这会违反规定。"他们到处跟着我，甚至儿媳妇在医院里生我的孙子，后来我带着小孩去散步，也是如此。那是经常的事，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有三个孙女和一个孙子。

只要我的妻子一走出家门，她也从来不是独自一人。有一次，她购物归来，拿着沉重的手提包。当她发现两个年轻力壮的秘密警察跟着她，她在拐角处等到他们走近。她说："你们至少应当帮助老太太拿手提包。"但是，他们装作听不懂她说什么。

我们在塞涅茨的别墅里时，他们也进行监视，在那里容易发现他们的观察哨。持不同政见的朋友有时到塞涅茨找我，有些来自布拉格。我的忠实支持者瓦茨拉夫·斯拉维克到那里拜访过我几次，我们一般在湖中趟水。兹德涅克·姆林纳日 1977 年去奥地利以前，也来访问我一两次，我们也利用湖泊进行私人谈话。这使警察感到不安，他们不得不坐到船上。有一次，一个肯定因在我们周围划船而已经累了的警察，对我叫嚷道："你们打算呆在那里多长时间？"我也向后叫道："肯定比你们长！"

作为林业局的工作人员，我经历过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我

们的技术装备特别是链条锯的零备件不断出问题。买零备件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不时彻底地绝望。

最后，他要求我给予帮助。我说，我试试看，我也办到了。在绝望的经理的准许下，他们给了我汽车及司机，我们到布拉迪斯拉发以外、但主要是西斯洛伐克的各五金产品仓库，进行采购旅行。我几乎运来了所需的一切。到处都有好人，当他们看见我时，都乐于把东西卖给我。另一次，我们需要用于给车间生暖气的高压热水器。他们又把我派去采购。这一回，我从日林纳购进。我怀疑，假如胡萨克或比拉克处在我的地位，他们会比我干得更好。

有一次，仅仅一次，我不得不一直走到捷克地区，离布拉格不远之处有 Husquarna 和 Stihl 牌链条锯零备件中央仓库。由于那是在林业管理局的汽车可开的地区以外，我不得不乘火车去那里。

我用车间的电话，暗中同我过去的助手奥·雅罗什博士联系，他住在布拉格，"正常化"迫使他当泥瓦匠。他的也是历史学家的妻子维拉，在有零备件仓库的企业里当汽车司机。我乘火车到达布拉格时，她去接我，并把我送到仓库。我得到了所需要的零备件，她又把我拉回火车站。但是，国家安全局终究还是侦查出我的访问，不久以后维拉丢掉司机的工作，被分配到另一个仓库。这次"旅行"之后，当局禁止经理派我出差。绝不能让杜布切克出差。因此，从那时起，我就被羁于车间里的工作上。

在整个"正常化"（后来的名称是"整顿"）时期，我的一家都是窃听和警察监视的目标。他们掐掉许多碍事的、被以各种借口清洗的人的电话线。不过，他们对我未这么做。他们不仅给我留下家中电话，而且我还得到一部比老电话漂亮得多的新电话，据说是一位多年朋友祝贺我 51 岁生日（1972 年）的礼物。起初，我没有任何怀疑。我只是通过推论，才发现这部机子的特殊性能。他们给我接上新的电话机以后不久，我注意到，通常停在房前的警

车，向前开出一段距离。但只要有谁一按我们家的电铃，他们马上就在那里。因此，我开始估计到漂亮的新电话和岗哨行动变化之间有联系。

我的技术知识不足以理解弱电流的性能，因此我就暗中要求一个专家朋友对此试一试。那是简单的：电话同门铃联在一起。只要电铃一响，电话里的“臭虫”就能听到，并提醒监视队。

我们悄悄拆掉新电话机，重新接上老机子。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对着电话大声抱怨说，机子又坏了，这在捷克斯洛伐克古老的电话系统中并非异乎寻常。当我们接上机子，有几秒钟不响，但以后突然冒出声音。警车很快回到房前。

晚些时候，我认识的一位林业工作者对我提出，他将给我试用奥拉瓦市特斯拉工厂生产的新电视机。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他们把新型号给数十家试用。这么做的条件是，使用电视机的人，必须报告收视效果如何。

但是，我当时越来越怀疑。几个星期以后，我切断新电视机电源，又开始用老机子。接着，林业工作者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喜欢新的电视机，好不好，我是否记录收视效果。最初，我告诉他，一切正常，对其工作情况我作记录。但几天以后他又打电话，向我提出同样的愚蠢问题。我就对他说，电视机坏了，我又接上老机子。然后，他要求我至少把“箱子”退还。这使我开心，我告诉他，我已把它送给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当我的朋友在电视机中找到窃听器，一点也不使我感到意外。从那时、特别是我们在小丁烷打火机里找到“臭虫”时起，我就注意我们家里的一切电器。我也提醒妻子，要她注意一切家用电器的维修。但有一天，电烤箱的管子坏了。安娜未告诉我，就打电话叫修理工来。故障发生在恒温器里。在修理工取回新的恒温器途中，国家安全局抓住他，把他拉到州安全局，在那里“专家”把“臭虫”装进恒温器。然后，他们威胁命令他回我们这里，把“新的”零件装入我

们的管子里。

当安娜几天以后把这告诉我，我立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一能买新的恒温器，就买了。我在家把音乐开大，以使岗哨感到高兴。我把国家安全局装上的窃听器拆卸下来，安装上正常的恒温器。

我把我们多年在屋里找到的一切"臭虫"保存起来，作为纪念品。但我认为，我们并未找到所有窃听器。那里可能还有若干个，在墙里生锈。

尽管我对这一切迫害努力泰然处之，当我妻子受到恶劣对待之害时，我保持不了平静。安娜仍然失业，她照看房子和我们屋后的小"农场"，我们养母鸡和兔子，种蔬菜。这是安娜的主要工作。这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入够敷出。我也修建了小葡萄园，每年大约产 80 升好葡萄酒。

安娜的胆仍然有问题。过去，在专门治疗这种病的温泉疗养院疗养，对她有帮助。最佳的是卡罗维发利，但我们得不到上那里的疗养证，因为该证是由把我开除的工会分发的。

根据法律，所有的人都有到医疗设施疗养的权利。但实际上当局有效地控制谁能、谁不能行使这一权利。最糟糕的是，我没有地方申诉。不过，1976 年我们终究还是得到赴卡罗维发利治疗的疗养证。有一位和蔼可亲的妇女在工会工作，我对她谈了安娜的健康问题，她把我叫去，给了我疗养证。我感到非常高兴，几周以后我把安娜拉到火车站，送上去捷克的火车。

当然，她的外出躲不开国家安全局的注意。在赴卡罗维发利途中，她的旅伴始终不变。当她抵达那里，他们把她同其他一切病人分开，安排她住最高一层设备甚差的小房间。不论她走到哪里，国家安全局的秘密警察都跟踪她。她结束了疗养，但心理不断紧张使她不能进行真正的治疗。给安娜疗养证的工会职工，也被解雇了。

几年以后，在80年代中期，安娜又迫切需要疗养。但不论我怎么努力为她办理疗养证，还是办不了。后来，出现了解决的可能性。在斯洛伐克南部，有较小的也治疗胆病的杜金采温泉疗养院。我们弄不到去那里的疗养证，但林业局在那里附近有一座护林人住的房子，我们的职工可在那里住，休养一段时间。一位同我在克拉斯尼亚尼工作的妇女，获得供自己和另一名妇女用的休养证，因此建议安娜与她同去。安娜到那里，可去杜金采疗养院疗养，而不必直接住在医疗设施里。为此，她只需要医生的报告和建议。

但是，这只适用于“正常的”人，而不适用于我妻子。她当天去杜金采，当天深夜就从那里回来。她泪流满面。“发生了什么事？”我问。她边啜泣，边对我说，当她在主楼里要让他们给订治疗计划时，他们告诉她，对此不予考虑，因为……列纳尔特夫人、斯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妻子在那里。这件事只损害了安娜一人，因为同去杜金采的妇女都没有问题。医疗保健当时对我们来说属于政治范畴。

这一时代曾称为现实社会主义或“现实的社会主义”，以区别于老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我们改革派的新世界。我想，这一概念产生于乌布利希的民主德国，因此听起来有点像恩德勒松——最后解决。现实社会主义是个诸如比拉克或福伊季克这样的占领制度的主要宣传者经常使用的概念。他们在一点上取得了“成就”。他们把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概念都彻底亵渎了。

现实社会主义是苏联制度的一个阶段，它在我们眼前慢慢灭亡，虽则我们对此未立即意识到。多年以后，我还不相信，这一制度未进行重大深刻变革，却能苟延残喘如此之久。当他们以暴力阻止我的朋友和我进行这样的变革，我知道，制度的危机仅仅是深化了，它的完结自相矛盾地加速了。当隧道尽头终于出现闪光，我自然感到高兴，但我并不感到意外。

30

历史的道路

在我所谈的时期，我多年已相信，在苏联和东欧实行的社会制度没有前途。社会主义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缺乏民主都不能存在。这是我们 1968 年试图实行的方针。但因为他们残暴地阻止我们实现我国的计划，我知道，苏联制度的垂死挣扎只会进一步深化和加速。

但是，这里普遍推行的专政，在 70 年代初仍然是强有力的，内部有个控制机制之网，这些机制不断完善，以遏制其崩溃。因此，在当时期待我们通过发生某种奇迹，获得又一次解放的机会，是不现实的。

以往的经验表明，未来的变革将几乎完全取决于苏联本身事态的发展。因此，我开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对苏联的内部事务感兴趣。

不过，自 1970 年年中从土耳其回国时起，我观察我国国内事态发展的时间非常少，更不必说观察苏联的事态发展了。我全天干体力活，晚上回家时，常常感到疲倦。工作之余，我必须在房前屋后干活，照顾家庭。我无较大的困难就适应了这些条件，这也有其积极的方面：我可同家人一起度过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爱好——园艺和房屋周围的零活。

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跟踪国内外事件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我阅读国内报刊，收听收看我国的广播和电视新闻。但这多半是没有客观消息的宣传。当然，也有别的选择余地。我们可收看维也

纳电视，在布拉迪斯拉发听看都很清楚。此事令人感到振作。我认识一些不收看任何别的节目的人。

另一方面，要收听西方的广播电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70年代它们受到日益加强的干扰。我记得，我只有几次能收到自由欧洲。美国之音和伦敦BBC的收听效果也仅略为好些。在这种情况下，我获得客观消息的渠道是有限的、非经常性的。我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经验和本能。

70年代早期的确是令人厌恶的。苏联人在布拉格让掌权的吉斯林集团巩固了地位，其震耳欲聋的宣传的中心话题是，他们将永远呆在那里。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质即：只有这才是现实的，任何其它东西都不是现实的。

打破其“永恒”想法的第一个事件，是1975年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那里通过的文件的最重要部分，是苏联在人权和公民权方面的让步。苏联人和我国政权的代表在赫尔辛基所签署的，同其每天推行的政策是完全对立的。尽管苏联人并非真的想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履行协议，我们理解，他们正式签署的承诺，是重要的。条约给整个局势带来质的变化。赫尔辛基会议以后，苏联人及其东欧走狗所继续做的，根据国际法就是非法的。

1974年，赫尔辛基会议之前一年，我给联邦议会、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和捷共领导发去了长篇个人声明，在这些声明中我谴责在我国对基本人权和公民权的系统压制。我指出，我认为人们又不能自由地、毫无恐惧地谈论公共事务是最有害的。我强调我国社会陷入的危机的致命后果。

指出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未以完全同样的方法对“正常化”作出反应，是重要的。普通的态度确实是一样的：悄悄反对占领，藐视外国扶植的统治者。但就其特点而言，有相当大的差别。

在斯洛伐克，我的案子是个例外的极端情况。总的说来，斯

洛伐克遭到清洗的人的百分比较捷克地区略低。投入监狱罕见，刑期不那么长。除例外情况外，清洗的受害者在斯洛伐克可比较容易地找到别的生计。在那些年，甚至某些在本地区受迫害的捷克人，在斯洛伐克也可比较容易地找到工作。其结果是斯洛伐克的抵抗不如捷克地区那么激进、拼命。因此，在斯洛伐克未产生什么可同七七宪章运动[①]相比的组织，七七宪章运动是个公开反对政权、争取公民权和人权的运动，它向胡萨克政权发出挑战。在七七宪章运动的数百名签名者当中，斯洛伐克人非常少，其中还有一些是住在布拉格的。另外一些人晚几年才签名。

当然，七七宪章运动是捷克植根于历史的政治和文化反抗传统上的伟大的勇敢创举。我们在斯洛伐克怀着巨大的同情注视着它。我个人的许多捷克和摩拉维亚朋友都在《七七宪章》上签名，其多数签名者实际上是捷克前改革派共产党人。

人们有时问我，为什么我不在《七七宪章》上签名。问题主要来自于对捷克和斯洛伐克现实的差别理解不够。《七七宪章》是捷克对局势的反应。我们在斯洛伐克实际上同意它的每个思想，但我们有自己支持同样理想的方法。

在整个苏联占领年代，我给布拉格的政治机关写了个人声明。我一再抗议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和对他们的其它形式的迫害。我谴责对瓦茨拉夫·哈维尔[②]和《七七宪章》的其他主要签名者鲁道夫·巴杰克、彼得·乌尔、拉吉斯拉夫·利斯、伊日·丁斯特比

---

① 七七宪章运动，捷70年代末至80年代最大的反对派组织。签名者最初为200多人，80年代末增至1000多人。该组织打着争取人权、民主、自由等旗号，多次发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捷当局及其政策和苏联占领，受到西方的支持。1989年剧变后，同其它反对派组织一起，组建右翼执政党公民论坛。

② 瓦茨拉夫·哈维尔（1936—），出身于大企业家家庭，荒诞剧作家。1968年加入非党人士俱乐部，1977年参与建立捷最大的反对派组织七七宪章运动，1979年因“颠覆共和国罪”被判处四年半徒刑，80年代为反对派代表人物，1989年底参与组建右翼执政党公民论坛，先后任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总统至今。

尔、瓦茨拉夫·本达等人的迫害。在这一方面，我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从未把它们收回，从未停止反对"正常化"政策。我认为没有必要以和我决定使用的不同的方法，把自己宣布为持不同政见者。

斯洛伐克对变化着的国外局势的反应与捷克地区不同。这里未采取诸如发表《七七宪章》这样的公开行动，而是逐步平静地形成了地下反对派，特别是天主教活动分子和前改革派的反对派，后者在清洗期间不得不离开共产党。两个群体互相支持。我参加了这些活动，我的朋友总是找到向我通报事态的重要发展的方法。

赫尔辛基会议以后若干年，1980 年前后，我开始感到苏联最初的变化之风。当然，我注意到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的逐步瓦解，特别是因对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负有责任的人如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和马祖罗夫的下台而瓦解。我也注意到新人的上升。有些比较坚决，如安德罗波夫，有些不能肯定，如吉洪诺夫、罗曼诺夫或契尔年科。那是个变化的过程，但我仍然悲观地评价这些苏联领袖放弃斯大林主义方法的能力和意愿。我必须说，我长期也是这样悲观地评价戈尔巴乔夫的。

波兰事件和入侵阿富汗宣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结束。波兰团结工会的成立是个预示苏联整个制度总危机的因素。我也把 1981 年 12 月波兰雅鲁泽尔斯基军事专政的建立看作是苏联人的失败，而不是胜利。我带着苦涩的讽刺意味回忆起哥穆尔卡及其破坏我国改革的作用。以其生活经验，怎么能瞎到如此程度，而看不见本国的情况呢？

1982 年 1 月苏斯洛夫去世，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他是斯大林的政治局的最后一名尚存的委员。此外，我一向认为他是其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正如我后来获悉的，苏斯洛夫的葬礼举行以后，安德罗波夫立即对勃列日涅夫发起攻击。在此之前数月，我观察勃列日涅夫有时在电视镜头中露面，发现其力量明显

下降。显然，其时代快结束了。现在，在他临死之前，克格勃就使他的女儿卷入贿赂丑闻，以此来破坏他的威望。当勃列日涅夫终于在 1982 年 11 月去世，安德罗波夫而非勃列日涅夫指定的接班入契尔年科获得总书记一职。

我在电视中观看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我在这之前一年退休，有更多的时间阅读、思考和看电视。我看电视直播时感到震惊，由于为安放勃列日涅夫的棺木而挖掘的墓坑显然太短，因此不得不抬高棺木的一头而放低另一头，让它滑入墓穴。棺木突然滑下，滑得太快太远，撞到墓壁，悬空掉在墓底。“天哪，”我对妻子说，“他们已连埋葬国家元首也不会！”

我非常注意地阅读苏联共产党新的总书记的最初一些公开讲话，开始意识到，正在发生某种不仅仅是一般换人的事情。显然出现了继续尝试改革苏联制度的新条件。当然，无法估计，这一进程会走多远。但我至少可注意到，苏联官僚的关键环节被迫承认需要变革。体制明显地不运行，在苏联经济的整个活动中显然出现相当大的衰退，也出现其它危机迹象。只有如此严重的信号才能推动苏联领导入承认变革的必要性。

我也关注安德罗波夫突然罹病去世，接着契尔年科政权可怜短命，戈尔巴乔夫上升并最终于 1985 年 3 月接管政权。我很快就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和安德罗波夫的方针之间的直接联系。我相信，假如安德罗波夫不这么快去世，至少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的最初那几年，他也会像戈尔巴乔夫那么做。

1986 年和 1987 年，在苏联开始发扬“公开性”和开展“改革”，这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我们这里有戈尔巴乔夫努力改革的制度的僵化模式。从 1969 年起，胡萨克的整个政策就建立在不断反对改革上。改革本身被看作是反革命的同义词。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迅速破坏胡萨克-什特劳加尔政权的整个结构。

苏联的改革同我国1968年的行动纲领相比是泡过的茶，公开性同我们当时实行的新闻自由也不能相比。但重要的相似点是每个人都清楚的。我听过当时流传的一个笑话："戈尔巴乔夫和杜布切克的差别是什么？20年！"

布拉格政权惊慌失措。其领导人肯定直到1989年初以前，不敢对苏联改革公开说什么批评的话。他们代之以对其表示有保留、有选择的赞同，要知道他们最终取决于苏联的继续支持。但他们突然开始指出两国的"不同条件"，这从1969年起到此之前几乎是被禁止的。他们感到被出卖，被逼到墙角。

胡萨克政权的最后阶段不仅仅受到苏联事态发展引起的压力。国内政策的失败也越来越明显。1969年停止一切解决积累起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改革尝试，恢复前一时期最恶劣的做法，造成灾难性的后果。8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全面恶化。但受衰退之害最大的是生活环境和居民健康方面。从不受尊敬的政权，迅速失去一切威望。

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春访问了我国。许多人希望他揭开其几个前任盖上的压迫盖子。但是，他的访问普遍令人失望。他未做任何可作积极解释的事情。相反地，他表面上表示支持在布拉格进行统治的勃列日涅夫的遗腹子。不过，当时已什么也不能延缓政权的崩溃。1987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在绝望中决定进行美容式变动。胡萨克被撤去党的最高职务，留任共和国总统。其党的职务由1968年以后苏联的典型仆从米洛什·雅盖什接替。

这一变动使形势更加恶化。它揭露出一个基本事实，即1969年至1971年的清洗消灭了捷共内部的一切改革派力量，未留下任何能贯彻新方针的人。1987年，共产党既不能改变，也不能装出一副较好的面孔。雅盖什是个只适于供人无穷无尽地说笑话的可悲人物。舞台为"正常化"的结束准备好了。

但是，我个人的情况仅缓慢地改变。我仍然处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甚至经常受到五辆无标志的警车跟踪，在其中的每辆车内坐着两名秘密警察。他们继续扣押同我说话的人，查明其身份。

我从未停止对这种干扰提出抗议。1971 年至 1989 年，我向总检察院发出 20 次抗议。我详尽地描述每次事件，并不忘写上识别号。经过长期等待以后，我总是得到同样的答复："您×月×日的意见收悉，经查无任何理由采取任何行动……"

我依然是大众媒体上粗暴攻击和诽谤的不能自卫的受害者，政权的宣传者在传媒上更疯狂地指责 1968 年的改革及其领导人。瓦西尔·比拉克 1985 年在对德国《明镜》周刊的谈话中攻击我，试图在国外污蔑我。我当时决定回击，在意大利记者卢奇安·安东内蒂的帮助下，我把答辩寄到意大利共产党的《团结报》。他们立即发表，《明镜》周刊也全文转载我的答复。

尽管监视在继续进行和国内报刊继续攻击我，我发现有了一定变化。我在公共场所遇到的人，明显地不如以往害怕。风向开始变了。

雅盖什取代胡萨克的职务时，我决定试探一下情况，两三次访问布拉格。我住在诸如奥尔德日赫和维拉·雅罗什夫妇或瓦茨拉夫和维拉·斯拉维克夫妇这样的朋友、《七七宪章》签名者处。我到布拉格市中心散步，朋友们也带我上剧院。每走一步，国家安全局的秘密警察都跟踪我，然而这就是一切。不认得的人向我致意，同我握手。在剧院里，观众认出我，就鼓掌，一些演员甚至来向我问好。

1988 年 5 月，我收到来自波洛尼亚大学的信，他们在信中通知我，他们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他们邀请我到意大利去接受学位。

我居然收到那封信，这是个小奇迹。但是，这就是正在变化

着的形势的特点。我申请护照和出境许可，不久我就得到了。那是8月份。我到布拉格申请意大利入境签证，立即得到。瓦茨拉夫·斯拉维克陪我到意大利使馆，在我们背后跟着载有国家安全局军官的整个警车车队。

我应当于11月去意大利，但行前我要有把握，他们将准许我回国。我根据这个意思草拟了一封信，寄给内务部长瓦伊纳尔。我决定，不得到官方的保证，就不去波洛尼亚。

大大出乎我的意外和使我感到惊喜的是，我在10月份得到这样的保证。经商定，波洛尼亚大学将派车到布拉迪斯拉发接我。卢奇安·安东内蒂自己提出，他来接我，但他们不许他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因此，他在奥地利等我。

描述我在波洛尼亚和意大利各地所受到的接待，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我所到之处，友好的人群都把我包围起来。在这么多年被人"遗忘"之后，这种公开的尊敬和同情的表示完全把我征服了。不认得的人的友好表示尤其感人。当我在一个书店前等要拉我的车，有位男子认出我，坚持要把我送到大学。盛情难却。

在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波洛尼亚大学举行的仪式上的讲话中，我毫不让步地捍卫"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政策，又对捷克斯洛伐克成千上万仍然遭受镇压的人公开表示声援。我补充道，我完全理解我国那些选择流亡国外而不是在国内忍受屈辱的公民。

在意大利逗留两周期间，接见我的有意大利议会主席妮尔德·洛蒂夫人，共产党和社会党领袖阿基莱·奥凯托和贝蒂诺·克拉克西，在梵蒂冈，教皇约·保罗二世也接见我。

他们用汽车把我送回布拉迪斯拉发。那是11月底阴沉沉的一天。国内局势由于秘密警察越来越加紧活动而非常紧张。我回国后不久，又收到几个访问西欧各种机构的邀请。我决定申请准许我去马德里和法国作报告，后者邀请我1989年7月参加法国革命200周年庆典。我国当局坚决拒绝我的这两次申请。他们已不愿意

让我到国外去。

但是，他们的时日缩短了，不论他们做什么，也制止不了。在布拉格七七宪章运动的行动越来越勇敢，在布拉迪斯拉发反对派举行示威，反对继续破坏宗教自由。瓦茨拉夫·哈维尔因试图在扬·帕拉赫 20 年前自焚之处献花，而于 1989 年 1 月 16 日被监禁。我立即向雅盖什和胡萨克发出强烈的抗议。我写道："如果你们还想做什么，我劝你们从释放哈维尔开始。"

1989 年 4 月，雅盖什政权决定对国外和我国国内的抗议浪潮作出让步。他们放哈维尔出狱，我决定到布拉格访问他。通过同捷克七七宪章运动成员的接触，不难商定访问。当瓦茨拉夫·斯拉维克带我去哈维尔在伏尔塔瓦河边距民族剧院不远的家，一队警察跟踪我。另一队警察"守卫"哈维尔住的楼房，但他们未阻止我进入。

当哈维尔看见我，他非常高兴。我们的会见是异常友好的，表达个人的互相尊重。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局势，我们两人都是乐观的。哈维尔建议我们打电话给在维也纳的诗人和剧作家帕维尔·科侯特。那是我们的共同朋友，他近 20 年前被迫离开祖国。1967 年，科侯特是被诺沃提尼开除出党的捷克作家之一。"布拉格之春"期间，其党籍得到恢复，但后来胡萨克又将其开除，正如也将我开除一样。现在，我们在同他打电话和说话。我喜欢回忆那天晚上。

* *　　* *　　* *

导致 1989 年秋东欧一切苏联模式的政权垮台的戏剧，始于民主德国群众试图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逃往西德。每个人对西德驻布拉格大使馆及其土地上的景象肯定记忆犹新。

德国的大逃亡非同寻常地影响了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现实社

会主义的假象最终被粉碎了。9月底，成千上万辆被抛弃的东德特拉班特牌汽车塞满布拉格。火车一开始把昂纳克的“臣民”拉到西方，他们宁愿把汽车扔在那里。

看来，苏联人对自己的东欧领地已不感兴趣。波兰已丢掉了，匈牙利改革迅速转变为革命。苏联领袖在控制国内局势方面遇到更多的麻烦。东德政权于10月倒台。不需要有预见性，就能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政权也将垮台。但在表面上，局势看起来仍然平静。既没有任何罢工，也没有其它群众性抗议迹象。警力的动员登峰造极，看来雅盖什派为了救自己，似乎准备进行血腥镇压。

但是，后来一切突然变了样。

11月17日，德国占领期间纳粹袭击捷克高等院校50周年，当局批准大学生举行纪念集会。学生原计划在布拉格市中心以外的地方举行游行。但游行者临时改变方向，向市中心行进。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至今仍不清楚。

那天我恰巧在布拉格，因为我要向西方记者发表谈话。我住在雅罗什家，傍晚我们去看学生的示威游行。我们一直走到古老的维谢赫拉德[①]下面，在那里警察把我们包围起来，接着押到警察局。他们把我们扣押到晚上挺晚的时候。

在这期间，经过特别训练的警察部队袭击朝着瓦茨拉夫广场行进的学生。他们粗暴地殴打一些学生。这一残暴的干预激起人民的怒潮，引发在两周过程之中造成旧政权垮台的一系列事件。

翌日，我返回布拉迪斯拉发，参加首次数千人抗议现政权的示威游行。全国各城镇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与日俱增，布拉格的人数很快达到百万。当然，布拉格起了重要作用。那是共和国的首都，政府一切主要机关的所在地。冲突的结果不可能在其它地方决定。不过其它城市，尤其是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和摩

① 维谢赫拉德，布拉格的名胜古迹之一，原为捷克王公的驻地，有名人墓等。

拉维亚大都会布尔诺，也不落后。

在这些革命的日子里，成立了两个新的运动作为反对派的代表：布拉格的公民论坛和布拉迪斯拉发的公众反暴力。两者自由地把从持不同政见的前共产党人到天主教活动分子的各种反对派力量组织起来。这些团体之间迅速建立直接联系，其进一步行动是紧密协调的。

反对派提出三项根本要求：修改现行宪法，删去规定共产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的第四条；撤销各政党和运动自由形成的障碍民族阵线；结束马列主义作为惟一准许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

雅盖什的领导处在公众日益增大的压力下并为苏联领导所抛弃，决定下台。几天之内，政府（仍然是那个旧政府）向议会（也仍然是那个旧议会）提出重要议案，后者于11月29日通过。我相信，这一天标志着旧政权的结束。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由公民论坛和政府领导人的谈判确定，在斯洛伐克由公众反暴力协调中心和政府领导人的谈判确定。他们商定政权非暴力转变的特殊形式。“天鹅绒革命”的提法，是后来主要由外国记者根据这一进程的非暴力性质提出的。

1989年11月26日，瓦茨拉夫·哈维尔和我肩并肩出现在瓦茨拉夫广场麦兰特里赫出版社楼房有名的阳台上。我们象征着捷克和斯洛伐克反对派力量在反对斯大林主义制度残余的斗争中的联合。

对这一珍贵的时刻，我记忆犹新。我想起，在通向阳台的房间里发生了争执，谁把我们领到阳台上去。这本身是个馊主意，但楼房是民族社会党的财产，其主要领导人想以此赢得信誉。后来，有人把哈维尔和我使劲往前推到阳台上。那是捷克著名的电影摄影师斯坦尼斯拉夫·米洛塔，他当时是公民论坛的主要协调人。

当我们露面时，人群发出强烈的反响，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

际。在那里站着数十万欢呼的人。我在思想上回到20年前即1968年的“五·一”检阅。我不能把这些时刻同任何别的时刻相比。

这样，对我来说，1967年10月我们开始反抗诺沃提尼时开始发生的一连串历史性事件就结束了。从那时以来，出了多少事情！发生了多少戏剧性事件！有希望的时期、失败的时期、还有耐心反抗的时期互相交替。现在，我同比我几乎年轻一辈的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并肩站在这个阳台上。我们两个都知道，下面这群人相信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将竭尽全力，使我们的祖国最终获得自由。

捷大事略表

1918.10.28	奥匈帝国于一次世界大战末崩溃，捷克和斯洛伐克在分别受奥、匈数百年上千年统治之后，组成统一国家。捷统治阶级对内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对外奉行亲西方政策。
1921.5.14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
1938.9.29	奉行绥靖政策、试图把祸水东引的英法，不惜出卖捷：同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强迫捷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
1939.3.15	纳粹德国得寸进尺，占领捷克全境，成立捷克与摩拉维亚保护国，在斯洛伐克扶植傀儡政权。
1942.5.27	捷伦敦流亡政府派遣的伞兵小组，刺杀德代理总督赖·海德利希。
1944.8.29	欧洲最大的反法西斯起义之一——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爆发。
1945.5.5	布拉格人民举行反对德国占领的起义。
1945.5.9	苏军解放布拉洛等地，随后捷全国宣告解放。
1945.6.19	捷开始惩治法西斯罪犯和叛徒，没收敌伪财产。
1946.11.1	苏台德区德族人结束从捷迁德，计有217万余人迁走。

1948.2.25	被称为“二月事件”的政府危机，以接受联合政府中的右翼党部长辞职、任命捷共提名的新政府的办法解决。
1949—1950	经过自1945年秋和1948年春起先后把500人和50人以上企业收归国有，捷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并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
1952.11.20—27	捷法院审判以前捷共总书记鲁·斯兰斯基为首的所谓“反国家阴谋中心领导人案”，11人被判处死刑，三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1954.4.21—24	审判所谓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案，古·胡萨克被判处无期徒刑。
1960.7.11	捷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缩小斯民族议会权限，撤销斯行政委员会。
1962—1964	捷经济发展停滞，导致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破产。
1967.1.1	捷开始贯彻执行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主要原则。
1968.1.5	亚·杜布切克接替安·诺沃提尼，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进行“布拉格之春”改革试验。
1968.3.23	苏、波、（民）德、匈、保和捷六国党政领导人在德累斯顿举行会晤，苏等五国对捷进行围攻。
1968.4.5	捷共中央通过《行动纲领》，强调要从本国情况出发，纠正冤案，发扬民主，实行自主经营和联邦制等。
1968.7.14—15	苏等五党领导人在华沙举行会晤，捷方建议先由捷党分别同各党举行双边会谈，未派人与会。会后，苏等五党联名致信捷共，对捷进行指责，捷共复信逐点加以驳斥。

1968.7.29—8.1	捷苏两党主席团（政治局）在捷苏边境捷方一侧的切尔纳小镇举行会谈，陷入僵局，只商定两天后举行多边会谈。
1968.8.3	苏、捷等六党领导人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会议，未直接谈及捷国内问题，但发表的联合声明宣称捍卫苏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国际主义义务”。
1968.8.20	苏等华沙条约五国军队入侵并占领捷。
1968.8.23—26	在捷人民强烈反对和世界各国普遍谴责下，苏方不得不转而同被挟持到莫斯科的捷领导人举行“会谈”，软硬兼施，迫其就范。
1968.10.16	苏同捷签订苏军在捷“暂时留驻”条约，其它四国军队从捷撤离。
1969.1.1	捷开始实行联邦制。
1969.1.16	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扬·帕拉赫为抗议苏联占领，在该市中心瓦茨拉夫广场自焚。
1969.4.17	古·胡萨克取代亚·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开始在捷推行“正常化”。
1969.8.19—21	布拉格等市爆发反占领示威，当局出动军警镇压。
1969.9.25—29	捷共中央全会撤销该党主席团1968年8月21日谴责苏等入侵的决议。
1970	捷共更换党证，将占总数近三分之一的约50万名党员开除或除名。
1973.12.11	捷和联邦德国签署关系正常化条约，德方承认慕尼黑协定无效。
1977.1.1	捷持不同政见者发表《七七宪章》。

1989.11.29	捷联邦议会取消宪法中有关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款和本着马列主义精神进行教育的提法。新的掌权者对内推行多党议会民主制和私有化，对外奉行“返回欧洲”的政策。
1991.6	苏军全部从捷撤离。
1993.1.1	捷解体，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杜布切克回忆录
作者＝
页数＝３０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